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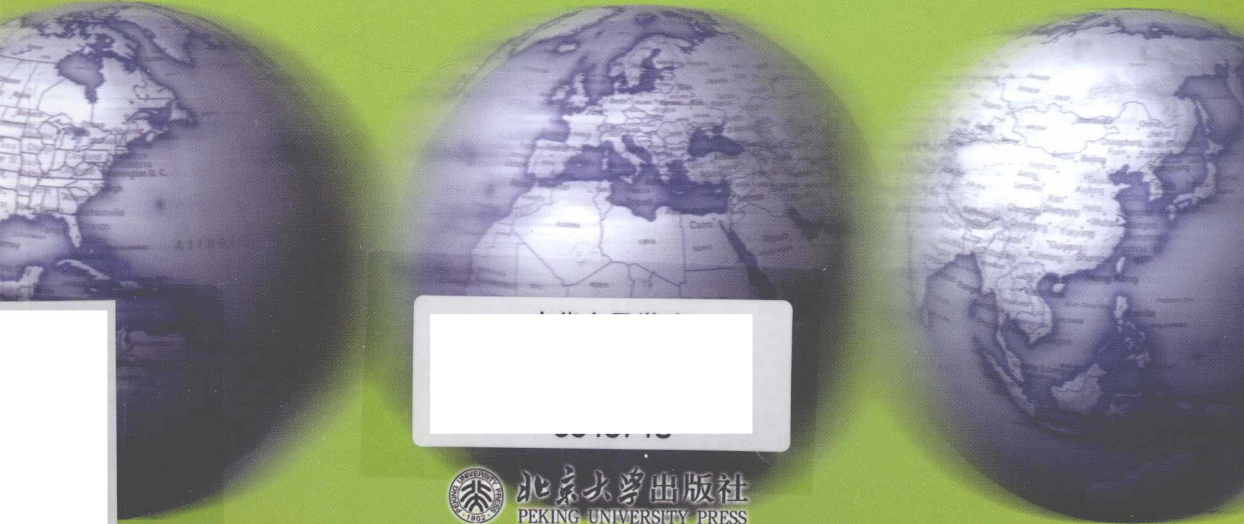
21 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 乡村传播学

##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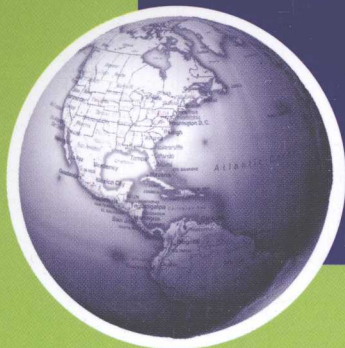
李红艳 著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乡村传播学

#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本书从乡村传播学的学科建构出发，在界定了乡村传播学的内涵和外延之后，简要论述了乡村传播学在中外的发展历史、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继而分别从乡村传播学的传者、信息内容、传播模式、受众理论、传播制度、效果研究角度进行了论述。最后对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作了概括。

本书的主要特点：一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乡村传播学理论的著作；二是，对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新的视角；三是，坚守历史视角，将乡村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放置在宏观的社会发展背景中，在丰富了乡村传播学学科内涵的同时，又延展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潜在可能性。

■ **李红艳** 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乡村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传播学理论与实务、乡村传播学理论、媒介变迁与社会心理研究等。主要著作有：《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传播关系之实证研究》、《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中国乡村传播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媒介组织学》、《新农村：帮你经营乡村文化》等。发表相关论文40余篇。参见乡村传播研究所网页：[www.caucrcc.com](http://www.caucrcc.com)

ISBN 978-7-301-16359-7



9 787301 163597 >

定价：32.00元

中华书局

G206  
48

21 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 乡村传播学

R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李红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传播学/李红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16359-7

I. 乡… II. 李… III. 乡村-传播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9447号

**书 名:** 乡村传播学

**著作责任者:** 李红艳 著

**责任编辑:** 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359-7/C·05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6.75印张 310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目 录

|                                  |       |
|----------------------------------|-------|
| <b>第一章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及发展脉络</b> ..... | (1)   |
| 第一节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             | (2)   |
| 第二节 乡村传播学在国外的发展脉络 .....          | (6)   |
| 第三节 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          | (15)  |
| 第四节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意义 .....             | (29)  |
| 第五节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             | (33)  |
| <b>第二章 乡村传播学之传者</b> .....        | (40)  |
| 第一节 乡村传播学之传者概况 .....             | (41)  |
| 第二节 乡村传播学之传者特征 .....             | (45)  |
| 第三节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传者 .....             | (51)  |
| <b>第三章 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研究</b> .....      | (71)  |
| 第一节 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理论 .....             | (71)  |
| 第二节 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类别 .....             | (78)  |
| 第三节 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特征 .....             | (80)  |
| 第四节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研究 .....           | (82)  |
| <b>第四章 乡村传播学之传播模式</b> .....      | (96)  |
| 第一节 国外乡村传播学模式 .....              | (96)  |
| 第二节 中国乡村传播学模式 .....              | (101) |
| <b>第五章 乡村传播学之媒介研究</b> .....      | (118) |
| 第一节 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发展的主要观点 .....       | (118) |
| 第二节 不同国家的媒介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     | (124) |
| 第三节 中国乡村媒介概述 .....               | (127) |
| 第四节 中国乡村大众媒介的生态环境 .....          | (147) |
| <b>第六章 乡村传播学之受众</b> .....        | (162) |
| 第一节 乡村传播学之受众概况 .....             | (162) |
| 第二节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受众 .....             | (174) |

---

|  |       |
|--|-------|
| <b>第七章 乡村传播学之传播制度</b> .....            | (186) |
| 第一节 乡村农业传播制度 .....                     | (187) |
| 第二节 城乡关系传播机制 .....                     | (194) |
| 第三节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传播制度 .....                 | (198) |
| <b>第八章 乡村传播学之效果研究</b> .....            | (210) |
| 第一节 乡村传播学之微观效果理论 .....                 | (210) |
| 第二节 乡村传播学之宏观效果理论 .....                 | (215) |
| 第三节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效果研究 .....                 | (228) |
| <b>第九章 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势</b> .....         | (245) |
| 第一节 大众媒介与乡村发展研究的拓展 .....               | (245) |
| 第二节 乡村信息化网络建设和农业科技传播<br>与推广研究的持续 ..... | (251) |
| 第三节 乡村传播组织制度研究 .....                   | (254) |
| 第四节 乡村社会性质与乡村传播特性的理性思考 .....           | (257) |
| 第五节 城乡传播的差异性研究 .....                   | (258) |
| 第六节 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主位思考 .....                | (261) |
| 后记 .....                               | (264) |



## 第一章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及发展脉络

确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播学,一经诞生便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组织学、语言学、文学、哲学、新闻学和历史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联系在一起。在传播学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学科的研究者都以各自专业视角研究的影响力,推动和促进着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拓展。除此之外,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的冷战时期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的对立、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杆的发展观的普遍化等影响力,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均有所体现。换言之,在相关学科研究的影响力和社会发展宏观背景的双重作用下,传播学研究在控制研究、内容分析、效果研究、传者研究和受众研究等五大领域的拓展中,逐渐衍生出一些新的学科分支:以大众媒介体系为研究对象的大众传播学、以组织信息传播体系为研究对象的组织传播学、以人际关系建构为核心的人际传播学、以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为核心的发展传播学、以对全球化文化传播体系的关注而形成的跨文化传播学、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等,来自于不同国家、地域的学者们,由于自身处于人类传播信息体系的不同位置中,各自携带着自身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特色,在传播学的上述分支领域中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合力则将传播学学科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研究平台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媒介技术的日益大众化、新媒体形式的日益普及化,对原有大众媒体体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21世纪的传播学研究将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在这种学科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媒介体系的更新过程中,乡村传播学是如何发端、如何推进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一门学科的呢?为了厘清乡村传播学的发展脉络,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描述:乡村传播与乡村传播学、乡村传播学研究的研究对象和发展脉络,以及乡村传播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等。

## 第一节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从对乡村传播概念的解析中,来确定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本节的主要内容。

### 一、乡村传播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乡村?乡村(rural,有时又称 country),就社会发展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所使用的乡村概念,与当时社会发展的整体结构、城市化进程、乃至大众教育的普及和精英文化的衰落等因素,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就宏观而言,乡村的概念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界定:一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二是作为人类对消逝的生活世界的心理追寻而存在。

就社会历史发展历程来看,乡村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的产物,是人类生活演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乡村的概念也处在变化中。换言之,不同时代的不同群体在使用乡村概念时,和当时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向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即乡村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概念。从世界范围看,可以从经济区域的视角将乡村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原始型乡村、古代型乡村、近代型乡村、现代型乡村、未来型乡村。

把乡村作为对已存在的或是令人怀念的文化符号和生活状态的向往,是对乡村概念的又一种宏观解读。这一点在西方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很多的描述。如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对18和19世纪英国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的描述,又如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苔丝》,虽然故事主线是描述在工业资本日益占领农村,个体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大背景下乡村百姓的命运,但是其中有大段的关于英国乡村风景的诗意描述。就中国而言,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始,便有学者体现了这种倾向。他们赋予了乡村很强烈的情感,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他把乡村看作是一个价值的共同体,而不是权利的共同体。<sup>①</sup>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的逐渐冲击,对乡村的这种人文意义上的关怀,便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精英和知识阶层或多或少对自身“所失去的生活年代”的情感维系上。因而,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世界里,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乡村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是人类精神世界里的一个梦想,在形而下的意义上则

<sup>①</sup> 顾红亮:《梁漱溟的乡村概念与生活世界》,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四十六期,2006年1月27日, [www.cuhk.edu.hk/ics/21cn](http://www.cuhk.edu.hk/ics/21cn)。



是人们脱离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烦恼而潜意识依托的解救途径。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种意义上的乡村是人类对已失去的童年时代的怀恋和向往。这种情感维系的形态也以各种形式呈现在知识阶层的笔下。例如,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农民在近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自我觉醒和现代化意识的启蒙,体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中的农民形象,也经历自我主体意识萌生与成长的精神嬗变历程,在一定意义上,对农民形象的构建特征的转化是知识阶层对乡村生活现实的一种感知。换言之,对乡村人文情感的认知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一种是对乡村生活场景的怀念,一种是基于农民形象的认知。

就微观而言,可以从地理区划对乡村进行界定,也可以从经济形态进行界定。国内外对乡村概念的理解和划分标准不尽相同,一般认为与城市相比,乡村在人口密度、聚居规模、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居民生活方式及景观上有自身的特点。

就人文地理形态而言,世界各国规定的城镇标准各不相同:(1)按居民点达到一定的人口数作为城镇标准的。(2)规定各级行政中心为城镇:这类国家有埃及、蒙古、土耳其、巴西、海地、危地马拉、毛里求斯、哥斯达黎加等国家。(3)规定首都或某几个居民点为城镇,其余为乡村。规定首都为城镇,其余为乡村的国家有布隆迪、冈比亚等;规定某几个居民点为城镇,其余为乡村的国家有苏丹、摩洛哥、贝宁、乍得等。(4)按居民点的人口数量及其非农业人口比例规定城镇标准。如前南斯拉夫、俄罗斯等国家。(5)按居民点的人口数量及职业构成规定城镇标准。如印度规定城镇指地方行政中心以及人口超过5000人、人口密度大于390人/km<sup>2</sup>、至少有3/4的成年男子不以农业为主的居民点。

而中国第一次对城镇的行政地位做出明确规定的是国务院1955年6月9日所作的《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规定市、镇是工商业和手工业的集中地。镇是属于县、自治县领导的行政单位。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可以设置镇的建制。不是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但聚居人口在2000以上,有相当数量的工商业居民,在确有必要时可设置镇的建制。1984年11月22日,根据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国务院以国发[1984]165号文件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建制标准的报告》对1955年和196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设镇的规定作了调整,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镇的建制;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000的,可以建制;总人口在2万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的,也可以建制。

根据上述城市规划的设定,中国的城镇规划不仅与世界各国的设置有一定差异,而且各地区在城镇设置上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可以说,是不同标准混

杂为一体的城镇规划标准,这种规划标准一方面具有行政特色,另一方面又具有地理人文特色,这也对从学理上和实践中对中国城乡之间认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就经济形态而言,乡村是与城市相对应的,而与农村是一致的。“乡村与农村具有很大的重合性,农村是乡村的主体,乡村地区的绝大部分是农村地区。但是,二者毕竟是有区别的。这不仅表现在二者的范围有所不同,更表现在二者划定对象的角度不一样。农村的概念,是一个产业区域概念,指的是以农业为基本产业的地区。乡村的概念,是一个管理区域概念,指的是乡政权管理的地区”<sup>①</sup>。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标志着社会活动方式的区域差别;农村是与工商业相对照而言的,标志着产业布局的区域差别。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乡村的范围要比农村的范围大一些。所谓乡村,是指由乡(及镇)与村两种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活范围。我国《城市规划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城市的法律含义,是指直辖市、建制市和建制镇。一般而言,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称为城市,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

从社会文化取向来看,乡村强调的是城市和乡村居民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乡村是低密度人口居住地区,城市是高密度人口居住地区。乡村居民被认为是固守传统价值体系者,有虔诚宗教信仰、注重家庭、尊敬长者、具有强烈的社区意识,并对社会政治现状变迁抱怀疑态度,而城市居民则有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

就学术思考来说,乡村概念在社会发展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乡村概念的界定应该与对乡村社会发展变迁过程相对应。鉴于此,乡村社会学对乡村概念的认知主要有两个视角,一种认为传统乡村社会正处于变迁中,应该研究乡村社会面临城市化压力时的困境与现实;另一种则认为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一个同质的单一社会形态,而是具有多元与异质的社会文化空间体系。就研究实践而言,这两种思考路径只能说是一种思考框架或范畴,本书所界定的乡村概念,就宏观意义而言,是指人类对已失去的童年生活的一种潜意识渴求的符号,是人们对传统生活和远古时代记忆的一种标志,它更多地存留在人们的心中,不可复原,也无法复原;从微观意义上而言,乡村是指与城市对应的,由村民居住的社会区域,凡是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们都可以称之为村民,具有城市户口而居住在此地的也称之为当地的村民,没有城市户口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也是村民,从事农业劳动的当地居民既是村民也是农民。

“传播”(communication)词源于拉丁文(communis),其意是“与他人建立共

<sup>①</sup> 秦志华编著:《中国乡村社区组织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同意识”。研究者一般从三个视角上认识传播现象：一是认为传播是一个信息共享的过程，施拉姆指出：“我们可以给传播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它即是对一组告知性符号采取同一意向。”他认为，传播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是建构了传播关系的人使传播本身显得神奇而富有魔力。而传播关系本身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人们总是带着第三只耳朵参与到传播关系中来，试图理解传播双方言语、行为等后面的背景及含义。传播关系是一种结果，建构传播关系的过程及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是研究传播的核心命题。<sup>①</sup>二是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产生影响的过程，侧重强调传播的目的性和指向性。三是“过程”说。传播不是一个被时间和空间所固定的静止实体，而是一个恒动过程，用以运送意义，传递社会价值，并分享经验。另外还有传播的互动说、反应说等。

乡村传播中的传播概念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强调呈现传播关系。将乡村社会内部以及与外界发生的社会关系的传播特征进行描述和评介；二是强调传播过程。将乡村社会内部信息传播的流程以及与乡村社会外部的信息传播过程进行描述和评介；三是强调传受双方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平等性。所以说，乡村传播首先侧重描述乡村社会内部信息传播关系的建构，但并不涉及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动物与植物之间的传播关系的发生过程，而这种传播关系的发生载体是乡村社会及其与乡村社会相关的城市社会形态，或者是现代化、工业化较为完备的社会形态，因此传播关系的建构双方就宏观而言是城乡之间，就微观而言是乡村社会内部村民之间传播关系的建构以及乡村社会的外出者、乡村社会外部的进入者与乡村社会成员之间传播关系的建构过程；其次，乡村传播侧重凸显出上述传播关系的产生流程，并对其中的各诸多环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再次，乡村传播强调传者和个体受众之间的角色的平等性，强调传受双方的共同参与性和一致行动力。

换言之，乡村传播是指对发生在乡村社会内部、乡村社会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传播现象的总称，包括对传播关系的建构和传播过程发生的描述；是对以地理区划为标准的乡村社区内部与城市社区之间所发生的传播行为、传播机制、传播生态环境、传播模式、传播系统等诸多传播现象的统称。乡村传播的研究内容包括乡村社会的传播类型、传播模式、传播效果、传播文化、传播者、受众以及与乡村社会发生信息交流的传播活动类型等。

## 二、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乡村传播学是围绕乡村传播诸种传播现象进行探究的学科，它关注以信息

<sup>①</sup>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 页。

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内部及其与外部之间的传播机制、传播模式、传播类型、传者、受众、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的研究,关注在乡村传播系统中传者与受众的角色、权利、身份与地位;关注所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构成、来源及其渠道;关注乡村传播系统的运行模式及其效果;关注大众媒介与乡村传播系统之关系。

换言之,乡村传播学是以乡村社会内部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社会形态的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行动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为主要手段,通过对传播技术、传播控制、传播机构、传播群体等在乡村社会中构建过程的研究,在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发展学等多元化学科视野下,对乡村传播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体系进行全面探索的一门学科。

## 第二节 乡村传播学在国外的发展脉络

### 一、乡村传播学在国外的发展历程

就历史渊源而言,对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关注首先发端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对话录·斐德罗篇》中记载说,苏格拉底之所以选择在城邦生活的缘故,是因为在乡村社会中信息传播的容量不足以吸引他的缘故:“我爱好学习,树木和田园不会教我任何事情,而城里的人可以教我。”<sup>①</sup>据历史记载,早期罗马人对乡村生活的兴趣远远大于城市,罗马主要的领导人物均生活在乡村并从事耕种生活,因为“人们宁愿过乡村人简朴勤劳的生活,而不愿过罗马市民游手好闲的生活”<sup>②</sup>。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古希腊时期与古罗马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的趋势,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人们对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差异的初步认知。

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则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建议君主们施行以城市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只要君主们“使自己的城市森严壁垒,备足粮草,对于乡村则不要有任何顾虑”<sup>③</sup>。完全将乡村社会的管理排斥在国家政治管理的范畴之外。

但无论是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还是文艺复兴时期,在没有工业化的社会中,城市和乡村的区分与现代社会中的划分有较大的不同,因此他们所说的城市更多的是与古代的城邦概念联系在一起,是现代城市的雏形,而乡村的概念则更接近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区域概念。

近现代意义上对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状况的研究,主要与工业革命、科学革命

① 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② 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4页。

③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著,潘汉良译:《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0页。

和政治革命的推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工业革命之后,随着传统社会格局的逐渐变化,城市化规模的扩大,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形成,迫使传统乡村社会组织衰落瓦解的同时,世界不同地域也以各自的路径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城乡差异的问题日益凸现,研究者和管理者开始关注乡村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下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在工业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大约在1770至1914之间)。而对乡村社会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在乡村社会逐渐解体中来到城市底层的城市外来者生活状况的关注,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早期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著作中,主要的代表性人物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

马克思、恩格斯对乡村社会发展以及与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的观点上。首先,他们认为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乡村就地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是乡村发展的未来之路,而不是以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模式来发展,以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为动力;其次是对新兴的城市工人阶级构成的研究。恩格斯在其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则开始思考如何将各个行业的工人团结起来,发动工人运动。该书客观上对从乡村来到城市工作的外来移民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对工业化所导致的城市问题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了工业社会中存在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原有的传统社会阶层的冲击展开了充分的论述。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为了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进行了长达21个月的观察和记录,在研究方法上对认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史的变迁积累了宝贵的研究经验。

涂尔干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对乡村传播学发展而言,其主要的观点体现在他的《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指出,传统农业社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征是机械团结,这种关系以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化的个体团结在一起,鉴于农村社区中社会分工的程度较低,同质化个体在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评价以及对事物的情感反应上都有高度的一致性,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稳固和高度一致的集体意识。因此个体人格的自由发展在此受到了限制,人与人之间的稳固关系是依靠强大的集体意识在做支撑,个体如要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势必要放弃自己的独立自由的发展,“这就是我们把这种团结称为机械团结的原因,这并不是说它是通过机械手段或人工手段产生出来的”<sup>①</sup>。如果说这种传统农村社区的内部特征是机械团结的话,其外部特征则是以法律的

<sup>①</sup> [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1页。

形式对人的压制(repressive),这种压制体现在对触犯集体行为和集体意识的个人的社会活动中,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人如果被认定为是罪犯,并不会得到理性意义上的惩罚,而是从道德立场、从集体情感的角度进行惩罚,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这种对传统社会逻辑的越轨行为,只是为了从道德情感上得到宣泄。<sup>①</sup>因此在这样的农村中,个体是具有相似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充分而完全地社会化了,并不具备个体的特性,机械团结正是以这种群体的相似性为基础的,因此机械团结越是发挥到极致,个人就越不是自己,越受到社会的控制。对机械团结相对应的是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有机团结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的基础上,其所对应的经典社会形式则是工业社会和都市生活,在这种社会形式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每个个体完成的社会职能越来越细化了,在个体的异质性成为显著特征的同时,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原有的传统农村社会中的集体意识被个体意识所取代,法律对人的惩罚形式也不再是压制性的,而是以恢复性为特征。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执行法律的特征体现了理性和宽容的原则,犯罪行为不再被视为是对整个社会的威胁,而是对被侵害方的一种合理补偿行为的考虑。<sup>②</sup>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

涂尔干在描述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变迁的过程中,实质上展现了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希望,依靠法国大革命所积淀的个人自由主义理想是他所说的现代工业社会制度的重要表征,这种制度本身是工业社会和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

马克斯·韦伯的主要声誉集中在社会学理论及方法论、经济学、宗教学、法律及政治学等领域。而他早年对德国工业化过程中乡村问题的关注虽是在其博士论文尚未完成的时候,但对其后来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19世纪后期的德国,由于东部大庄园生产方法的变化,导致德国农业工人的外流和外国移民的增加,韦伯参加了当时德国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uer Sozialpolitik)关于劳动力问题的调查,主要是针对德国西南、西北、北部和东部三千多名地主实施问卷调查,韦伯负责对易北河以东省份的问卷进行分析和评估。韦伯的研究结论指出,德国农业社会中农业工人身份的转换,并不是基于商业伦理的考虑,而是出于对心理自由的迷恋,农业工人的基本动机不是为了改变劳资关系,也不是为了获得一块土地,而是为了谋求社会地位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显

<sup>①</sup> [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7—72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89—91页。

示了德国农业工人在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却也表露了他们在经济竞争中的劣势。结合韦伯在同一时期对证券交易所的调查,他得出结论:德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自发的商业伦理,而商业文化本身既可以创建或者摧毁原有的文化价值观,二者是同时进行的,在摧毁家长制的文化价值观的同时,扩大了农业工业在社会生活中各种机会;人们的经济行为与追逐经济利益时的观念是不可分割的,这些观念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有不可分割的关系。<sup>①</sup>

与学者们的关注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其他各界对乡村生活中正在逐渐消失的文化形式、经济形态和人与人之间交往模式转变的关注也成为重要的方面。主要的代表性著作集中在文学艺术作品和社会历史文化的相关游记中。文学艺术作品类别主要包括描述乡村田园风光以及乡村文化在工业社会的冲击下变迁的小说、散文和绘画作品。其中,作为工业革命先导者的英国,文学艺术作品的表现无论是出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还是出于对乡村社会文化传统的赞誉,亦或是对工业文明对乡村社会的冲击,流传下来的作品最为显著,文学家有勃朗特姐妹(Charlotte Bronte、Emily Bronte)、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哈代、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等等,艺术家有乡村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等,无论是《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还是《德伯家的苔丝》、《荒原》、《孤独的收割人》、《骑马返乡记》、《干草车》等,在一定程度上均体现了对于乡村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的深深依恋。与英国比邻的法国,工业革命不仅在时间上晚于英国,其工业化速度也缓慢了许多,呈现在同一时期的法国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法国乡村,更多地是以浪漫主义的色彩描绘传统乡村社会的美好,艺术家将笔触更多地集中在描绘法国乡村的自然风光和抒发个人的主观感受上。而瑞士德语作家凯勒(Gottfried Keller)的《塞尔特维拉的人们》中,作家所描述的塞尔德维拉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存在。凯勒在虚构的想象世界中,以嘲讽的手段描写了小人物的生活,在展现对瑞士民族性批判的同时,也隐含了作者对理想乡村生活的向往。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乡村传播学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一战和二战中各国政府和媒介组织所积累的对于媒介力量的认知,使得人们对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充满了浪漫的憧憬。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形式的日益更新和普及,使得如何利用大众媒介来促使乡村社会发生转变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这种憧憬和关注与二战之后的冷战思维模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也与人们对如何促使民族国家发展的希望联系在一起了。人

<sup>①</sup> 参见〔美〕莱茵哈特·本迪克斯著,刘北成等译:《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3—38页。



们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也因此转入到另一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伴随着工业化的长足进展,通过什么样的手段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发展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因此,作为职业身份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居住地乡村,成为各国政府竭力综合发展的一种社会场所。这一阶段发展思维模式开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极世界中延伸,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关注也不例外。

在这种对发展认知的差异中,乡村社会在各国政府的诸种行动措施中发生着转型。例如,就美国社会发展而言,对乡村社会的关注是以教育、改造和影响为核心的。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由于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关注是从两个视角展开的,一个是从社会学角度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在美国各州农业实验站建立之后,由于政府的资助,对于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研究成为热点。杂交玉米的实验便是早期扩散研究的成功范例;二是对城市移民的关注。随着美国乡村社会的逐渐转型,村民与市民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剥离了,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出现同质化倾向,学术界对乡村社会的关注也日益转向了。而英国,由于乡村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已经基本完成了,遗留下来的乡村社会及其发展在二战之后并未成为政府所关注的发展重点。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在的地区,如中东地区,南美地区,非洲等地则成为发达国家以西方模式为发展标杆、借助大众媒介等技术手段推动当地乡村社会发展的试验田。这种西方中心模式的乡村发展理念,不仅延续了人们对二战时期新兴大众媒介传播效果的乐观主义信心,而且是以进化论的思维模式,将发展中国家看作主流边缘化发展意识下世界格局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20世纪50至70年代,出现了一批从外部力量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的初期阶段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村民为对象的效果研究,另一类是以村落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农业推广制度研究。以村民为对象的效果研究主要是围绕传统人与现代人如何在外界信息的作用下发生改变的,而农业推广制度则以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形式以农业技术的培训,宣传和推广为核心,以期实现在农业现代化技术理念下的乡村社会的转变。无论是个体传播效果研究,还是农业推广组织的技术型推广,其背后的理念则几乎是一致的,前者认为可以借助大众媒介技术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后者希望借助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模式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社会在这种发展模式,缓慢地改变着乡村社会的发展进程。

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有美国学者勒纳(Dannel Lenner)、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施拉姆等。由于这一时期大众媒介体系日益成熟,人们对大众媒介影响力的认可重新获得了认知。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开始迷恋大众媒

介对乡村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希望借助大众媒介这一信息传播机制来推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以乡村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向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社会转变。

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指出应该按照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来借助大众媒介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施拉姆则在1964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中指出,大众媒介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尤其重要。罗杰斯1966年出版《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一书,强调了大众传播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作用,认为社会变革的过程是创新与发明的传播推广过程,通过媒介普及以及人际传播相结合,使人们接受新事物、新观点、新技术、新思想。20世纪70年代,他又提出了创新扩散的“四阶段论”。在关注个人层次上的现代化上,罗杰斯将大众媒介视为中心环节,五个投入环节(原因):读写能力、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年龄和世界主义精神,经由大众媒介这个转换器的作用,即可产生五个产出环节(结果):移情性格、务实和治家的创造性、政治知识、成就冲动和进取心。<sup>①</sup>

在这样的指导理念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依照发达国家模式建设乡村社会、促使国家现代化的各种努力,尤其是普及大众媒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较为显著,但实践证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强行推行乡村社会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试图改变乡村社会信息传播模式的方式,虽然是一种对乡村现代化的努力,如苏维埃的集体化农庄、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等,但这种由“国家发起的极端现代化农业”所依赖的简单化、静态化、公式化的模式,屏蔽了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从而出现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投入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差异状况。20世纪前半叶政府组织和相关社会组织的历次社会实验表明,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应符合各国的国情,若以发达国家的模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其中的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社会政治制度乃至宗教因素会以合力的形式,终将导致这类社会实验的失败。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中心模式的反思与批判,社会各界对大众媒介功能的冷静思考,以及冷战思维模式的逐渐消解,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发展乡村社会的思维模式发生了转变。如何将传统的农村社会转变为适应新型社会形态的现代社会模式,更成为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努力实现的目标,乡村传播学的研究进入了当代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随着20世纪前前中期所积累的乡村社会发展与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所带来的启示,以及民主参与观念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普及,以借助外界力

<sup>①</sup> 张咏华著:《大众传播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1页。

量向乡村社会灌输信息的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以谁为传者,以谁为受众,以谁的感受和理念为核心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并不断地在实践中被经验着,参与式发展思路和行动研究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乡村传播学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成熟期。主要的转变体现在:依然关注乡村社会的发展,但摒弃了自上而下、由内及外的传播理念;以理解和学习视角,进入乡村社会以及与外界的相关互动过程中;注重传受双方的平等角色和地位,力图在双方互动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发展;研究路径选择参与式和行动研究方式,以期获得更为丰富的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资料。乡村传播学研究 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乡村发展理论相结合,将对乡村社会的研究领域和路径进一步拓展,这一部分在乡村传播学与乡村发展理论中将进行详细论述。

## 二、乡村传播学的当代发展

1978 年,亚洲发展银行出版了《乡村的亚洲:挑战与机会》(*Rural Asia,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其中有专章讨论乡村发展的设定与设计,可以说是乡村发展概念基本理论的积淀。该书将乡村发展的理论架构划分为范围与取向,社会政治环境与乡村发展的关系以及操作指南等三个方面。其他有关乡村发展的理论,主要有“乡村发展的认定与设计论”、“现代化过程与乡村发展的人类学理论”、“农业与工业在乡村发展中角色及相关性的理论”、“乡村组织在乡村发展中角色的理论”等四种。而对乡村发展的定义主要包括:(1) 大卫·李(David A. M. Lee)及朝锐(D. P. Chaudhri)提出的整合乡村发展概念,其目的在于:① 改善乡村大众的生活水准,保障其基本安全及对食、衣、住以及就业等的基本需求;② 增加乡村地区的生产力,使之免受自然的灾难,并改进与其他部门的互惠关系;③ 提出自立的发展计划,并使大众都参与发展的计划;④ 保障地方的自立性及减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干扰。(2) 伊那雅突拉(Inayatullah)在其编印的《乡村发展的研究:亚洲的若干经验》一书中,把乡村发展的意义着眼于三方面:一是传播适当及改进农场技术的过程;二是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人民接触外界而产生新技术与新态度的过程;三是包含技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因素的过程。(3) 华兹(Raanan Weitz)在《变迁世界的乡村发展》一书中指出,乡村发展着重在欠发展国家寻找能促进发展过程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与人力发展理论方面的研究。<sup>①</sup>

如果说当代乡村发展理论是一种宏观视角的话,现代意义上的参与式发展理论及实践则是一种更为平等、更为民主、也更为微观的视角。参与式发展理论

<sup>①</sup> 官景辉主编:《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7 页。

源于 50 年代早期至 60 年代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实施发展援助时所采用的“社区发展战略”。具有文献记载的概念则来自于英国学者 R. 钱伯斯,他首先提出了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并倡导了在广泛的范围内应用参与式农村评价(PRA)的方法,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的图圈。70 年代末期,随着对贫困人口贫困化因素的反思,在就业领域、经济领域等开始呼吁将参与作为其基本的战略发展的因素来实施。一些重要的参与式工具和方法也逐渐被应用于发展实践中。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参与式发展理论及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真正开始普及。

现代意义上的参与概念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引入中国,有关 Participation 的名词可见于 FAO、UNDP 等国际组织出版物的中译文中。1989 年原北京农业大学综合农业发展中心(CIAD)翻译了德国的《区域农村发展》一书,书中正式对“参与”、“目标群体”等概念进行了中文的解释。从 1989 年开始该中心按书中的原则以及“FSR”的原理在河北省开始了有关参与式的实践。90 年代以后,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开展了有关资源、社会林业的研究工作。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可以说代表了早期参与式发展方式在中国的主要活动。90 年代初期,钱伯斯在云南办了 PRA 培训班,对后期参与式实践在中国的推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参与式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参与”意味着发展对象在发展过程中的决策作用,他们不仅执行发展的活动,同时也作为受益方参与了监测和评估。(2)“参与”是政治经济权力向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进行调整的过程,即要对弱势群体进行赋权。这一思想更多地受到自由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为后期形成的有关施政与发展的理论产生了影响。(3)“参与”意味着在社会中构建社会角色相互平等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不仅意味着磋商,而且还意味着社会角色的基本愿望和知识体系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这一思想是 20 世纪 90 年代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方法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4)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参与式理论在实践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倡导,也就是说,利益相关者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共享资源、共享决策。

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核心是赋权概念,赋权的核心是对参与和决策发展援助活动的全过程权力的再分配,即增加社区和穷人与妇女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赋权给穷人和妇女的过程,是重新唤回穷人和妇女对自身的知识和能力的自信、重建自尊的过程,这对构建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增加社区的社会

<sup>①</sup> 李小云主编:《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 页。

资本来说至关重要。<sup>①</sup>

与参与式发展理论相关的是过程理论。过程理论认为,任何乡村发展实践是一过程,应认真研究、分析并重视这一过程。只要过程的每一步都做得很好,结果肯定不会差的。过程理论还强调,参与式发展应当提供一种正确的理念和知识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但又不影响当地人的自我发展及自我组织能力,不让他们对外来的发展资源产生依赖感,强调综合提高人的能力。<sup>②</sup>

乡村传播学中的乡村发展概念的含义包括以下内容:

#### (一) 侧重参与式行动研究

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是近年来出现的、用于对社区和群体进行干预、发展和改变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它是在许多国际发展机构和大学的项目以及世界各地无数的当地社区组织的共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PAR过程是一个不断重复提升的循环过程,研究人员和社区开始于对主要问题的识别确定,然后开展研究和组织行动,并从所采取的行动中总结经验,再开展新一轮的研究和行动的循环。行动研究项目过程持续进行,参与者不断反思,从他们的行动中去学习,然后在试验地上继续开始新的行动。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承诺、创造性和想像力。PAR与PRA不同,PRA是一种评价技术,是PAR过程的一部分,不能包含整个行动反思循环。<sup>③</sup>

#### (二) 侧重参与式学习与行动

参与式学习与行动(participatory learning and action, PLA)是定性研究的一种具体形式,用于深入了解社区或形势。它基于各类不同人群的参与,包括项目工作所涉及的社区内的居民。其目的是帮助人们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而不是让外部人士分析这些人的处境),以及将认知转化为行动。因此,参与式学习与行动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参与式学习和行动运用了应用人类学、参与式研究、农业系统研究和农业生态系统分析的技巧和传统做法。这些研究方法旨在探究各类社区中均存在的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关系和活动。

其特点在于:(1)三角测量。三角测量是交叉验证定性信息的一种方法。同样的信息可以从至少三个信息源通过不同的方式收集,从而确保信息的可靠性,同时检查信息是否存在任何偏倚。通过多学科小组收集信息可以实现这一

<sup>①</sup> 王国良、李小云主编:《参与式扶贫培训教程》,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页。

<sup>②</sup> 叶敬忠、刘燕丽、王伊欢编著:《参与式发展规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sup>③</sup> 王晓军、孙拖焕编著:《参与式监测评估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点。(2) 多学科小组。多学科小组的指导原则在于具备不同技能、经验和观点的人会寻找和发现不同的事情,这样整个小组能够对问题或事宜有更新颖的和更深入的看法。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参与调查的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小组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包括女性成员,只要有可能,还应该包括目标社区的成员。(3) 综合应用不同技巧。使用不同技巧有助于深入了解所收集的信息。(4) 适当的忽略和现场分析。(5) 矫正偏倚与自我批评。应该找到不实信息的源头,防止仅仅获得主观信息的可能性。<sup>①</sup>

### (三) 侧重多方意见的和谐和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行动研究的全方位实施的过程中,乡村传播学侧重于在信息互动和平等共享中,融入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并以参与者的身份将外来系统的信息传播给乡村社会。有学者指出:“行动研究和参与研究是两种探求模式,二者都明确地把社会变革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这两种探求模式都是将社会行为者视为计划和完成这种变革的积极参与者。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社会变革’的定义方式不同;行动研究强调意见一致和共同解决问题,而参与性研究则假设冲突的存在并试图纠正由意识形态统治造成的不平等现象。”<sup>②</sup>因此,乡村传播学将视角更多地集中在行动研究上,目标是乡村社会发展,但是强调多方共同协商,完成这一信息传播及解决问题过程。

## 第三节 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晚清以降,中国乡村社会系统、文化系统、政治系统乃至组织系统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是中国广大农民贫穷化的过程。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遂成为引人注目的大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那时在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

换句话说,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

<sup>①</sup> [英]路易莎·戈斯林、[英]迈克尔·爱德华兹著:《发展工作手册规划、督导、评估和影响分析实用指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223页。

<sup>②</sup> 参见[美]丹尼斯·K.姆贝著,陈德民、陶庆、薛梅译:《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六章。

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步履维艰。在 20 世纪上半叶急切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出路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学术界、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等各以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生产建设派等都试图在自己的学理论证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任何模式都有其学理层面的价值,也有其现实试验的意义。

1949 年之后,基于对乡村社会传统组织力量的体认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和控制基层社会各个领域,重新组织了基层社会。因此,乡村社会的转型是在打破传统组织力量,建构一种社会主义权力结构中进行的。<sup>①</sup>

改革后的乡村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组织力量的改造过程说明了一个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乡土传统浓厚的国家,重构现代化进程的政治基础关键在于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力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干扰而已。”<sup>②</sup>建国后的前 30 年,“可以说是传统与变迁找不到一个平衡点的时期,其原因在于以‘运动’为特点的‘规划的社会变迁’对传统给予过分的否定,而对‘速度’过于重视。”<sup>③</sup>

但是,无论是在怎样一种意义下进行和规划的社会变迁,1978 年以来,中国的乡村确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并释放出大量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使农民走上致富之路,而且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天;小城镇的崛起,既成为乡村与城市的连接部,又成为中国乡村都市化的动力等等。但这种描述仅仅是从制度和组织形态出发、以政策和理论的演进和描述为基础而得出的。中国乡村社会在 20 世纪以来的变迁过程,因为其历史背景和社会系统在不同区域的复杂性,即使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也只是在结构和社会表层进行的。一旦这种规划的动作结束了,乡村社会在不同区域的文化特性和社会组织形态便重新趋向它们原有的形态,并结合现实性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如何认识这种种复杂的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过程,不同的利益群体做出了不同的探索和回答,因而便有了从各个视角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关注。

① 童庐、吴丛环:《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天津社会科学》1998(4)。

② 费孝通著:《江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页。

③ 王铭铭著:《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60 页。

概括而言,自近代以来,社会各界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关注便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热点,在一个多世纪的乡村发展中,积累了对中国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特征、信息传播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及效果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领域主要是围绕乡村社会的发展而兴起的,并伴随着相关的社会运动和事件。这里分两个部分进行论述。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性人物有:费孝通、毛泽东、乡村建设派中的学者们,他们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观点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得到详尽的论述。

### 一、围绕乡村社会发展的研究领域的兴起

最初对乡村社会的关注,是从乡村社会学的传入开始的。20世纪初,乡村社会学传入中国。早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学主要是引进和移植。最早的乡村社会调查是1918—1919年由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库尔普(Daniel Harrison Kulp)指导的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其内容涉及地势、人口、种族、经济、治理、风俗、社团、教育、美术、娱乐、宗教等方面,是一次完整的农村社会调查,调查结果于1925年在美国发表,书名为《华南农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1924年顾复的《农村社会学》出版,是中国第一部乡村社会学著作。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著名的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6)、《兴国调查》(1930)、《才溪乡调查》(1933)。并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于1934年创办了刊物《农村中国》。4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学学会强调社区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其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1948)和《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影响较大。1949年之后,乡村社会学曾一度中断了在学科意义上的研究。1979年其研究传统得以开始恢复。1986年,华中农业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乡村社会学专业。

乡村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很宽泛,包括:乡村区位结构研究、乡村社会结构研究、乡村社区体系研究、从乡村角度研究城乡关系、乡村生活方式和水平的研究、对乡村社会问题的研究、对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包括变迁过程和发展趋势,导致和制约变迁的各种社会、心理因素,乡村发展的目标模式和乡村现代化等。乡村社会调查在乡村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建立了一系列乡村社会调查指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有农业生产调查、乡村人口调查、乡村家计调查和乡村教育卫生调查。

正是基于上述的历史情境、社会发展背景和学科建设,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社会学无论在学术建设还是在社会发展中都做出了大量的很有价值的实证研究。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其他相关社会学科的复苏,以及学科交叉性和边缘

性的现象的出现,围绕乡村社会研究的学科领域越来越多,如农村发展、乡村治理等等。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非农化与城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它既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引的必然结果,又进一步推进了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乡村社会学研究者始终关注着非农化与城镇化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的趋势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较著名的是费孝通于1983年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以及大量的围绕小城镇问题的研究。

(二) 农村社会组织机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革引发并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分化重组。乡村社会学对组织结构变迁中的两个问题研究较为集中,一是因旧体制惯性作用与新体制尚不健全双重原因派生出的系列问题;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中出现的新型社会组织。

(三) 农民分化与分层研究:农民分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就开始了,但是分化的速度极其缓慢。改革以来中国农民的分化明显加速,其结果一是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从农业产业分化出来而转向非农产业;二是原先具有相同农民身份的人们分化为带明显阶层特征的群体。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他们对农民分化的前提与途径、结果与现状、未来趋势与社会影响作了深入探讨。

(四) 乡村及乡村人口迁移研究:乡村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趋势日渐明显,关于乡村人口流动化的研究包括:当前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和总体特征、农村人口流动的组织化问题、农村人口流动化的影响、农村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等。

(五)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村民自治而兴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研究。<sup>①</sup>

## 二、与中国乡村传播学相关的事件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政府及各阶层人士不仅在政策层面着力关注中国乡村的发展问题,而且伴随着这些政策性口号采取了系列社会行动。这里从乡村传播历史事件的角度对此类社会行动做简要的描述。

(一) 民国大西北开发运动:一场自上而下的乡村传播运动

1928—1930年,陕甘宁一带连续三年特大干旱,泾渭诸河水涸,可以行车,粮食无收,哀鸿遍野。政府机关和民间慈善团体拨款、募捐,进行救济。但面对

<sup>①</sup> 参见朱又红:《我国农村社会变迁和农村社会学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1997(6);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6)。

这样严重的旱灾,似不能止于临时性的救济,应有进一步措施,因此国民党政府提出开发大西北。当时说的开发大西北,实际是开发大西北的农业。农业开发要依靠农业科学,可是那时西北地区竟无一所高等农业学校,因此开发大西北必须从兴办农业教育入手,为此决定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武功。威胁西北农业最主要的是旱灾,兴修农田水利当然更刻不容缓。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提出“十年万井”计划,即在西北广凿水井,用以灌田。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则在陕省当局支持下,全力以赴地兴建大型水渠以解决引水灌溉的问题。

兴办农业教育是开发农业的基础工作,1932年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至1934年部分校舍建成,开始招生。首先招收的是水利系本科预科各一班,又招收职业学校的农科、林科各一班。到1936年全部校舍建成,设水利、农艺、林业、园艺、畜牧兽医、农经六组,全面招生。抗战前夕,西部地区的高等农业学校除成都的四川大学农学院和上述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外,尚有规模很小的两所,一所以是兰州学院1932年增设的农业专修科,另一处是重庆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农业系。

1937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1939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南三十里铺开办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设农艺、园艺、畜牧三部,校内附设边区农业试验场。这些设施标志着边区政府注意到用近代科学来开发边区农业。1941年,该试验场并入前一年在延安杜甫川建立的光华农场。光华农场是以饲养奶牛、种植蔬菜果树为主的保健产品农场,边区农业试验场并入后,光华农场改称“光华实验农场”,其任务在于集中技术力量,从事作物及家畜的品种改良和耕作饲养技术的改进等实验。

## (二) 农民运动讲习所:乡村传播机构

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林伯渠创办。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农民运动的实施方案,根据林伯渠建议,决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办了6届。它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委派彭湃担任广州农讲所主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每届时间定为1个月,毕业后选派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在兴办过程中,讲习内容不断丰富,讲习时间也逐渐延长。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任务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才,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规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报考条件是:“中国国民党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者皆得报考。”因此,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之取材,在第一二届,则以中国国民党员,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而身体强健能吃苦耐劳者为合格;第三四届,则



专招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共办了6届,培养出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前五届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改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810名学员,比前七届学员的总和还要多。这些学员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全国各地领导农民运动。这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是由国民党开办的,但是领导人、教员以及学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这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影响下,地方性的农讲所也建立起来了。这些农讲所的学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成立农民自卫军,为农民协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sup>①</sup>毛泽东1924年在湘江学校开办“农村师范部”,1925年回韶山开办18所农民夜校,1926年在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对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sup>②</sup>

### (三) 新生活运动:一种间接的乡村传播模式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宣布发起新生活运动。随后又相继发表《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3月5日)、《力行新生活运动》(3月11日)、《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3月19日)、《再解释新生活运动》(3月26日)等一系列演讲。为了推行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决定运动分三项进行,先以宣传,继以指导,后以纠察。宣传方面,利用报纸、通讯、杂志,发行小册子、传单、标语、电影、广告,并召开市民大会,举行提灯大会,请名人演讲等;指导方面,除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加以详细指示外,并组织指导队,进行实施指导,请各学校选派学生,利用星期日挨户指导;纠察方面,由行营、政训处、省市党部、宪兵团、民众教育师资培训所、中国文化学会南昌分会、青年会会员等,组成17个队,分布全市各地,实行纠察。以上工作纲领确定后,运动即渐次展开。3月11日,在南昌市举行了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18日夜又举行了提灯大会。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轫后,各省市县纷起响应,相继成立7分会支会。为了统一思想,蒋介石亲自制定了《新生活运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根据《纲要》,1934年7月1日,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自任总会长,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任总会主任干事,邓文仪为副主任干事。总会设调查、设计、推行3股,并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33人为指导员,李焕之、李厚微等22人为干事。同时迁移了会址,补充了专职人员、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编印了刊物。自此,新生活运

<sup>①</sup> 王永乐、刘妮妮、宣跃文:《试论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的发展状况》,《党史文苑》2007(8)。

<sup>②</sup> 陈敬朴:《中国农村教育观的变革》,《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4)。

动进入自由发展时期。

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①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礼为四维之首,就是规规矩矩,不犯上作乱;②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规定要拔上鞋跟,扣齐钮颗;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和洽邻里,同谋公益等;③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④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1934年7月至1937年新运总会由南昌迁到南京,又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宋美龄为指导长。抗日战争中,“新运总会”先后迁到武汉、重庆,其工作也转向全力支援抗战,开展战时服务。1945年后日本投降后,新生活运动总会于当年10月成立南京办事处,并由前军委会战地服务团服务总队,就近协助甫经光复地区的新运工作。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溃败,历时十余年的新生活运动也宣告结束。<sup>①</sup>

#### (四) 乡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传播运动

从西周开始,中国便有了“乡学”的名称,其后又有乡校、社学、村塾之设;清末民初,张謇又在南通试行过“村落教育”。这些无疑都属于乡村教育,然而远未构成运动。形成社会运动的则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乡村教育运动,其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

1919年,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上,先后发表《乡村教育之危机》、《乡村教育运动的涵义和方向》两篇文章,首先倡言乡村教育。其后,在美国研习乡村教育的留学生博葆琛、赵叔愚归国,将美国、丹麦等国家的乡教理论和实效进行介绍,乡教运动也逐渐转入筹备试验的行动阶段。乡村教育形成运动是在1927年以后。其标志是晓庄师范(全称为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8年8月改名晓庄学校),由陶行知所创办。1928年5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了多件有关乡村教育的提案;而普设乡村师范的建议,后来也为政府所采纳。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自1923年10月由晏阳初任总干事后,主要在城市从事平民识字运动,后来由分析文盲数量而注意农民,因研究农民教育而移往乡村。1926年该会选河北省定县为华北试验区,特从翟城村入手;进行平民教育、农业改良、社会调查等工作。至1929年该会才集中全力以县为单位在定县进行实验。他们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来进行生计、文艺、卫生与公民“四大教育”,企图解决他们所谓中国农村的“四大病”,即:贫、愚、弱、私;并实

<sup>①</sup> 龚书铎、史革新、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0页。

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建设”。由于得到美国民间募捐的资助和国民政府的支持(批准在定县设立“县政研究院”),发展很快、影响很大。1939年因局势原因结束定县的实验后,又转至湖南、四川继续展开。1949年后,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实践,甚至推展到国际范围。

梁漱溟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及其头面人物于1929年在河南筹创了“村治学院”;又于1931年在山东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除指导研究生和训练乡村服务人员外,并在邹平、菏泽两个实验县办理乡农学校、乡学村学。这种学校是把中国宋朝、清朝曾推行的“乡约”制度加以修改补充,以学校为外貌,由乡“村领袖”(地主绅士)“学众(农民)”和“有志于乡村运动”的知识分子(教员)组成。这实际上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是政治、经济、教育、自卫的综合体,既对农民进行宗法思想教育和地主武装训练,又行使一乡(村)的行政权力。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附设有农场,供本院学生进行农业实习,又是实验县农业推广的场所。

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26年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设立乡村改进区,推行社会教育,改进小学教育。他们的目的是:提高文化,培养新农民,使农民有自治能力,同时改进农业。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于1926年主张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强调要教育农民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本领,能自立、自治、自卫等,并筹办晓庄学校,于翌年春开学,成为乡村教育运动的重要阵地。他企图用教育来改造乡村生活,带有空想的成分,但他反对封建传统教育和,教育,这是有进步意义的。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政府封闭后,陶行知又创办山海工学团,注重培养农民在军事、生产、科学等方面的能力。

20世纪30年代期间,以高阳为代表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设有研究实验部,在无锡设了惠北实验区、北夏实验区等,进行乡村成年民众教育、电化教育、农事教育,实行改良蚕桑、养鱼植树开荒,增加农业生产等。

除了江苏无锡、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处和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在巴县开展乡村教育运动外,还有上海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的工学实验;浙江湘湖省立乡村师范学校的农工试验班;大夏大学民众教育实验区民生本位的教育实验;燕京大学设立的农村建设科及清河试验区以及南开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与“平民教育促进会”曾合组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等,都曾进行过研究实验及训练工作。“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于抗日战争时期移至贵州定番,改称“农村建设协进会”,下设乡政学院,训练各校学生。重庆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是在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院于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巴县等地进行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工作。晏阳初也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附近的歌马场创办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改为乡村建设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乡村教

育系于抗战后改为乡村建设系,在该系任课的教师主要来自定县、邹平和无锡;该系曾编辑出版《华西乡建》刊物及《乡农报》等。1934年《民众学校规程》颁行后,民众教育的名词逐渐占了上风,乡村教育逐渐沉寂。究其实质,各县的民众教育馆及民众学校,依旧是面向乡村及农民的。<sup>①</sup>

#### (五) 土地改革:由外及内的乡村社会的整体传播

1949年10月以前,全国大约有1.19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这主要是抗战以来中共所管辖的地区。1949年冬天,在中共新解放的一些地区,主要是华北的一些城市的近郊和若干地区,加上河南的一半地区,总共有0.26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将来在南方新解放区,必须“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二年后“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将“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南方新区土地改革的启动是在1950年6月。当月14日,刘少奇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1950年冬天完成土改的地区大约一亿农业人口,1951至1952年是1.64亿农业人口的大部分地区,余下0.2亿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暂不进行土改。土地改革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路线,也是它获取农民支持的基本手段。建国以前的土地改革,被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现在,民主革命大致结束,新区土地改革的推行,已经不仅为了最后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被当作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环节。<sup>②</sup>

#### (六) 农业合作化运动:乡村内部的传播活动,以外部推动为特征

农业合作化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

<sup>①</sup> 参见喻本伐、熊贤君著:《中国教育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3—594页;陈学恂、高奇主编:《中国教育史 现代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211页。

<sup>②</sup> 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 600 余个。

1952 年冬至 1953 年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 1953 年 3 月 8 日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于 3 月 26 日发表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4 月 3 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10 月 15 日、11 月 4 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

1954 年至 1955 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4 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 9.5 万个，参加农户达 170 万户，大大超过了中央提出的数字。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国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 13 万多个，加上原有的共 22.5 万多个。

1954 年 10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决定到 1955 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 60 万个。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到 1955 年 4 月，合作社发展到 67 万个。由于发展速度过猛，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中共中央在 1955 年初发现了上述问题，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纠正偏差。1 月 10 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3 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到 1955 年 7 月，全国原有 67 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 65 万个。1955 年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 15 个省市书记会议。6 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关于到 1956 年合作社发展到 100 万个的计划。

1955 年下半年至 1956 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 1958 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到 1956 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96.3%，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 87.8%，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



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sup>①</sup>

(七)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种乡村文化传播模式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规定将两个“十条”印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并在党内外宣读。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从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社教工作进入到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夺权斗争成为主要内容,广大基层干部受到冲击。这期间,从中央和各地领导机关组织了大批工作队,主要领导干部亲自蹲点,并且采取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到一地开展社教,在这些地方,社教工作由工作队领导,在许多地方组织了贫农协会代替基层组织乡基层干部,原来的干部大部分被赶下台,而清查的内容也由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的“小四清”转为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的“大四清”,许多干部受到伤害,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形成许多冤、假、错案。并且出现了混乱、动荡的局面。

为总结社教运动的经验,纠正这一时期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研究讨论社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会议制定出了《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其中规定了社教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将社教运动(包括城市和农村社教)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取消了城市“五反”运动的名称;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截止1965年12月,全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

<sup>①</sup> 参见新华网资料,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957.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957.htm)。

县、社进行了“四清”。<sup>①</sup>

#### (八)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城乡传播的互动机制的创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因素相联系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困难,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却是巨大的,全国合作化仅会计一项,就需要几百万人。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首次公开提出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理由是:“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1955年8月30日,北京郊区五名青年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向北京团市委提出要求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北京团市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组织了一支60人的垦荒队。当时,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勇往直前、战胜困难。同时又指出,组织大量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到边疆去的条件还不具备,他们大多数家庭在农村,应在自己家乡为社会主义出力。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sup>②</sup>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正式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首次明确把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称之为“下乡上山”,说:“城市中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sup>③</sup>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20世纪60年代,单一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另外我国人口呈几何比例上升,城市就业的问题更是积重难返。同时,60年代又连续出现灾荒年,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再加上中苏关系

<sup>①</sup> 参见樊天顺、李永丰、祁建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二卷1956—1966》,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93—97页。

<sup>②</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sup>③</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55页。

开始恶化,经济出现低谷。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长期工作被确定下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乡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在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及“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和“广阔天地炼红心”是这场运动的典型口号。<sup>①</sup>

#### (九) 农业学大寨运动:从理想到现实,一幅乡村传播的浪漫场景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

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就成了毛泽东的语录。“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报纸上和书籍中引用毛泽东的原话,都要用黑体字,以示格外重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被用黑体字突出出来。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发[1980]83号)。这是农业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对持续十几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总结和检讨。83号文件的转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盖棺论定,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模式的终结,预示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衰落。

#### (十) 从新农村运动到新农村建设:乡村成为传播中心

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1999年林毅夫教授在一个小型讨论团体——“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一次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就在同一年,他提出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新农村运动”。政府对新农村运动目标的正式说法是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因而,由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

2006年2月21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

文件全文共分八部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因而,全国各个领域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从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医药卫生、媒介等等领域展开了关于新农村建设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典型之路的探索,至今仍在热潮中。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乡村的自上而下的一种传播机制的变革开始发生。至于这种传播机制对于中国乡村历史及现状的影响,乃至对于中国整个社会转型的作用还有待历史来验证。

## 第四节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意义<sup>①</sup>

### 一、认识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系统的综合视角

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 20 世纪初年,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据绝对的优势,即使对于整个近现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其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20 世纪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独具的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sup>②</sup>。因而,如何从各个角度来相互补充从而更好地解剖中国乡村社会便既具有学术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传播学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发展状况的研究,其意义由此展开。

#### (一) 厘定乡村概念的意义

信息是一种现代社会各个层面都在使用并从不同视野里界定的概念,信息理论的广泛意义成就了各种关于信息社会的现代意义上的看法,这种观点的优劣姑且不论,至少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信息对现代社会的含义。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意义,从信息学的角度便是首先可以用信息的概念的模糊性来重新看待“乡村”这一概念,“乡村”:在我们的视野里的日常含义是什么?在规范化的世界里,“乡村”又是什么概念?经验意义上,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概念系统,相对于城市的开放、现代、繁荣和发展而言,乡村是封闭的、保守的、落后的和停滞的。在社会化的视野里,乡村是一种地理区划的概念,有人文的传统和特定的文化遗产;对于现代的市场经济发展而言,乡村正在成为或者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惯常使用的品牌了;而在学术视野里的研究意义的变迁,同时也提供了认识乡村概念的不同角度。

通过界定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传者和受众所持有的立场首先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立场,这种立场的选择使得其他一些无论是工业化还是非工业化、城市与乡村在地理和人文上的区分变得不重要了。就传播学的视野而言,乡村是一个与“我们”所拥有的城市主位立场完全不同,它是“我们”所生存的传播生态和信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是一个独立运作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社会系统中的人群以及他们的所固有的观念、行为、文化、意

<sup>①</sup> 本节内容已在《中国乡村传播学》(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年版)第二章第 55—62 页中有所涉及,这里进行了修订、补充和更正。

<sup>②</sup> 王先明:《开展 20 世纪的中国乡村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 年 12 月 1 日。

识及其制度干预和历史传承共同构成了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中的“乡村”这一传播学意义上的概念,与之相关联的是乡村社会这一传播系统。传播学视野下的“乡村”进而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这一完整的社会系统。

### (二) 阐释中国乡村社会系统变迁的传播学角度

从传播学角度对于中国乡村概念的厘定,无疑拓展了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视野,换言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系统变迁,其意义不仅仅是学术上,更多的是现实层面的。当代社会学学者在关注中国乡村发展现实的同时,已经逐渐将视角延伸到“日常生活”和“下层民众”,乡村传播学的学科积淀本身就是日常化的和民众化的,对于认识中国当代的乡村社会及其组织机构的形态更能提供比较现实可行和真实性的研究视角。

因此,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意义在这里转换为如何更好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从乡村传播学的视角,利用传播学的模式和认识规律来重新划分中国乡村社会的各种信息系统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现实的逐渐转型过程,并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缓慢地瓦解而又保留的原有特性,对传播的每一个环节加以剖析,这样的研究视角既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也同样具有历史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的意义。

这种意义上的探寻,不仅对乡村传播学学科发展有广泛的促进,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也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 (三) 认识中国乡村社会阶层和系统的传播学视角

在乡村传播学的视野里,中国乡村社会的形态是一种传播形态,这种传播形态涉及到的主要是传播过程发生的各关节的不同群体和个体,乃至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关于中国乡村社会阶层的传播学研究对于人群的划分和界定标准都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在:首先其前提与其乡村社会研究视阈的设定不同,传播的理念植根于大众文化的主要精神中,其核心是关注如何给予个体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平等的获取相同的信息的机会和渠道,对于这种公平的机会和渠道的构建是传播学对社会发展应有的一种学术理念和学术精神的贡献,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次是立足点不同,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阶层是针对整个乡村社会的社会形态而言,乡村传播学界定的则是整个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其立足点始终是受众和信息,而不是社会框架。

因此,对于社会人群的划分而言,乡村传播学遵从的是受众为本位的研究模式,因而对于人群的划分,不是给予经济文化和社会地位,或者是指职业类别,而是基于他们本身对于信息需求的要求来划分的,同时根据不同人群所拥有的传播渠道加以辅助来认识在乡村传播学意义下的中国乡村社会阶层和系统结构,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学术研究者和公共政策的研究者,提供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

重要依据,给受众提供了解中国乡村现状的新视角。

#### (四) 分析中国乡村社会信息发生系统的渊源及意义

与从信息和受众角度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阶层和系统相关联的问题是,乡村传播学的在中国研究意义,体现在对于中国乡村社会信息发生系统的渊源及意义研究上。

中国的乡村社会与中国的历史演变进程一样,在漫漫的历史进展中,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统治经济和文化变迁,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在中国乡村信息传播系统的发生机制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这种痕迹又是如何作用于当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机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意义便可以显现出来。

#### (五) 对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组织系统的演变和现状研究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的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很快席卷各个学科,并形成一种研究思潮。在这种研究思潮中,所界定的和所提出的议题各不相同,但在关于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话语空间,它被看作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研究框架,对于乡村传播学而言,则是信息的交流和传播的组织机制问题,或者说涉及到我们可以称之为“乡村政治传播学”的问题。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必然将会对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和行为模式上提供自己的独特视角。换言之,因为乡村传播学关注的是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组织与个体、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传播机制和运作形式,并探寻这种传播机制的最佳运作状态,对于了解和更好的理解中国乡村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有着独特的意义。

#### (六) 探寻和发现中国乡镇精神的一条途径

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及美国民主时认为,乡镇自由是美国人公德观念与爱国心生成的重要条件,并指出:居民依恋乡镇是因为乡镇是强大和独立的,他们关心乡镇,是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将自己的抱负与未来都放到乡镇上了,他们使乡镇发生的每件事都与自己联系起来。正如后来的马克斯·韦伯在美国发现了新教伦理这一特殊的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很早就在美国发现了乡镇精神这一美国式民主的灵魂。新教伦理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相结合,造就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而乡镇精神则与公民权利基础上的民主制度相结合,创造了美国自由民主的神话。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在美国,乡镇不仅有自己的制度,而且有支持和鼓励这种制度的乡镇精神……”<sup>①</sup>所谓乡镇精神,大体是说乡镇居民对本地公共事务的参与、决定以及对乡镇的依

<sup>①</sup>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4页。

恋、热爱。托克维尔说：“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sup>①</sup>这样，乡镇生活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与自己休戚相关，每天每日都在通过履行一项义务或行使一项权利而实现。这样的乡镇生活，使社会产生了一种勇往直前而又不致打乱社会秩序的稳步运动。<sup>②</sup>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乡镇精神？是否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中已经积淀了这种具有特色的乡镇精神？在中国乡村社会不同时期的转型期，乡镇精神的演变如何？在当代的乡村社会中我们还拥有怎样的乡镇精神？又或者已经衰落？回答这些问题依靠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构建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此引导出一条探寻和发现之路来，未尝不是不可能的。

这种探寻的可能性在于：中国乡镇精神是以中国乡村社会的基层单元——单个的人为基础的，乡村传播学考察的正是作为乡村社会中一个基本分子个体在信息接受和传播中的位置，具有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文化背景、怎样的区域和传统差异性。当然，这种考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同的社会学科，尤其是通过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乡村社会学的共同研究才可完成，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可以在这种发现和探寻之旅中为中国乡村社会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我们正缺少的精神。

## 二、构建城乡之间平等的互动系统的传播学意义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从综合视角更好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系统，还可以为城乡之间的互动和发展提供很现实的依据。乡村传播学的关注点是对等的话语世界的人群，也唯有在这种意义下的城乡互动研究才是有意义的。

### （一）研究城乡互动的作用形态的意义

首先，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可以为认识城乡互动形态提供新思路。城乡互动是在一种循环体系里发生作用的，这种循环体系的构建基于对于弱势环节的足够重视，在以往的研究视野里，乡村是一种被动的受动环节，是一种被动形态下的运作，而忽视了对于这个环节本身运作体系的研究，更加难以提及对于城乡互动的研究。对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构建而言，乡村传播系统作为主要的研究视点呈现出来，这种呈现是平等的，因此互动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

其次，互动式相互反馈的形式，而不仅仅是城市对于乡村的灌输，乡村对于城市所给予的信息的反馈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尽管这种反馈或者只是

①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6页。

② 包刚升：《乡镇精神：美国民主的灵魂》，《世纪中国》，2001年6月13日，www.cc.org.cn。



在很狭窄的意义上起作用的。研究乡村传播学的目的之一便是在互动的形态中,将中国的乡村传播系统与作为主流的城市的传播机制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很和谐的中国当代社会的形态。

最后,研究乡村传播学可以为研究城乡互动提供理论上的依据。通过对乡村传播系统演变历程的阐释,解构中国当代乡村传播体系,分析在中国乡村社会的信息运作系统,可以更好地为城市的信息向乡村的输入提供最佳途径,同时,乡村对于城市的反馈形态和作用层面则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认识。

## (二) 对城市化进程的促进意义

对于城市化进程的促进的认识,其前提是存在城乡差别。如何认识城乡差别?在我们对城乡差别的认识中,往往更多地局限于物质形态,但就城乡差异而言,还远远不惟如此。文化和心理的差异,具有更加深层的、根深蒂固的渊源。要消除以至弥合这种差距,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一是城市如何以更多的空间和宽容的心态接纳农民;二是农民如何以自身的能力、素质、文化和心理适应城市;三是政府如何为这种城乡之间的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服务安排。<sup>①</sup>在乡村传播学的立场上以信息为核心的城乡差别,其实质是一种文化心理层面的差异,这种差异的背后即是信息的非公正性和非平等性。消除这种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差异性,可以从深层结构上改变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因此,乡村传播学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还在于:可以间接或者直接的促进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

## 第五节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可以借鉴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自然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大致相同,但是其最优特色之处则在于对乡村社会的研究路径的选择上,以及由这种研究路径所选择的研究倾向上。如何认识乡村社会的特征,如何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如何在信息时代利用信息和媒介技术的力量获取具体而微的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状况,如果仅仅是量化的研究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以质性研究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上,主要包括行动研究、民族志研究方法、参与式研究方法和内容分析法。<sup>②</sup>

<sup>①</sup> 杨以谦、王春侠:《文化与心理:换一个视域看城乡差别》,武汉:中国农村研究网2005年5月17日, [www.ccrs.org.cn](http://www.ccrs.org.cn)。

<sup>②</sup> 这里选择内容分析法主要是侧重分析乡村发展中文献资料中所隐含的信息,选择的视角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视角。

## 一、行动研究 (Action Research)

社会心理学家勒温 (Kurt Lewin)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把行动研究引入到了社会科学领域。行动研究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之下,有不同的研究取向 (approach)。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科学行动研究 (scientific action research)、实践行动研究 (practical action research) 和批判行动研究 (critical action research)。行动研究理论可归纳为三项主要特征:为行动而研究 (research for action); 在行动中研究 (research in action); 由行动者研究 (research by actors)。

为行动而研究:为行动研究指出了行动研究的目的。研究的目的是不是构建系统的学术理论,而是解决实践工作者所处的情境遇到的问题。研究目的具有实用性,问题的解决具有即时性。

在行动中研究:在行动中研究指出了研究的情境和研究的方式。行动研究的环境就是实际工作者所在的工作情境,并非是经过特别安排的或控制的场景。行动研究的研究过程,既是研究者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种行动的表现,也是研究者学会反省、问题探究与问题解决能力的过程。

由行动者研究:由行动者研究指出了行动研究的主体是实际工作者,而不是外来的专家学者。专家学者参与研究扮演的角色是提供意见与咨询,是协作者。<sup>①</sup>

换言之,乡村传播学依据的是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对于传者与受众关系的处理则借用的是行动研究的基本理念,从二者出发注重乡村传播学研究中的传播过程、传播角色、传播理念和传播行为。

## 二、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 (The Approach of Ethnography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方法肇始于 20 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传播的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德尔·海默思 (Dell Hymes) 是该学派的创始人,1964 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 的一期特刊上,海默思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这一术语。他认为传播民族志学包含了两大特征:其一,它让我们注意到需要新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直接考察语言在情境背景中的使用,以揭示适合于语言活动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单独的对话法、对人格、对宗教、对亲属关系及其他类似物的研究中是无法被揭示的;其二,

<sup>①</sup> 参见刘恩山:《生物学教育研究方法与案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2 页。

它必须把一个社区 (community) 作为语境 (context), 把传播习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 这样, 任何特定的传播渠道及符码 (code) 的使用都是作为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sup>①</sup> 格里·菲利普森 (Gerry Philipsen) 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 他所进行的研究把民族志传播学真正地导入到传播研究中来。20 世纪中期以来, 民族志传播学派内部形成了两个分支, 即海默思传统的民族志传播学和批判民族志 (Critical Ethnography)。

霍格特 (Richard Hoggart) 的《文化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 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民族志的研究将目光聚集于电视受众, 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布伦斯登 (Charlotte Brunson) 和莫利 (David Morley) 在 1978 年在早期对英国电视新闻杂志节目《举国上下》(Nationwide) 的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sup>②</sup>

换言之, 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根本用意是让研究者回到传播的动态现场情景之中。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 (Kirk Johnson) 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约翰逊在印度进行了两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他采用了适合田野情况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 解读了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电视在不断变化的景观中所起的作用; 它探究了村民们的生活并研究了电视对他们的抱负、理想、亲情和传统的影响; 它试图了解电视在这些乡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sup>③</sup>

### 三、RRA、PRA 和 PEA

(一) RRA: 快速农村评估方法 (Rapid Rural Appraisal, RRA) 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作为在农村快速获得社会信息以替代正规的社会调查的一种方法。80 年代初期有关杂志上开始发表了一些介绍这种方法的文献, 随后出版了一些有关书籍。在这方面应用较多且有贡献的主要领域有: 土壤生态系统、自然资源、林业、小水利、健康与营养、土地管理, 以及农业系统等领域。<sup>④</sup> 通过 RRA 获得的信息, 由外来者带走, 由外来者作分析, 供外来者做决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一些 RRA 分别在世界上不同地区开展, 开始被称做“参与性 RRA”。

(二) PRA: “参与式农村评估”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这个名称

① 蔡骥著:《文化社会传播》,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0—103 页。

② D. Morley,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0, p. 111.

③ [美]柯克·约翰逊著,展明辉、张金玺译:《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 页。

④ 林晓言、许晓峰等著:《建设项目经济社会评价》,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9 页。

首次于1985年在一次国际农村发展会议上出现,这种方法则于1988年在肯尼亚和印度的农村实践工作中正式开始使用。与RRA相比较,PRA更强调PRA过程本身的效果:此过程能够催化由不同个体、群体和机构(称为“合伙人”)采取行动。如果所有的合伙人都以适当的方式参与PRA过程,可导致多种合伙人的行动,而不仅仅是由外界机构或政府单独采取的行动。换言之,这种信息收集、分析和决策过程会影响下一步要发生什么及这个过程的最佳效果。换言之,RRA是外来者了解当地情况的一种办法,PRA的目的是使得当地人建立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sup>①</sup>

(三) PEA:参与式推广与创新(PEA)的核心是基于社区的推广、推广过程的完全社区主宰和联合学习。PEA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重点加强解决农村人口的问题,加强规划并提升个人和集体的管理能力,他们能互相学习并共享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农民适应和开发新技术、适用技术与创新的能力,通过鼓励他们学习试验,增加自己的知识与实践,以及在学习模式的行动中将这与新思想融合;认识到社区不是同质的,而是由不同的社会团体和相对立的利益群体、势力群体以及不同能力的群体组成。目标是通过这些群体间的利益均衡,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空间以及淡化集中式决策,实现平等、持续的发展……

PEA不仅仅是一个参与式方法,并且明显不同于参与式农村评估,农村评估本质上是一个工具箱。PEA是综合的方法,是反复学习的过程,学习农村革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加强农村地区的管理和民间社会的发展。<sup>②</sup>

#### 四、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主要以各种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它处理明显的(manifest)文书内容,不管内容可能表示的潜在动机(latent intention)以及由内容可引出的潜在反应(latent response);它依据说了什么,而非依据内容何以如此,它不凭空推测动机(motives);也不是依据人们如何反应(How people react),即吸引力(appeals)或反应(response)。早期的内容分析法源于社会科学借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进行历史文献内容的量化分析。克里彭多夫(Krippendorff)的研究被认为是由文献记载的、最早对印刷文字进行定量分析的案例之一。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和他的同事在第二次世界大

<sup>①</sup> [英]安迪:《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的国际经验》,参见李小云主编:《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4页。

<sup>②</sup> [美]Roger D. Norton著,梅方权等译:《农业发展政策:概念与经验》,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98—399页。

战前后所进行的一些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学者拉斯韦尔等人组织了一项名为“战时通讯研究”的工作,以德国公开出版的报纸为分析对象,获取了许多军政机密情报,这项工作不仅使内容分析法显示出明显的实际效果,而且在方法上取得一套模式。有关内容分析的定义有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经典定义是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在《传播研究的内容分析》一书中提出的(详见表1-1)。

表 1-1 贝尔雷森关于内容分析法的定义

| 基本定义                                | 研究对象                         | 推广的研究对象                    | 方法论设计  |
|-------------------------------------|------------------------------|----------------------------|--|
| 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明显的传播内容,做客观的、系统的、量化的描述之研究方法 | 用于研究作者的意向与目的、推论或测定个人或众人的心理状态 | 即使是非言辞的传播,如音乐、卡通漫画、手势、音调等等 | 假设内容的产生是由于读者、听众或观众需要的结果,便可使用本方法探讨传播对象注意的焦点所在 |

对乡村传播学而言,内容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1) 分析传播内容短期或中长期的发展趋势;(2) 就各种传媒对同一问题、同一事件的报道,或就不同国家的同一类传媒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3) 研究传播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法规和政策;研究传媒借助传播内容实现的宣传策略、宣传方法以及某一方使用的宣传战术;(4) 了解和解决科技、文化等特殊信息在传播中的问题和困难,兼及受众类型和数量等。

### 思考题

1. 名词解释:RRA,PRA,PEA,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
2. 简述乡村传播与乡村传播学的概念。
3. 简述乡村传播学的发展脉络。
4. 简要叙述乡村传播在中国发端的历史背景
5. 根据你对中国当代乡村社会发展历史的了解,举例说出三种以上乡村传播事件。
6. 如何理解乡村传播学研究与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关系?
7. 你如何认识乡村、农村与城市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试举例说明。

### 参考文献

#### 著作

-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原著影印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美]拉伯尔·J.伯德格著,王晓毅、王地宁译:《乡村社会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王国良、李小云主编:《参与式扶贫培训教程》,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叶敬忠、刘燕丽、王伊欢编著:《参与式发展规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王晓军、孙拖焕编著:《参与式监测评估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7年版。

[英]路易莎·戈斯林、[英]迈克尔·爱德华兹著:《发展工作手册 规划、督导、评估和影响分析实用指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美]丹尼斯·K.姆贝著,陈德民、陶庆、薛梅译:《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 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蔡骥著:《文化 社会 传播》,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美]柯克·约翰逊著,展明辉、张金玺译:《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D. Morley: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0.

林晓言、许晓峰等著:《建设项目经济社会评价》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

[美]Roger D. Norton 著,梅方权等译:《农业发展政策:概念与经验》,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费孝通著:《江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铭铭著:《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龚书铎、史革新、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喻本伐、熊贤君著:《中国教育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贺雪峰著:《新乡土中国》,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陈学恂,高奇主编:《中国教育史 现代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樊天顺、李永丰、祁建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二卷 1956—1966》,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 论文

顾红亮:《梁漱溟的乡村概念与生活世界》,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四十六期,2006年1月27日, [www.cuhk.edu.hk/ics/21cn](http://www.cuhk.edu.hk/ics/21cn)。

[英]安迪:《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的国际经验》,参见李小云主编:《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

杨以谦、王春侠:《文化与心理:换一个视域看城乡差别》,武汉:中国农村研究网2005年5月17日, [www.ccrs.org.cn](http://www.ccrs.org.cn)。

童庐、吴丛环:《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天津社会科学》1998(4)。

朱又红:《我国农村社会变迁和农村社会学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1997(6)。

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6)。

王永乐、刘妮妮、宣跃文:《试论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的发展状况》,《党史文苑》2007(8)。

陈敬朴:《中国农村教育观的变革》,《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4)。

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柳建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载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3)十年风雨:1966—1976》,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霞飞:《农业学大寨始末》,载杨文,裴小敏主编:《被历史忽略的历史》,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 第二章 乡村传播学之传者

在乡村传播系统中,传者与受众的角色并非固定,也常常转化,每一个传者同时又是受众,而每一个受众又同时是传者。尽管传者是发起传播行为的人,是利用某种传播技术和工具,是以发出的信息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而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传者与受众的角色常常互换,在乡村传播行为发生过程中,这种合二为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第一,乡村传播学的传播现象既发生在乡村社会内部,也发生在城乡之间,既发生在外来者对乡村社会成员的传播互动中,也发生在乡村社会成员在城市生活中对城市社会成员的传播互动中,因此传者与受众之间的角色并不完全固定;第二,从社会信息传播的系统而言,信息流量在城乡之间虽然处于由高处向低处流动的态势,但是城乡信息传播的这种现实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平衡和自我修复的作用,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信息交流系统的完善性,弱化了城乡之间传者与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第三,传者与受众角色与身份的合二为一的视角,可以在学理上消除城市市民与乡村传播受众对社会信息总量的差异性。但在论述过程中,为了说明方便,本书还是以传者与受众分割的概念形态进行解读,只是将传受双方相对平等的视角渗透在传者与受众的章节叙述之中。

从传者与受众平等的视角出发而论及乡村传播学的传者,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认识作为传者的农民在信息传播中角色的问题。农民是相对于城市而界定的一种社会身份下的概念,换言之,工业化,城市化是确定农民社会身份的前提,假如整个社会充分城市化了,农民这一社会身份便自然消亡了。

如何认识农民这一社会身份的问题,国内外的学者从各自的历史背景、时代特色和学术立场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观点。由于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的逐渐建立是与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因而对工业之前的农民身份的认识,便集中在文学、艺术和历史等人文科学的研究视野中。“19世纪的社会科学表明,它们对现存事物的不了解令人惊讶,它们所有的分析和解释的努力都是针对工业经济和



都市社会的。”<sup>①</sup>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渐展开,城市化的推进,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城市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以此来建立认识社会变迁的逻辑,从而建构认识乡村社会延续的逻辑。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作为乡村传播学的传者主体农民群体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学术命题。乡村传播学的传者分类也是在农民群体中所进行的划分,可以说,农民群体的分化及新阶层的形成构成了乡村传播学的传者类别。

### 第一节 乡村传播学之传者概况

就社会历史发展而言,乡村传播学的传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乡村社会系统内部的传者和乡村社会系统外部的传者。乡村社会内部的传者主体是农民群体,他们相互之间的传播行为的发生和传播关系的建构,组成了乡村社会内部传播系统的重要部分。乡村社会系统外部的传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发展阶段,构成成分都有所不同,但主要是由乡村社会传播系统中的乡村精英、走出乡村社会的外来者组成,也可以说,他们是介于乡村社会与外部之间的群体,既属于乡村社会内部也属于乡村社会外部,是二者之间的中介群体。

就社会传播状况而言,我们可以把传者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类传者没有经验,对于和他人打交道有恐惧心理,与他人交流感到很不自在,对于信息感到很陌生;以信息为中心的,这一类传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信息本身上,关注对于信息的理解、解释和接收,忽视受众身份、动机和目的,自主性很强、霸权意识倾向严重;第三类传者以对话、沟通、平等的态度进入传播过程,其特点是:倾听、对话、交流、提高传播效率和传播效果。

乡村社会内部的主要传者农民群体在进行信息传播时,主要集中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和以信息为中心两种类型;乡村社会系统外部的传者包括乡村精英和来自于乡村社会外部的传者,前者如绅士、贵族、教师等,后者如商人、学生等。由于乡村精英主要还是居住在乡村社会中,因此在这里把他们也简约地划归为农民群体,外来传者在不同的时期类型有所不同,主要集中在以商业交流、知识传授和政府信息传播为主的传者群体上,因此可以大致划分为商人及其商人组织、政府信息传者及以学校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包括家庭教师群体)等。

<sup>①</sup> [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 一、传者概念历史变迁

传者主要是指乡村社会的农民主体与乡村社会的外来传者,二者的历史变迁构成了乡村传播传者的总体状况。

### (一) 乡村社会内部的传者主体:农民

farmer 与 peasant 的差异:这两个英文单词在翻译为中文时,多以农民这一词语笼统称谓,二者之间在社会背景和历史成因有着显著的差异。从词义上说, farmer 以 farm(农业)为词根,强调的是职业含义;而 peasant 一词从词源及构词成分看与“农业”、种田等本无直接关系。这一概念源于古法语,系由古拉丁语 pagus 派生,该拉丁词意为“异教徒、未开化者、堕落者”,带有强烈的贬义,因而 peasant 在古代的本义是对卑贱者的贬称。在古英语中 peasant 可作动词用,意为“附庸、奴役”,是指一种低下的身份或出身。只是由于那时卑贱者大多种田,这个词后来才与农业有了关系。换言之, farmer 这一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完全是个自由职业概念,是与工商业者、市民、渔民等相为并列的概念,与其在整个社会中的身份没有关系。而 peasant 则更多强调这一群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鲜有职业内涵的着色。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与对农民职业和身份的认同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人们在联想到农民这一概念时,想到的便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结构式乃至心理结构,经济越落后,整个社会对农民群体的社会身份、生存状态和社会等级等因素就越加重视;经济越发达,整个社会对农民群体的职业身份则更为习惯。

中文的“农民”在中国各个时期,伴随经济的发展水平,人们对其理解不完全相同。在古汉语中,甲骨、金文时代就已分别有了“农”与“民”。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已经清晰地出现了。唐代庄园之大者,收容客户,多至数百人,一家数口,集居一隅,于是庄园之中,发生客户所居之村落,后世称农村为“庄”、称农家为“庄户”、称农民为“庄家人”,其义殆起于此。<sup>①</sup> 因此,古代中国“农民”这一概念比西方有更多的职业涵义,而身份卑贱之义却较为淡化。这反映了古代中国比当时的西方职业分化较明显而身份壁垒却较宽疏。遗憾的是到了 20 世纪中叶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社会的身份性色彩反而空前地

<sup>①</sup> 参见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加重了。直到改革开放时代,这种状况才逐渐发生着缓慢的转变。<sup>①</sup>

在现代汉语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辞海》对农民的解释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不包括农业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主要指贫农和中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指集体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延伸,农民成分也开始分化,农民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仍然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但已成为身兼工、商或管理者多重身份的复合型农民,由于我国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许多已经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名义上仍属于农业户口,被视为农民身份。也就是说,农民的名义概念和实际概念发生了背离,名不副实。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农民概念包括三种属性:户籍属性、职业属性和政治属性。一方面农民群体在分化,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内部有大量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如学生、教师、乡村管理者等,因而农民只是乡村社会传播系统中传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乡村社会传播系统中的其他传者与农民一起我们称之为村民。

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sup>②</sup>。就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现实而言,农民与村民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村民的数量远大于农民,农民只是村民的一部分,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村民中所占比重会不断下降;第二,农民是专职或兼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而村民的职业则不仅限于农业劳动,而且横跨第二和第三产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村民中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人口的比重将会不断上升。虽然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村民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仍然还属于乡村人口,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不是农民,而具有了现代产业工人的某些特点。此外,对中国农民概念的认知,还要撇清意识形态化影响力和历史因素,以及中国近现代社会以来社会主流群体所形成的刻板成见。

## (二) 乡村社会外部的传者

乡村社会外部的传者是指与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发生关联的群体。他们以各自在乡村社会中的身份与地位以及与外界联系的角色,作用于乡村社会中的传播系统。这些传者包括在乡村社会进行市场信息、知识信息、政府信息以及其他信息的中介、外来传者以及相关的信息传播组织。

<sup>①</sup> 秦晖:《农民与农业者》,中国学术网站,2007年4月22日,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148。

<sup>②</sup> 同上。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乡村精英的构成成分也有所差异,就欧洲社会发展而言,在城市没有形成之前,乡村社会中只有农民,他们在领主的周围居住而形成乡村,所有的人都按照一种方式生活,随着乡村社会诸种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和丰富,乡村社会变得多样化和功用化了。农民群体发生了社会分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同时,大领主逐渐脱离了农民群体。土地具有经济价值之后,领主和借助土地交易而富裕的富人们开始追求新的奢侈品,促使了贸易的产生。城邦的兴起、贸易的发展也在原有的农民群体中促生了新的乡村精英,即农业企业家阶层,包括富裕农民、小乡绅、大领地的管理人、正在诞生的城市资产阶级。换言之,乡村精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乡村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而出现的,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农民群体的分化;二是在农民群体分化中所产生的领主及其衍生物和农民阶层中新兴的农企业家阶层。

由于欧洲社会内部各个国家的乡村工业化进城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乡村社会的精英不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类型有差异,而且在当代乡村社会中乡村社会外来信息的传者也有显著差异。其作为传者的特征将在下面详细论述。

## 二、传者理论

守门人理论和洋葱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读乡村社会中传者的行为。

### (一) 乡村社会的守门人

守门人的概念的由来:德裔美籍社会心理学家勒温于1947年首先提出Gatekeeper(即守门人)的概念。其原始含义是指对食品种类的选择和消费渠道的建立模式。“传播”(communication)与“守卫”(gatekeeping)在这里首次作为一对术语出现,勒温基于“渠道理论”进而建立了守卫的思想,他的研究对象是食物的流通渠道,即研究食物是如何通过各种渠道来到饭桌上的。身为心理学家的勒温认为影响渠道通畅的首要的是人的因素,并归纳为“守门人的认知结构”和“守门人的动机”两大因素。指出在“守门”过程中个人的因素(个体的价值判断)起着主要作用。守门人的认知结构是指传者头脑里知识结构的综合、是对已有的全部观念内容的重新组合的状态;守门人的动机则是指传者在进行选择时的价值判断,需求状况以及面临的阻碍因素。认知结构在传者对外界信息的获取和学习过程中不断发生分化、重组和再度综合化,是传者继续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决定性因素。尽管后来的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大众媒介的新闻信息守门人上,但勒温最初提出守门人这一概念时,是将其广泛地应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

作为传播系统之一的乡村社会,其信息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守门人,他们作为乡村社会内部以及与外部之间信息传播的主要传者,以特定的文化心

理、社会背景和历史特色选择和过滤着诸种信息。

## (二) 洋葱模式

德国汉堡大学新闻系教授西格弗里德·魏申贝尔格(Siegfried Weischenberg)于1992年以洋葱的层层剥离形式来解读大众传媒研究,即洋葱模式。该模式将媒介研究区域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区域,这四个区域的关系如同洋葱的皮是从外向里收缩的。它们从外到里分别代表了标准维度、结构维度、功能维度和角色维度。<sup>①</sup>同样的,这一模式可以用来解读乡村社会中传者角色的研究。

乡村社会中的传者,在其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受到其所隶属的乡村社会规范的影响、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乡村社会功能变迁的影响以及自身在所隶属的乡村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影响。在这种由内及外的系统作用下,传者不仅仅是作为守门人在信息传播中发挥过滤和选择作用,而且作为镶嵌在特定乡村社会群体、社会结构、角色和社会身份以及社会功能的层层网络中的守门人在传递信息和过滤信息。

## 第二节 乡村传播学之传者特征

### 一、个体农民的传者特征

对研究者而言,农民的特征在不同的学术视角里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这些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必须立足于农民所生活的乡村社会中。宏观而言,从乡村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农民主要有以下特征:

#### (一) 过渡性

农民代表着从分散的、孤立的、自我满足的乡村社会到完全结合在一起的现代社会的过渡群体,社会变革也伴随着农民群体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变化。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蒸汽机为工业化发展契机的工业革命接受了“机器制约人”的管理模式,并以科学的名义将之辅之以整个工业社会,工业化普及的需要使得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农民群体逐渐成为需要被工业化的群体,农民群体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被无情地打断了,他们不得不面临着整个社会为他们设定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职业,过渡性特征也因此成为农民群体的基本特征之一了。

#### (二) 交换关系

农民社会与外界社会体系之间存在着交换关系,不仅是经济交换关系,还有

<sup>①</sup> Siegfried Weischenberg, *Journalistik. Theorie und Praxis aktueller Medienkommunikation*. drei Bände,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2, Opladen, p. 98.

其他交换关系,如文化信息交流关系、政治信息交流关系等。对农民而言,与外界交流既是一种机会,也是一种压力,参与到其他社会体系中,可以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有更大的可能性参与到社会的整体运行中,但是由于农民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弱势地位和经济弱势地位,社会市场逻辑迫使农民不得不在承担社会风险过程中,努力获取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机会。当农民群体原有的农业文明的生活节奏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与外界发生交换关系,以建构新的社会关系。换言之,一方面他们渴望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时刻做出承担各种外来风险的准备。

### (三) 依附性

由于农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社会和经济地位较低,便自然形成了对外部社会的依附性。所谓依附性是指不平等的社会或文化地位、一个社会集团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压制以及进入政治权力的机会不平等状况。工业革命所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不仅造成了一定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状况,而且在城市化的推进中,乡村社会对城市社会的依附越来越大。居住和生活在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体系中的农民,由于其在整体社会传播系统中的信息弱势地位,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不得不依附于城市社会。因此,便形成了个体农民身上所具有的依附性特征。

### (四) 内部差异性

同样属于乡村社会内部的农民群体,其内部也存在着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换言之,农民之间存在着社会地位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静态的和恒定的,而是不断受外部力量的影响而有所变化的。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乡村社会内部的差异都是存在的,不断变化着的是差异的程度衡量问题。这种衡量标准又与乡村社会内部人们对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标志性认知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在法国的中央高原,有个农民劳动者拒绝他人以5头牛替换他的8头贫乳的瘦牛,因为在这个地区,牛的拥有数量是作为确定各个家庭在村庄中所属社会阶层的依据,虽然5头优良的奶牛比8头干瘪的瘦牛带来更多的货币收入,但拥有8头牛的人就是个‘富人’,而拥有5头牛的人就成了地位低微的人。”<sup>①</sup>而在其他乡村社区中,富人与穷人之间标识的认知差异,则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 (五) 可塑性

所谓农民的可塑性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作用下,农民受外部因素影响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应变能力,特别是主动适应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从历史发展

<sup>①</sup> [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和社会变迁来看,工业化之前的传统社会中,农民群体是社会发生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历次的农民起义便是农民群体集体传播行为的总展示,在这种展示中,农民自身的适应性和自主创新性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农民的分化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从农民分化的模式看,英国选择的是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在英国,农村劳动力除了向本国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外,还向殖民地国家转移,特别是向美国转移。美国的农民分化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大约用了一个半世纪完成的。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浪潮的涌起,美国的农民开始分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从农民分化的具体模式看,美国的农民分化属于自由迁移模式。从农民分化的方向看,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基本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部门。美国农民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点。日本农民分化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从20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完成。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农民分化则是20世纪60—70年代完成的。<sup>①</sup>中国农民个体的分化则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目前,这种分化过程仍未完成。

## 二、乡村精英的传者特征

所谓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强干的人,而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在历史上,除了偶然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为精英所统治着。对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而言,也是如此。简而言之,精英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流动性与继替性。任何社会里的精英都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时代在变迁的同时也在要求并塑造着“合适”的精英人物。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是精英无限流动与继替的过程,正如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言:“通过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新的精英产生于社会的较低阶层,升为更高阶层,在这里登峰造极,然后,趋向堕落,被消灭或消失。”<sup>②</sup>第二,转化性。因为精英的流动和继替性使得精英阶层之间的新旧转化成为自然而然的过程,这种转化一方面是指精英阶层的转化,另一个方面是指精英社会角色的转化。第三,代表性。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当时的精英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主要表现者。

<sup>①</sup> 刘怀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sup>②</sup> 参见〔意〕维尔弗雷德·帕累托著,刘北成译:《精英的兴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例如,就欧洲社会发展而言,西欧中世纪晚期的乡绅——租地农场主阶级,以新的方式控制了生产、交换等环节,还控制了乡村行政事务,成为农村中富有生气的阶级力量。领主特别是那些拥有贵族身份的大庄园主,却急剧衰落。贵族地主不仅是在人数上减少,在实力上也不断削弱。换言之,由于中世纪晚期西欧贵族通常都不直接经营土地,而是靠固定的年度租金过活。大片土地的出租期往往长达几十年之久甚至更长,其间即使租金有所增长也绝对赶不上生活费用增长的比例。当生活费用不断上升的时候,贵族一年比一年更穷苦。他们被迫抵押庄园,当他们不能支付利息时,抵押品的赎回权就被取消,因此丧失了土地。旧贵族逐渐丧失了他们在乡村社会基层组织管理中的地位。以英国为例,自中世纪中晚期开始,英国乡村社会中新的精英群体崛起了,这便是乡村士绅阶层。乡绅最初的含义,大概是指有资格从军的自由人。其后形成了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小地主阶层。1066年诺曼征服战争后,他们成为骑士的重要来源,本身则作为低于骑士的等级而存在。到中世纪晚期,乡绅的数量和经济实力一再膨胀。虽然乡绅收入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他们主要以农牧业经营为主,是通过采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管理而发达起来的。该时期地方上的行政管理,几乎完全被乡绅把持。15世纪前后阶级分野正在变得模糊起来:一方面,一部分乡绅开始与贵族财富相当,于是,有的乡绅购买爵位正式跻身贵族;另一方面,农民上层与乡绅也出现某种程度的交融。农民上层与统治阶级下层的交融,使得英国在贵族与普通农夫之间出现了强有力的中间等级;这个“中间等级”与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密切相关,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利益集团。

而以中国明清之际为例,当时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渐凸显,他们通过专制皇权和科举制度获得在乡村的社会地位。由于举人、监生、生员(秀才)身份改为终身制以及官僚队伍的膨胀,乡村社会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数量和实力的绅衿阶层(又称缙绅或乡宦)。在经济上,他们多为当地富有者,拥有大片良田美宅;在政治上,通过乡里保甲制和乡族组织,成为明清特别是清代乡村基层政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许多情况下,绅衿以其特殊身份在幕后左右乡村及地方事务。明清时期,大小绅衿几乎在每个地区都构成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相互应酬往来,匹配婚姻,形成一个社交圈子。所以,地方官到任的第一件事总是要拜访绅衿,听取他们的主张,结交他们。晚清以来的乡村精英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中一部分不再是借助于国家功名和乡土威望的“道德权威”,蜕变为“利益获取者”,特别是可以借助国家权力“赢利”,成为“土豪劣绅”。

杜赞奇在研究1900年到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精英的时候,他发现谁成为精英,主要取决于这样几个因素:一是经济因素。凡是乡村精英,在村里都是比较富裕的人,或者是其家族比较富有,只有这样,才能救助别人;二是与政府有



着比较亲密的关系。自己当过官,或者有亲戚和朋友在政府衙门做官;三是家族的势力。绝大多数精英来自势力大的家族。<sup>①</sup> 财富、家族和社会关系(特别是与官府的关系)是乡村精英产生的主要依据。

就社会历史变迁来看,乡村精英作为传者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一是与乡村管理天然的融合性,无论是哪个历史时期的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行政管理和乡村发展中都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影响力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们可以是乡村村民的代言者,也可以是乡村村民的欺压者;二是乡村精英的继替和流动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不可分割,新型的乡村精英以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理念,在传达着新型经济信息的同时,客观上也拓展了乡村村民的视野;三是作为传者的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中扮演着综合信息传播的角色,他们以自身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影响着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流量和内容,并在乡村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以这种信息的合力影响着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和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

### 三、乡村农民组织的传者特征

农业专业性合作组织主要存在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农村社区性合作组织主要存在于东亚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二者的特征并不完全相同。

农业专业性合作组织作为传播者的特征主要体现在:(1) 农场规模大,商品化、专业化程度高。合作组织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合作组织围绕专业化生产提供产前和产后服务,既可以满足农民的需要,也可以在经济上做到有利可图,使得专业合作组织成为欧美国家农业合作的主要形式。(2) 从合作社的产生来看,欧美发达的工业,一方面,使农业大量劳动力得以转移,农民数量不断减少、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为农业的机械化提供了保证。因此,工业化促进了农业的专业化和专业性合作组织的发展。从合作组织的发展来看,工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从技术和资本上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使农产品加工业等产后环节越来越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农业产后环节的价值在整个农产品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3) 合作组织企业化。从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专业合作组织具有单功能、封闭、福利型等特征。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尤其是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合作组织受市场的冲击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合作社,逐渐由传统型变为现代型,由分

<sup>①</sup> 参见[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散型变为联合型,由单功能型变为多功能型,由封闭型变为开放型,由福利型变为企业型。(4)产权明晰。在发达国家,农民一般是在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独立经营权的农场主,合作社一般是在不改变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农户自愿入股形成的。合作社的财产属合作社成员集体所有,盈余按社员交易额返还入社社员,投资入股也给一定的报酬,充分体现了明晰的产权。农场主既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大部分也是合作社的社员,具有双重属性。

农村社区性合作组织作为传播者的特征主要体现在:(1)农业经营规模较小。农民多从事兼业化经营。兼业化经营使得农产品的商品率低,这样合作组织因服务对象的业务数量少,单一经营很难在经济上做到有利。(2)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现实,使得社区发展与社区型合作组织目标相一致,但鉴于社区发展的控制性,使得农民自身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违背了自愿原则,同时由于社区和合作组织功能的差异性,使得社区的公益性和合作组织的对外赢利性之间产生矛盾,从而导致农民失去参加合作组织的积极性,作为传者的组织没有真正代表农民的心声,其传播的形态便成为了以组织传者为中心的状态,而并非是农民传者真正要传播的信息。(3)鉴于上述原因,社区型合作组织正在向各类专业性合作组织转变。<sup>①</sup>

以欧洲农民协会为例。19世纪,随着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农产品贸易竞争也日趋激烈,欧洲一些国家形成自发性的农民合作组织,进而以自下而上的模式形成了全国性的农民合作组织。20世纪后,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各国农民协会趋向于综合性和国际化,欧洲各国农民协会之间实现了联合,于1958年正式成立了欧盟农民联合会(COPA)。农民联合会可分为欧盟、全国、省级、地区级和基层农民协会等级别,欧洲农民协会的基层组织由农民自愿参加,协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各级农民协会的负责人都由选举产生,上级农民协会的组织 and 领导机构由下级选派代表组成,或者由下级组织的负责人组成。农民协会的直接选举制和自下而上的利益代表制,不仅保证农民协会与农民利益的直接联系及会员对农协成员的直接监督,也有利于反映和代表不同地区及不同方面农民利益和要求,使农民协会的权力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经费来源主要是会费、服务费和捐赠,有些还有政府资助。<sup>②</sup>

依据世界各国合作组织产生和发展的途径,国外合作组织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两种模式,即市场推动模式和政府推动模式。

<sup>①</sup> 刘禹宏等著:《中国农业产业化与农民组织化研究 兼企业制度分析》,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218页。

<sup>②</sup> 王俊英等:《欧洲农民协会的发展及其启示》,《世界农业》2004(11)。

就亚洲而言,日本的农业合作是比较发达的,早在19世纪末就存在,二战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日本的农业合作分为流通领域的合作和农业生产合作两大类。在日本,流通领域的合作以“农业协同组合”为主,简称为“农协”。农协的产生可追溯到明治维新以后,当时一些经营生丝、茶叶、蚕种等商品生产的农民,自发地组织起“同业组合”从事商品的共同销售。在日本出现的生丝合作社、茶叶销售合作社以及共同购买生产资料合作社,都是流通领域中出现最早的合作社。19世纪80年代,西欧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日本广泛传播,明治政府为了巩固小农制度,于1899年制定了“农会法”,1900年又制定了“产业组合法”,从上到下形成了全国性的组织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农户基本上都参加了这个组织。20世纪40年代,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这两个农民组织都变成了政府的御用机构,1943年颁布了《农业团体法》,将两个组织合并为“农业会”。“农业会”可以说是“农协”的前身。二次大战以后对“农业会”进行了改组,恢复了合作组织的民主原则。日本政府于1947年通过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这便成为农业合作社的基本法律。此后,在全国普遍建立了“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农协”便成为日本流通领域合作社的主要形式。除了流通领域合作社外,战后日本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有了明显的发展。主要有四种形式:共同利用各种机器和技术设备的合作组织、集体栽培组织、畜牧业生产合作组织、协作合作经营组织。

### 第三节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传者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传者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个体传者和组织传者。根据乡村社会与外界之间的信息传播流程,可以依次划分为乡村社会内外部的个体传者和组织传者。换言之,中国乡村传播学之传者是一个综合的传播系统。就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信息平等交流的传播理想而言,乡村社会内部与外部的任何个体都可以是传者,也可以是受众,这是社会传播系统的现实情境。但是,为了叙述方便,在这里把乡村社会内部的个体传者分为普通农民和乡村精英。

#### 一、个体传者

乡村传播学的个体传者包括村民及其村民领袖、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外出读书的农村大学生、深入乡村工作的大学生村官以及到乡村传播技术、文化及其他信息的技术员、旅游者和乡村社会的城市居住者。

就上述对农民与村民概念的分析来看,对于中国当代乡村社会传播系统而言,使用村民的概念更为全面和恰当,也更符合当代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现实。

一般而言,村民具有三种属性:第一,职业属性。村民中的大多数人专职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部分人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为主,兼营第二和第三产业;还有一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专职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第二,行政属性。在人事关系上隶属于某行政村;第三,村民的户籍属性。村民无论居住在农村或城市,其户口都属于农业户口。因此,可以将乡村定义为: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业或其他产业劳动,隶属于某行政村,属于国家行政统计数量类别中乡村人口的劳动者。

在乡村社会传播系统中,村民作为传者的角色则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在乡村社会内部的信息传播中,一般村民可以借助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先天优势,使自身处于对话、沟通、平等的交流状态中。面对来自于乡村社会外部的消息,他们则更多集中为前两种传者类型:以自我为中心和以信息为中心的。这种角色类型与村民群体自身的阶层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村民至少可以分化为七个阶层:(1)农业劳动者阶层,直接从事农、林、牧、渔生产;(2)农民工阶层,在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从事工业生产劳动;(3)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4)私营企业主阶层;(5)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6)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主要指农村基层组织成员;(7)农民知识分子,指农村技术人员、民办教师、乡村医生、回乡大、中专学生等。<sup>①</sup>

#### (一) 乡村社会外部的个体传者

就个体传者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别:

##### 1. 作为乡村生活叙述者的知识精英:乡村体验与想象农民

20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和动荡。从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这些过程必然会呈现在以农民为主体对象的文学叙述中,这种文学叙述体现在各种大众媒介中,并随着媒介形式的多元化而逐渐扩大了。这些知识精英作为乡村生活的叙述者,根据各自的乡村体验和生活阅历,通过对乡村社会的第三叙述视角,对农民群体的形象通过一定的叙述程式进行了构建,客观上也构建了乡村生活在城市生活中的全貌。

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并不是很丰富,也没有充分展现出具体而微的乡村生态世界。其中“……可以看到等待启蒙的蒙昧地域,阶级革命的斗争场所,或者是遥远的文化怀乡,却很难看到农民的真实生活世界。农民的真实外表和日常生活,精神渴求和理想愿望,基本上徘徊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之外”。<sup>②</sup> 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提供了农民

<sup>①</sup> 孙德厚:《公共政策制定和理论研究中的“村民”与“农民”概念辨析》,《行政与法》2005(12)。

<sup>②</sup> 贺仲明:《乡村生态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06(6)。

转向新的发展趋向的机遇,抗日战争中的农民形象更多地体现了争取自由的意识的增长过程,而解放区文学中,农民形象则成为当时历史和文学的中心和主角,因此现代文学中农民形象经历了唤起、觉醒、革命、翻身的过程。

20世纪中后期,乡村题材小说显示了自己的独特价值。它以集体书写的姿态,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中国乡村,对乡村生态世界作了多方面的描述。首先表现在对乡村自然和生活环境的描绘上;其次表现在对乡村社会生活描写中、对乡村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表达了对乡村社会未来发展的关切态度。这些描述体现在对乡村人物前途和命运的关注上,对乡村人的关注则是与对乡村社会整体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了。作家们尽管受着政治形势和政治潮流的左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全身心地将笔触伸向了乡村社会的深处,展现了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风貌。作为外来的知识精英,知识分子对乡村有着双重的意义:乡村面貌的改变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但知识又是乡村人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途径,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农民往往很快就离开了乡村。与此相一致,作家们对乡村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以回乡或离乡为标准,作家们表示出谴责或赞扬的态度。<sup>①</sup>这种返乡与离乡之间的行为和心理徘徊的状态,可以说,既是作为乡村生活体验和农民想象的作家知识分子的心态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对乡村知识分子身份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乡村生活叙述者的作家,其叙述的立场可以划分为三种:进城、守城和返城三类。“进城”作家对于城市与乡村的三种书写姿态:一是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极力守护;二是从寻求城市现代性,进入城市,又在城市文化对于乡村文化的冲击下回归乡村文化;三是抵抗城市现代性,却因乡村以及乡村文化本身逐渐被吞噬的命运,表现出无力与无处逃离的困惑。“返城”作家对于城市与乡村的三种书写姿态:一是“右派”从接受乡村的现实到告别乡村;二是“老三届”以“启蒙者”姿态于乡村寻找革命理想,并由对“文革”的质疑走向对“寻找”的质疑;三是“70届后”“被迫”下乡,返城后自觉进入城市日常生活,书写市民文化,并揭示出他们对于革命“理想”的不同阐释,带来对城市与乡村的不同观照姿态。“守城”作家的三种书写城乡姿态:第一是对于城市传统文化中民间文化的守护;第二是从对城市传统文化的批判走向对城市现代性的反思;第三是对于乡村形象超越他人经验的塑造,从而揭示出在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下,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文化的焦虑,以及对乡村文化的陌生感使乡村书写超越了既定的形象。<sup>②</sup>

① 贺仲明:《乡村生态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06(6)。

② 吴妍妍:《作家身份与城市书写》,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

同样地,在其他艺术领域,如美术界,农民形象的构建同样也体现了阶段性的特色。第一种是以传统社会观念和审美习惯为基础的农民形象。传统中国绘画中的农民形象,大都出现在农事中,如耕织、渔猎、采樵等。一般以两种方式呈现,一是有关劳动过程和农事季节关系的叙述;二是抒写心情,寄情山水的文人写意。在这两种类型的绘画中,农民的容貌和个性特征往往不很清晰,只能通过画中人的衣着、从事劳动的身姿,以及人物所处的环境,如田园、山林、桑陌、茅舍……组成想象中的农村景色和身处其中的人物;第二种是现代国家和民族叙事中的农民形象。大致有三种类型:(1)苦难象征:画家描绘农村的生活状况,尤其描写遭受水灾之害的乡村、城镇百姓痛苦生活。(2)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底层民众苦难的叙事,可以转换为对民族和国家的比喻。比如,以受难的农夫或农妇的形象,隐喻土地、家园、国土和民族的受难。抗战时期和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大量版画、宣传画,其中所描绘的农民和城市底层人物的形象。(3)革命的符号:整合了从底层人物,尤其是贫苦农民形象发展起来的叙事象征,以及从国家、民族演绎而来的“解放”和“斗争”的符号体系。第三种是多样性和当代性问题情境中的农民形象。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艺术变化,首先在于人性的复苏,集中反映农民形象变化的是罗中立的《父亲》。其次是现实主义题材的流行,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民题材作为现实主义创作和形式语言探索,被进一步整合入当代文化问题之中,并集中反映在农民和土地关系、农民的精神状态、农民进城以后的境遇之中。<sup>①</sup>

无论是对乡村生活体验中的怀恋之情,还是对农民的集体想象,这类知识精英依靠各自的生活经历,以城市视角对乡村生活进行了多层次描述,在体验和想象中,这些知识精英的信息选择和过滤也是社会大众获取乡村生活信息资料的主要渠道之一。在信息时代,作为传者的乡村社会的外来知识精英,在未来的乡村社会对外信息传播活动中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

## 2. 作为乡村生活关注者的乡村医生

为了发展农村卫生事业,保障农民身体的健康,1958年后,全国选择和训练了一批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保健人员充实到广大农村卫生保健站。1968年9月对其称为赤脚医生。其职责是宣传和执行国家制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进行“两管五改”的技术指导,预防接种、传染病管理和疫情报告;负责一定范围内的人员简易治疗的临时创救。“文革”中的“赤脚医生”,也由从农民中挑选出来,经过简单培训,又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村卫生人员组成,他们采取巡回

<sup>①</sup> 徐虹:《中国农民形象的阶段性特征》,新华网2007年5月22日, [http://news3.xinhuanet.com/shuhua/2007-05/22/content\\_6135470\\_1.htm](http://news3.xinhuanet.com/shuhua/2007-05/22/content_6135470_1.htm)。

下乡、田头出诊的方式。“‘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卫生部门遵照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为生产大队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1968年9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传达毛主席重要批示的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给予了这一新生事物以极大的支持。各地农村赤脚医生,一般都是从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中选拔培养的。他们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对贫下中农有深厚的阶级感情,熟悉当地生活、劳动习惯,所以,当他们经过上级卫生部门有计划的培养训练,初步掌握医疗卫生知识和技术以后,……一般都能比较熟练地用中医和西医两种方法防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有的还能独立地治疗一些疑难病症”。<sup>①</sup>

到1975年,全国已有“赤脚医生”130多万,卫生员、接生员360多万,70%以上的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1974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代表团介绍了中国进行农村卫生建设的情况,包括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以及如何组织城市医药卫生人员下农村等,引起了国际卫生组织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很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1980年至1981年年报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sup>②</sup>1985年1月卫生部决定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凡达到医生水平的改称乡村医生,达不到医生水平的改称卫生员。

作为传者的乡村医生,在乡村社会中角色比较特殊,主要集中在卫生健康信息方面。由于他们部分源于农民群体,工作性质又与农民群体的生活状态紧密相关,因此他们对乡村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无疑成为了解和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健康信息传播状况的重要依据之一。

由于赤脚医生本身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现象,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已经消失了,原来的赤脚医生则大多已脱离了以前的工作,他们在乡村所传播的信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乡村观念的变化,因此就变成了一个需要研究却比较难于收集资料的领域。

### 3. 作为乡村生活实践者的知识青年

有资料显示:在1962年至1963年间,全国共动员上山下乡人员30万人,直接插队落户的就有9000余人。1964年间,全国共动员下乡、回乡人员68万余人,其中知识青年32万余人。1965年,仅到8月份,下乡的知青就有25万余人……这样,至“文革”开始前,不仅将2000余万在“大跃进”中从农村招来的人员

<sup>①</sup>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显示强大生命力 我国农村百万赤脚医生茁壮成长》,《人民日报》1974年6月26日。

<sup>②</sup>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578页。

全部动员返回到了农村,而且还动员了近200万城镇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上山下乡。《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表文章《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新型农民》,指出到农村去,已在我国城市青年中逐步形成了一个革命高潮,“它是推行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sup>①</sup>

作为乡村社会外部的个体传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自身的生活经历在中国城乡社会历史发展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对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而言,其主要作用体现在:

第一,传播文化知识。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公开发布党中央声音的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尤其是在这几份报刊上发表的社论、最高指示等,马上就成为全国的重点学习文章。在条件允许的地区,插队知识青年往往组织读报活动。通过讲读报刊的文章向当地农民传播信息。

第二,传播新的生活观念。他们在单调的乡村生活中,由于是接受农民群体的监督和教育,因此得以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可以将城市生活习惯的点点滴滴传播给当地的村民。

第三,基于对农村社会的体验,他们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村改革乃至于中国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群。

## (二) 乡村社会内部的个体传者

### 1. 普通农民

这里所说的普通农民是指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农民。个体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其天性决定了其与平均主义既对立又向往的矛盾心态;个体小农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绝不是追求平均,而是谋求发财与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完成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来看,农民的主体意识和现实追求与“一大二公”道路的价值取向则难以对接。政府希望在保留农民优点的同时,修正他们的弱点,对农民“劳动者”与“私有者”的两重属性进行剥离:一方面,消除农民“私有者”的基因,要农民放弃小私有,放弃对自己劳动产品拥有权,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强化农民“劳动者”的基因,让他们共同为“集体化”而劳动,变成“狠斗‘私’字一闪念头”的集体主义者。<sup>②</sup>

作为普通农民个体,他们在乡村社会中作为传者的地位是弱势的,主要限于

<sup>①</sup> 文锋:《毛泽东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法治论坛2006年6月18日, www. bbs. china- court. org。

<sup>②</sup> 温锐:《农民平均主义? 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关于农村集体化运动与中国农民研究的反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一般性的生活信息交流,主要以人际传播为主。在这种传播活动中,农民个体之间相互共为传者和受众。其作为传者的主要特点体现在:

第一,就社会历史背景发展而言,中国农民是处于中国社会传播系统中的自然民。鉴于中国社会现实中历史、地域和政治等因素的限制,中国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自然民(natural people)状态,而不是社会公民(social citizen)状态。自然民状态是指农民并没有像城市人口那样,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生活,而处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自然集群的农村社区中。他们对于社会体系的认识,基本是对农村家族关系的一种推断和延伸。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民进城数量的不断增加,这种自然民状态不断在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差异的基础上发生转化,外出打工的农民群体,在城市社会中不断再度社会化的过程中,返乡后也再度社会化了乡村社会的留守农民群体,如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等。乡村社会系统中的农民群体正从自然民状态缓慢地向着社会公民的状态发展。这种发展趋势对于乡村社会变迁机制而言,一方面促使了乡村农民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入城,也造成了部分乡村社会结构的改变,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

第二,农民群体是乡土知识系统的传播者和拥有者。从强调知识的技术性出发,可以把乡土知识称为:“传统技术知识”(Traditional Technical Knowledge)、“原住民技术知识”(Indigenous Technical Knowledge)、“原住民环境知识”(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从文化角度而言,也可以把乡村知识称为部落人的知识(Tribal People Knowledge)、“本土知识”(Native Knowledge)、“土著知识”(Aboriginal Knowledge);而较为常见的是把其与现代科学知识区分的称谓,如:“民间知识”(Folk Knowledge)、“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原住民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乡土知识”(Local Knowledge)。从较系统的角度可以称为“传统知识系统”(Traditional Knowledge System)或“原住民知识系统”(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农民群体的这些乡土知识需要进行适当的管理、抢救。其中的创新性理应得到挖掘和重新发现。

第三,农民群体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延续者。城市化的发展在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现代化的思维模式和新的生活模式的同时,以无可置疑的力量将乡村社会也拖入了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与传统乡村生活形态联系在一起,如社戏,社火,剪纸,泥猴,糖人,年画等,这些文化形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在缓慢地消亡。农民群体对乡村传统生活的承继与延续无形中也延续了乡村传统文化的某些形式。同时,随着农民群体的分化,以市场化的意识来发扬乡村传统文化形式也成为一种新的形式。

随着农民群体的分化,出现了一些介于农民与乡村精英之间的群体,如乡村信息源、农民工、乡村大学生等。

### (1) 乡村信息员

目前,国内乡村信息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府培训的农民信息员,主要由相关农业信息机构的工作人员和部分农民组成;一种是乡村社会内部的乡村精英,在市场机制下自发扮演着农民信息员的作用。

就乡村信息员的形成过程来看,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农民越来越意识到,谁拥有信息并驾驭信息,谁就能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一部分农民率先闯入市场,做起了信息员,他们一方面推销本地的农副产品,另一方面传播市场信息,提供先进的种、养、加工技术,促进了当地副产品的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信息员有的依托瓜果、畜牧、加工龙头企业,有的依托专业市场、专业协会和科技实体,广泛搜集科技信息,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信息网点。农民信息员大多系本地区农副产品销售领头人,他们不仅帮助群众收集、鉴别市场信息,也负责市场分析、前景预测及技术指导、法律服务等业务,他们活跃在市场、乡村,既为农民选择适销对路的种植、养殖、加工业项目,也跑销路;同时提供信息种技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政府主导的乡村信息员是属于金农工程的具体目标之一。金农工程是1994年12月在“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目的是加速和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立“农业综合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其建设目标是建立信息应用系统,构筑农业信息网络,造就信息服务队伍。在现有基础上,具体建设任务包括:开发四个系统、整合三类资源、建设两支队伍、完善一个服务网络。其中建设两支队伍便是指两支信息服务队伍,一支是高素质的农业信息管理服务队伍,另一支是乡村信息员队伍,依靠村组干部、农村经纪人、产业化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和经营大户等,通过培训考核和资格认证,建立乡村信息员队伍。

### (2) 农民工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行动的制度化进程,大批农民离开家乡来到城市,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铸成了城乡之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就农民工群体的当代性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他们既是初级社会群体又是次级社会群体。作为初级社会群体主要以业缘和利缘为纽带,如结伴打工、合伙做买卖、合作办企业等。当然,他们很看重血缘和地缘关系,有些人还利用这些关系了解信息、联系工作、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第二,他们具有中介性的特点。他们的自身素质介于市民和农民之间,低于

市民而高于农民,他们所联系的生产社会化程度一般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况也介乎于市民和农民之间,既保留了一些农民的传统,又具有仿效市民的内容;

第三,他们具有复杂性的特点。该群体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心态和人际关系复杂,质量结构复杂,异质性强;

第四,他们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从农村非农产业群体个人来说,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逐步适应城镇生产和生活的要求,农民的特征逐渐消失,到了他们的后代,就基本融入了城镇社会,成为城镇社会的一员。<sup>①</sup>

而他们作为乡村社会内部个体传者的作用则体现在:(1)以身体力行的生活模式,改变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化现实。在户籍制度机制和农民工政策的变迁中,他们坚守着农民自身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坚定不移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留在城市中生活,并以这种群体的生活姿态,改变着社会制度屏蔽下的城乡不平等社会现实。(2)他们将乡村生活的深层逻辑转移到了城市生活中,因此在城市中形成了城中村等特殊的居住区域,在接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同时,改变着城市生活的现实逻辑关系。或者这种改变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但是这种改变所持续的时间目前还不好估量。(3)他们的下一代将成为推动中国城乡社会实现和谐的推动力之一。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传统农民的生活模式于他们已经很陌生了,对城市生活模式的熟悉度正在从灵魂中改变着在他们身上所残存的传统农民的因子。

调查显示,57.1%的农民工被调查者选择赚钱是其外出打工的目的,列第二位的是寻找致富信息与方法,占42%,而选择学习先进技术观念和开阔眼界的被调查者分别占25.9%和24.7%。农民工外出打工将赚钱作为首要目的是必然的,若传统农业收入大于外出打工收入,就不会产生农民进城务工的现象。赚钱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直接目的,而列第二位的寻找致富信息与方法,也使其能有更多的收入。<sup>②</sup>

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也在悄然发生着分化,根据是否会在城市定居生活的愿望,可以划分为三类:返乡性农民工群体、徘徊型农民工群体和融合型农民工群体。返乡性农民工群体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打算和计划,也就是尽可能多赚钱与学技术,以后将钱与技术带回家乡去供子女上学或者建设家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的是建筑、纺织、清洁、服务等行业。徘徊型农民工群体对自身的定位比较模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适应城市生活自己也希望能够留

① 吕世辰著:《农村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② 调查数据来自于笔者2006—2008年度在北京市对农民工的调查。

在城市。但是,现实的社会制度与政策及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歧视和隔膜,又使他们感觉到了自己与城市的距离。因此,他们对于自己是否能够融入城市感觉希望不大,但是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多年来在城市打工付出的努力结果。这一群体以青年一代农民工为代表。虽然,他们从小生活在农村,不同于返乡型农民工群体的是,在他们身上中国传统农民的典型心态已经消退了许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亲历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初期中国农民在得到土地后的强烈兴奋,以及农村生活在那个时期欣欣向荣的变化。相反,“在他们的印象里家乡留给他们的更多的是一种日渐衰败的贫瘠回忆。因此,这一代人对土地和家乡的眷恋显然已经少了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新观念不断地输入农村并改造着中国农民几千年的传统观念。相当数量的徘徊型农民工群体还没有在家乡建立自己的家庭,也没有在家乡建立了足够的人脉关系,‘落叶归根’对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他们对城乡分治的二元化社会模式流露出不满,并希望变革现行体制。同时他们又认为改革现行体制不是他们可以考虑的问题,而把自己当作体制改革被动的接受者,他们所期望的制度变革不仅仅是统一户籍制度,更重要的是与之相联系的诸如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一系列福利制度。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实现和城市居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他们才有可能真正融入城市。融入型农民工群体可以说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相对成功者”,他们通过多年的奋斗与拼搏,在城市中已经有了相对比较稳定的职业和生活,自身也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对家乡的概念已经很模糊,对他们来说,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意识到自己还不是真正的“城里人”,但与其他农民工群体不同的是,已经普遍认识到自己不大可能回到农村生活了,而且也不满足被当作城市的过客和外来者。<sup>①</sup>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崛起在延续上述选择的同时,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对乡村社会的陌生感,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熟悉了城市生活的时间和空间逻辑,对乡村生活的传统时间和空间概念已经感到陌生;二是在这种处境中,返乡或定居对他们而言,定居是首要选择,但是定居所面临的一系列制度性问题和现实问题都是他们难以回避的选择,因此如何更好地将这一群体稳妥地转化为和谐社会的力量,是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关注的社会命题之一。

### (3) 乡村大学生

乡村大学生作为流动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特殊群体,与城市大学生相比,他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更为频繁,对于城乡二元结构对立以及城乡社会的文化差异心理感受深刻,生活状况的改变十分明显。而他们与乡村社会的天然联系,也使得他们成为乡村传播中面向乡村社会的传者,面向城市社会的受众,这双重身

<sup>①</sup> 刁松龄:《城市化进程中外来农民工群体信息需求分析》,《图书·情报·知识》2007(4)。

份使得乡村大学生在乡村传播系统中处于自我矛盾的心理态势中。一方面他们的乡土情感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信念,另一方面这种浓郁的乡土情感又有意无意地阻碍着他们全身心地融入城市生活中。

由于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乡社会体系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乡村大学生到城市之后所面临的社会化问题,本质上是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文化价值体系的冲突、妥协、融合过程。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大学生的假期返乡行为,在返乡的短暂时间内,他们对原已熟悉的乡村社会的生活产生了陌生感,这种对乡村社会生活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也伴随着他们对城市生活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在接受并选择乡村社会内部信息的同时,他们在选择着如何将城市生活中的相关信息传播到乡村社会中去。在城乡信息传播过程中,乡村大学生的信息选择,也因此带有强烈的城市化色彩。

乡村大学生在城乡之间扮演的主要角色的特征体现在:(1)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乡村生活的变革者的角色。他们是乡村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社会而言,他们的进城意味着乡村与城市之间、依靠知识信息可以进行无障碍沟通,大学生就像是乡村世界里的派遣者,尽管怀抱着各自的梦想,却依然在内心深处固守着乡村社会的生活信念。对城市生活而言,他们扮演着乡村生活系统里传播者的角色,以乡村社会局外人的角色观察着城市与乡村的差异,这一点也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乡村社会的变革者。(2)在乡村生活中,则扮演着城市生活的先导者的角色,以自身的行为模式影响着乡村生活。(3)在城乡信息传播中,扮演着双重而矛盾的角色。乡村代表着自己的根,城市则象征着社会发展的未来,那么乡村大学生以何种立场在城乡之间传播信息便是一个两难选择了。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的家乡可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可以留在城市中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如何选择是当代乡村大学生面临的人生课题。

## 2. 乡村精英

乡村精英是指在村庄中拥有比较优势(如经济资源或人际关系等),拥有一定地位和支配能力,对村庄的变化和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等特征的群体。在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乡村精英群体的构成阶层都在发生着变化。

近代的中国乡村精英是以乡村士绅为代表的,但是传统乡村精英扮演的角色是连接着行政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的,或者说,他们扮演的是“经纪”角色,政府通过其经纪角色来实现其对农村社会的统治。“以乡村领袖为中心的保护体系往往间接地加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正统特性——即加强其与上层官府的联系。通过这些体系,乡村领袖(或称保护人)为村中被保护人提供各种服务,而这种

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又加强了保护人在宗教、家族、以至在 20 世纪初乡村政权的领导地位”。<sup>①</sup> 所以,传统乡村精英更多的是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或经纪人而获得社会地位的。

当代乡村精英类型的划分有不同的标准,有学者将其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三类,有学者则认为可以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或者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而体制内的精英又可以划分为代表自上而下的体制性权力的村党支部、和代表自下而上的内生性权力的村委会。

就乡村传播学而言,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乡村精英,还是经济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精英的划分,均不能改变他们在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的地位。这里按照信息传播的类型来分别论述乡村精英的类型,可以简单地将其划分为经济信息传者、政治信息传者、文化信息传者、服务信息传者和其他生活信息类传者。这些乡村基层精英在信息传播中主要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由于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优势,因此乡村基层精英作为传者在传播信息的时候更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例如在村干部对政策文件的讲解、村庄外部的信息传播等方面。

第二,乡村基层精英处在上级与村民之间,是二者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桥梁,在村庄中他们主要承担着传者的角色。例如,在对上级的信息传播中,也主要承担着传者的角色,受众的角色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中介角色。学者张静指出:村干部的基本角色是变化的,他们致力于在行政系统和村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他们贯彻上级的意图但是并不一定以官方行政规则为摹本,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要通过制造信息或阻塞信息得到行政系统的认可。另一方面,他们需要行政体制的认同,村干部的发言讲话内容充满了行政统一词汇,对自己处理公务的解释也往往给出行政认可的理由。同时,他们还指点村民如何用行政接受的理由打报告,以便通过。因此,除了特定目的的行政大检查之外,村干部日常的工作不重程序而是重结果。<sup>②</sup>

第三,超越乡村视野的“城归”精英返村参与村政,在中国乡村是一个新的现象。他们大多属于乡村经济型精英。改革开放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迁,使得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可能。一些乡村居民积极拓展其社会活动空间,将其延展到政治、经济、精神生活集合地的大城市中,并迅速发家致富,脱颖而出。这些村民走出封闭落后的乡村,常年在外,历经种种磨炼,不仅开阔

<sup>①</sup>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中国: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8 页。

<sup>②</sup> 张静著:《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2—84 页。

了视野,增强了现代意识,而且累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扩大了交往渠道。个人方面的成功,使得他们具备了更多的现代性潜质。他们本来离开了第一产业,进入了第二产业甚至第三产业,现又想通过参与村政的方式,把知识、经济资源、致富经验等回注家乡。从“城归”精英自身而言,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个人能力使得他们有条件参与政治。作为从城市中归来的精英而积极活跃于城乡之间,“城归”精英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活力,很快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并希望他们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 3. 乡村教师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教师在乡村的特殊身份,已经得到认可。一定程度上的乡村领袖地位使得他们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唤醒农民、推动发展的作用。因而从政府或民间层面上均有对乡村教师身份、角色和地位的评价和肯定。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的乡村教师运动始,直到建国后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后乡村教师系统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冲击下的尴尬处境,都很清晰地呈现出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

近代以来,乡村教师是共产主义革命在乡村社会的主要传播者。这是由于“他们接受的教育使他们有能力理解这一复杂的意识形态,而他们对本地乡村实际情况的了解,使他们能根据农民的切身问题并以农民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宣传和解释共产主义”。由于当时主要的传播模式是从中心城市向省城、县城、集镇、乡村这样逐级垂直扩散开去,“乡村教师在这个传播路径中正好占据着城乡联结的关键点,他们从城市接受了现代教育,又回到乡村教书,但与集中在城市的母校、老师,以及教育行政机构仍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并且与同在乡村教书的同学、校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也决定了他们比基本上只在村庄之间流动的货郎和雇工有着更大的空间优势,来传播和发展源自中心城市的革命思想和组织”。<sup>①</sup>

从20世纪20年代,中共中央发起了乡村教师运动。192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作出《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民族革命潮流之高涨,已经影响到乡村中一般思想落后的被压迫农民群众,他们已逐渐有了组织农民协会改良自身生活的要求。党应当特别注意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引导他们与工人联合。为此,就应当首先注意到在乡村中知识比较进步而有领袖地位的乡村教师,争取他们站在我们这边。《决议案》进一步指出:作为乡村教师工作,第一要紧的便是引导他们做反抗地主的宣传,做农民协会运动,组织反抗劣绅土豪,要求减租,宣传党的农民政纲。同时,要引导乡村教师参与地方政治活动,参加全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他们参加共产党、共青

<sup>①</sup> 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

团或国民党,并要十分重视训练他们;联络乡村一般小学教师,引导他们参加教育会,为自身利益而奋斗,提出他们自身权利的要求等等。《决议案》要求党的组织和党员应当立即开展这一乡村教师运动,组织教师联合会,并用联合会名义,召集各种形式之会议,进行宣传和教育,使其更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同一时期,以陶行知等为首的乡村教育工作者,则从乡村教育视角出发,提出应该从改造乡村教师出发来推动乡村教育发展。他认为理想的乡村教师应具备三个特征: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变革社会的精神。并于1930年在《乡村教师》创刊号中写道:“‘生长三家村,苦守五家店。知己遍天下,终身不相见。’这不是我们乡村教师所共感的烦闷吗?《乡村教师》周刊的志愿就是要消除这种烦闷。它要打破空间,使不能相见的可以谈心。我们的警句:‘小的村庄愿与大的世界沟通’,是永远不可忘记的。周刊便要负起这个使命。世界的沟通,在人的沟通;人的沟通,在心灵的沟通。全世界乡村教师有了谈心的机会,然后小的村庄与大的世界乃有沟通的希望”。<sup>①</sup>金轮海则认为“小学校的教师,便是农村的精神领袖,好像人体的大脑,代表思想,可以支配全村的运动,凡是文化的传递,时事的报告,知识的灌输,都要小学教师去做的,他是全村小朋友的朋友,所以对于小朋友的家庭,最能联络,凡是公益事业的举办,各项活动的推进只要由他一宣传,就能轰轰烈烈地向前推进了,总之小学教师确能紧握着全体农民的灵魂,做着整个农村的精神领袖”。<sup>②</sup>

20世纪50年代以来,乡村教师的角色和地位随着社会发展时期的变化有所改变。建国后,为了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乡村教师分为两个系列: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是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和教育系统的正式职员。后来国家施行“民办教师转正”制度,民办教师通过培训(县级进修学校、市级教育学院)、考试等手段拿到相当于中等职业技术的文凭,从而获得和公办教师相同的福利待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90年,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级人民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整顿教师队伍、中师招收民办教师、“民转公”等形式,使民办教师从1977年的491万人减少到1990年的280万人,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1992年8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人事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著名的“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在1994年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争取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解决民办教师问题

<sup>①</sup> 引自陶行知“乡村教师宣言”,他为1930年2月1日出版的《乡村教师》创刊号写的发刊词,原题为《本刊宣言》。

<sup>②</sup> 金轮海:《农村组织与农村改造》,《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一号,第91页。



从此有了历史性的转折。<sup>①</sup>除了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系列之外,还有一种是代课教师,主要是为了应付乡村学校缺乏相应的任课教师而临时设定的。这三种乡村教师的身份,可以从代课教师提升为民办教师、再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换言之,除了公办教师之外,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的主要职业身份是农民,主要工作也以务农为主。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大批年轻人离开了乡村,乡村教师成为乡村教育的坚守者和守望者,他们在低微的工资收入(甚至是常常被拖欠)状况下,一方面维护着乡村教育的希望,另一方面还要想办法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因此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乡村教师的影子,或者是正面的赞誉形象,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而形成新闻轰动效应的需要,乡村教师这一社会身份成了乡村社会中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弱势群体。那么,这一弱势群体的地位和社会角色、乃至社会身份该如何界定?他们在变革中的乡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应该如何呢?这需要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近年来展开的大学生支教活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乡村教师支持和培训活动,是表示对乡村教师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关注的一种社会回应,只是这种社会回应的力量还显得微弱了些。

## 二、组织传者

乡村社会的组织传者可以分为外部的和内部的,乡村社会的外部组织传者主要是农业推广组织和相关企业组织。这一部分将会在传播模式和传播制度中进行分析。这里主要叙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传者。

### (一) 改革开放前的乡村组织

改革开放前的乡村组织是农民协会、农村互助组和人民公社三种类型。

农民协会,也称农会,从历史上来说,中国最初的农民协会是与近代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的。清末在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大力倡导和影响下,1898年清光绪帝发布上谕,正式命令各省府州县“广开农会”,目的是“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1917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公布了农会暂行章程,要求各县成立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也就是说,在清末和民初,中国最初的农会,是一种社会经济自助组织,其主旨是推动农业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将农会变成革命性组织,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之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后来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号召下,又将农会变成了新的

<sup>①</sup> 储召生:《中国民办教师备忘录》,《中国教育报》2001年1月5日。

政权组织。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农会法》规定,农会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为宗旨。<sup>①</sup>

1950年7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将农民协会界定为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任务是,团结雇农、贫农、中农及农村中的一切反封建的分子,遵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有步骤地实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保护农民利益;组织农民生产,举办农村合作社,发展农业和副业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农民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参加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各级农民协会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其职权是根据政府法令和上级农民协会指示及当地农民要求,决定农民运动的方针和计划,审查农民协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农民协会委员会。农民协会经费的来源是会员的工作和人民政府的补助,会员每人每年缴纳会费一斤米。农民协会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农民协会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sup>②</sup>

农村互助组是建立在个体农民基础上的一种农业经济组织。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推动了萌芽于抗战时期非系统化的互助组的发展。互助组有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两种基本形式。前者的规模一般很小,成员之间的共同劳动只限于农忙季节的一些最重要的农事活动。后者不仅规模稍大,而且往往具有这样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参加常年互助组的农户在全年的主要农事活动上都从事共同劳动,并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劳力、牲畜和农具的全面互助。第二,它虽仍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但已积累了少量的公积金和公共财产。

以1958年8月毛泽东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为标志,“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兴起,到全国农村于1982年取消政社合一的体制建立乡政权止,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人民公社的三级管理体系在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强力的整合与控制,这一时期村庄的组织基本上是由国家“嵌入”的。它彻底消灭了传统乡村社会旧的“经济体制”,此前的各种政权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推行公社化的过程中,国家用社会主义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产方式取代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了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生存方式。“在人民公社制度中,最令人惊奇的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缺少明晰的组织边界,

<sup>①</sup> 于建嵘:《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决策咨询》2003(4)。

<sup>②</sup> 参见于建嵘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三章第一部分相关内容。

尽管公社行政是国家组织的最低一层(从形式上看),但实际的国家边界无法清楚地划出,公社经由村社组织——民兵、党支部、大队、小队、农会、妇联、共青团等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关系联系起来。这些组织均非村庄内部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国家嵌入的,以保证对村庄的控制;人民公社的准军事组织形式依从的是国家权力的逻辑”<sup>①</sup>。

## (二) 改革开放之后的乡村组织

乡村组织的类型主要有乡村经济组织、乡村社会组织和乡村基层组织。

乡村经济组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中国乡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专业性和社区性经济合作组织缓慢发展起来。当前中国农民专业性的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各种农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还包括乡村合作基金会。乡村合作基金会是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为解决农民生产资金流转问题而产生的。它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另外,在乡村经济活动中还广泛存在着农产品代理商、批发商以及一些相关的农业经纪人组织。社区性的合作经济组织,现在主要是指以乡镇、村行政区域为范围,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融管理与经营为一体的社区性、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类经济合作组织设在乡村两级,从各地的情况看,名称不完全统一,有的地方称为“乡(镇)经济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有的称为乡(镇)、村“经济实业公司”、“农工商总公司”等。

总体上来说,经济性农民组织名称多样、类型不少。<sup>②</sup>乡村经济组织作为传者的特点主要体现在:(1)提高了农民的组织意识;(2)促进了农民的市场化进程;(3)迫使农民改变自身的小农意识而进入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体系中来。

乡村社会组织:乡村社会组织是乡村次级社会组织,与农村家庭、家族、村社等乡村初级社会组织相比较,具有鲜明特点:组织成员较多,组织规模较大;成员互动面窄,成员间的信息往往由中介传递,有时还要受到某种限制;成员间的关系由规章制度加以规定,是一种依附于职位的、先于互动的正式角色关系;成员在组织中有相对固定的位置并从事某项具体工作;组织间有明确界线,组织领导者根据管理的需要实行权力划分,进行民主管理以调动部属的积极性。

现阶段中国社会组织利益的表达渠道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获准进入这种利益表达渠道的社会组织主要是八个民主党派、军队

<sup>①</sup>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 (ed)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up>②</sup> 程同顺等著:《农民组织与政治发展:再论中国农民的组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19页。

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它们通过固定的制度渠道参政议政;第二种是结构性利益表达渠道,获准进入这种利益表达渠道的主要是代表社会中某一方面、某一部分公民,反映一定利益群体具体利益诉求的社会组织,如文联、科协及各种学会等,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方式或通过在大会议上的代表途径进行利益表达;第三种是功能性利益表达渠道,获准进入这一渠道的主要是不固定为某一社会利益群体表达意见的新闻媒体等社会组织。由于进入这三种利益表达的社会组织基本上都具有官方性或半官方性,这使它们的利益表达往往局限于政治信息的反馈层面,而没有达到西方较成熟公民社会的社会组织参与型的利益表达层次。与此同时,在中国现阶段,还有许多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没有获得政治参与的渠道。<sup>①</sup>

乡村基层组织:目前中国的基层自治性农民组织主要是指村民委员会,它也被视作中国的农民社区自治组织。1982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0条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根据这一规定,村级管理机构的名称统一为村民委员会。1982年宪法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从而指明了乡村社会管理实行村民自治的基本方向。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对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到1985年2月,全国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基本完成。1987年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国家颁布了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职责、产生方式、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等都做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

村民委员会是中国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一些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在中国各地进行,在选举的方式和过程上农民也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比如海选等。

### 思考题

1. 名词解释:守门人,洋葱模式。
2. 简述中外农民概念的差异性。
3. 简述个体农民的传者特征。
4. 简述乡村精英的传者特征。

<sup>①</sup> 傅小随著:《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5. 简述农民组织的传者特征。
6. 简述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中的传者特征,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7. 中国的医疗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不断推进,从医疗改革的角度谈谈你对乡村医生的看法。
8. 简述改革开放后乡村组织的类型。

## 参考文献

### 著作

[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刘怀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意]维尔旨雷·帕累托著,刘北成译:《精英的兴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刘禹宏等著:《中国农业产业化与农民组织化研究 兼企业制度分析》,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版。

吕世辰著:《农村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张静著:《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于建嵘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 (ed)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程同顺等著:《农民组织与政治发展:再论中国农民的组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傅小随著:《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 论文

秦晖:《农民与农业者》,中国学术网站,2007年4月22日,<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148>。

Siegfried Weischenberg, *Journalistik. Theorie und Praxis aktueller Medienkom-*

munikation. drei Bände,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2。

王俊英等:《欧洲农民协会的发展及其启示》,《世界农业》2004(11)。

孙德厚:《公共政策制定和理论研究中的“村民”与“农民”概念辨析》,《行政与法》2005(12)。

贺仲明:《乡村生态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06(6)。

吴妍妍:《作家身份与城市书写》,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

徐虹:《中国农民形象的阶段性特征》,新华网 2007 年 5 月 22 日, [http://news3.xinhuanet.com/shuhua/2007-05/22/content\\_6135470\\_1.htm](http://news3.xinhuanet.com/shuhua/2007-05/22/content_6135470_1.htm)。

文锋:《毛泽东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法治论坛 2006 年 6 月 18 日, [www.bbs.chinacourt.org](http://www.bbs.chinacourt.org)。

温锐:《农民平均主义? 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关于农村集体化运动与中国农民研究的反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刁松龄:《城市化进程中外来农民工群体信息需求分析》,《图书·情报·知识》,2007(4)。

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

于建嵘:《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决策咨询》2003(4)。

## 第三章 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研究

### 第一节 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理论

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理论主要描述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中有代表性的信息理论,并对乡村信息传播的特征进行概述。

#### 一、相关信息理论

##### (一) 市场有效性与信息不对称理论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有大量研究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信息不对称理论则是由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和迈克尔·斯彭斯(A. Michael Spence)提出的。该理论指出,首先,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其次,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市场信号显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再次,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要想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 (二) 信息行为理论

信息行为是人类以信息为消费对象,进行各种信息活动的过程。这一行为过程与个体或群体的信息需求、信息动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信息需求的特征,进而解释信息的选择动机,继而再对信息行为理论进行概述。

像生活在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一样,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需要,

这些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现实状况中有相当的差异性。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的。他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需求层次逐步由低向高发展。一般地,层次越低的需求越容易满足,层次越高的需求越不容易满足;但层次越低的需求则越是基本需求。其核心主观观点是:

(1) 五种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但这种次序不是完全固定的,也有例外的情况;

(2) 需求的发展遵循“满足—激活律”。一般地,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更高层次发展,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相应地,获得基本满足的需要就不再是一股激励力量;

(3) 需求的强弱受“剥夺—主宰律”的影响。即,某一需要被剥夺得越多、越缺乏,这个需求就越突出、越强烈;

(4) 五种需求可以分为高低两级,其中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社交需求都属于低一级需求,这些需求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属于高级需求,它们只有通过内部因素才能满足,一个人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同时存在几种需求,任何一种需求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求的发展而消失。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求占支配地位,对行为起决定作用。这种占支配地位的需求称为优势需求或主导性需求;

(5) 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求层次结构,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文化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直接相关。在不发达国家,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居主导地位的人数比例较大,而高级需求居主导地位的人数比例较小;在发达国家则相反。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人们的需求层次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变化。<sup>①</sup>

人类的信息需求可以说包含了马斯洛所说的5种需求,也就是说信息需求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社会活动。因此,美国学者韦尔(Tom Weir)仿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提出了信息需求行为等级图。韦尔认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信息需求行为,当某类信息与个人自己的需求等级位置无关紧要时,“知沟”就出现了(见图3-1)。

与信息需求行为相关的是信息服务。信息服务就是信息机构针对受众的信

<sup>①</sup> 俞明南著:《现代企业管理》(第四版),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3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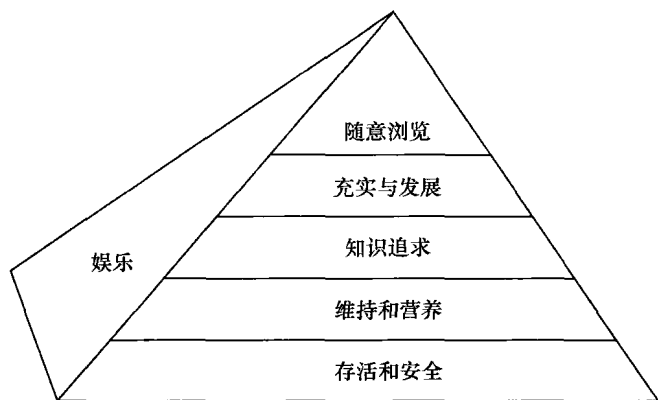


图 3-1 信息寻求行为的等级图

资料来源:[美]沃纳·赛佛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学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5 页。

息需求,及时地将信息提供给受众的活动。信息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向受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以使信息发挥效应。由于对信息的需求不断增加,信息服务处于不断的发展和深化之中。

受众的信息需要是千变万化的。信息机构必须针对不同的受众及其信息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不仅要面对一般的信息受众及其信息需求,更要面对特定的信息受众及其信息需求。一般来说,按照信息服务工作基础的不同,可以把信息服务划分为文献服务、指导服务、检索服务、咨询服务和网络服务几大类型。按服务所提供信息的加工深度区分可分为一次信息服务、二次信息服务和三次信息服务。按信息服务手段区分可分为人工信息服务和自动化信息服务。按照服务持续的时间可分为长期信息服务和即时信息服务,按服务的收费情况可区分为无偿信息服务和有偿信息服务等等。<sup>①</sup>

### (三) 信息依赖模式

由美国学者鲍尔·罗克希与德夫勒(Ball-Rokeach & DeFleur)提出。信息依赖模式主要探究大众传播媒介效果出现的潜在社会结构条件,指出在现代社会里,受众依赖大众媒介信息,来了解和适应他们所在的社会中发生的情况。依赖的类型和程度取决于若干结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条件,首先是与社会常遭到的变化、冲突、不稳定的程度有关;其次是与大众媒介行使许多独特的和主要的信息功能的程度有关。信息依赖模式把传播效果同社会结构条件(社会文化、规

<sup>①</sup> 杜栋编著:《信息管理学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6 页。

范和价值等)联系在一起。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劝服性信息—社会文化形成的过程—接受信息按社会准则作出解释—导致受众态度行为的改变。信息依赖模式关注的是社会条件而不是个体及个性变量,因而该模式能解释一些宏观的社会现象。

#### (四) 信息污染理论与信息素养

随着社会信息化速度的不断加强,社会信息流大幅度增长,信息污染(Information Pollution)问题也日趋严重。对信息污染的界定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说法,代表性的定义有:(1)信息污染是信息环境被污染、被破坏、失衡的表现;(2)信息污染是信息存贮无序化的表现;(3)信息污染是负信息现象;(4)信息污染指信息服务业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服务体系不健全,消息流通不畅,信息加工基本处于低级阶段等等,由此引致的信息失实、重复、过载、堵塞、误导而造成的信息混乱、失灵甚至失效现象;(5)信息污染指由于信息量的急剧增长、信息处理过程中所造成的误差导致各种意见、判断选择不可避免地出现偏离事实的现象;(6)信息污染指信息资源中混入干扰性、欺骗性、误导性的现象;(7)信息污染指无价值与错讹的信息泛滥并造成危险的现象;(8)信息污染指社会信息流中的信息由于潜伏着与生俱来的不完全性、可伪性、时滞性等可污因子以及受人类在信息生产、加工处理、传递与应用等各环节中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带来与其正效用近乎平行的负面影响;(9)信息污染指在人们从事的政治、经济、教育及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许多虚假、冗余、过剩、老化、淫秽等不良信息,影响了人们对用信息的吸收利用,甚至造成对人类的危害和损失的现象;(10)信息污染指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信息生产、加工处理、传递和利用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

我国学者陆宝益等将信息污染的表现形式归结为:信息过载、信息失实、信息过时、信息重复、信息堵塞、信息错位、信息误导,信息干扰、信息无序、信息缺损、信息病毒、信息渗透等十二种。应当说,上述对信息污染表现形式的归结是比较全面的。<sup>①</sup>

伴随着信息污染而来的现象便是信息侵略行为的构成。信息污染不仅发生在信息数量过度的社会情境中,在信息相对不发达的地区也会存在这样的现象,甚至会出现信息污染综合症的情形,其产生的缘由在于因为有些人不善于分析处理信息,以致在短时间内接收大量的信息后,大脑来不及消化吸收,受繁杂信息干扰,人便会产生心理不适应现象,造成心理和生理状态的变化。

对乡村社会信息传播而言,不仅仅是外界信息输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信息接受的问题,尤其是提高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的问题。信息素养概念

<sup>①</sup> 郭太敏主编:《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北京:中国矿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波尔(Paul zurkowski)于1974年提出,并被概括为“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后来又解释为“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利用信息的技能”。

信息素养主要包括: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三方面素养。信息意识是指人们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包括对信息的识别与获取能力,对信息的分析、判断以及对信息的利用和评价素养;信息能力是以各种形式发现、评价、利用相交流信息的能力。信息能力是图书馆素养、计算机素养、传媒素养、技术素养、伦理学、批判性思维和交流技能的融合或综合;信息道德是指人们在信息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如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个人隐私、抵制不良信息等。<sup>①</sup>

### (五) 信息设计理论

芭芭拉·奥凯菲(Barbara O'Keefe)认为,人们对传播和信息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在特定的情境中决定跟对方说些什么的时候,运用了不同的逻辑。可以用“信息设计逻辑”(message design logic)这个术语来描述信息背后的思维过程。并将这种逻辑分为三种:表达性逻辑(expressive logic):即把交流看作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模式,它可以用来交流感情和思想。从本质上说,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开放的,对外界的刺激反应很灵敏,但它并未对他人的需求和欲望表现出足够的重视;成规性逻辑(conventional logic)把交流看作是一场按照特定规则来进行的游戏。按照这一逻辑,交流是自我表达的方式之一,它是按照被普遍接受的规则来进行的,这些规则涉及到每一个参与者的权力和责任。这一逻辑旨在设计出符合礼节的、得体的、以每个参与者应当了解的规则为基础的信息;修辞性逻辑(rhetorical logic)把交流看作是通过谈判来改变规则的一种方式。按照这一逻辑设计的信息较为灵活、深刻和以人为本。这类信息重新设计了情境,以便将各种不同的目标——包括说服和讲礼貌——整合为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sup>②</sup>

在乡村社会中,人们表达信息的方式有自己的独特性,换言之,有自身的信息设计逻辑,尽管这种逻辑是潜在的而非自明的。上述的信息理论在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信息的不对称状况,信息的寻求诉求行为,信息的依赖行为,信息素养问题等,在下面的描述中会涉及到这些问题。

## 二、乡村信息传播特征

### (一) 法国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在研究法国小农的信息传播时,就

<sup>①</sup> 郭太敏主编:《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北京:中国矿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sup>②</sup>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人类传播理论》(影印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11页。

认识到了技术手段的影响。他认为乡村社会内部存在两种信息传播系统,“一种是基于邻居互识关系的信息传递系统,信息和影响是沿着传统的、个人的和整体的渠道传递,另一种是更加分化的社会信息传递系统,大众传播手段具有更大的作用,组织和机构是一些比近邻关系更具有约束性的框框”。这两种信息传递系统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是紧密地交错在一起的。“由报刊、广播和电视传递来的信息,必须先通过交谈进行讨论、解释和评价,然后才能真正被理解并随后被运用”。讨论、解释和评价的过程就是村民集体“消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影响的人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外一些“主要关切地方问题的人,具有更多的个人影响和道德影响,他们主要参与解决家庭问题和近邻关系的问题”<sup>①</sup>。这两种人在乡村信息传播中起着意见领袖的作用。换言之,乡村信息传播的关系网络一方面是邻里之间,一方面是大众传播组织和相关机构的信息传播网络,在这两个网络之间,还包括一些意见领袖在发挥协调和再度传播某些特定信息的作用。

## (二) 熟人社会信息传播观

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体系是按照熟人社会的信息传播逻辑来实现的,并指出了形成熟人社会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中国乡村社会的不流动性特征决定的,这种不流动性具有空间上的常态性和时间上的延续性。“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来说则是孤立和隔膜”。但是这种孤立和隔膜并非是个体意义上的;也不是家庭意义上的,而是以居住在一起的乡村社区为单位,“农民大多聚村而居”;其次,在以村落为单位的居住状况下,人与空间的孤立和隔膜在这里指的便是村落与村落之间的隔膜,也就是村落的地方性特征;再次,这种不流动性和地方性混合在一起发生作用,形成了单个村落内部独特的人际关系系统,谁与谁都是熟悉的,甚至是未出生的、即将出生的和已经成人的或行将辞世的人,因为独特的地方性和集聚特色而形成了熟悉的社区信息传播状态。

这种熟悉对于中国乡村基层的信息传播而言,具有很显著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意义。具体而言,体现在:第一,信息传播具有约定俗成的渠道和模式。因为“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地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从无数次的小摩擦里淘炼出来的……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sup>②</sup>。因此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交流是自然状态的交流,是体验

① [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②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0页。

式的交流;第二,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情境和行为模式是后天习得的。人与人之间的性情、癖好在日常接触中自然而然地相互了解了,交流所用的语言有时甚至是多余的,因为他们是日常接触的关系,是天天见面相互合作的关系,是没有陌生人的信息传播。其中每个人的生存半径、生活半径都非常狭小,只需要与熟悉的人更为熟悉地自然交流就可以了,没有陌生的信息传播情境和行为模式;第三,信息传播作用的媒介即语言和文字,有时会阻碍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因而对传统的中国乡村基层社会而言是可有可无的,或者是多余的。“语言像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出去……其实这个筛子虽则有助于人和人之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之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个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sup>①</sup>。无言胜有言的情形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常常发生,因为熟悉,无需语言,只需要彼此之间更为直接的交流,这与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本质有必然的联系;第四,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变迁中,“文字下乡”或者类似的文化传播行为,应在理解乡村基层社会的信息传播理念、规则和特征的前提下才能有所拓展,否则以乡村社会外来者的立场来评判接受者的“愚”是不恰当的;第五,乡村社会中没有新闻。因为这个熟悉的社会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这里的时间是在世代之间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sup>②</sup>。

基于这样的社会特征,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并不依赖文字和语言这些大众媒介,更不需要现代大众媒介所提供的新闻,人们在历史文化和世代传递中,丰富着自身的信息内容,历史甚至可以在某一刻停滞,文化的年轮就像是安静的河流中清晰的鹅卵石,静静地绽放着自己。

### (三) 横向畅通、纵向阻滞的信息传播特点

中国学者秦晖、苏文认为,“对某一个宗法农民来说,他周围的社会宛如以他为中心的若干同心圆,按‘人情’亲疏层次分明地外延着:极少数亲近者,较多的次亲近者,更多的半疏远者,而在最后一圈之外,则是无数毫不相干者的汪洋大海”<sup>③</sup>。对欧洲宗法农民而言,人情有较浓厚的地缘色彩,对中国农民而言,家族因素在其中则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鉴于此,由于缺乏个体人格基础上的隐私权屏障,现代市民社会中高度“闭塞”的许多“个人信息”在乡村社会中往往传播迅速。而且,这种传播还往往具

①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 页。

② 同上书,第 22 页。

③ 秦晖、苏文著:《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0 页。

有信息“放大”或信息扭曲的功能。同时,某些信息因宗法共同体的等级壁垒,会导致不同等级之间的信息隔绝机制。许多上层对之高度敏感的信息,在下层却难以引起反应与传播。“隐私权屏障的缺乏与等级壁垒造成的信息隔绝机制,使宗法农民社会内的信息传播出现了横向畅通而纵向阻滞的局面”<sup>①</sup>。

换言之,在传统乡村内部,信息的传播呈“横向畅通而纵向阻滞”的特点。“横向畅通”是指乡村内部的某些信息,由于人们之间的隐私权障碍的缺乏,呈现出高度开放性的特征。“纵向阻滞”则是指由于“等级壁垒”的缘故,来自乡村社会外部的信息很难在乡村社会中得到传播,获得良好的效果。

#### (四) 乡土知识系统的创新性传播观

美国学者罗杰斯认为,“许多种乡土知识系统是以传统知识系统的实行者为代表的”。例如:中国乡村的赤脚医生,第三世界国家乡村的传统接生婆等。个人在推荐一项创新时,为什么常常忽视乡土认识系统呢?对新想法相对优势的强烈信任,常常使有权的技术专家认为:现有的策略是低劣的,根本就不需要对它加以考虑。“乡土知识系统的实践专家们,像巴厘岛的印度教祭司、许多国家的传统助产士(接生婆)和拉丁美洲的‘库润德若斯’(传统精神病医生)等,在他们使用现代技术的同行们眼中,都是江湖骗子”<sup>②</sup>。因此,应重视和发掘乡土知识系统中的优势,并进行适当的管理和传播。

## 第二节 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类别

### 一、政策信息

政策信息是指国家和政府各级管理部门根据政治生活、社会经济、科技活动、文化教育等方面制订的有关方针、政策、法令、规章制度等指令性信息,它还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所制订的有关全国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长期或短期发展规划、计划等。

政策信息的特征在于:覆盖面广,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权威性,一方面政策制订的基础是来源于社会各种调查资料,准确可靠,另一方面政策信息产生于决策机构,对各种社会活动起着引导和制约作用。政策信息可分为政策理论信息、政策内容信息、政策运行信息、政策主体信息、政策客体信息等类型。

<sup>①</sup> 秦晖、苏文著:《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83页。

<sup>②</sup> [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著,辛欣译:《创新与扩散》,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政策理论信息是政治、经济等各类政策思想的反映,它是有关政策理论、思想、观点的总和。这部分信息的内容属思想形态,具有观念性。

政策内容信息是各种各类政策内容的反映。政策通过各种新闻媒介或书籍等物质载体表现出来,就成为政策内容信息。从纵向看,这一信息包括历史性政策信息、现行政策信息、未来政策信息。从横向看,则包括经济信息、科技信息、文化信息、教育信息等。

政策运行信息是指反映政策的运动和发展变化的信息。它包括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价监督和终结各阶段的信息以及一个政策周期向另一个政策周期转化的信息。政策运行信息是政策实践活动以及政策发展变化状况的反映,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因其包含的内容庞杂繁多,又具有综合性;此外,政策运行信息是一环扣一环,每一环相互联系,循环往复运动,具有连续性的特征。

政策主体信息是指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的政策意向、主张、倾向等。由于这部分信息是领导者的政策思路和政策观点,往往又是在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以谈话或讲话以及报告介绍形式出现。因此,这种政策信息相对政策内容信息来说,具有一定超前性和潜在性,它是或可能是一种未来政策的思想倾向和思想基础,即这些意向、主张、倾向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政策的发展趋势。这部分信息又具有可变性,即政策主体的意向、主张、倾向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政策客体信息是指政策对象对政策的认同、接受程度等,它是政策对象的社会政治心理的反映。由于这部分政策信息来自广大的政策对象,需要经过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的心理反映的集中过程,即信息加工过程。<sup>①</sup>

## 二、市场信息

市场信息是反映市场经济活动特征及发展变化情况的各种数据、情报和资料的统称。市场信息包括市场需求变化信息、价格变动信息、消费者购买、购销服务信息、竞争对手信息、流通渠道和商品的上市情况、市场潜力信息等。其主要内容包括:(1)农牧民生产、生活需求情况;(2)农副土特产品的供应量;(3)市场服务情况;(4)新产品供需情况;(5)市场价格变化情况等。市场信息对转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而言,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如何建立乡村社会与市场信息网络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促进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

## 三、其他信息

其他信息包括文化教育信息、媒介信息、旅游信息、就业信息等。以文化教

<sup>①</sup> 王福生著:《政策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育信息为例,乡村图书馆早在19世纪的英国就出现了社区服务,后来欧洲一些国家也相继出现,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就已形成了“公共图书馆社区服务”机构,为居民提供教育、卫生、福利、家庭、法律、消费者权益、住房等全方位信息服务。20世纪60年代,美国由政府组织发起,底特律公共图书馆首先参与,开展社区信息服务。70年代已建成庞大的地方信息库,形成美国公共图书馆社区服务专门机构。日本政府提出在居民徒步20分钟之内必须有一个图书馆,每月至少要有两次以上的巡回送书服务。发达国家的社区图书馆便由公共图书馆派生而出。他们大多实行总馆一分馆制,即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以公共图书馆为核心总馆,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分馆,分馆隶属于总馆。读者可以在任何一个分馆办理图书借阅手续。在我国,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近几年的事,而把图书馆与社区服务联系在一起,基本处于刚起步阶段。<sup>①</sup> 其他的信息建设也处于零散的状态。

### 第三节 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特征

传统时期,农民生产自给自足,属于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小农阶段,即“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省。……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sup>②</sup>。村民的流动性很小,村民之间的区别不大,村庄的信息内容单一,信息的传入具有偶然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的流动性日益增大,姻亲圈也随着扩大。人员的流动带来信息的流动,率先进入城市的村民,率先尝试新事物的村民,给其他村民做表率,通过熟人的带动作用,信息渐渐由个人掌握变为集体所有;姻亲圈的扩大,使村民有机会获得其他村庄的信息,有利于村民了解外部世界。总体上看,村庄信息的特点具有低风险性,村庄信息总是他人的经验,是被验证可靠的信息。然而,村庄信息的内容相对单一,毕竟村民实验的信息是有限的。村庄信息传播的特点是先行者掌握,而后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作用下,信息由个人掌握变为集体所有。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对于没有利益竞争的信息,村庄基本是共享的,一旦

<sup>①</sup> 廖腾芳著:《中国乡村社区图书馆的现状与发展模式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sup>②</sup>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信息的外泄会引起村民之间利益的冲突。

### 一、信息的乡土性

农民的信息来自多种渠道,他们自身也经常性地生产信息。通常,对农民有用的信息并不是来自研究单位、推广单位、政府部门等,而是来自农民本身。由于农民居住区域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地理状况的差异,使得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的乡土性特征具体体现在地域性和季节性上。地域性是指由于自然环境和地理差异而形成的信息特征。例如:法国在社会历史、自然条件和耕作体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作为法国乡村居民面上的分布形式——乡村聚落一类型很多。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聚居型、散居型和垂直型。聚居型以巴黎盆地最为典型,东部和北部地区也多聚居型村落。这里的村民往往沿道路或者围绕学校、教堂、邮局和商店等机构聚合居住。每天到离开住宅较远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它代表着历史上公有土地的遗迹。散居型则以佛兰德滨平原最典型,此外还有西部和南部。这里的村民往往独处,机关和其他单位也分散在各处。村民的耕地一般均在宅旁附近。垂直型又称阿尔卑斯型,是山区居民特有的村落形式。村落最高限度一般为海拔1000米左右。因此,乡村的信息传播不仅具有因为居住状况、自然环境和历史原因遗留下的痕迹,而且信息的内容也因此具有不同程度的分散性和地域性。

乡村信息具有时效性的特征。农业生产周期长,带来信息效益的时限长。由于受生物因素(即动植物生长发育需要较长时间)的限制,信息的传播不仅表现在一个生产周期的结束,而且较长远地反应在连续的生产周期中。

乡村信息的信息之间的关联性。乡村社会、经济、生态、技术、环境各种因子综合交错,不仅构成了乡村信息的复杂性,也带来了明显的相关性。比如天气的变动,势必对其他因素,甚至整个乡村社会经济活动带来影响和变动。

### 二、信息的自主性与依附性

信息的自主性是指乡村社会有自身的信息生产和消费系统,这种传播系统使得乡村社会的信息呈现出自主性的特征。同时,乡村社会如果与外界发生信息交流,这一社会形态的信息容量会越来越固化,信息的流量也会降低。因此在拥有信息生产和消费的自主性特征之外,乡村社会的信息还具有依附性特征。

外来信息的输入,对乡村社会的观念必然会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力具体体现在信息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矛盾统一中。例如,一个离开了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大学生,他来到了都市,获取了城市社会信息内容,必然会对他原有的信息观念造成冲击,这种冲击既会体现在精神上,也会体现在行为上。当这位乡村

大学生毕业后重回乡村,或者他选择以外界所获取的信息观念改变原有的乡村信息自主系统,或者他选择放弃他在外界所获取的其他信息资源,这两种选择都不可能单纯而彻底地完成,他便会自主性和依附性中选择中间道路,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将外界的信息与内部的信息混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对乡村社会信息自主性系统的一种变革行为。信息的自主性系统与依附性系统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如何解决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种信息变革的方向。换言之,这种变革在乡村社会中总是在缓慢地进行着,村民的信息自主性系统和依附性特征之间也总是在悄然变革村民的观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乡村变迁的进程。

#### 第四节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研究

##### 一、信息的总体概貌

##### (一)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信息体系的构成

中国乡村信息传播体系主要由8部分构成。第一,以大众传播(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为主的信息传播体系。作为城市化产物的大众媒介体系,其报道的主位立场是城市受众。因此,大众媒介信息内容传播体系选择信息的趋向也是城市主位的信息选择方式;第二,以组织传播为主的信息传播体系。由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乡级涉农部门为信息传播主体将信息层层下载到基层村委会。这些部门多通过简报文件的形式传播农业政策或科技信息,并利用自己的网页在互联网上发布和收集信息。农技推广部门也通过各种方式诸如项目推广、项目示范辐射、技术承包等,将相关的农业新技术通过技术员向村民传播;第三,以工商企业或民营企业为主的信息传播体系。由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通过电话或计算机网络将该企业的农贸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供村民选择浏览;第四,以企业为主、政府为辅多元信息传播相结合的信息传播体系。由三个以上的信息传播主体相结合,通过相应的信息传播渠道共同为特定的受众(村民)提供科技信息服务的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如陕西宝鸡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信息服务模式;第五,以乡村个体信息中介为信源的信息传播体系。由村能人、乡村教师、信息专业户等为主体,主要通过人际传播方式(电话、宣传册、面对面)将信息直接传递给村民;第六,由大众传播信息系统、企业信息传播系统以及政府信息传播系统,对城市受众进行乡村信息的总体传播;第七,其他信息传播体系,如乡村大学生、农民工、大学生村官、下乡干部、乡村旅游者、社会调查者等组成的信息传播体系;第八,网络系统传播。中国是在1994年4月正式与国际互联网连接。1996年在农业部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级的中国农业信息网。1997年在中国农业

科学院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截至2000年,国内的农业网站有2200多家;到2002年初,中国农业网站数量已达3000多家,超过了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截止2008年中国农业网站数量超过7000家。其中,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www.ny3721.com/url/2805/>)、中国种植技术网(<http://www.ny3721.com/url/11008/>)、中国养殖技术网(<http://www.ny3721.com/url/10455/>)、365农业网(<http://www.ny3721.com/url/11892/>)、农博网(<http://www.ny3721.com/url/2645/>)。<sup>①</sup>2009年7月11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农村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农业部信息中心在京联合组织召开了《中国农业网站发展年度报告》编写研讨会,预计每年出版一本,2009年12月,《2009年度中国农业网站发展年度报告》面世。<sup>②</sup>

除此之外,我国还建立了多种类型的农业数据库,在乡村信息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进了世界大型农业科技文献数据库,并不断更新拓展。中国农业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起步虽比美国晚近10年,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加快了图书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和图书馆网络化的建设,为建设国家农业数字化图书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0年,中国正式宣布建设国家数字图书馆。随着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建立,农业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也将日益完善,乡村图书馆不仅成为乡村的文化信息交流中心和人际交往中心,在未来的发展中也会在乡村信息的对外交流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 (二)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信息内容

乡村信息场域是指由乡村传播系统中信息类别发生的场所构成的集合体,是信息地和信息类别共同组合的同一体。乡村信息的生产与再生产消费与再消费必然在乡村信息场域中完成。这里从信息内容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在分析中将乡村信息发生的类别场地等诸种因素做内容的附属品进行解读。

就宏观而言,乡村信息包括两个大的信息类别,一类是乡村市场类信息,包括经济信息、科技信息、金融信息、劳务信息、文化信息等;另一类是非市场类信息,包括日常生活信息、行政管理信息、乡村政治信息、媒介信息、政策信息等。这两个信息类别之间在传播过程中时常出现交叉现象。

### 1. 市场类信息

乡村市场类信息是指各级领导、有关部门、企业及其他事业单位在农村经济工作的决策与管理中和以农村市场主体(即农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

<sup>①</sup> 中国农业网站排行榜,2009年7月14日,<http://top.ny3721.com/>。

<sup>②</sup> 《“中国农业网站年度发展报告”今年内将问世》,新浪网2009年7月13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713/10346472163.shtml>。

在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具体来说,内容包括:相关的理论、方针、政策,新品种、新技术、农业质量标准,农业生产资料的供求及其价格情况、农产品的供求及其价格情况,农村劳动力的情况,农村资金的情况,农村土地的情况,农村经济宏观情况,国民经济宏观情况,世界经济宏观情况等等多方面多层次的信息。它可以细分为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农垦、水利、气象、农机、农技、乡镇企业等行业方面的信息,也可以细分为农产品生产、加工、经营、流通、消费、储藏等产业化各个环节方面的信息,还可以细分为有关的基础性信息、综合性信息、动态性信息和预测性信息。<sup>①</sup>

## 2. 非市场类信息

第一,三农政策与法规信息。政策信息就是国家和政党进行各种政策性活动的意志、主张、倾向等的信号,以及反映或表现这类活动的各种形式的信息。政策信息可分为政策理论信息、政策内容信息、政策运行信息、政策主体信息、政策客体信息等类型(详细说明见本章第二节政策信息部分)。三农政策信息是指与农业、农村与农民有关的政策与法规(也包括农民工政策信息),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政策、农村金融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农民非农化政策、农民户籍政策、农民社团政策、农民收入增收政策和农民工政策等信息。

第二,行政管理信息。通过规范性的政治传播手段而传递的信息,主要传播的形式有会议、文件、广播、乡村小媒体等。

第三,教育类信息。随着20世纪末中国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农业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因其弱势产业教育的特征与发展规律不适应简单市场化运作,在不同程度上被削弱、流失,甚至瘫痪。全国农村职业初高中基本上处于“有校无生”的瘫痪状态,农民的教育程度在迅速下滑。如何利用新的网络化手段,实现农村教育信息化是需要着手落实的一个问题。2003年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启动。至2008年,在总体规划、先行试点、重点突破、分步实施的指导原则下,我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sup>②</sup>

目前,一些新媒体公司利用自身的优势,将产品拓展到乡村市场,不仅开拓了乡村信息的内容,也将各种媒介手段综合起来,拓展了乡村社会中人际交往的信息内容。如移动公司所倡导的以“三个一工程”打造乡村信息服务站的口号:所谓“一站”:在一个村,至少选择一个宣传栏,可以是村务公开栏,也可以是卫生、法制宣传栏,统一命名为“乡村信息服务站”。乡村信息服务站三分天下,分

<sup>①</sup> 郭作玉:《关于农村市场信息服务的思考》,《电子政务》2009(4)。

<sup>②</sup> 《农村教育信息化更重应用实效》,支点网,2009年6月22日, <http://www.topoint.com.cn/html/e/jyky/anli/2009/06/239698.html>。

别为“村务信息栏”、“报刊阅读栏”、“移动信息栏”；“一报”：向乡村发放《南方农村报》、《农民日报》等村民爱看的报纸，粘贴于乡村信息站信息栏，为村民提供适用信息，增加乡村信息服务站的吸引力。中国移动的一些小型海报，单张也可以利用《南方农村报》渠道下发。“一员”：宣传栏的维护落实到人，由村委会安排村干部值班担任信息化管理员，负责宣传栏的管理与维护，以及移动宣传物料的领取、粘贴。公开栏的改造既满足了村民的信息需求，又树立了政府的民主形象，也给中国移动创造了一个恒久的、廉价的宣传平台。<sup>①</sup>

### (三) 乡村信息需求状况

农民最需要哪些信息呢？联合国粮农组织(www.fao.org)在网上公布的由中国农业部信息中心、北京市城乡经济信息中心牵头的一项全国农村范围内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在村民获取信息时的重要位置(见图3-2)。该项调查在2003年进行，包括浙江省绍云县、兰溪市、安徽省芜湖县、舒城县以及吉林省扶余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利通区等6个县(市)，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可以看出，技术信息、农业品种信息和市场信息是农民最为需要的信息种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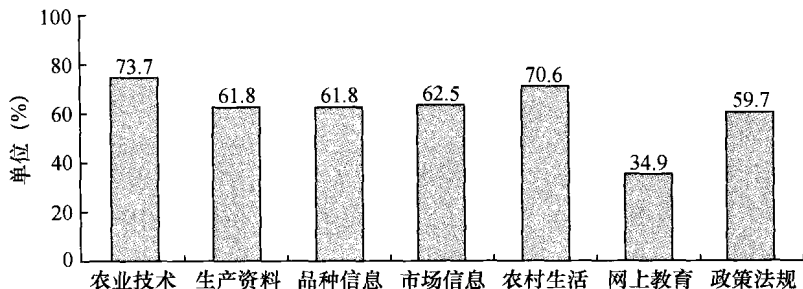


图3-2 农民信息需求种类

资料来源：王文生编著：《中国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与机制研究》，北京：经济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就政府所关注的科技信息而言，不同类型的农民对科技信息的需求有很大的差异。社会救济型和极端贫困型农民对来自媒介的各种信息不关心，甚至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即使是看电视，也只看影视剧等文艺娱乐节目，科技信息需求意识很低。

低收入型农民科技信息需求意识薄弱，科技信息需求不明显。对多种类别

<sup>①</sup> 彭旭知：《将农村宣传沉下去——中国移动农村市场宣传攻略》，博锐管理在线，2007年10月15日，<http://www.boraid.com/>。

的信息感兴趣,如政策法规信息、知识性强的科学文化信息、市场方面的农产品销售信息、供求信息、实际操作方面的新技术、新经验等方面的信息。但对于自己最需要的信息,往往回答不出来。用村民的话来说,就是电视里的节目都好看。

中等收入型农民有效信息使用率较低,科技信息需求较强。他们最需要的信息常常是实际操作层面的信息和市场信息,如新技术的使用、农产品销路信息、天气预报、与“三农”有关的农村政策、致富经验等。除了电视、广播、人际传播媒介外,开始较多地关注报纸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书籍、宣传册,并能够在带头人、技术员和村干部的引导下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科技信息。虽然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较前者多了,但选择有效信息和使用有效信息的能力还较差。多数农民不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信息,或者由于采纳信息后得到的结果不理想,结果造成对待信息的犹豫不决和使用信息的不确定性态度。

相对富裕型农民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市场信息、新技术使用、农产品销路、科学知识和农村政策,平均信息需求率约在 37.3%—53.9%,且更多地关注市场信息、农产品销路信息和政策、法规类信息。<sup>①</sup>

## 二、信息传播特征和趋势

### (一) 信息与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稳定问题

#### 1.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特征

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转型已是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就中国乡村社会而言,其转型特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郑杭生指出,主要有三个方面(见图 3-3)。

(1) 个体意识的觉醒。“总起来看,乡村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变化最集中地表现为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人力量的成长。人格变化的取向可以概括为个体化。这种个体化不是孤立的,它的另一面是对社会的认同。这和传统乡村社会成员被以血缘为纽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所统治不同,现代社会中对个人的约束表现在以业缘为纽带的法律作用。人格的个体化必须有社会的法制化与之相适应”<sup>②</sup>。

(2) 业缘关系在乡村社会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业缘、地缘、血缘三种关系交织在一起的乡村社会是相当复杂的,至今还没有量化的模型表示出三种关系

<sup>①</sup> 谭英、谢咏才:《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不同类型农户信息需求调查与分析》,2004 中国传播学论坛提交论文。

<sup>②</sup> 郑杭生著:《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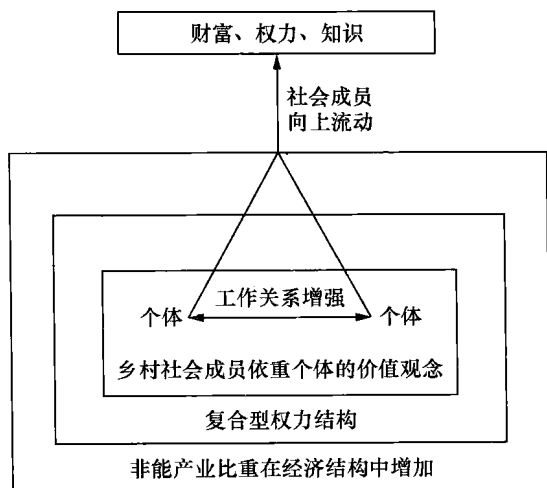


图 3-3 乡村社会转型理论模型示意图

资料来源:郑杭生著:《当代中国农村转型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7 页。

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但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业缘关系终究是要否定地缘和血缘关系的。

(3) 乡村社会成员实现自我的动力来源于财富、权力和知识。换言之,财富、权力(做官)与知识三者共同成为引导社会成员向上的动力。这与传统社会中,权力是引导社会成员向上的决定性因素是不同的。……可以预料,经济的发展必然提供更多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农村社会成员将进一步向非农领域转移。复合型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仍将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使加强社会管理机制在乡村的调控,宗族或家族力量也不会短时期内失去影响(见图 3-3)<sup>①</sup>。

因此,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需要从以下几个命题出发:第一,乡村社会性质是具体地历史地形成的,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不仅不同于西方乡村社会,而且没有一个一统的中国乡村社会;第二,制度安排对乡村社会性质有着深刻的依赖,同一个制度安排在不同性质的乡村可能具有极其不同的效果;第三,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主要内容是与乡村历史的发展相关联的。正是乡村历史及其与当前乡村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当前处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主要内涵;第四,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焦点是农民之间具体的人际关系,村庄社会关联。具体的人际关系不仅可以表达出当前正处于转变中的乡村社会性

<sup>①</sup> 郑杭生著:《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5—198 页。

质,而且为观察乡村社会性质的变动提供了途径,即通过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乡村社会性质;第五,农民的行动深受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地方性知识的实质即为乡村社会的性质。如果将农民视为理性行动者,则农民的理性并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具体的切合乡村社会性质的选择;第六,当前乡村社会性质本身正处于急剧变迁之中,这种变迁从短期来看,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是相互支持,共同生长,乡村社会更具特性。虽然从长期来看,现代因素会替代传统因素,大传统会替代小传统,地方性社会会融入大社会,乡村社会性质会失去特性;第七,因为掌握资源性质与数量的不同,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影响能力;第八,行政村或村委会是半熟人社会。随着20世纪以来行政村体制的建立,行政村日渐成为村庄秩序的主要决定者。但当前的行政村只是提供了公共的行政空间,还缺乏共同的生活空间,在行政村内,一方面,村民共享行政空间的同时,便共享村干部和村域范围的村庄精英;另一方面,只是在自然村内,村民才共享生活空间,人情往来、消闲娱乐、生产互助等等,大都在自然村内完成。这样一来,自然村便成为真正的熟人社会,而行政村仅是一个半熟人社会;第九,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村庄的共同体性质越来越趋于解体,当前行政村事实上的基层建制与社区经济组织合二为一的局面将难以保持,行政村的功能趋于弱化。<sup>①</sup>

## 2. 乡村精英对乡村信息资源的掌控、改变和垄断

作为乡村精英之一的村干部在乡村社会中,通过各自的行为模式,将自上而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体制转变为乡村社会惯有的弹性处理体制。其重要作用表现在改变乡村社会信息系统和改变处理公务的规则。其中改变信息的行为主要体现在:由于村干部在乡村社会的一般成员和上级之间扮演着信息传播者的中介作用的角色,制度化的公布信息制度并不存在,因此相当多的信息被村干部所掌握,他们决定发布哪些,发布多少,以及发布到什么程度。调查显示,在村民看来,村干部对信息的上传、下达和选择,是评价村干部人品的重要指标;村干部在选择信息进行上传下达的同时,还以垄断信息、文件阅读等地位,以满足自己的管理需要;并根据情况,制造虚假的基层信息。换言之,正是由于村干部在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与外界某些信息传播系统交流中扮演着中介人的角色,使他们有能力、有机会扮演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守门人角色,不仅如此,他们还改变着信息的内容、选择着信息的传播对象,以保证自己在上下之间控制信息的角色和地位。<sup>②</sup>

<sup>①</sup> 贺雪峰著:《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293页。

<sup>②</sup> 张静著:《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8—79页。



### 3. 大众媒介信息、政府、政策信息合力的作用

大众媒介信息、政府、政策信息的合力在正面而积极的信息给予层面上,对乡村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过多的媒介正面信息将村民的心理期望动员起来后,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期望又无法得到实现,村民群体出现的群体落差会威胁到乡村社会的稳定;反过来,如果是过多的正面信息使得村民在面对负面信息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同样会对乡村社会的稳定形成破坏力。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古尔(T. Gun)教授在《人为什么要造反》(Why Men Rebel)一书中提出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以解释政治生活中的集体暴乱。简单说来,人们是否投入叛乱取决于人们对心理期望值(value expectations)和实际实现能力(value capability)之间差距的理解,即人们对想得到和能得到之间差距的认识。当人们的期望值在增加,而满足需求的能力在下降,如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换言之,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后出现短暂的逆转往往是最容易发生动乱的时刻。这种理论被称之为“J曲线理论”(J-Curve-theory)(见图3-4)。相对剥夺理论指出人们如何感知和认识他们的状况和条件要比实际的状况和条件更加重要,而感知和认识来自于(1)人们和以前状况的比较;(2)人们和其他集团成员的比较。<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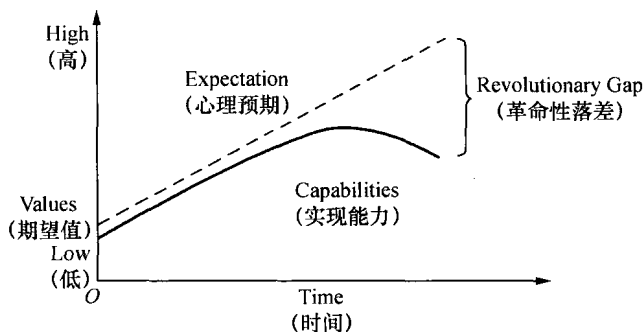


图 3-4 J 曲线理论示意图

资料来源:Rod Hague, Martin Harrop, Shaun Breslin, *Political Science: A Comparativ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 73。

对中国乡村社会而言,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系统和政府信息服务系统均以积极正面的信息传播为主,正面信息过多造成了村民对社会期望过高的社会心理,一旦有负面信息难以产生相应的预防力。调查显示,中国受众对各种性质的信息,大多数人持均衡态度,即不偏好或兼好正面和负面信息,其次是偏好负面信

<sup>①</sup> 燕继荣著:《现代政治分析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341页。

息,最低比例是偏好正面信息(见表3-1)。因此,对乡村的信息传播,无论是大众媒介的信息还是政府、政策信息都要注意到多以均衡的信息传播为导向,弱化或降低负面信息对乡村的传播,这样才有利于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的稳定状态,从而保证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表 3-1 中国受众对信息性质的偏好

|      | 频次 | 百分比(%) |
|------|----|--------|
| 负面信息 | 24 | 34.3   |
| 中立信息 | 29 | 41.4   |
| 正面信息 | 17 | 24.3   |
| 总计   | 70 | 100.0  |

资料来源:张国良、廖圣清:《中国受众的信息需求与满足》,《新闻记者》2004(11)。

#### 4. 乡村信息不和谐的发展现实

目前,乡村社会信息的传播状况在各种传播系统的外力和乡村社会内部传播系统的作用下,出现了信息发展不和谐的状况,具体体现在:

(1) 过高的信息流量和信息的缺乏都会对乡村社会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信息流量过低,乡村社会处于半封闭状态,与外界之间的交流甚少,例如改革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农民被固定在乡村社会的格局中,既没有机会离开乡村打工、经商,也没有机会在乡村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个性,只能在公社制度的低信息流量中生存,因此出现了农民的反行为问题,反行为即农民的“潜规则”,调查中发现,在许多农民心里,只有“大偷”、“惯偷”才叫做“偷”,日常生活中的“小偷小摸”,有些地方把它称作“抓握”<sup>①</sup>。换言之,信息缺乏的社会环境,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公共行为的深度和广度都很低,也很有限;一旦信息超量,社会成员在过度信息流量面前,一方面容易出现过度社会化的倾向,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另一方面,形成集体行为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从而对乡村社会的稳定带来潜在的风险。除此之外,信息缺乏或者与外界之间的信息阻碍都会使乡村社会中的文化、经济、政治及其其他信息难以传递到外界。如1987年的山东省苍山县发生的影响深远的“蒜苔事件”。1987年5月27日,由于县政府在没有市场预估的情况下,盲目摊派,让农民种蒜苔,结果虽然丰收,但大量蒜苔无法卖出。苍山县成千上万愤怒的农民开着拖拉机、推着小推车涌进县政府大院,把卖不出去的蒜苔倒成了一座山。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苍山蒜苔事件”。结果蒜苔全都烂了。亲身经历此事的农民至今懊悔不迭。因为虽然当时苍山县的蒜苔1角钱3斤无人问津,然而,就在百里之外的临沂市场和枣庄市场上,蒜苔售价却高达0.60—0.80

<sup>①</sup> 参见高王凌著:《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元/公斤。

换言之,我国农村信息与决策结构的不和谐是阻碍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卖难”问题就成为困扰我国乡村社会的严重阻碍。早期是卖粮难,之后陆续的是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的销售出现卖难。这主要是由于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农产品的市场表现遵循“蛛网理论”,即由于从开始生产到产品产出需要一定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生产规模无法改变,所以本期产量决定本期价格,而本期价格决定下期产量。我国农产品的“卖难”问题即是“蛛网理论”在现实中表现的一种:一旦某种作物有利可图,农民一哄而上都去生产该作物,从而导致下一期该作物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农民血本无归。应该看到的是,“蛛网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农村被反复验证,在于其中隐含的理论假设和中国农村的信息与决策机制相吻合,即:完全分散的农业经济主体,只能根据宏观的市场价格信息作出自身的生产决策,无从获得其他经济主体的生产决策信息,从而微观上个体的理性行为,在宏观上演变为群体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一波又一波的“卖难”现象,对农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和农民自身的发展。如果要破除中国农业“卖难”的宿命,就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的信息与决策机制,破除“蛛网理论”的现实基础。<sup>①</sup>

(2) 农村信息化过程中,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的不和谐也会阻碍乡村社会的发展。当前农村信息化的推进,主要还是依靠政府主导设计,国有企业是投资主体,与政府相关联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如学校、农技站)跟进的模式。当前,政府提供了大量优惠政策,但通讯资费相对于农民支付能力仍然明显偏高,这样就导致一方面农民和农村基层信息化推进单位认为政府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政府认为基层信息化推进单位和广大农民对信息化的认识不足,观念落后,信息素质亟待提高。简而言之,在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中,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顶层设计,各部门往往从自身立场出发出台相关的信息化政策,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信息孤岛,涉农信息资源过于分散,难以对信息资源进行深层次挖掘、分析和利用,造成了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据统计,我国80%的信息都由政府掌握。但由于缺少统一的法律规定。这些信息往往被封锁在政府机关,民间很难得到和利用,这种情况的蔓延趋势势必会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

(3) 不对称信息也是阻碍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农民对现实中存在着的事实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是涉农当事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掩盖真实信

<sup>①</sup> 姚宇:《三农信息化中信息与决策的和谐问题》,见王宪磊主编《科学决策和信息管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207页。

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以致农民上当受骗,造成农民不必要的损失。

## (二) 传播趋势

### 1. 熟人信息传播到“陌生人”信息传播

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社员(村民)们共同劳动,见面和联系的机会很多,彼此非常熟悉。公社体制解体后,由于不再共同劳动,熟人社会的情形发生了改变。村民们之间的接触减少,彼此之间的了解也相对减少,但对于小型和较为封闭的村庄,村民之间还是熟悉的。但较大的村庄,彼此之间完全了解就不一定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人口的流动性强,村民的对外联系和交往加强,削弱了村落内部的联系。行政村已大不同于作为熟人社会的自然村的情况。行政村是规划的社会变迁的产物。在行政村中,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共享一些公众人物,但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这可称为“半熟人社会”。因此在选举村干部时,行政村具有的“半熟人社会”的特征,使村民委员会选举大大不同于熟人社会的选举。<sup>①</sup>

这种半熟人社会的特征也正在缓慢地发生变化,一些离开乡村到城市的农民,随着其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体现出从熟人结构向半熟人结构的转变,更呈现出向陌生人结构转化的趋势。在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中,一方面,固有的熟人关系规则已然坍塌;另一方面,人们又习惯性地运用既有的熟人规则,想方设法把“人生地不熟”的陌生人社会改造成为在一定范围内的熟人社会,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城市社会中所存在的各式各样的老乡群体。

### 2. 城乡信息鸿沟进一步扩大

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在1999年6月的报告《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中提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泛指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总体差异,主要表现在信息工具、信息渠道和信息处理能力等方面。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或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

中国城乡信息鸿沟主要体现在:第一,信息消费能力的差异,主要与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相关;第二,信息基础设施与技术配置。具体体现在对城乡居民拥有电脑数量、手机数量、大众媒体拥有量等的比较上,差异显著;第三,信息资源开发的问题,乡村的部分信息资源有待挖掘和利用,而城市的某些信息资源则已经处于过度开发和过量,乃至引起信息污染的状况;第四,信息传受主体教育水平的差异。城乡居民之间的总体教育水平,也是造成城乡信息鸿沟的主要因素

<sup>①</sup>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3)。

之一。

### 3. 构建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农业部2001年发布“十五”《农村市场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计划用3—5年的时间,基本建立起覆盖全国省、市、县、大多数乡镇以及有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和经营大户的农村市场信息服务网络;健全乡(镇)、村两级信息传播网络”,“形成集信息采集、加工、发布、服务于一体的农村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使乡村市场信息服务滞后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sup>①</sup>。2001年10月,农业部信息中心在部级网站开设的各省农业部门网站联网运行的“农村供求信息全国联播(一站通)”系统正式开通。该系统提供技术指导、信息资源加工整理、信息查询、联网数据匹配、供求信息定制、必要的培训等服务,使地方网和基层信息服务站以较低成本进行网络运行;用户只要有计算机、能上网,就可在任意一地的网站登陆进入系统,免费上传供求信息,全国各网站同时发布。“一站通”为拓展农业网络信息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②</sup>。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基础设施建设部分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强化面向农村的广播、电视、电信等信息服务,重点抓好‘金农’工程和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工程”。其中包括:(1)党员保先教育:点播重要讲话、党建资料片;(2)实况直播重要会议;(3)农业科技远程教育:点播科教片;(4)通知信息发布:准确的按县、镇、村进行图文信息发布;(5)农业信息服务:法制宣传、农产品市场、信息查询;(6)供求信息发布;(7)娱乐生活:影视点播,以及点播中的广告投放。

乡村信息化的平台建设已经在一些地区全面展开。随着这一系统的完善,乡村信息与中国社会信息之间的全面畅通将有可能逐步实现。

### 思考题

1. 名词解释:信息不对称,信息素养,信息依赖,信息污染,信息设计。
2. 简述孟德拉斯关于法国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特点。
3. 简述熟人社会信息传播观的主要观点。
4. 举例说明学者秦晖、苏文关于中国乡村社会信息传播横向畅通、纵向阻隔的特点。
5. 简述罗杰斯乡土知识系统传播的观点。
6. 简述乡村传播学之信息特征。

<sup>①</sup> 农业部:“十五”农村市场信息服务行动计划,2001年9月18日发布。

<sup>②</sup> 中国农业信息网, <http://gongqiu.agri.org.cn/index.html>。

## 7. 简述中国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趋势。

### 参考文献

#### 著作

[美]沃纳·赛佛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学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杜栋编著:《信息管理学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郭太敏主编:《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北京:中国矿业出版社2002年版。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人类传播理论》(影印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儿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秦晖 苏文著:《田园诗与狂想曲 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4年版。

[美]埃弗雷特·M. 罗杰斯著,辛欣译:《创新与扩散》,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5年版。

王福生著:《政策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王文生编著:《中国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与机制研究》,北京:经济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

郑杭生著:《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贺雪峰著:《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张静著:《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燕继荣著:《现代政治分析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高王凌著:《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廖腾芳著:《中国乡村社区图书馆的现状与发展模式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论文

郭作玉:《关于农村市场信息服务的思考》,《电子政务》2009(4)。

彭旭知:《将农村宣传沉下去——中国移动农村市场宣传攻略》,博锐管理在线 2007年10月15日, <http://www.boraid.com/>。

谭英、谢咏才:《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不同类型农户信息需求调查与分析》,2004 中国传播学论坛提交论文。

张国良、廖圣清:《中国受众的信息需求与满足》,《新闻记者》2004(11)。

姚宇:《三农信息化中信息与决策的和谐问题》,见王宪磊主编《科学决策和信息管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3)。

## 第四章 乡村传播学之传播模式

卡尔·多伊奇(Karl Wolfgang Deutsch)1966年在《政府的神经》一书中曾论述过社会科学模式的主要优点。他指出,首先模式具有构造功能,能揭示各系统之间的秩序及其相互关系,能我们对事物有一个很难从其他方法中获得的整体形象,能为各种不同的特殊状态提供一个一般的图景;其次模式具有解释的功能;再次模式有可能对事件的过程或者结果进行预测。至少,它能够估算各种不同结局可能发生的概率提供基本依据,研究者因而可以据此建立其假说。因此,借助相关的信息传播模式可以帮助人们更为清晰地了解乡村传播的发生过程。由于在乡村传播学中也存在着各种社会信息传播的模式,本章节主要对国内外的乡村传播学模式进行概述。

### 第一节 国外乡村传播学模式

国外的乡村传播学模式主要从信息服务模式、农业信息传播模式和农业合作组织模式三个层面加以介绍。

#### 一、信息服务模式

综合性乡村信息中心模式。该模式是学者卡尼肯(Kaniki)在考察南非乡村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最佳的服务模式是建立一个信息资源中心,该中心应具备足够的满足居民需要的信息,应坐落于社区中最便于访问的位置。2000年,印度国家农村发展研究所(NIRD)开展了旨在建立乡村公共信息中心(PICs)的系列研究项目,试图将这一模式现实化。政府建立信息中心的目的是提供乡村发展项目信息、农业技术推广信息、社区设施信息和社会发展信息以及医疗卫生、教育、金融法律等方面信息。公共信息中心的具体目标在于:(1)为指定社区设立简介和资源目录,包括:人口、文盲率、土地、水文、灌溉系统、种植模式、居民从事的职业与行业、民俗艺术等,收集与农业技术、农作物种植系统相关的技术信息、本地产品的市场营销信息;(2)收集与医疗卫生、教育、就业、财



政、法律等相关的实用信息；(3) 为指定社区正在实施的发展项目建立信息目录。

以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乡村信息中心模式。澳大利亚政府自1992年开始乡村通信中心( Telecentres)建设,目标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手段以辅助农场和企业的管理,促进乡村居民的就业和终身学习。1996年,南非提出建立由政府资助的、以ICT为核心手段的信息中心,为乡村地区提供ICT技术和相关信息服务。

公民信息救助组织(Citizens Advice Bureau)。这类服务模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和美国率先出现的,主要向居民提供有关法律、税收、社会福利政策、移民等问题的免费信息帮助。比尔(Beer)等考察了英国Shetland Islands地区乡村居民利用这项服务的情况,研究发现,公民信息救助组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乡村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

由相关政府部门直接向乡村居民提供特定领域的信息。巴克尔(Barker)和帕思(Poison)考察了苏格兰地方政府提供医疗卫生信息的状况。苏格兰医疗卫生信息服务中心由苏格兰高地卫生局资助,面向所有苏格兰乡村居民提供服务。该研究发现,医疗卫生信息服务中心被不同的受众群所利用,受众满意度也很高。

农村流动信息服务队。20世纪90年代初,泰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项目的基础上发展了乡村流动信息服务队(mobile information team),这是一种非常适合泰国农村的信息服务形式。<sup>①</sup>

## 二、农业信息传播模式

### (一) 美国的农业信息传播模式

#### 1. 信息系统传播模式

在美国,一般通过五个单位分工协作完成信息传播。第一个环节是美国国家农业统计局,它在46个州设有办公室,拥有全国200多万家庭农场的基本数据资料库。对各主要农作物进行种植面积和产量的调查与预测;第二个环节是农业部市场管理局,它主要掌握国内现货市场供求和价格情况;第三个环节是农业部海外服务局,它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世界各国各类农产品的生产、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化情况;第四个环节是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它利用各种资料进行各农产品的品种分析,完成各主要农产品当年的全球和各主要国家的平衡表;最后是农业部的世界展望局,它统一分析与评估所有的资料,此外,还通过卫星系统随时

<sup>①</sup> 于良芝、张瑶:《农村信息需求与服务研究》,《图书馆建设》2007(4)。

监测世界各地的自然灾害情况。美国农业部提供的市场信息涉及到 120 多个国家、60 多个品种,囊括了主要农产品的全球数量、国内产量、供求情况、价格变化等情况,并在法定的日子里公布。村民可以通过网络、电话和邮寄等方式,从美国农业部及其有关职能局得到一套完整的市场信息。

换言之,美国乡村与农业信息传播主要依靠互联网,构建了以美国农业部为主线的国家、地区及州县相互配合的农业信息网,这一信息网可以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与村民直接对接,从而形成了完整、健全、规范的农业信息传播体系。其农业的信息化程度高于工业,政府所有的各类数据库,如美国国家农业数据库(AGRICOLA)、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数据库(NOAA)、地质调查局数据库(USGS)等规模化、影响大的涉农信息数据库,实行“完全与开放”的共享政策,村民可以免费使用。<sup>①</sup>

## 2. 农业合作组织信息传播模式

美国最早的农业合作组织,是 1810 年由康涅狄格州的奶牛农场主组建起来的奶牛协会。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解进一步搞好牛奶的加工和扩大销售奶油。尽管当时这个奶牛协会办得并不出色,但它开创了美国农业合作组织的先河。之后,各种合作社纷纷在美国各地和农业领域的各行业出现。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农业进入了商业化程度相当高时代,农业危机开始出现。1867 年,美国爆发了第一次农业危机,有些农场主为了保护其利益不受损害,在华盛顿特区成立了一个叫“格兰其”(Grange)的农场主合作社,有几个州的农场主参加,主要从事销售、储运和加工方面的合作,当时参与“格兰其”合作社的农场主的经济效益明显比不参与的农场主高出很多,于是全国各地的若干农场主纷纷效仿,成立了众多的“格兰其”合作组织。189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农场主合作社被看作是“限制贸易的联合”,属禁止之列。1922 年,国会通过了《卡帕—沃尔斯坦德法》(Capper-Volstead Act),确立了合作社的合法地位。随后,是美国农场主合作社发展的全盛时期,合作社的数量急剧增加,到 1931 年,农场主合作社的数量迅速增加到 22 950 个。1931 年以后,农场主合作社的发展进入一个漫长的不断调整 and 完善的时期,数量减少,规模扩大,管理水平提高。1996 年,全美国有 3 884 个农场主合作社,平均每个合作社有 1 030 名社员;年营业额约为 2 500 万美元。

美国农业合作组织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第一,农业合作组织是一种与其他商业单位一样的经济实体。运营的目的是给成员提供经济利益,追求有限的资金利润率,不以赚钱为目标;第二,合作组织是农产品生产者的合作团体。合作组

<sup>①</sup> 吴锋:《国外农村信息传播的基本模式与启示》,《今传媒》2008(4)。

组织的资金来自各成员,而不是合作组织外部投资者。合作组织资本金通过成员投资入股筹集。资产属于合作组织所有成员而不归私人所有。合作组织投资通过交纳合作成员会费,或通过出售股票而来,或通过成员签订的协约、持有一定比例的基于赠予资产而形成的收入或按照每单位产品出售后提取的一定基数和比例的资金。如果合作组织经营失败,合作组织成员具有一定的连带责任,这只是意味着他们没有超过本身投资在合作组织以外的连带责任;第三,民主管理,平等合作。绝大多数合作组织实行的都是“一人一票”制。<sup>①</sup>

#### (二) 法国的农业信息传播方式

法国农业部门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信息数据库,有自己的计算机网络。中央农业商会和营利性信息机构等非政府组织也都建有自己的信息数据库和自己的计算机网络。合作社普遍使用计算机介入管理,能上互联网获取信息。农场主有50%使用计算机介入管理,很多人上网获取信息。其信息服务的系统包括:(1) 国家农业部门。农业部、大区农业部门和省农业部门,负责向社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政策信息、统计数据、市场动态等;(2) 各种行业组织和专业技术协会。收集对本组织有用的技术、市场、法规、政策信息,为组织本身及其成员使用;(3) 各种农产品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社。广泛收集对自己组织有用的信息,需要其成员知道的事情,他们一般都通过传真等形式马上告知。

#### (三) 日本的农业信息传播方式

日本的农业市场信息服务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个是由“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联合会”主办的市场销售信息服务系统。日本国内82个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和564个地区批发市场及海关现在已实现了联网,每天实时发布各种农产品的销售数量和进出口通关量。另一个是由“日本农协”自主统计发布的全国1800个“综合农业组合”各种农产品的生产数量和价格行情预测系统。凭借着两个系统提供的准确的市场信息,每一个村民都对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市场每种农产品的价格和生产数量有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由此调整生产品种及产量。<sup>②</sup>

#### (四) 印度的农业信息传播模式

印度主要由农业部和农业研究委员会为村民提供信息服务,农业部主办的网站提供的信息较全面,包括管理信息、科技信息、市场信息、政策信息等。农业研究委员会是由政府主办的机构,统管全国农业信息网络系统,下设农业研究与

<sup>①</sup> 朱芙蓉、周慕荣:《美国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对我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启示》,《市场经济研究》2003(6)。

<sup>②</sup> 贾晓玲:《国外农业信息传播方式》,《科技致富导向》2008(12)。

教育子系统、农业研究管理子系统和印度国家科技文献与服务子系统,主要为村民提供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它将国家级、地区和子地区研究中心、区域试验站、农业大学、农场科学中心以及其他独立研究项目机构有机地组织起来,实现全国资源快速传递和共建与共享。农业部和农业研究委员会每年在生产季节前派专家去乡村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及技术信息服务,一年大约去5到6次。印度村民通常可以去农业大学、区农业信息中心获取免费信息,但目前村民的信息需求还不能完全得到满足。

邦农业科技推广站和种子公司,其宗旨是要把新技术的好处推广到村民、农作物和各地区。科技推广站及时地提出引进、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建议,组织村民进行田间试验,然后逐步推广;农业合作社主要有农业信用、销售、耕种、牛奶、渔业、农产品加工、消费以及住宅合作社等类型。村民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sup>①</sup>

### 三、农业合作组织模式

依据世界各国合作组织产生和发展的途径,国外合作组织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两种模式,即市场推动模式和政府推动模式。

(一) 市场推动模式是指村民在共同的市场需求下,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组织化程度,获取合理的市场交易利益,自我联合起来组成自己的服务组织。这种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坚持“民办、民管和民受益”原则,不以承担政府赋予的任务为主要职能,政府不干预合作社内部管理,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政府的作用在于通过法律法规为合作社提供一个宏观发展空间,使合作组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得到成长和壮大。欧美国家的农业合作社的成长模式基本属于市场推动模式,比较典型的有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

(二) 政府推动模式是指政府在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种类型的合作社,其组织体系、经济功能等都是在政府的直接推动下实现的,政府作用至关重要。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社成长模式都属于政府推动模式,如日本、印度、泰国、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农会等都是此种模式。政府推动模式具有以下特点:合作社是在政府积极推动下产生的;合作社要兼负当局委托的农业政策职能;政府对合作社的干预较多。

<sup>①</sup> 李道亮著:《零公里的探索 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页。

## 第二节 中国乡村传播学模式

### 一、乡村农业信息传播系统模式

#### (一) 政府主导的基层信息传播模式

政府主导的基层信息传播模式,主要是由政府农业部门通过相关的信息服务点(组)抵达农户。这些信息服务点包括:科技示范点、信息服务点、科技特派员、乡村信息员。信息传播流程如图 4-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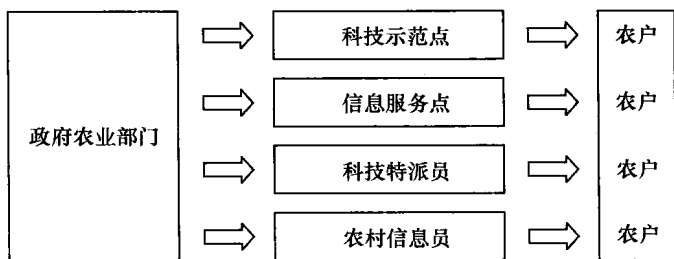


图 4-1 政府主导的基层信息传播模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李道亮著:《零公里的探索: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8 页。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直线单线传播的模式,其最重要的弱点是缺乏信息反馈环节,信息传播者政府农业部门的信息获取渠道及所获取的信息内容并没有得到体现,是一种干预式的信息传播模式,没有考虑到农户的信息需求、信息接收和信息消费能力,也没有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系统的传播效力,因此对其传播效果会有极大的影响。该模式适用于村落单一、村民同质性较强、农业信息各级传播组织较为完善的地区。

#### (二) 社会参与的基层信息传播模式

社会参与的基层信息传播模式是指农户被纳入到现代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中,企业、市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被纳入到一个共同的社会运作体系中。“社会参与型”模式又大致可以分为“协会十农户”型(这里的协会是指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企业十农户”型、“企业十协会十农户”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十农户”型。该种类型的模式以企业或协会为基层农业信息服务的主体,利益分配机制以半公益型、自助型和商业型服务为主,模式的运行基本上以市场化运行为主,信息传播渠道现代与传统相结合,比较适合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化、组织化、产业化相对发达的地区。具体而言,“协会十农户”型中,可以由政府农业部门

与协会合作,共同为农户提供信息服务,也可以由当地的村委会与协会合作,共同为农户提供信息服务。“企业+农户”型则可以由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直接将农户与农产品市场联系起来,也可以由政府与当地的通讯公司的信息网络相结合,为农户提供信息服务。<sup>①</sup>

该模式的利益分配和保障体系是:龙头企业通过与农户签订订单,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也向农户提供技术支持与咨询,进而形成利益共同体,保障体系的运行。比较适合产业化有一定基础,农业龙头企业发达,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专业化生产发达的地区。其弱点在龙头企业很容易形成对市场信息的垄断,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受限,从而形成垄断格局。理应采取相应的市场信息监管的第三方机构,来保护农户的利益(见图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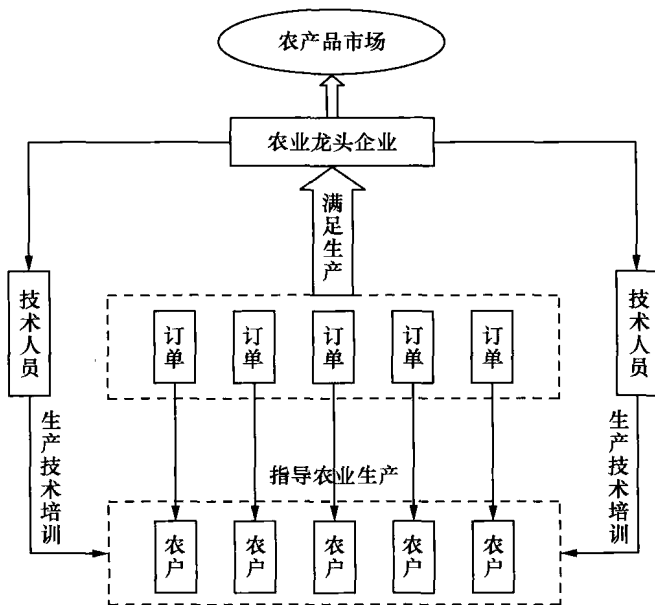


图4-2 龙头企业+农户型信息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李道亮著:《零公里的探索: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龙头企业+协会+农户信息传播模式在农户与农业龙头企业之间添加了协会组织,可以避免上述龙头企业直接与农户直接接触所带来的弊端,但这一模式适合龙头企业和专业化合作组织比较发达,农产品实行专业化生产,农户组织化

<sup>①</sup> 参见李道亮著:《零公里的探索: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2页。

程度比较高的地区(见图 4-3)。<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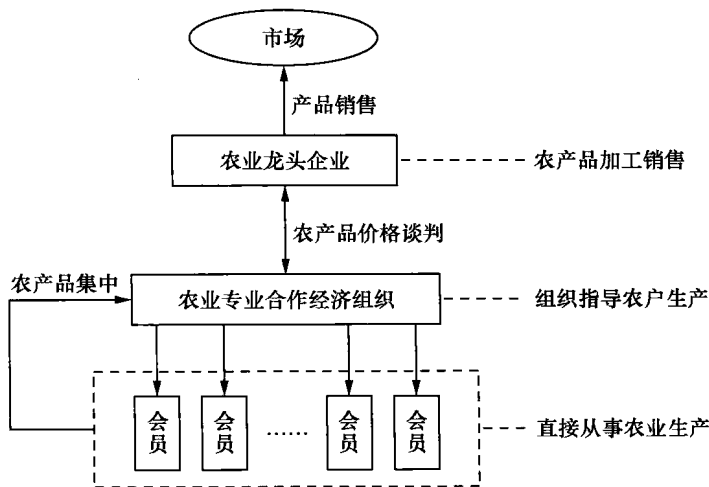


图 4-3 龙头企业+协会+农户信息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李道亮著:《零公里的探索 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2 页。

### (三) 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信息传播模式

宝鸡市专家大院模式集科研开发和技术推广于一体,农业专家大院设在企业(或农民协会)里,企业或协会管理专家大院的日常工作。其设有专门的信息组织,既负责农产品的销售,又负责向政府和农户上传下达农业科技信息。

政府信息服务部门仅仅是配合企业提供全程化服务,制订专家大院发展规划,聘任专家和专家大院管理办法,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包装、科研项目立项申请、信息供给及农业信息应用软件开发等综合服务。专家一方面负责研究开发高新技术,再由企业把高新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自办报刊、热线电话或市场提供给农户;另一方面,专家就住在科技试验田和示范园旁边,除了通过电话解决农户疑难问题,还可以直接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sup>②</sup>

农业科技大院信息服务模式是将政府、农业专家、企业或农民协会和农户结合在一起。政府、专家、企业为信息传播主体,农户为主要信息受体。信息传播主体各负其责,分别以自己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将科技信息传给农户。农户既是信息受体又是信息传播主体,他们一方面根据专家的技术指导和企业提供的

<sup>①</sup> 社会参与的基层信息模式部分资料来源于李道亮著:《零公里的探索 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8—32 页。

<sup>②</sup> 同上。

市场信息,科学规范地进行商品生产,一方面形成多级传播方式向身边或下一级农户传播信息,同时肩负为专家大院反馈信息的任务。这一模式将作为传者与受众的农户的互动性体现出来,以计算机网络为中心,实现农户与政府部门、相关协会组织、科技专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活动,是一个互动模式,但是该模式的采用与乡村计算机网络的普及有很大的关系,只是适用于计算机网络普及、农业专业化组织较为成熟、科技专家队伍建设比较完备、农户积极参与的地区(见图4-4)。<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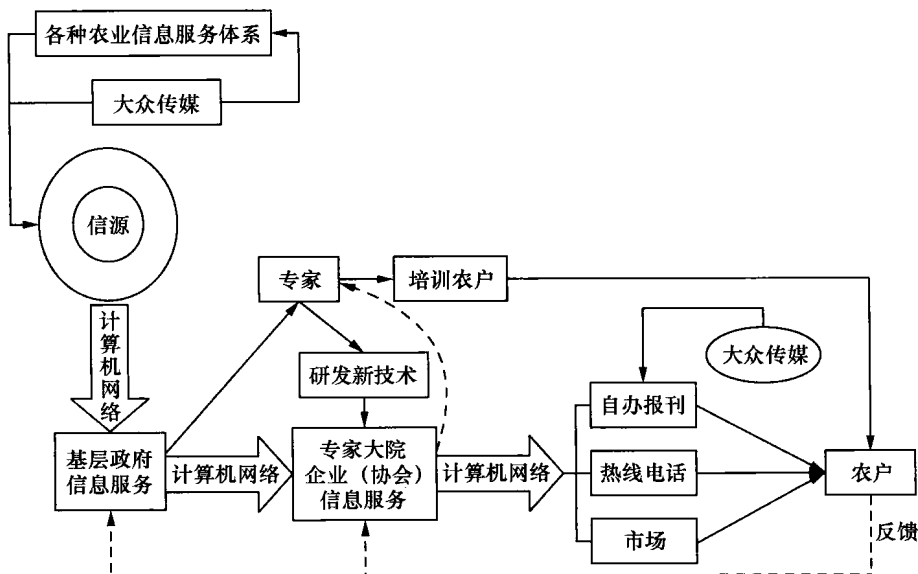


图 4-4 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信息服务模式

资料来源:谭英、谢咏才、王德海:《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信息服务模式分析与评价》,《农业网络信息》2004(8)。

#### (四) 农民之家模式

浙江兰溪市农民之家模式:农民之家内设 14 个专业销售柜台、1 个专家咨询台和 1 个农产品展示交易区。销售柜台主要经营农产品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农民在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的同时,可以得到如何正确使用等信息服务,还可以免费得到一些相关技术资料(见图 4-5)。

<sup>①</sup> 谭英、谢咏才、王德海:《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信息服务模式分析与评价》,《农业网络信息》200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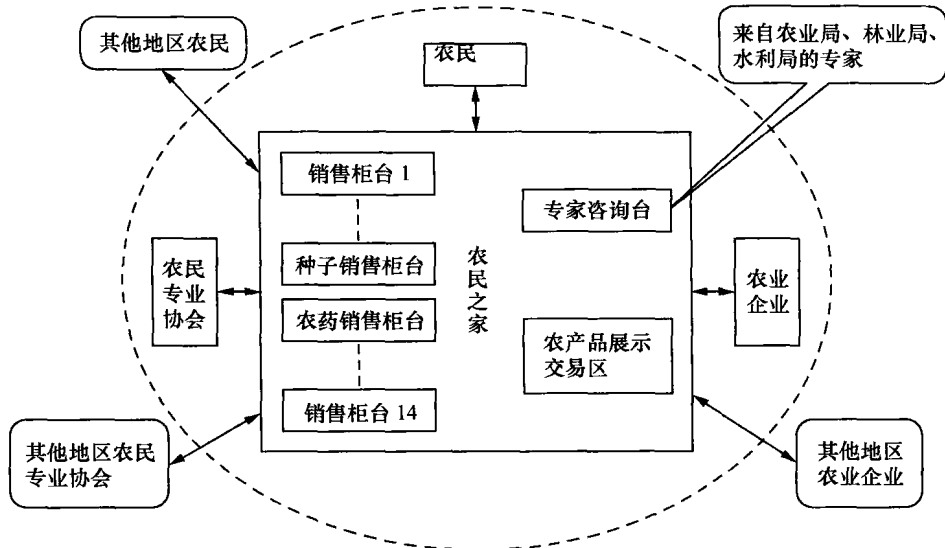


图 4-5 农民之家模式

资料来源:李道亮著:《零公里的探索: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6 页。

#### (五) 三电合一新型农业信息传播模式

“三电合一”是农业部通过总结农业信息服务基层工作经验而探索出来的打通信息“最后一公里”的新型服务模式,2005 年在吉林辽宁两省首先试点成功,2006 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2007 年 9 月即发布农业信息服务“三电合一”工程“十一五”建设规划(2006—2010),规划指出“三电合一”是从我国实践中探索出的信息服务模式,它充分体现了多种信息载体集中服务的优势,实现了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的有机结合,政府管理与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跨部门跨领域信息的有机结合,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有机结合,不同程度地解决了基础设施薄弱、信息资源利用不充分、信息传播渠道不畅和运营机制缺失的问题。

三电合一模式是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模式,包括省级、地级和县级。依次在这三个行政区划的级别上建立集中式“三电合一”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统一进行电话服务、农业信息网站、电视节目制作、数据库及后台数据管理等系统建设。

## 二、乡村政治信息传播模式

### (一) 庇护关系模式

庇护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其中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庇护者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作为回报。只要出现资源稀缺和地位不平等,就有可能形成庇护关系。庇护关系的基本形式是一种非正式的结构,其中包括提供保护和恩惠的强势人物,以及提供忠诚和个人服务作为回报的追随者。该模式不仅适用于分析传统社会的村落等地方层次,而且适用于现代制度如官僚机构和政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庇护关系或庇护主义通常被描述成政治家们向村民或选民提供物质好处以获取政治支持。<sup>①</sup>

庇护者由于具有相应的关系和人力资源,往往能影响和控制社会的决策。这使他一方面可以具有权威,并有能力促使被庇护者兑现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承担巨大的责任,诸如向被庇护者提供咨询、传播信息等等。连接不同庇护网络的角色被称为桥梁人。桥梁人的资源是能够在权力和非权力角色之间提供联系的渠道。在各种角色中传播和沟通信息,安排资源交换。这种关系体制是在行政集中化不够完全的条件下出现的,他承担着信息传播、利益交换和权力伸展等功能。<sup>②</sup>

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发展中,乡村行政与国家行政关系之间的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过程。庇护者的身份和角色尽管不停地发生着变化,他们始终扮演的是乡村精英的社会角色,被庇护者的身份却总是乡村社会中最基层的普通农民。

### (二) 社会动员模式

有观点认为,动员(mobilization)指一个社会单元在相对较快的时间里获得其先前没有的资源的过程。这种资源可以是经济、军事资源,也可以是政治资源和心理上的承诺。去动员即是指与此相反的减少资源控制的过程。与生产或整合不同,动员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是相对于特定的时间的一种社会行为。另外,动员具有时效性,是在给定的时间里发生的资源流动,没有一定的流动强度不能称之为动员。卡尔·多伊奇认为“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是用以表示社会人口层面的现代化。他对社会动员的界定是:“人们所承担的绝

① 陈尧:《政治研究中的庇护主义——一个分析的范式》,《江苏社会科学》2006(3)。

② 张静著:《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46页。

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同时，他还指出了社会动员的某些重要指标，其中包括：由机械、建筑物、消费品等所表现的现代生活层面、对大众媒介的反应、居处的变化、都市化程度、非农职业的转化、识字率、人均收入的增比等等。<sup>①</sup>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动员是指人们在社会持久的、主要因素的影响下，其态度、期望与价值取向等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社会动员的效果，其广度和深度，取决于社会动员的内容和形式。

“近代较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一般是由政府、政党、或类似于政党的社会团体组织发起：最初是从事宣传、教育等社会启蒙工作，以便形成社会共识或信仰；紧接着就是进行具体的政治活动。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又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即通过一定的选举程序，使用选举手段表达出多数意愿，实现政治诉求；或是投身于社会运动，利用运动形成的公众压力，促使政治体制或制度进行改革，或者从根本上推翻之。……中国革命转入以武装夺取政权阶段之后，对于土地问题的处理，最为集中地反映着社会动员的急迫性，特别是为要满足农村社会最大限度的动员，就必须不断地对当前政策和未来理想进行调整。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大规模的一次动员。国共两党在民众动员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改革问题上的解决程度”<sup>②</sup>。

从一开始，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就很低。特别是到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从农民那里动员资源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比如1947年，当表面上国民党对领土的控制达到了抗战后的最大限度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土地税却只相当于1942年征收量的57%，因为国统区农民抗粮抗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时共产党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不断提高。三大战役，民工支前参战886万人，相当于国民党全部海陆空军总数。<sup>③</sup>

1949年之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则自抗美援朝宣传运动始。动员的特征，就是全社会范围内结合土地改革运动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兴起。其中，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完全采用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方法，即广大人民群众控诉、检举和自动捕捉反革命分子。三大运动相互关联，互为条件，大运动之下还有单独的、或相交叉的子运动，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动员网络。

1953年，工作队下乡传播模式：诉苦会、小型座谈会等各种会议的形式，广

<sup>①</sup> Karl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1961, p. 494.

<sup>②</sup> 刘一泉：《社会动员形式的历史反视》，《战略与管理》1999（4）。

<sup>③</sup> 杨福忠：《从社会动员能力看当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3）。

泛宣传党和政府的土改政策和时事。诉苦也成为工作队宣传土改政策的一个主要方式;书写、张贴土改标语、口号和布告等宣传土改运动的方针政策;戏剧演出、文娱活动的形式宣传土改政策;教唱土改歌曲,编唱顺口溜。这些顺口溜易记,朗朗上口,并且有教育意义和鼓动性;利用大众媒介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宣传,如报纸、书籍等;成立贫农团、贫农委员会等相关组织,并制定出保证民主制度的实施和土改运动顺利进行的乡规民约;工作队与贫、雇农间建立朴素的情感,以人际传播关系的建构为辅助。

### 三、乡村大众传播模式

#### (一) 以电视为主的乡村大众传播模式

乡村大众传播模式的构建参考了韦斯利特—麦克莱恩大众传播模式,强调参与主体身处的不同环境对各自的传播活动构成的影响。但因为该模式是通过电视媒体的乡村传播情况分析而概括出来的,就必然没能体现其他大众媒介的乡村传播情况。虽然该模式基本上能够反映乡村大众传播的基本要素、结构及基本过程,但是目前乡村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网络媒体等大众媒介对乡村传播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不容小觑,所以应该将网络等大众媒体的传播过程纳入到该模式之中(见图4-6)。<sup>①</sup>

#### (二) 贫困山区本土化的乡村发展传播模式

仇学英对一个过去是贫困村而今迈进小康社会的典型村落进行考察研究之后,提炼出大众信息传播的模式与本土受众传播行为方式相交融所形成的一种本土化发展传播模式,并试图说明大众传播在不断提升贫困乡村整体发展水平和个体发展水平中的作用(见图4-7)。

该模式显示出绿色村信息传播通道双向畅通:村级以上决策管理系统,村内部决策管理系统,村级社会发展系统,资源增殖经营系统相互和谐互动,大众信息传播系统作为整个开放体系的核心,承担起信息中介的作用。<sup>②</sup>

这一模式的提出是对乡村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一种探索性实践,但是该研究对个人传播现代化态度量表的拟定仅出于作者的“探索性思考判断,缺乏丰厚的学理依据”,所以对“现代化”概念的界定以及相应变量的操作化与指标化尚不完善。而且该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大众信息传播系统具体通过怎样的途径,以怎样的方式推动了贫困山村的发展。同时百分之百的开通率和入户率是否能

<sup>①</sup> 旷宗仁、谭英、左停:《中国乡村传播及其优化模式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6(8)。

<sup>②</sup> 仇学英:《贫困山村发展传播模式的探索——大众传播与一个贫困乡村现代化演进的分析框架》,《中国传媒报告》20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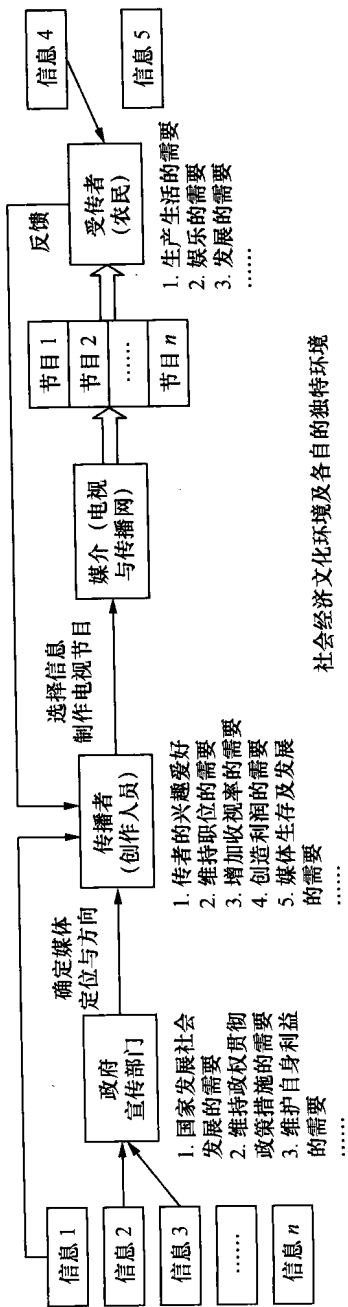


图4-6 以电视为主体的乡村大众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旷宗仁、谭英、左婷：《中国乡村传播及其优化模式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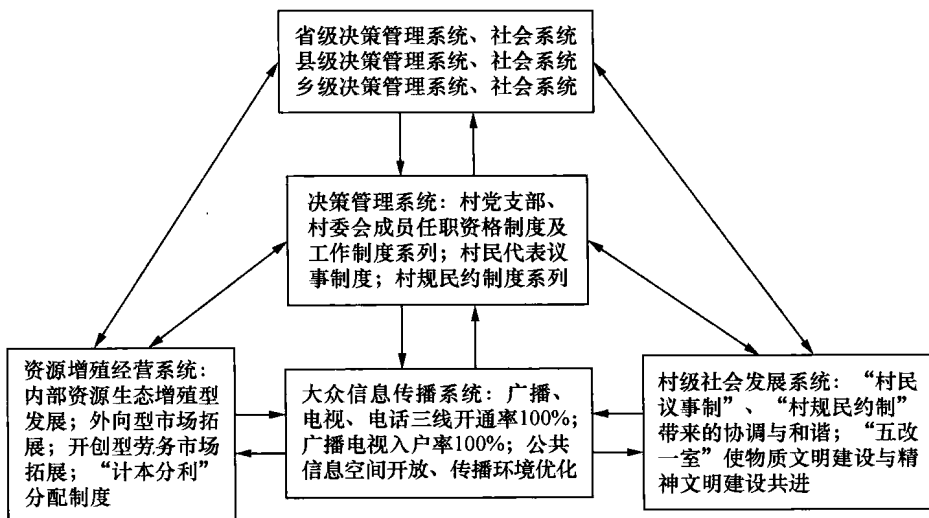


图 4-7 贫困山区的乡村发展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仇学英:《贫困山村发展传播模式的探索——大众传播与一个贫困乡村现代化演进的分析框架》,《中国传媒报告》2004(2)。

说明大众媒介的使用情况?大众媒介的使用与色绿村的发展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 (三) 大众传媒与乡村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针对未来乡村传播的发展方向和乡村传播的改革,有学者构想出大众传媒、乡村、政府之间的良性循环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众传媒与乡村发展的关系不只是双向互动的,而是三向度的互动关系,政府作为社会层级的上层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大众传媒、农村与政府处于协调发展时构成良性循环:大众传媒促进农村发展,监督政府行政;农村发展推动传媒变革,影响政府政策;政府服务和引导大众传媒和农村的协调发展”。<sup>①</sup>(见图 4-8)

## 四、城乡信息互动传播模式

### (一) 理想的城乡信息传播模式

如图 4-9 所示,作为媒介组织的信息传播系统也隶属于社会传播系统中,并同时是城乡一体化信息传播系统的一个部分,同时媒介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也是社会传播系统的一个部分。也即城乡信息传播系统是在社会传播系统中进行的。理想的状态是作为社会传播系统的一部分,农民工信息传

<sup>①</sup> 刘玉花:《大众传媒与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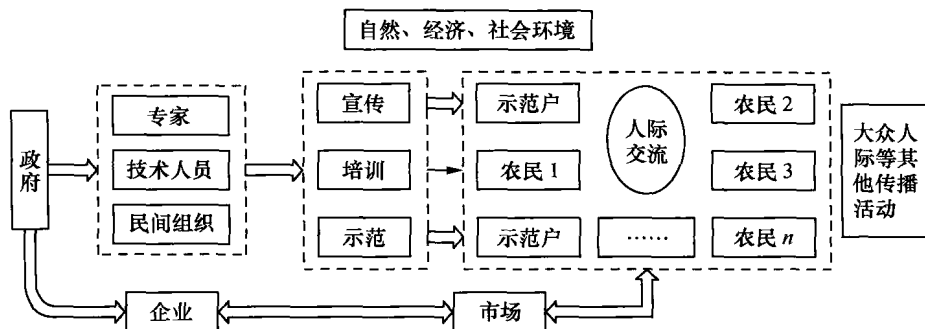


图 4-8 大众传媒与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资料来源:刘玉花:《大众传媒与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播系统、市民信息传播系统与媒介系统的信息传播系统之间是相互平等,进行传播活动的,三者之间不仅有反馈的过程,而且与社会传播系统之间的各个部分也进行着相应的信息交流。<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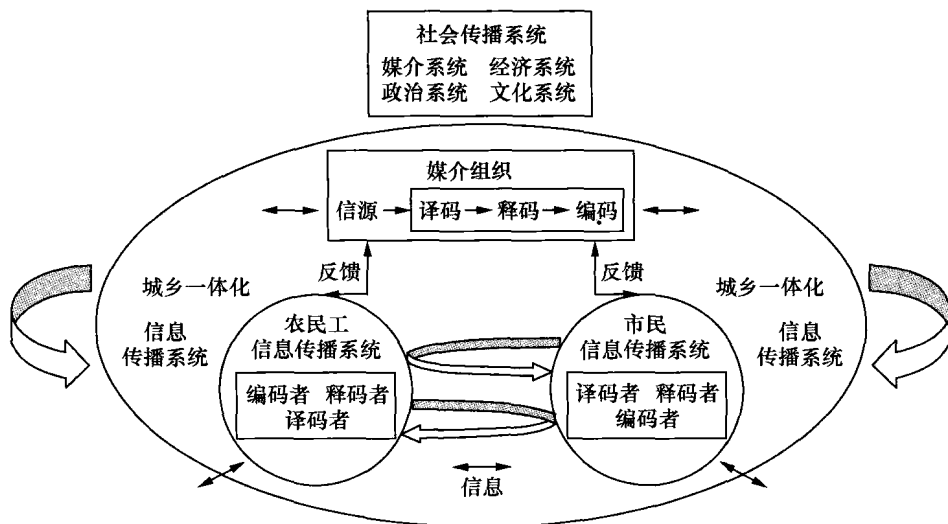


图 4-9 基于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理想的城乡一体化信息传播系统

资料来源:李红艳著:《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传播关系之实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3 页。

<sup>①</sup> 李红艳著:《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这一模式较为理想地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与市民之间的信息传播状况,以及二者与大众媒介信息传系统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状况中,这几个系统之间的信息互动关系,处于不稳定和不完善的状况,还需要社会各个层面共同去建设。

## (二) 以农民为中心的信息互动模式

政府以及相关机构的正规行政管理体系、或者有明确目标、结构的组织团体面向乡村的有计划有目的的传播活动可以称之为乡村组织传播。组织传播是我国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对乡村干预最直接的一种传播方式。该模式基本呈现出各种涉农信息服务部门通过各自不同传播媒介,有组织地将相关的农业技术通过技术员向农民传播的样式。这个模式突出了政府的推动作用,专家、技术人员和民间组织在政府的组织下利用宣传、培训、示范等手段向农民传播技术。农民之间主要通过日常人际网络交换信息。<sup>①</sup> 该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确实概括了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组织传播方式。但是近来参与式技术传播的应用使我国乡村组织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息传授双方的互动,而该模式并没有体现出来。

有学者指出家庭,邻里、基层农技协构成乡村社区里的网络群体。“由于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网络群体就成为乡村的组织基础,它特有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将整个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sup>②</sup> 根据乡村网络群体成员已具意见地位的高低将成员分为意见领袖,助手和一般成员,三者间利用各种社区资源进行直接的信息交流,各层成员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多样的,信息量也有差别。意见领袖在传播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外部信息大都经过意见领袖传递给助手和一般成员。该模式还对乡村网络群体的传播面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控制方面进行的描述,为农村群体传播模式研究提供了思路。<sup>③</sup>

其他一些研究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理想乡村传播系统的各要素进行了分析,站在一个全面的高度上,构建出反映整个乡村传播系统的传播模式,即以社区为基础,以农民为中心的互动式乡村传播模式(见图4-10)。

该模式以农民为中心,社区环境和整体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构成了传播的基本条件和背景,外部参与者与内部参与者(农民)共同合作,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及自我传播相辅相成,形成促进乡村发展的强大合力,构成和谐而高效的乡村传播图。但是该模式没有体现出乡村群体传播,有待日后继续完善。

① 旷宗仁、谭英、左停:《中国乡村传播及其优化模式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6(8)。

② 党轲:《基于网络群体的农业科技传播》,《农林科技》2006(4)。

③ 党轲:《农村网络群体内部传——收双向互动模式研究》,《甘肃农业》20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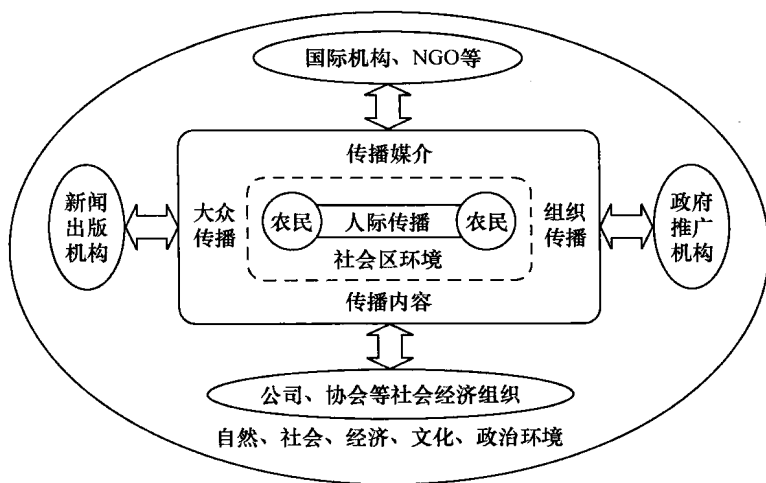


图 4-10 社区为基础,以农民为中心的互动式乡村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6 页。

### (三) 农业推广框架模式

农业科技传播是指运用现代传播手段进行农业科技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农业科技传播的模式主要包括农业推广模式,农业创新扩散模式和农业技术传播模式等等。

有学者设计出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图 4-11),此模型表示农业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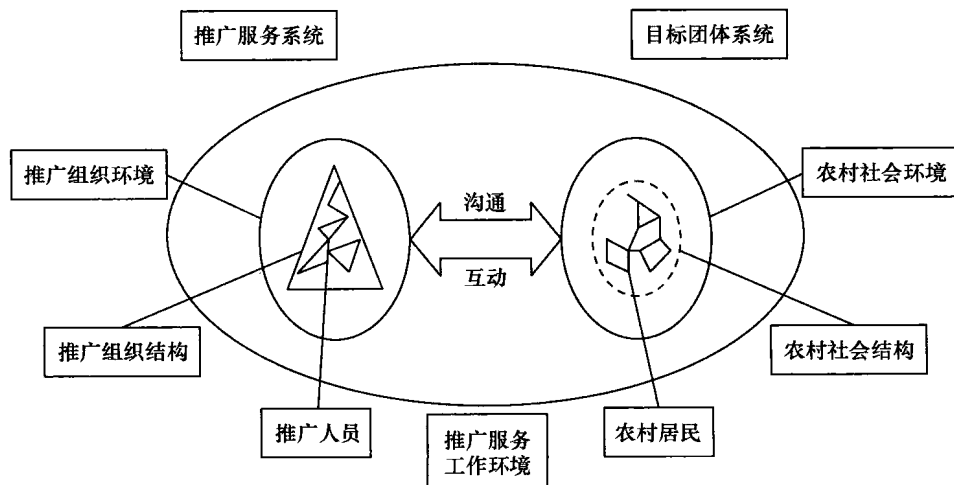


图 4-11 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资料来源:高启杰著:《农业推广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 页。

过程是个复杂的信息流动的系统,由推广服务系统和目标团体系统构成。两个子系统通过沟通和互动联系在一起,<sup>①</sup>可是模型中没有体现出信息的具体流动渠道,而且现实中两大子系统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融合交叉的。

#### (四) 西部地区的科技传播模式

研究者根据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利用现有的主要传播网络卫星电视网络构建了适宜西部地区的科技传播模式:

这一模式是把西部地区的科技传播活动视为一个系统过程,把利用卫星电视系统的远距离传播和人际传播融合在一个系统而形成的。受众通过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及时收看到科技节目,再通过科教员与受众之间,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人际传播进行交流。<sup>②</sup> 这样把远距离传播和人际传播结合起来的模式符合西部地区的需求,很好的解决了西部科技传播的资金短缺和人才匮乏的问题(见图 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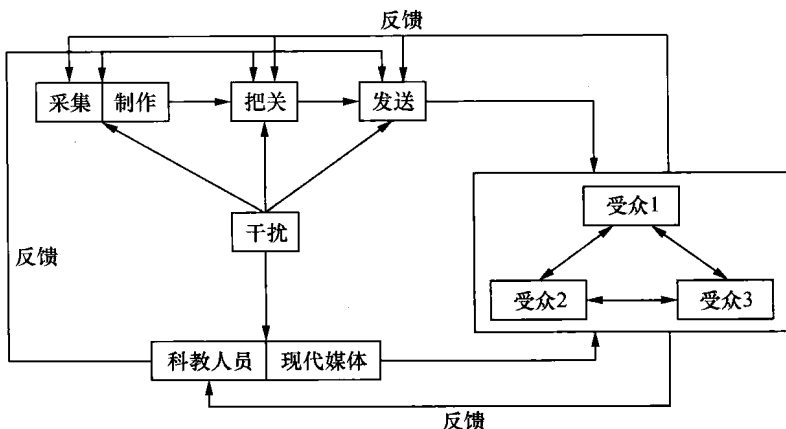


图 4-12 西部地区科技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胡晓玲,杨政学:《西部地区科技传播模式及策略分析》,《现代远程教育》2001(1)。

#### (五) 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情典型宣传模式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动员家乡在农村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回乡,青年团就树立了徐建春和吕根泽等回乡知识青年的典型,其中吕根泽被树立为典型的过程,是很有代表性的。

第一步:借助大众媒介进行宣传报道。吕根泽因病未能继续升学而不得不

① 参见高启杰著:《农业推广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② 胡晓玲,杨政学:《西部地区科技传播模式及策略分析》,《现代远程教育》2001(1)。

回乡之后,经历过非常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来终于安下心来投入了家乡的农业生产和各种活动,受到了社员的欢迎,他的情况被当地的青年团组织所发现,他们认为这中间体现了教育青年的一个原则问题——劳动与知识相结合的问题,于是采写了报道文章,1953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青年团中央写给吕根泽的信,同时发表了署名玉石采写的文章《站在建设前列的年轻人——记初中毕业生吕根泽参加农业劳动的事迹》,以及社论《用吕根泽的范例教育农村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这是树立典型做法的第一步——大张旗鼓地运用报刊、广播等宣传机器进行宣传。

第二步:从上到下,运用各级组织的力量,组织青年和群众学习。领导干部接见、到各地作报告,以自己的体会向广大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说明“参加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是必要的,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没有一定数量的知识青年参加是有困难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决不该都挤到学校和机关里去”等等道理。

第三步:领导设定典型的宣传模式。吉林省团委在全省团县委书记会议上作出具体布置,采取几种方式广泛宣传。方式之一,是通过党报、团报和印发小册子对他的事迹进行广泛传播,其中仅小册子就印发1万多本,发到各农村团支部,要求作为学习材料;方式之二,组织吕根泽到各县和青年直接见面,作报告,还利用纪念“五四”青年节时机,组织了一次全省规模的广播大会;方式之三,通过召开各种代表会,举办训练班,广泛进行宣传,全省有13个县70个区召开了知青代表会。

第四步:巩固典型人物模式,派专人随时观察和监督典型人物的情况,发现不正确的行为及时批评和教育。

这一树立先进知青典型来号召大家学习的方式,多年来一直被看成是非常有效的,不断地被采用。到20世纪60年代,党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口号并且推出邢燕子。这期间的先进知青典型,包括上海的浦锦文、吕美英,河南的荆焕云,河北的李瑞芬,山西的乔继光,陕西的韩志刚,江西的宋喜明和天津的王培珍等。<sup>①</sup>

知青典型的宣传模式带有20世纪50至70年代社会动员的特点,却有着自己的特点。主要在于:从城乡结合的视角进行宣传;系统的政治宣传与个人教育相结合。

<sup>①</sup> 刘小萌、定宜庄、史卫民著:《中国知青事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233页。

### 思考题

1. 举例说明两种农业信息服务模式。
2. 简述国外农业合作组织的两种模式。
3. 简述中国农业信息传播模式。
4. 简述乡村政治传播中的庇护模式和社会动员模式的主要观点。
5. 简述理想的城乡信息传播模式的主要特征。

### 参考文献

#### 著作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英国等]丹尼斯·麦奎尔著,祝建华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李道亮著:《零公里的探索: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

张静著:《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李红艳著:《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高启杰著:《农业推广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论文

于良芝、张瑶:《农村信息需求与服务研究》,《图书馆建设》2007(4)。

吴锋:《国外农村信息传播的基本模式与启示》,《今传媒》2008(4)。

朱芙蓉、周慕荣:《美国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对我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启示》,《市场经济研究》2003(6)。

贾晓玲:《国外农业信息传播方式》,《科技致富导向》2008(12)。

谭英、谢咏才、王德海:《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信息服务模式分析与评价》,《农业网络信息》2004(8)。

陈尧:《政治研究中的庇护主义——一个分析的范式》,《江苏社会科学》2006(3)。

何宏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词——对底层的社会动员如何可能》,天益社区,2008年3月12日,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54492>。

刘一泉:《社会动员形式的历史反视》,《战略与管理》1999(4)。

杨福忠:《从社会动员能力看当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3)。

金太军、施从美:《村庄场域中的三重权力互动分析》,《理论文萃》2002(2)。

旷宗仁、谭英、左停:《中国乡村传播及其优化模式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6(8)。

仇学英:《贫困山村发展传播模式的探索——大众传播与一个贫困乡村现代化演进的分析框架》,《中国传媒报告》2004(2)。

刘玉花:《大众传媒与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党轲:《基于网络群体的农业科技传播》,《农林科技》2006(4)。

党轲:《农村网络群体内部传——收双向互动模式研究》,《甘肃农业》2006(8)。

胡晓玲、杨政学:《西部地区科技传播模式及策略分析》,《现代远程教育》2001(1)。

## 第五章 乡村传播学之媒介研究

### 第一节 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发展的主要观点

#### 一、大众媒介体系与乡村社会的兼容性与排斥性

施拉姆认为,大众媒介诞生于15世纪40至50年代,其标志是1450年德国人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运用活版印刷术,成功地印刷出了第一批《圣经》,施拉姆把这个日子称为“庆祝大众传播开始的日子。”(as good a date as any to celebrate as the beginning of mass communication)<sup>①</sup>但是按照大众媒介发展史的另一说法,近代大众媒介的起点,理应以19世纪30年代大众报刊的出现为标志。进入20世纪逐渐出现了广播、电视、录像机、电影、互联网以及手机媒体等新的媒体形式。

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形式出现之后,传统大众媒介的基本属性面临着多元化的挑战,原有的大众社会的形态已不复存在,大众媒介在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专业化标准和职业传播者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及其相关的媒体形式,手机媒体及其相关的媒体形式使得传播者的大众化、平民化和日常化成为现实;二是传播技术显现出从专业化向大众化发展的趋势;三是信息的大量复制性,不仅仅体现在专业机构可以生产和制作,传播技术的大众化发展趋势使得信息复制的平民化、日常化成为可能。在这种意义上,大众媒介产生时的背景条件已基本改变。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大众报刊诞生的条件包括: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通讯工具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和大众对信息的需求的话,互联网、手机媒体等新的形式则更多地依赖于通讯技术的发展而成为社会大众的媒介工

---

<sup>①</sup> Wilbur Schramm: *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具。基于这种差异性,对传统大众媒介形态、新的大众媒介形态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我们提出下述观点:

第一个观点:传统的大众媒介形态是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而逐渐兴起的,是为了满足城市大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而产生的,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系统并无必然联系;

第二个观点:新型的大众媒介形态,也是首先在城市社会中拓展出来的,乡村社会的受众在传播技术的日常化前提下,可以获得平等的使用权,这意味着大众媒介与城市文明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契合关系;

第三个观点:随着传播技术的大众化、日常化,乡村社会也正在成为新型大众媒介的消费场所。

## 二、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发展

### (一) 塔尔德论报刊与乡村社会的发展之关系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在考察技术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时,探讨了电报、电话、大批量生产的书籍,甚至是印制的请柬和广告的角色,特别是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报刊,他尤为重视。他认为,现代报刊依靠电报电话和铁路,迅速收集和传递着信息。工业化之前,没有大众传播影响的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行业和家庭:“在封建国家如中世纪的英国或法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子内部都有它不同的意见,都有它独特的政治和思潮。……一个地方的思潮和另一个地方的思潮因为不相往来而彼此陌生,互不相同。……只有书籍才能提供这种联系,后来报纸更加有效地提供了这样的联系。……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想象,报纸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个人的谈话,……使人们的谈话在空间上整合,在时间上多样化;即使不读报但和读报纸者交谈的人也会受到影响,也不得不追随他们借用的思想,一支笔足以启动上百万的舌头交谈”<sup>①</sup>。

换言之,塔尔德认为,现代报刊改变了整个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形态,人们可以跨越时空借助它进行充分地沟通,从而也会在这种沟通中构建新的社会关系。

### (二) 帕克论报刊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

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在1925年发表的论文《报刊的自然历史》一文中指出,报纸的发展,与现代城市的发展史是一致的,是一个自然产品,而不是理性化的产品,尽管报纸在发展过程中,经受了不同的控制和干预手段,报纸的发

<sup>①</sup> [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著,[美]特里·N.克拉克(Terry N. Clark)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235页。

展依然是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发展,呈现出自然发展的特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乡村向城市的变迁中,报纸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报纸的信息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就像是乡村社会人际传播中的信息,具有闲言碎语的特征,换言之,报纸是这种闲言碎语的延伸。

显然,帕克对报纸是否可以乡村社会的变迁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持怀疑态度,他从进化论的视角对报纸的认知,认为报纸的新闻开始是从乡村社会中的信息延伸而来,这一点与现代报刊的发展史并不吻合。

### (三) 施拉姆论大众传播媒介与发展中国家信息的影响力

施拉姆在1964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一书中,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促进国家发展的设想。他认为大众传播对第三世界国家更重要。“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sup>①</sup>他对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大众传播事业中遇到的问题,如资金、计划、专业训练、设备等方面的困难,和有关法律制定等,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他认为大众传媒在国家发展中具体可以发挥的功能包括:(1) 扩张视野,使传统社会的人民把眼光放在将来以及现在的生活形态,并通过媒介唤醒国家意识,促进国家的整合;(2) 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家的重要发展项目;(3) 提高人民的抱负,拒绝被命运摆布;(4) 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的气候;(5) 与人际管道沟通;(6) 赋予人与事以地位;(7) 扩大上下沟通的政策“对话”;(8) 执守社会规范,使人不敢轻易逾规;(9) 形成文化口味;(10) 改变比较不重要的态度,疏导强固的态度。<sup>②</sup>

显然,施拉姆关于大众媒介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认知,持乐观而积极的态度,因此也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过高估计了媒介的社会功能。

### (四) 英尼斯论社会变迁与媒介形态的关系

作为多伦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尼斯(Harold Innis)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把传播放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中进行考察。他认为传播有两层含义,一是时空的偏倚,二是媒介形态的变化。总的来说,传播媒介可以分为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帝国也可以分为倚重时间的帝国和倚重空间的帝国,即宗教帝国和政治帝国。倚重时间的媒介,性质耐久,有利于宗教的传承、维持宗教帝国的统治权威;倚重空间的媒介,质地轻便,有利于政治帝国的空间扩张和远距离控制。因此,知识和权力的垄断在媒介与帝国的关

① 张隆栋主编:《大众传播学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② 李金铨著:《大众传播理论》(修订六版),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243页。



系中发挥着桥梁的作用。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在传播媒介和帝国组织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间保持平衡。

换言之,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和贮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技术手段。所有的文明都由知识、思想、习惯、实践、仪式、艺术等内容构成。社会组织的转化、主体性的新形式和知识的重新组织都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传播媒介有助于维持权力,继而建立知识的垄断等功能。传播媒介形态的变迁形式有利于特定社会阶级的知识和权力的集中和垄断,从而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变化。

英尼斯对传播媒介与社会形态变迁的观点,对认知乡村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将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较量,传播媒介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作用,由传播媒介所形成的知识垄断和知识阶层权力的积累,是城市社会以工业化的逻辑不断瓦解乡村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

### 三、大众媒介与现代化

#### (一) 勒纳与《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

1950年和195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在中东的6个国家做了一次长期调查。被调查的6个国家是:伊朗、埃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这次调查的目的是尽量了解居民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的程度,以及接触传播媒介后被调查者对与自己国家发展有关态度的变化情况。丹尼尔·勒纳在1954年返回中东进行了相关的后续调查,并于1958年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他认为,欧洲现代化模式展现了一定的成分与顺序,而这种成分与顺序的相关性是全球性的。都市化增加—识字率—传媒阅读率—政治参与率,这样的顺序在西方国家演进的现代化过程,几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会一再重复。在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增加工业化便会提高都市化;提高都市化便会提高(人民)读书识字能力;提高读书识字能力会提高媒介的使用;增加媒介的使用会促进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sup>①</sup>。其主要的观点包括:

1. 大众传媒有移情作用。他指出移情就是一种以自己的情况来考虑别人处境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具备,是现代人格的体现。大众传播媒介为这样的移情提供了支撑,从而可以使当代人更全面地沟通与了解世界。它能使近来迁徙频繁的人们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高效率地行动。简单地说,移情就是一种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来看自己的能力。对摆脱传统环境的人们来说,这是必不可少

<sup>①</sup> 李金铨著:《大众传播理论》(修订六版),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243页。

的技巧。<sup>①</sup>

2. 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勒纳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对73国的调查统计资料中发现,现代社会的四种指标的相关系数具有密切联系性。以识字率为例,识字率与都市化的相关系数为0.64;与选举的相关系数为0.80;与传媒参与的相关系数为0.82。在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中,他得出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化组成体系的结论。<sup>②</sup>

## (二) 媒介塑造现代性人格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Alex Inkeles)从1962年起,在“哈佛国际事物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实施了较大规模的题为“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的计划。这一研究在智利、阿根廷、以色列、印度、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六国展开,调查访谈对象达6000人。这些研究样本包括了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在城镇从事比较传统职业的那些人,“所有被挑选的人代表不同的种族、宗教、地区、居住点以及其他重要的社会类别”<sup>③</sup>。他认为,国家落后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状况,也表现为一种心理状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他把人的现代化视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环节,“几乎没有一个人主张仅仅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去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进步。发展和进步也标志着政治上的高度成熟。例如表现出以国民精神为基础的社会稳定、秩序井然的国家行政管理,此外还包括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文化艺术的繁荣、交通工具的发展、娱乐和休息时间的增多等。当然,发展最终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sup>④</sup>。

英格尔斯最突出的贡献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传统人和现代人的概念。他认为现代人有以下特征:(1)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2)准备迎接社会的变革;(3)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4)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5)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6)有计划性;(7)尊重知识;(8)可依赖性和信任感;(9)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10)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的智慧敢于挑战;(11)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12)了解生产及其过程。<sup>⑤</sup>

① Lerner Daniel: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p. 51.

② 孙聚成著:《信息力: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09页。

③ [美]阿列克斯·英格尔斯、戴维·H.史密斯等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④ [美]阿列克斯·英格尔斯等著,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⑤ [美]阿列克斯·英格尔斯、戴维·H.史密斯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英格尔斯在调查中发现,较现代的人愿意积极地同信息来源保持接触,无论是现代的信息来源还是传统的信息来源,他都经常接触。但在评价和接受这些信息时,较现代的人对于新的现代的大众传播工具较信任,而不太现代的人则重视传统的消息来源。由此他得出结论,一个现代人应当经常与大众传媒接触。<sup>①</sup>显然这是一种以西方国家为标尺的主观色彩浓厚的方式,更何况这些研究对“传统性”的归纳主要来自非洲和拉美,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其社会阶层的变化的差异甚大。

#### 四、参与式影像与乡村发展

影像生产工具在诞生之始,就成为弱势群体、边缘人群谋求改变不平等现状,并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的一种斗争工具。世界影像史上第一次自发的有组织的民间影像运动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当美国的穷人共同感到宣传工具都不报道他们的困境时,1930年12月,以普通工人为主要成员的“工人电影—摄影联盟”便在纽约创立,联盟成员观摩影片、切磋习作,力图在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中记录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1969年,在欧美思潮剧变,反战运动、民权运动高涨,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利用纪录片来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让普通民众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以图革新政治。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在派出电影工作者到边远贫困地区做社会调查的同时,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和民间的业余创作人员。1969年,第一部由印第安人自行拍摄并寻求解决自我问题的影片——《你正站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成功推出。另一部重要影片《磁带录像、圣雅克》则是在蒙特利尔贫民区,由圣雅克(Sain-Jacques)的志愿者自己操作磁带摄录像机,摄录当地居民的讨论及居民们观看录像后的意见表达,最后再根据这些原始素材后期编辑而成。这些地区的居民观察自己和别人的讨论,体察到了不同意见。这样,磁带不仅对地区外的官方起到桥梁作用,同时也促成和改善了地区内部的意见交流。<sup>②</sup>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参与式影像(participatory video),作为一种重要的影像类型和工作方法,进入传播学的视野中,在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得到广泛运用和推广。<sup>③</sup>

① 李良荣等著:《当代西方新闻媒体》,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② [美]埃里克·巴尔诺,张德魁、冷铁铮译:《世界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250页。

③ 韩鸿著:《民间的书写: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191页。

## 第二节 不同国家的媒介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 一、韩国新村运动时期媒介的影响力

#### (一) 韩国乡村运动

韩国政府在 1972—1976 年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把“均衡工农业的发展”、“开发农水产经济”,放在三大经济发展目标之首。时任总统的朴正熙希望“把传统落后的乡村变成现代进步的希望之乡”,在 1970 年 4 月举行的一次全国性部长会议上,他正式号召要开展一场以“勤劳、自助、协作”为精神主旨的乡村建设运动。随后,韩国政府开始了一个名为“新村运动”的试验性项目计划,以“建设更美好的村庄”,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因此开展起来。分为四个阶段:(1)启动建设阶段(1970—1973 年):这一阶段自 1970 年冬季开始,由民政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打破部门、行业界限,建立了全国性的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了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出大批新村指导员。(2)扩大成果阶段(1974—1976 年):1974 年新村运动进入全盛期,重点从改善农民基本生活居住条件发展为改善、提高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住房建设从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新建住房为主。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修建了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娱乐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农村文化设施。(3)充实提高阶段(1977—1980 年):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是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色农产品产业,实施区域开发,建设农产品流通批发市场,支援农村的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积极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与农村保险、金融业的发展,支持农民协同组织发展等。(4)国民自觉阶段(1981—1988 年):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80 年代初期,韩国国内政局不断动荡,新村运动也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韩国政府认为已经完成了自己支持、协调和推进新村运动的主要使命,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式的运动转变为民间的自发运动,逐渐成为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sup>①</sup>

#### (二) 新村运动中的大众媒介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举国上下开展的“新村运动”中,韩国广播电台采用移动广播的方式,以农村为对象进行集体听广播,组成农家讨论广播小组,在“人的

<sup>①</sup> 张泉等著:《城乡统筹下的乡村重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7—39 页。

革命”中对民族意识进行熏陶和提升;在提倡“新生活”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在提倡“新生活运动”中,配合了城市支援农村的社会实践,传播效果显著。<sup>①</sup>

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推行新农村建设运动时,韩国报刊(尤其是城市媒体)在发动城市各界力量关注农村、构建城乡互助互补机制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6月,韩国经济人联合会联合农协中央会和《文化日报》,共同发起了“一社一村”运动,动员一家企业与一个农村结成姊妹关系,帮助农村解决实际问题,建立长期交流渠道,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经过报纸的宣传,一社一村运动得到了韩国社会的广泛呼应,企业和各类社会机构团体也踊跃加入了与农村结亲活动,出现了一校一村、一店一村、一军(部队)一村、一区(社区)一村等各种新合作形式。一些政府部门积极参与进来,开展“一机关一村”活动,其中包括外务部、警察厅、国防部等单位。

## 二、广播对美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从广播发展史来看,广播对美国乡村生活影响极大。广播电台出现之际,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1920年49%的美国人生活在农村地区,1940年仍有43%的人住在乡下。美国的农业广播电台相当发达,尤其在美国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州。农业台主要为农业人口提供农业市场信息、天气预报、天气形势分析,以及对负责农业的官员的访谈、农作物新品种和农作物改良信息、耕耘技术和有关农业机构、组织的新闻报道等。值得提及的是,农业台所播放的面向农民的广告很有特色,使这种电台充满了乡土气息。在节目安排上,农业台更多地将节目重点放在早晨和中午,并随四季变化对节目作出相应调整。<sup>②</sup>

和城市居民相比,农村人对广播有更多的喜悦之情。在给电台、演艺人和杂志的无数封来信里、在与农业机构和收音机销售者的谈话中,他们表达了对信息的重视,表达了摆脱隔离与孤独后的欣慰。到1938年已有三分之二的农村家庭有了收音机。社会学家威斯特(James West)在1938至1941年间对中西部小乡镇的研究发现,“超过半数的镇民,以及将近一半的农户有收音机。大多数镇民的收音机用交流电,而乡下的收音机几乎都用电池。少数的矿石收音机还在使用”。<sup>③</sup>

农民购买收音机的初衷以及美国农业部和许多州的农学院推广无线广播的

<sup>①</sup> 郎劲松著:《韩国传媒体制创新》,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sup>②</sup> 陈卫平著:《中外广播电视简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sup>③</sup> 转引自〔美〕理查德·布茨著,王瀚东译:《美国受众成长记》,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主要动因,是它对农业经营的价值。天气与市场行情预报的作用无穷。农民在出售他们的谷物时,因为没有关于市场价格的独立信息,而只是听凭批发商们信口开河,曾经处在极其不利的境地。国会于1913年在农业部创设了一个联邦市场局,专司向农民提供价格信息。该机构在一开始依靠电话来收集信息,报告发布到全国范围农村地区的报纸、邮局和乡村商店。农民进城时在他们当地的店铺或邮局得到最新的通报。广播极大地促进了这一信息的发布。1920年美国农业部首次通过广播发布报告。到1922年,报告已经送达50家以上的电台广播。气象局也于1921年开始通过广播发布气象预报。到1923年,有140家电台发布美国农业部的气象预报。

起初,乡村听众主要把广播视为信息的来源。但是他们很快便开始看重它相伴娱乐的功能。城市广播电台发现了它们周边乡村听众的潜在市场。亚特兰大的WEB电台和芝加哥的WIS电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率先开办了常规性的乡村节目。农民、农业机构、乡村杂志编辑、广播从业者和广告商们均认为,广播排解了乡村生活的孤独感,成为社区集会的主要媒介工具。一项伊利诺伊州农民的调查表明,收音机经常在学校、教堂和其他公共场所的社区集会上用于广播讲座和音乐会。<sup>①</sup> 这种情形一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

### 三、一村一品运动与大众媒介

“一村一品”运动(The One Village One Product)是日本农业产业化的成功模式。这一运动是日本大分县前知事平松守彦先生于1979年倡导的。大分县开展“一村一品”运动以来,全县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不但使本县成为一个生活安定、环境优美、经济发达的国际化城市,也在日本国内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广泛关注。韩国、法国、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都与大分县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交流。美国洛杉矶制定了“一村一品”节,路易斯安那州开展了“一州一品”运动。印度尼西亚推出了“东爪哇一村一品”标记的咖啡。美国洛杉矶市在开展“一村一品”运动的同时,还专门设立了“一村一品”节。受其影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也组织开展这一运动,以解决当地失业问题,他们将“一村一品”运动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新途径。

所谓“一村一品”,就是一个村子的居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建设家乡、发展农村经济的活动。“开展一村一品运动,就是使每个市町村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或‘拳头产品’,

<sup>①</sup> [美]理查德·布茨著,王瀚东译:《美国受众成长记》,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222页。

打入国内和国际市场”。“一村一品”的实质是搞活地区经济的一种手段,是一个地方的象征,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代表着这个地方在某一个地区乃至全国和全世界市场上享有的声誉,同时还反映着这个地方的精神风貌。<sup>①</sup>

2005年12月,日本政府在WTO香港会议上提出了国际版的“一村一品”概念,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建设自由贸易体制,促进各国经济发展。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06年2月提出了“一村一品”援助计划,一是在成田机场、羽田机场等开设“一村一品”展台,展示发展中国家的土特产品;二是以技术合作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专家,同时接受发展中国家人员到日本培训。“一村一品”运动的理念逐步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所认识和接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菲律宾等国家依照一村一品的模式发展本国的经济,消除贫富之间的差距。非洲马拉维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HCA)的援助下开展了“一村一品”试验项目,突尼斯也正在研究如何引进“一村一品”运动。

一村一品运动中,其核心的问题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介,宣传“一村一品”成果,通过展销会等推广产品,使一村一品产品的知名度得到提升,将大众传播媒介的综合效力与推动经济发展、消除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宏观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

从日本、韩国、美国大众媒介在乡村社会发展时期的作用中可以看出,借助大众媒介促进某一特定的社会改革的进行,对乡村社会而言是可借鉴的一条思路。

### 第三节 中国乡村媒介概述

#### 一、乡村电视

##### (一) 乡村电视栏目/频道的发展历程

乡村电视栏目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由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7 甘肃兰县一些省级电视台开始创办自己的乡村

贵州电视台的《致富之路》以及同年湖北电视台的《农村新貌》等,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四川电视台开播的《农村俱乐部》,这是全国第一个专门为农民办的综合性电视节目。吉林电视台在1982年也开始做农村综艺节目的尝试,主要内容是录制一些二人转、拉场戏等地方戏,安排在隔周的周五播出,节目长度50分钟左右,当时没有正式的名称,就叫为农民安排的文艺节目,节目中没有设播音员或主持人,而是通过字幕告诉农民观众剧目名称和演出单位。1985年,吉林电视台节目改版,在播出二人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很受欢迎的相声、小品、歌曲等,节目也正式命名为《农村俱乐部》。

第二个阶段我国乡村电视节目发展时期。1987年中央电视台与农业部合办、由当时的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现为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承办的《农业教育与科技》,是第二时期开始的标志,它带动了又一批省级电视台乡村电视节目的开办。如1987年广东电视台的《摇钱树》、内蒙古电视台的《牧民之友》开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省级电视台陆续开办了乡村电视栏目,如山西电视台1995年开办的《黄土地》栏目,中央电视台第二套经济生活频道在1996年开办的《金土地》栏目,云南电视台1999年开办的《红土地》栏目,新疆电视台1999年开办了《农牧天地》栏目,天津电视台2000年开办的《世纪风》栏目等等。

第三个阶段的重要标志是1996年由农业部和中央电视台合办、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承办的央视七套农业节目正式播出,对全国乡村电视节目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诸多农村节目中,湖南台《乡村发现》异军突起,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浙江电视台的公共频道则改为“公共·新农村频道”。这个频道最大的特点是不把“三农”当幌子、当招牌,而是真抓实干,其突出标志就是创办了《新山海经》、《新农村纪实》、《农村大讲堂》、《政策面对面》等“三农”节目。

## (二) 乡村电视栏目/频道的发展现状

研究乡村广播电视栏目的相关文献多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而着重探讨乡村电视栏目的更多见于2000年以后。就研究现状来看,我国乡村电视栏目主要呈现出以下主要问题。

### 1. 媒体资源配置严重不足

2006年1月18日的《经济日报》推出了《农业电视节目现状扫描》系列报道。报道称,在全国电视节目年播出总量的1004万小时中,农业电视节目不超过1%。这种资源配置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壮志远远不相适应。目前已经开通的部分省级电视台的乡村频道或节目见表5-1。



表 5-1 各省市电视台开办的面向农村的电视节目(频道)

| 电视台     | 栏目(频道)名称 | 开播时间 | 栏目简介   | 播出时间   |
|---------|----------|------|--|--|
| 河北电视台   | 农民频道     | 2005 | 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为宗旨,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为己任。解读涉农政策,关注农民生活,传递致富信息,记录社会变迁,立足农村,沟通城乡,全面宣传河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频道每天早晨 06:50 开播,次日 02:00 结束,全天播出 19 小时,其中自办节目每周达到 10 个小时                                 |
| 吉林电视台   | 乡村频道     | 2001 | 频道以传播现代农业科技资讯、关注乡村百姓生活动态、弘扬地域文化为宗旨,全方位、多角度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  | 频道自 2001 年 7 月开播以来,先后创办了多档定位准确、内容丰富、互动性强的自办栏目,《乡村四季》、《乡村聚焦》、《乡村导视》和《乡村大戏台》等栏目均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
| 山东电视台   | 农科频道     | 1996 | 集专业、科技、旅游、法制、影视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媒体;为省级有线台,实现有线、无线双重覆盖,现已覆盖全省 17 地市。农科频道已经成为山东省内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的省级电视频道   | 周一—周日  |
| 山东临沂电视台 | 农村科普频道   | 2006 | 及时传播科技、政策信息,报道各地科普新成效、新成果,宣传党和国家的农业政策,开展农业科技知识讲座   | 早晨 6:45 至晚上 24:00 全天候播出  |
| 新疆电视台   | 农牧天地台    | 1999 | 做农牧民生产和生活的好帮手。关注普通农民、关注农业,介绍实用技术   | 周二   |
| 广东电视台   | 摇钱树台     | 1987 | 以“立足三农”为宗旨,为观众解读最新的农业政策,提供及时的流通信息,助广大观众了解成功的致富经验,并选择重大题材重点经营,突出时效性,实用性,贴近农民生产、生活,介绍农村奇人新事,优质种苗,农村技术,以节奏快信息量大使受众群体成为受益群体                | 周日   |
| 山西电视台   | 黄土地台     | 1995 | 面向农民,服务农民。介绍致富妙招,提供贴心服务,发布最新农业信息   | 周二   |
| 四川电视台   | 金土地台     | 1994 | 及时传达中央和地方的方针政策,推广新技术,反映农民心声,引导农业生产   |  |
| 甘肃电视台   | 田野之光台    | 2000 | 以关注“三农”问题、加强城乡联系、推进小康建设为宗旨,全面报道甘肃“三农”发展现状,与时俱进,扩大信息量,增强导向性、针对性、服务性,以宣传先进典型为重心,为城乡观众提供全心的农业现代理念,树立新农业、大农业形象,引导生产消费,培育城乡市场,助民致富,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 周二   |

(续表)

| 电视台   | 栏目(频道)名称 | 开播时间          | 栏目简介  | 播出时间 |
|-------|----------|---------------|---|------|
| 湖南电视台 | 乡村发现     | 1995(2005年改版) | 以普通故事为主,原生态的展示乡村农民的故事,加强城乡互动  | 周日   |
| 北京电视台 | 京郊大地     | 1995          | 透视京郊旅游产业的发展轨迹,呈现新时代京郊大地的风貌,提供时尚快捷的京郊旅游咨询,全面服务于北京城区的旅游消费市场   | 周日   |
| 江西电视台 | 稻花香里     | 1996          | 设有三个板块,说新事、说能人、说农活  | 周二   |
| 辽宁电视台 | 黑土地      | 1989          | 以宣传农业科技知识入手,为农民送去最新的科技知识,最新的品种,提倡科学种田,强调实用性;帮助农民认识市场,了解市场,具有前瞻性;通过典型农村、农民的致富事例去带动农民,启迪农民的思维,具有趣味性 | 周日   |
| 福建电视台 | 农村新事     | 不详            | 围绕三农建构综合节目群,农村经济类、农村文化类、农村法制类   | 周三   |
| 浙江电视台 | 田野风      | 1998          | 常规节目有三个子栏目组成,以动态信息为主要内容   | 周二   |

## 2. 覆盖率低、入户率低

乡村地形地貌复杂,广播电视节目覆盖的难度很大,更多的是采用无线发射、多路微波等方式覆盖,节目套数很少,信号质量不好,许多地方无法全天候接收到节目信号,许多农民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近年来,“村村通”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现在的“村村通”工程只能接通央视一套,且入户率很低,很多地方不到10%。由于覆盖技术的原因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只能看到中央一套节目和本省电视台部分频道。

## 3. 乡村电视节目普遍偏少,节目竞争力普遍不强,发展失衡

乡村电视节目普遍偏少,节目品质有待提升,许多电视台或节目制作机构都把目光聚集在城市,乡村则少有人问津,乡村电视节目发展的失衡主要体现在节目数量与结构方面,反映农村实际生活,反映农民普通劳动者形象的节目少,面向乡村的专业频道少,面对三农的节目少,农业科技节目少。

## 4. 乡村电视节目与受众之间存在错位现象

节目的贴近性与针对性较差,电视从业者者的传播理念与乡村受众的需求脱节。从乡村电视节目的创作指导思想到节目形式,再到节目的内容,乡村电视节目与农民之间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都较远。节目形式与农民接受能力也存在失调现象。有关资料显示:农村观众的文化程度在初中或初中以下的,占

88.1%，绝大多数农民只有中小学文化水平。乡村电视节目特别是一些科技类节目专业化过强，农民对节目内容往往一知半解，降低了节目的传播效果。另外，一些电视栏目由于对乡村受众缺乏了解，在栏目设置、内容选择、节目制作包装以及播出时段安排等方面，都不能很好地适应“三农”的实际需求，使传播效果与传播功能大打折扣。<sup>①</sup>

#### 5. 电视节目的制作队伍不稳定

各家电视台对乡村电视节目的态度不同，导致节目制作队伍的心理压力的不同。一些节目的编导不情愿辛苦工作得到的却是生活的清苦，制作队伍的不稳定导致节目质量提升缓慢，从而又成为某些电视台的决策者压缩乡村电视节目版面、甚至停播乡村电视节目的理由。<sup>②</sup>

#### 6. 乡村电视节目的运营模式有待突破

乡村电视节目制作成本高，乡村受众消费能力低，目前乡村的收视群在收视率中被忽略不计，影响了乡村电视节目的广告创收。这些因素制约了乡村电视节目的改进和发展，乡村电视节目面临着资金匮乏、运营困难与质量低的多重困难。由于乡村电视节目的经济效益低，节目的设置和播出时段正在萎缩，逐渐陷入边缘化的困境。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乡村电视节目中主要存在的三个矛盾是：一是收视标准与功能定位之间的矛盾。乡村电视节目理应属于公益性服务类节目，它在传播新品种、新技术的同时还应具备传达新思路、新观念的功能，在完成功能定位的前提下采用要求同样的收视率标准。二是市场需求与导演意识的矛盾；三是“乡村信息饥渴”与电视对乡村信息传播的失衡。“乡村信息饥渴”是指电视媒介在频道栏目等电视资源配置方面出现的一种悖论现象：占全国总人口少数的城市人拥有着“大众”媒介，而占人口“绝对”数的农村人却远离大众媒介。虽然整个国家远未实现城市化，而媒体却单独地率先城市化。这种现象主要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电视媒体的利润逻辑和媒介从业者心理深层的商业意识相关联。

#### （三）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电视节目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城市化过程大量劳动力的缺乏和农村土地改革的逐步推行，农民群体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而是一个可以流动的群体。进城的农民群体的称谓伴随着流动人口政策的转变也有所变化，从盲流、民工到农民工便是证明。随着农民工群体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渐提

<sup>①</sup> 贺福中、田文利：《农业电视节目的现状及对策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9）。

<sup>②</sup> 吴杰：《电视对农节目现状和发展对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12）。

升,这一群体如何融入城市生活中,并完成自身的蜕变成成为城市中合格的一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电视产业对农民工的关注也悄然成为一种新气象。

2006年,贵州电视台成立特别节目部,从全台抽调10名业务骨干,开始筹备一档让农民工说话的节目。通过广州“立白”企业集团与贵州电视台的联合,以《“立白集团,温暖行动”——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公益活动的形式,开办《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电视节目。用真情去反映农民工兄弟的喜、怒、哀、乐,反映城市与农村的依存、精神与生存的振荡、成就与艰辛的血痕。2007年2月,节目第一季《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开播。从2007年9月开播,已完成三个播出季,共制作播出48期节目,每个播出季均在贵州卫视周日晚间黄金时段推出,时间为半小时到1小时。据CTR央视市场研究公司调查,该节目稳居贵州本地同时段卫视节目收视第一,在全国省级卫视同时段收视率排第十四位。<sup>①</sup>

除此之外,中央电视台的《阳光大道》、江西电视台的《传奇》,辽宁电视台的《王刚讲故事》等节目也以农民工的生活经历为故事主线,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生活。《西陆打工俱乐部》全国电视联播服务网是为外出务工的兄弟姐妹们提供就业信息、就业安置服务的全国性电视节目及地面服务网络平台。四川电视台、重庆电视台、福建电视台、河南电视台、内蒙古电视台等58家电视频道联播《西陆打工俱乐部》,以指导农民工城市化生存、协助就业为宗旨,通过再现农民工的生活、就业、情感的真实故事,与观众一起体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艰辛历程,记录当代农民工的就业和生存状态,展示中国农民工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感人诉求。自2009年6月15日改版开播以来,因其公益的媒体属性,以及为农民工说话办事的宗旨,收视率一路飙升,2009年7月5日的《姐妹》收视率更是达到了0.796,与同期央视强档节目相当。<sup>②</sup>

可以说,目前面向农民工的电视节目,首先是以社会关怀和企业合作的形式出现,以温情和关怀为视角,关注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构成,凸显他们在城市的艰辛之路,以《中国农民工》节目为代表;其次,是以融合的视角,在一个栏目中化解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如一些故事类的节目、情感类的节目和心理访谈类的节目;再次是以农民工的就业为出发点,开办就业服务类节目。

<sup>①</sup> 汪志球:《中国农民工:为何热播》,《人民日报》2009年7月5日。

<sup>②</sup> 夏天的裙子:《四川新闻资讯频道“西陆打工俱乐部”收视节节攀升》,西陆网,2009年7月7日。  
[http://superlive.xilu.com/2009/0707/news\\_1098\\_30344.htm](http://superlive.xilu.com/2009/0707/news_1098_30344.htm)

## 二、乡村广播

建国之初,全国的收音机和报纸数量都很少,对贫困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信息传播更是难上加难。针对当时全国尤其是乡村收音机数量极少、交通不方便等情况,1950年4月国务院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收音站,并为收音站规定了三项任务:抄收记录新闻、预告广播节目和组织群众收听。1955年3月,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在农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合作社重点建立收音站的指示》和《在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通知》。随后,全国各地开始普遍建立收音站。在建国初期,全国广泛分布的县级广播收音站就成了党和政府对广大乡村地区进行政治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以及农业互助合作等重大政治运动中,都通过收音站有线广播对乡村社会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动员。1952年,吉林省九台县第一个把收音站发展成为乡村有线广播站。这种小型广播站和收音站相比,其优点主要体现在收听范围大、时间地点固定、播放形式自由三个方面。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肯定了九台县的经验,并决定向全国推广。由于收音站和有线广播站的建立和发展,广播开始进入广大乡村。

1955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开始在全国逐步建立乡村有线广播,肯定了乡村有线广播“是教育农民和满足农民收听广播的最经济、最有效的工具”,“是国家对广大农民进行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工具”。要求“把几年来试办农村有线广播的经验加以总结,在全国有条件的省和自治区内有计划地加以推广,并为今后大规模发展农村有线广播打下基础”。<sup>①</sup> 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又进一步提出乡村广播的发展计划,准备“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乡村广播网,要求各乡和大型的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都装置收听有线广播或者无线广播的工具”<sup>②</sup>。从此,全国开始了乡村有线广播网的大规模建设。之后,在全国大跃进运动的整体氛围下,乡村有线广播网的建设进入了高潮。就全国有线广播网的发展来看,当时全国有1747个县建立广播站,1960年建立广播站的有1600多个,1961年有广播站2万多个。1957年全国有94万多只广播喇叭,1958年为304万只,1959年为469

<sup>①</sup>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广播电视史料选编之四:中国的有线广播》,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4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万只,1960年为604万只。<sup>①</sup>在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困难阶段,乡村有线广播网的建设也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整顿反复。有线广播站整顿后停办了一些,保留了一些。1960年全国市县广播站有2404座,1962年调整为2029座,同期广播喇叭由604万只减为548万只。但到1966年春,全国广播网的全面调整工作基本结束后,有线广播站的建设已经恢复到1962年调整前的规模,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全国有县级广播站2000多座,放大站和公社广播站8435座,广播喇叭872万只,都超过了乡村有线广播以前的发展水平。乡村广播网的传输质量和收听效果也比过去有了显著提高。有线广播喇叭普及到77%的人民公社、54%的生产大队和26%的生产队。<sup>②</sup>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的乡村有线广播在发展中求进,建设规模进一步扩大,是全国有线广播网的普及阶段。1969年财政部和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发出通知,明确规定了县广播站的日常经费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由国家拨款解决;公社放大站的日常事业经费由地方财政拨款。这就为乡村广播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在1970年的国家国民经济计划中,把出版毛泽东著作、办好报纸、广播列为第一条。这样乡村有线广播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1966年,全国有县级广播站2181座,放大站和公社广播站8435座,广播喇叭1100万多只,77%的人民公社、54%生产大队和26%生产队接通了有线广播。至1976年底,全国已经建成县级有线广播站2503座,安装有线喇叭11300万只,95%的生产大队和91.4%的生产队接通了有线广播,61.5%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还建立了15.4万多个小片广播网。<sup>③</sup>至此,全国有线广播已经基本实现普及,这个时期的乡村有线广播建设规模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随后五年里,乡村有线广播网也不断进行整顿、巩固、发展和提高,基本巩固和维持了前期的建设成果。

1983年以前,我国的广播电视建设主要实行四级办广播、两级办电视、分级覆盖的方针政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广播电视尤其是无线广播和电视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单由中央和省两级来实现广播电视覆盖十分困难,特别是资金投入过大,单靠国家财力是远远无法满足需要的。1983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决定对广播电视的事业方针和技术政策

① 赵玉明著:《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② 同上书,第250页。

③ 同上书,第317页。

作较大的调整和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出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政策。从此广播电视建设的政策限制开始放开,无线广播和电视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除了中央和省一级可以办广播电台和电视以外,凡是具备条件的省辖市、县旗都可以根据当地的需要开办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条件的不断进步,乡村广播电视网的建设也日趋多元化。乡村广播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有线广播网,而是逐步发展为有线、无线、调频、电视组合的综合网络。在多元传播媒介的冲击下,乡村有线广播呈现出不断萎缩的态势,到1990年全国共有市县广播站2466个,乡镇广播站和村广播室39.7万多个,广播喇叭8222万只;村广播通播率和喇叭入户率已经分别下降至69.9%和37.3%。<sup>①</sup>而同期的收音机和电视的社会拥有量已经由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7546万台和304万台分别上升至1990年的25123万台和18546万台。<sup>②</sup>收音机和电视已经逐渐成为乡村社会更受关注的传播媒介,有线广播正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从目前乡村社会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村庄只保留有形式上的村广播室和一个高音喇叭,平时已经很少使用,偶尔村委会用它来发布开会通知、计划生育工作通知或天气预报,还有村民有时会用其发布一些寻人寻物启事等。总之,有线广播只能像这样偶尔在村庄内部发挥一些作用,相对于电视、收音机、手机甚至电脑等更为现代的传播工具,有线广播在乡村社会已经被边缘化了。

而对乡村广播自20世纪50直至80年代中后期,一直都是各省市级广播电台的一个固定节目。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例:北京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举办的“对郊区农村广播”节目,大力宣传农业政策,使“服务首都,富裕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方针,深入人心。例如1981年举办了“怎样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专题广播,从“敢不敢致富”、“该不该富”、“会不会富”等10个方面展开讨论,使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经济改革的主张,一竿子插到底。对郊区乡村广播节目还定期讲解农业科技知识,被农民称为“不收学费的课堂”。<sup>③</sup>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电视在乡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兴起,乡村广播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为农民提供真正有用的信息,二是如何将乡村广播的经济效益提升上去。乡村广播联盟便是在这样的思考和探索中形成的新的乡村广播新形式,不仅信息丰富、收视率提升,农民受众喜欢,经济效益也得到

① 赵玉明著:《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8页。

② 同上书,第583页。

③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北京》(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

了保证。

2003年3月28日,中国第一家乡村广播——陕西电台乡村广播在三秦大地率先成立,而之后仅有几年的时间,就有近15家省级乡村广播频率相继开播,辽宁、山东、湖南、江西等地纷纷建立其富有本土特色的对农广播电台各自独立地发展。2006年8月26日,“中国农村广播协作网”在辽宁电台牵头下顺势而动,在中国湖南长沙宣告成立。渤海沿岸的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也跨出了联盟的步伐,联合天津11个区县电台共同打造天津区县联盟广播,此刻,广播界掀起了一股农广联盟的高潮。其最大特点是可以突破地域界限,加强台与台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降低了经营成本,获取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中国农村广播协作网”在成立一周年之际,由辽宁电台乡村广播牵头发起,联合十一家省级专业对农广播频率参与推出了《全国农村广播大联播》这一档专业对农节目。“大连播”在节目设置上分为《东南西北致富经》和《市场探探探》两个板块,在《东南西北致富经》这个板块里,主要是把全国各地农民发家致富的好方法集合起来进行播出,让更多的农民通过节目了解农业信息和技术,快速走向致富之路;而《市场探探探》这个板块将关注点放在了全国各地的农作物市场上,介绍相关农作物价格变化的走势,并且携手一些农业价格分析与预测专家分析其中的商业机会,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农业资讯。节目的所有素材都来源于成员台供稿,由辽宁电台乡村频道对所有稿件进行统合和再次编辑,形成一个完整生动而又富含大量农业讯息的广播稿,每周六在各家参与台同时播出,届时形成了全国农民听众同时收听之势。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广泛征求农民对于节目的意见,拉近了广播和听众的距离。天津区县联盟广播还组织了“送文艺下乡”的活动,邀请本市知名的演员和电台节目主持人同台献艺,让老百姓更加熟悉了 this 联盟。此外,为了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致富信息,区县联盟联合了天津市农业局、天津市林业局组织近百名农业专家,深入到区县举办了《科技大篷车》现场咨询活动。<sup>①</sup>

同时,电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进入乡村之后,为了发挥有线广播在新时代的特殊作用,国家政策扶持乡村有线广播建设的力度在逐步加大。如今国家提出要实现乡村“广播电视村村通”的要求,要使20户以上已通电的自然村,实现广播电视的大面积普及。这对于进一步扩大乡村广播电视的有效覆盖,缩小公共文化服务的城乡差别,改善乡村群众的视听文化生活,保障乡村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建设等,都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

<sup>①</sup> 孙铭欣:《中国对农广播联盟 逆势之下,应运而生》,《媒介》2009(4)。



用。<sup>①</sup> 建设新农村,促进城乡和谐发展,重要的一环便是要消除乡村信息荒漠,利用信息化促使农民群众转换观念,善于运用信息发展生产,提高精神和物质的生活水平。而实现乡村信息化,需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功能。广播作为三大主流媒体之一,又在乡村拥有良好的受众基础,在新的时期更需要承担信息解读、资讯传递、服务农业的功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国家投资将向乡村基础设施倾斜,并且首次把广播电视作为乡村信息服务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乡村广播电视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使得县乡党委政府更加倚重乡村广播的作用,更加重视农村广播的建设。国家财政也在2006年安排了5亿资金的基础上,2007年再安排25亿专项资金,对全国县及县以上的大中功率广播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和运行维护,这必将彻底改变过去乡村广播设备发射功率不足、接收信号不强和收听音质不好等状况。在“广播电视村村通”的基础上,乡村有线广播事业终于几经沉浮之后焕发出新的生机。<sup>②</sup>

### 三、乡村报刊

“农”字报纸在中国最早创刊于解放战争初期。20世纪30年代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便兴起了一系列的以乡村建设的为中心的乡村报刊。主要的报纸杂志分主要由乡村建设运动的学者们、政府相关部门和一些报刊本身。如中华职业教育社附设潜河泾农学院编的《农村改进》、北平师范大学乡村教育实验区编的《乡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编的《乡村建设》、山西太原农村教育改进社编的《新农村》等;政府相关部门主办的“行业”刊物,比如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的《农民运动》、农业部编的《农声》、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的《会报》、青岛市政府编的《乡村建设》等;比如《大公报》、《国闻报》等也创办了农村、乡村建设等专刊、特刊和专栏。这些报刊主要是服务于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者,以理论探讨或者随笔的形式,进行舆论宣传。当时唯一的一本专门以农民为对象的报纸则是中华平民教育总会定县实验区办的《农民》报。<sup>③</sup>

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夕,各“农”字报纸发行量多在数万份之间,突出的也只是十几万份。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一些省的“农”字报纸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开了新闻改革的先河而影响很大。中央相关部门、少数没有“农”字报纸的省以及一些地市,纷纷办起了“农”字报纸,从而再现其黄金时代。

① 曾岩:《新一轮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广播电视信息》2008(1)。

② 江成军:《浅谈农村广播如何应对网络时代》,《声屏世界》2003(3)。

③ 曹立新:《化农民与农民化: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大众媒介功能与策略研究——以〈农民报〉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3)。

1950年,全国仅有农村期刊55种,70年代末农村期刊增加到290多种。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农村改革深入,作为直接反映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期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92年乡村期刊骤增至537种,且门类多、品种全,形成体系,而进入21世纪则只有十几种了。可以说,一部中国乡村期刊的发展史,可以间接折射出我国农业和乡村的复苏、兴旺和发展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报刊按来源来分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中央级报刊,一类是各省报主办的,一类是市报主办的。

中央级乡村报刊:如《农民日报》,创办于1980年4月6日,是一份中央级、综合性大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张面向全国乡村发行的报纸。原名《中国农民报》,1985年1月改名《农民日报》。《农民文摘》是农业部专门为农民办的一本综合性农村刊物,本着“一切为了农民,为了一切农民”的办刊宗旨,宣传农村政策法规,介绍科学致富项目,集纳生活百科知识,提供宣传后续服务,是目前我国发行量最大的农村期刊。

省级乡村报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黑龙江等14省市均有专门的农村报或农业报,包括了农业科技、乡镇企业、农业经济信息以及有关农业机械、畜牧水产等专业行业报纸,分布较广,种类较多。如《湖北农民报》,是《湖北日报》社主办的一张面向乡村的综合性报纸,创刊于1951年7月1日,其间因故两次停刊。1984年8月1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第二次复刊;《陕西农民报》是中共陕西省委为全省农村干部群众办的一张通俗报纸,是《陕西日报农村版》;《河南农村报》的前身是《河南日报农村版》,创刊于1963年1月5日,“文革”期间停办,1980年恢复为《河南农民报》,1993年更名为《河南日报农村专版》,后更名为《河南农村报》;《山西农民报》是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依靠《太岳日报》编辑人员和工人,于1949年10月20日在太原创办的。此外还有《湖南农民报》、《四川农村日报》、《南方农村报》、《东方城乡报》、《甘肃农民报》、《农村大众》、《辽宁日报农村版》、《山西日报农村版》、《黑龙江农村报》、《广东农民报》、《河北农家乐》等。市级乡村报刊:如上海市农业经济学会1988年7月1日创办的《东方城乡报》,石家庄日报社创办的《石家庄日报农村版》,重庆日报社创办的《重庆农村报》等。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报刊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蓬勃发展阶段。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各项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广大农民对农业科学技术产生了迫切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各地农民报纷纷复刊或创

刊,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科技知识、提供信息为己任,深受农民的欢迎,发行量节节攀升。

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艰难爬坡阶段。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我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时候,一个突出的矛盾摆在了农民面前:增产不增收,到20世纪90年代末表现尤为明显。对此,一些农民对土地的钟爱程度渐低,资金、技术的投入积极性越来越小。因此,对以传播科技知识为主的农民报也兴趣不大了。各省的农民报开始进入爬坡阶段,发行量逐渐降低。时至今日,这种艰难爬坡阶段仍未从总体上得到根本的改观。如1993年全国邮发报刊的发行,晚报、经济类报有较大幅度上升,而农林牧类报却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超过20%。《北京日报郊区版》1992年的发行量达40万份以上,1993年下降了近10%,保持近37万份。在连续几年的报刊大战中,农民报和农村报且战且退,而真正独立的农民报只有中央级《农民日报》一家,其发行量也只有14万多份,还不到《参考消息》的5%。<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初的乡村报刊大战中,东北地区辽宁、吉林先后停办了农村报,1998年初贵州将农村报改成城市报纸,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成立时省报主办的农村报有20多家,到1998年只剩下11家。<sup>②</sup>

据统计,在2007年,除中央级的《农民日报》外,省级乡村报只有17种,且都面临发行难、创收难、影响力小等问题,农民也很难从中获得需要的信息。“九亿农民能看哪张报”已经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乡村,中国直接服务于占总人口70%的农民的报纸仅四五十种,这些报纸又很少能进入普通农户家,农民平均千人拥有报纸量不到1份。<sup>③</sup>

乡村报刊萎缩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乡村报刊发行量低的原因在于出版周期长、时效性差、舆论监督难、内容“小而全”等,解决办法是要充分发挥优势,促进劣势向好的方面转化;第二,乡村报刊的特色不明显,地域性不强;科技文章内容缺少新意,反映第一手资料与最新科研成果的少;信息传递时效性差,导致信息滞后;读者意识、服务意识不强;第三,2000年后,乡村出现“报荒”,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增收缓慢,购买力有限,报价不断提高也让农民很难买得起报纸。另一方面,媒介忙于追逐经济利益。目前,我国乡村居民社会购买力不到全社会总额

① 张成文:《农民报何去何从——写在报刊征订大战之后》,《新闻采编》1995(2)。

② 钟玉明、李亚彪:《九亿农民能看哪张报——农村“信息孤岛”现象,成为城乡又一种大差距》,《瞭望》2006(6)。

③ 张从春、徐一化:《中国农村“报荒”的成因与对策》,《新闻爱好者》2007(1)。

的40%，广告商多不看好农民的消费需求，农村广告市场相对低迷。<sup>①</sup>而乡村采集新闻和发行报纸成本较高；第四，农民青壮劳力的转移，都市报等的崛起，造成乡村报刊的困境；第五，乡村报刊在报纸向市场化转型中应对性不强。要摆脱发展困境，根本出路在于以差异化拓展生存空间，突现报纸特色，细分市场，找准突破口，坚持多渠道发行。

#### 四、互联网和手机媒体

##### (一) 互联网

1997年6月3日，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宣布成立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同时发布了《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和《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此举将使我国的网络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随着个人电脑和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1997年开始，互联网开始了进入普通家庭的历程。同时，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日渐广泛和深入，互联网已经成为乡村信息化体系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使互联网真正惠及“三农”，进一步推动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国互联网协会于2007年12月19日在北京宣告成立了农村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

就乡村网民规模而言，截至2008年底，乡村网民规模已达到8460万人，年增长率超过60%，远高于城镇网民35.6%的增长率。与2007年相比较，在2008年新增的8800万网民中，新增的乡村网民有3190万人，乡村互联网持续快速发展。<sup>②</sup>

对比2007年中国网民的城乡结构，2008年中国网民中乡村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互联网正在不断向乡村地区渗透。如图5-1所示，乡村网民的数量增长迅速，比例超过60%。而乡村网民与城市网民相比，与2007年相比，由占总网民人数的25.1%增长到28.4%。

随着互联网在乡村的普及和网民人数的增加，互联网对乡村社会的传统思维模式的改变正在悄然发生，从生活助手、信息渠道、交往工具、社会隔离、网络信任与安全和社会参与方面相比，比例超过10%的有两项，一是在交往工具方面，在回答“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这一问题时，城市网民认同度为62.9%，乡村网民的认同度为72.5%；另一项是信息获取渠道方面，在回答“对

<sup>①</sup> 钟玉明、李亚彪：《九亿农民能看哪张报——农村“信息孤岛”现象，成为城乡又一种大差距》，《瞭望》2006(6)。

<sup>②</sup>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8—2009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调查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网，2009年1月16日，<http://research.cnnic.cn/html/1245139584d654.html>，第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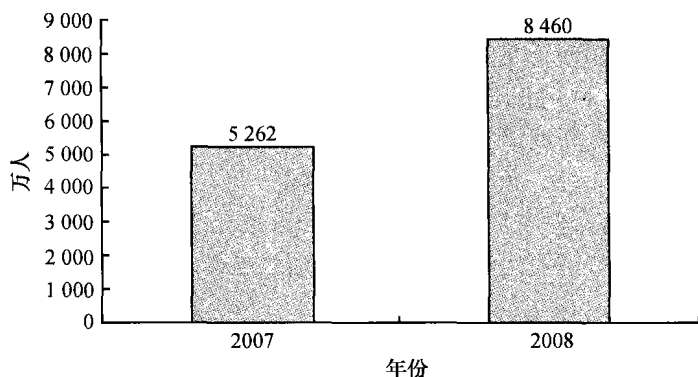


图 5-1 2007—2008 年中国乡村网民规模对比

资料来源:秦英:“中国农村网民规模增长迅速 高达 6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research.cnnic.cn/html/1244706796d611.html,2009 年 1 月 16 日。

遇到重大问题时,我首先会从网上找答案”这一问题时,城市网民的认同度为 67.3%,乡村网民的比例为 57.5%(见表 5-2)。这也与城乡社会之间的人际交往状态和社会价值系统相关联。

表 5-2 城乡居民对互联网在生活中的认同度比较

| 分类      | 语句                | 城镇认同度 | 农村认同度 | 总和    |
|---------|-------------------|-------|-------|-------|
| 生活助手    | 离了互联网,我无法工作、学习    | 39.6% | 37.3% | 39.0% |
|         | 没有互联网,我的娱乐生活会很单调  | 59.6% | 57.9% | 59.1% |
|         | 网上办事减少了我很多亲临实地的麻烦 | 70.5% | 66.0% | 69.3% |
| 信息渠道    | 重大新闻我一般都首先从互联网上看到 | 63.4% | 57.5% | 61.8% |
|         | 遇到问题时,我首先会去网上找答案  | 67.3% | 57.5% | 64.6% |
| 交往工具    | 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 62.9% | 72.5% | 65.4% |
|         | 互联网加强了我与朋友的联系     | 81.7% | 84.9% | 82.5% |
| 社会隔离    | 互联网时代,我感觉更孤单      | 19.2% | 22.1% | 19.9% |
|         | 互联网减少了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 28.5% | 30.6% | 29.0% |
| 网络信息与安全 | 我在互联网上填写注册信息是真实的  | 48.2% | 45.7% | 47.5% |
|         | 在网上进行交易是安全的       | 29.3% | 22.9% | 27.6% |
| 社会参与    | 互联网是我发表意见的主要渠道    | 40.9% | 44.5% | 41.9% |
|         | 上网以后,我比以前更加关注社会事件 | 76.6% | 77.6% | 76.9% |

资料来源:2008—2009 年互联网研究报告系列之《中国农村互联网状况调查报告》,第 23 页。

在乡村互联网建设方面,2008 年,全年共为 593 个乡镇提供上网接入、601 个乡镇开通宽带,目前全国 98% 的乡镇能上网、95% 的乡镇通宽带,全国有 27 个省份已经实现“乡乡能上网”;共为 12364 个行政村开通互联网,全国能上网

的行政村比重达 89%，已有 19 个省份基本实现行政村“村村能上网”。<sup>①</sup>

乡村网民上网时间为每周 13.1 小时。新闻信息浏览、搜索引擎应用和网络求职应用等都是农村网民信息获取的重要方式。目前，中国乡村网民中有 68.7% 的网民使用互联网浏览新闻信息，比城镇低 13.6%。2008 年，乡村搜索引擎用户净增长了 1976 万人，增长率超过 60%。<sup>②</sup>

就上网地点而言，对于乡村网民，网吧与家庭几乎居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网吧成为乡村网民进行网上生活的重要场所，随之也带动了乡村网吧经济的繁荣。8460 万农村网民中，网吧网民人数已达到了 4585 万人，年增长率达 79.7%。其中，只在网吧上网的网民占农村网民总体的 9.3%，约有 787 万人。对乡村网民而言，网吧和家庭网吧而言，几乎同等重要。<sup>③</sup>

尽管如此，“数字鸿沟”不仅仅存在于城乡之间，也存在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城镇居民的互联网普及率是 35.2%，乡村仅为 11.7%。乡村网民分布的区域差异更为明显，超过 50% 的乡村网民集中在东部乡村地区，但与 2007 年相比，东部地区的网民所占比例降低了 8.5%，而中部地区上升了大约 7.9%，西部地区网民比重也有所增长。<sup>④</sup>

综上所述，政府和相关企业不仅应该在乡村互联网设施、乡村网络教育内容、乡村网民互联网的认知度方面进行系统性的信息传播和培训工作，而且应该在家电下乡、文化下乡、技术下乡等系列活动中，加强乡村互联网的相关信息的传播活动，使得互联网能够成为推动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的有力助推器。

## （二）手机

In-Stat 公司于 2009 年发布的报告《农村市场——手机终端的另一个蓝海市场》显示，目前，全中国 6 亿多的移动通信用户中只有大约 30% 是乡村用户，乡村移动电话普及率仅在 20% 多。而从运营商近两年的新增用户结构来看，乡村用户已经占到新增用户的 50% 到 70%。乡村市场无疑已经成为未来几年移动通信市场的主要新增力量。因此，电信运营商、手机厂商、芯片厂商，都已经开始关注乡村市场，希望能够挖掘乡村用户对移动通信的需求，激发乡村居民的购买力，从而开拓出一个巨大的移动通信蓝海市场。

研究指出：（1）乡村移动通信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还有 5 亿多的乡村人口没有使用移动通信服务；（2）在乡村市场，山寨手机和超低成本手机有较大市场

①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8—2009 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调查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网，2009 年 1 月 16 日，<http://research.cnnic.cn/html/1245139584d654.html>，第 7 页。

② 同上书，第 19—20 页。

③ 同上书，第 26—27 页。

④ 同上书，第 6 页。

潜力。山寨机可以满足大部分农民工和部分乡村中产阶级的需求,覆盖大约 2 亿左右的乡村用户;而“超低成本手机”可以满足部分农民工和大部分普通农民的需求,能够覆盖 3 亿左右的普通农民用户;(3) 乡村移动通信市场的快速发展将给电信运营商、手机厂商、芯片厂商带来一个新的蓝海市场。In-Stat 预计到 2012 年乡村移动用户将超过 4 亿人。<sup>①</sup>

就手机上网而言,2008 年是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增长最多的一年。目前,手机上网在广大乡村地区的渗透率高于城镇,但由于乡村网民规模远低于城镇,因此乡村手机上网的用户规模和城镇依然有一定差距。截至 2008 年底,中国手机上网用户达到 1.2 亿,城镇手机上网用户 7 789 万人,占城镇网民总体的 36.5%。乡村手机上网用户约为 4 010 万人,占乡村网民比例的 47.4%,显示出手机对乡村市场的巨大影响力。<sup>②</sup>

## 五、乡村影视

### (一) 乡村电影与电视剧

电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产物,也诞生于城市。“五·四”之后,对社会问题的研究蔚然成风,知识分子面对着由于历史沿革而无可避免的最广大的地域(农村)和最多的人口(农民),也就必然地关注到与自己的生活有着一定距离的遥远乡土。而真正把力求使电影与农村结合起来的努力作为一种理论或一种口号提出来的,是田汉倡导的“到民间去”。田汉对 19 世纪俄国近代文艺中俄国青年所谓的“到民间去”运动十分认同:“要全然与大海同化,便非投入大海之中不可,一旦投入大海之中,与之同化,要使大海巨潮向所当向的方面而趋当然不成问题”。<sup>③</sup> 伦理与爱情的主题是当时乡村电影的核心主题之一,但无论是用伦理还是爱情做包装,每一个文本都鲜明地体现出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电影人在美化着乡村的同时也控诉着城市。伴随着当时的历史背景,革命与抗日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乡村电影的主题之一。<sup>④</sup>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中国电影在诞生之初正面表现农村景况的影片只有但杜宇的《重返故乡》和卜万苍的《桃花泣血记》。在其他一些影片里也有一些乡村表现空间,但更多的影片是把乡村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还有的影片甚至将农

<sup>①</sup> 《In-Stat:农村手机市场有待挖掘》,通信产业网,2009 年 4 月 1 日,http://www.ccidcom.com/html/chanpinjishu/zhongduan/200904/01-59597.html。

<sup>②</sup>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8—2009 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调查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网,2009 年 1 月 16 日,http://research.cnnic.cn/html/1245139584d654.html,第 30—31 页。

<sup>③</sup> 杨元婴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文化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8—159 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 162 页。

民对城市的陌生和惊讶作为笑料加以嘲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狂流》(1933年)、《春蚕》(1933年)、《铁板红泪录》(1933年)、《中国海的怒潮》(1933年)、《盐潮》(1933年)、《渔光曲》(1934年)等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土豪压迫、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势力渐趋渗入下的悲惨人生和痛苦挣扎。

建国初期,乡村不仅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地,还是展示精神文化生产的核心领域,乡村电影成为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乡村电影的创作趋势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时掀起了热潮,首先在“为亿万农民服务”文化方针的指导下,乡村放映网得到迅速发展,农民有更多机会观看影片。这一时期的乡村电影“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真实、朴素、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这一点是以后任何时期的电影所无法比拟的”<sup>①</sup>。

建国后,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相应形态的银幕上的“农村故事”:大跃进时期的《五朵金花》(1959年)、《咱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人民公社时期的《李双双》(1962年)、《枯木逢春》(1961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人生》(1984年)、《喜盈门》(1981年)、《乡音》(1983年)、《野山》(1985年)、《老井》(1987年)、《一个都不少》(1998年)等,建国以来电影中的“农村故事”,就是一部新中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形象历史。<sup>②</sup>

改革开放30年来电影中的乡村故事则是一部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首先是对20世纪历史场景和社会发展状况的背景中展开的,代表性作品如《柳暗花明》(1979年)、《笨人王老大》(1980年)、《月亮湾的笑声》(1981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1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年)等等,这些以“文革”为背景的农村电影借助现实主义的常规叙事手段,通过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自然质朴的表演风格、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展示了特殊历史时期在乡村发生的种种艰辛和困苦,也处处体现出人们顽强的生存信念、丰富的情感追求和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其次,对“文革”反思题材的乡村电影出现了,这些电影多以知情下乡之后所造成的社会错位和对人本身的思考为契机来展开,如《我们的田野》(1983年)、《牧马人》(1982年)、《芙蓉镇》(1986年)等,同时第五代导演开始崛起,主要代表作有:陈凯歌的《黄土地》(1984年)、张艺谋的《红高粱》(1987年)、吴天明的《老井》(1987年)等。

改革开放中期的乡村电影在艺术观念、价值取向、风格类型和文化功能上也出现了新的分化。还出现了一个以第五代导演为主的电影创作群体,其作品以

<sup>①</sup> 舒晓鸣著:《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sup>②</sup> 参见贾磊磊:《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见酆苏元、胡克、杨远婴主编:《新中国电影50年》,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展现中国乡间婚嫁风俗为主题,但这些看似带有纪录性质的民俗风情并不是对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是一种经过浪漫化、奇观化处理过的民间景观。这种图解式的改造行为一方面源于中国电影为了获得世界认同而采取的商业和文化策略,另一方面也源于创作者对民间传统情境的另类理解。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乡村电影市场也逐渐铺开,乡村的发行放映管理等问题开始得到相应重视,如何在乡村深化电影行业体制改革,更新观念,转变经营方式,巩固和开发乡村电影市场,解决电影放映收费等问题,成为中国开拓乡村电影市场的重要改革措施。<sup>①</sup>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乡村电影有:《背着爸爸上学》(1998年)、《喜莲》(1996年)、《九香》(1995年)、《一个都不能少》(1998年)、《留村查看》(1994年)、《山神》(1992年)等等。

但是随着城市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乡村题材电影的地位与影响日益边缘化,甚至成为主要依靠政府资金扶持的对象。比如,1989年、1990年、1991年连续三年乡村题材电影都只有七八部,1997年农村题材电影只有四五部,成为自1981年以来的最低谷。1999年以后,随着电视电影这一新的媒介与艺术形式的兴起,平均每年生产的乡村题材影片大约20多部,占全年故事片生产总量的15%左右。<sup>②</sup>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普及和深化,乡村电影市场走向滑坡,主题和风格也发生了转向。

年》、《天高地厚》、《走进石锁沟》、《美丽的田野》、《都市外乡人》、《别拿豆包不当干粮》等电视剧热播荧屏。2005年出现了《圣水湖畔》，2006年推出了《老娘泪》、《插树岭》等作品。2007年以来，陆续播出了《乡村爱情》、《乡村名流》、《清凌凌的水蓝盈盈的天》等。

21世纪以来，很多优秀的乡村题材的电视电影涌现，像《欢乐树》“法官老张轶事系列”、《村官过大年》、《王长喜来了》等电视电影，借助电视这个平台，用电影的形式传递出最鲜活的乡村信息，体现了乡村电影电视发展的新趋势。

## （二）乡村纪录片与参与式影像学的兴起

### 1. 乡村纪录片

中国纪录片的崛起，与大众文化的现状有着深厚的联系，一个最明显的表征便是中国纪录片的崛起是在电视中完成的，而没有像国外那样以电影为纪录片的主要载体。中国的纪录片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作为一个自觉的整体初次亮相并获得成功，正是因为纪录片通过描述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没有优势的非主流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亚文化群落，关注他们作为现实存在的人的生存情感需求使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成了纪录片的另一个名字。<sup>①</sup>因此，“文革”前的电视纪录片主要以新闻纪录片为主，兼有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录片，以及带有浓厚教化色彩和政治倾向的题材的政论片。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的纪录片，《丝绸之路》、《话说长江》、《望长城》等影响较大。总体而言，80年代的纪录片大多以大型纪录片为主，追求宏大叙事，很少将视点对准普通的小人物，不管在结构上还是在表现视角上都显露出宏伟的气魄，虽然其间也出现了一些有较强平民意识的短纪录片，但由于播出缺乏连续性，影响不大。同时，电视栏目纪录片开始出现，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省级电视台都创办了纪实栏目。

### 2. 参与式影像学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参与式影像伴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所自主的农业项目、林业项目等作为一种工作方法进入中国。1991年，福特基金会在云南资助了一个“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的项目，53位农村妇女自己拍摄她们的生活场景，用照片故事表达她们的诉求，以影响生育健康的决策。继此以“照片之声”（photo voice）命名的项目之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进行的参与式影像实践逐渐推开。2000年9月，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云南大学开始了“社区影视教育”的行动项目。<sup>②</sup>研究者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三个村子请村民

① 吕新雨著：《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7页。

② 邓启耀：《视觉表达：2002》，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拍摄他们自己的生活,然后做成VCD,再送回村里,由当地人自己开展关于本土文化的教育。2001年,欧盟与中国合作开展了“中国村庄可持续前景”项目,在中国六个省市选定七个小城镇和乡村,从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寻找每个社区的未来发展之路。其中在陕西姜家寨、河北北苏闸、云南三元村三个试点村展开了村民参与式DV影片的拍摄。项目组对挑选的男女村民进行DV拍摄技巧培训,他们分别以妇女权益、老人赡养、农民增收、环境保护、村民价值体系以及如何实现村庄的现代化等为主题,记录村民的想法,制作了名为《北苏闸》、《姜家寨》、《三元》的三个参与式影像系列。村民自编、自导的社区影像在公共场所给村民们放映,反响强烈,并得到了项目研究人员的广泛好评。<sup>①</sup>以影像生产为主要媒介和参与方式的乡村文化建设,为村民找到新的娱乐方式和快乐维度,成为一种凝聚人心的方式。在一个个民间小叙事中,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群体需要来建构自己的文化资本,增强文化自信。民间影像的生产与传播日渐成为一种大众参与的仪式性行为,村民在其中形成了公共文化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意义与快感也随之得到生产和传播。<sup>②</sup>

2007年,另一个更大的参与式项目“乡村之眼——自然与文化影像纪录项目”正式启动,这个由环保组织“保护国际”资助的项目将支持6个来自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的6个乡村社区拍摄自己的短片,帮助当地人用自己的视角,记录西南山地乡村传统的文化与自然保护模式,面对的冲击和变化,以及村民如何通过参与式的方法进行讨论。

总而言之,参与式影响学的视角将村民视为乡村发展的主角,借助新媒体手段将触角深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除了上述的国际合作项目之外,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些短片在网络上也开始出现了,这种新媒体的形式正在以特有的性质改变着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趋势。

## 第四节 中国乡村大众媒介的生态环境

### 一、乡村大众媒介生态特征

#### (一) 乡村信息报道内容的“非农化”与媒介报道话语的误导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排斥性与兼容性决定了乡村社会在大众媒介报道视野中的角色和位置。同时,媒介从业人员对乡村社会

<sup>①</sup> 韩鸿:《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新闻大学》2007(4)。

<sup>②</sup> 韩鸿著:《民间的书写 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194页。

报道内容的“非农化”<sup>①</sup>和不准确的状况,不仅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例如:2006年10月18日,有媒体报道称“香蕉被加工化学剂催熟”,在报道中,作者把香蕉生产过程中正常的生理催熟环节人为地演绎为:存在安全隐患的化学加工过程;2007年3月13日,广州《信息时报》推出广州香蕉感染“蕉癌”的重头报道,把原本和香蕉根本不搭界的医学词汇“SARS”和“癌症”联系在一起。在标题制作中采用了“蕉癌”、“灭绝”、“致命”等词汇。接着文章中又使用了“昔日万亩蕉林今日全无踪影”、“幸存香蕉树几年内将枯亡”、“封锁不及时病毒四处蔓延”、“蕉农为操旧业背井离乡”等小标题,正文中使用了“枯亡”、“病毒蔓延”、“蕉癌”、“香蕉世界的SARS”等词语。但是报道没有说清楚巴拿马病毒是否会影响人类健康,也未表明成熟的香蕉是否带“毒”。文章刊登后,许多网站转载,“蕉癌”谣言四起,很多人误以为吃香蕉会得癌症。2007年3月20日,《广州日报》曝光了12种常吃的“毒”水果,香蕉也赫然列入其中。海南香蕉从3月20日前平均2至3元/公斤一路走低,最低收购价仅0.3元/公斤,海南香蕉产区每天运销岛外的香蕉更是从原来的7000—10000吨一下子锐减到3000多吨。2007年3月31日,一则“香蕉用氨水或二氧化硫催熟”的报道更是违背事实。2007年5月份,一条关于香蕉的短信开始在全国传播开来,使得海南的香蕉产业又遭受打击,一些地方香蕉价格又下降到0.1元/斤。

正如《光明日报》记者蒋玉生调查所说:

“回来看看报纸,对对农事,才发现我们的农业科技是‘科技户’、‘专业户’不过瘾,一般的农户又不看。有一次,我发现我市不少地方种葡萄,于是我跑到农科所、柑橘研究所(该所也种葡萄),请专家写了好几篇关于葡萄栽培技术的稿子,为了赶上农时,还采取调版面的办法,及时将稿件发了出来。这次回老家特意问起此事,可是种葡萄的乡亲说:‘那点东西种葡萄的知道,不种的不感兴趣’”<sup>②</sup>。

“有一年,市委、市政府发动群众稻田养鱼,时任报社经济生活部主任的我,发动部里的记者找资料,访专家,发了很多介绍稻田养鱼知识的稿件,可家乡的父老不相信我们的介绍,他们只相信他们看到的。他们稻田养鱼的技术是熟人口口相传的,是请来的技术员手把手传的。也不是乡亲们不相信我们的科技栏目,‘非典’时期我们介绍的预防方法,他们无一例外地

<sup>①</sup> “非农化”在这里的含义是指:(1)报道内容涉及的是乡村社会的问题,但却在客观上与乡村社会发生的现实无关或错位;(2)报道内容的受众定位是城市受众,而不是乡村受众。

<sup>②</sup> 蒋玉生著:《新闻有道》,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接受了。科技讲究系统,每一项技术前后相关,报纸、电视那种且听下回分解的介绍,不如不看”<sup>①</sup>。

“有时新闻单位也组织走进农村的报道,笔者也参加过此类报道活动。此类报道活动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可农民并不买账。……有一次,我说我参加了我们单位‘走村串户看农村’的报道活动。儿时的伙伴笑我说:‘你们在城里住久了,是到农村散散心。’‘你们是到农村秀一回。’……我参加‘走村串户看农村’的报道,确实走了好几个县,也写了不少的报道:专业户、专业村以及农村新貌等。这些报道对城里的人也许新鲜,但对农民来说,就无关痛痒。‘那点东西我们见多了,还有更新奇的你们没发现’”<sup>②</sup>。

换言之,媒介对乡村的报道活动看似在城市社会中热闹非凡,对村民而言则基本是无用的。所谓的乡村新现象,对他们而言只是无关痛痒,甚至与现实脱节;而乡村科技新闻报道,理应是既源自于乡土知识中,又高于乡土知识才会为村民接受。否则大众媒介报道系统的内容即使是媒介从业人员花费了很大力气,依然是“非农化”的报道,同时也是“非城市化”的报道,村民不看,认为无用,城市市民看了觉得与自己无关,与城市生活也无关。这样的新闻报道最后变成了既非乡村也非城市的报道了。

## (二) 大众媒介的报道视野与想象的乡村与城乡关系

与无关痛痒的媒介报道相关的是大众媒介对乡村社会的整体想象,总体而言,主流的报道语言内容多为对乡村进步与发展的歌颂,小康村的形象越来越多地被大众媒介所树立并放大,因此造成了大众媒介对乡村歌颂式的塑造现象普遍化,富裕的新农村现象成为报道的主流话语。

这里以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的报道内容进行说明。宏观而言,媒体并没有完整和客观地反映农民工的利益、需求和生活处境。目前新闻媒介对农民工的报道,在报道规模、报道质量和议题设置上存在着话语权萎缩和媒介镜像被污名化、妖魔化倾向,加深了社会主流群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刻板成见,也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国内媒体所建构的农民工形象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sup>③</sup>从近两年频频发生的农民工“跳楼秀”事件可以看出,农民工话语空间的被限制、话语的被掩盖、被扭曲的现象,媒介应为农民工立言。<sup>④</sup>针对当前农民工报道出现的种种问题,建议媒体为农民工留出更多的版面和频道时间,为农民工提供更多更

① 蒋玉生著:《新闻有道》,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② 同上书,第248页。

③ 参见陈文高:《当代农民工媒介镜像批判》,《学术交流》2007(5);雷涛:《媒体农民工报告分析》,《中国科技信息》2005(11)。

④ 卫凤瑾:《大众传媒与农民话语权——从农民工“跳楼秀”谈起》,《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2)。

好的服务信息,同时对农民工的报道角度不能太单一,应该有一个全面综合的观察角度。强调媒体在更好地引导农民进城,为他们在城市营造一个良好的劳动和生活环境,做好对他们的服务等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大众传媒在报道中被社会主流偏见所影响,并自觉不自觉地传播着这种偏见。研究显示,卷入“农民工议题”新闻场的四个主体,即农民工、政府、城市市民和雇主,后三者对媒体的话语实践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力,唯独处在议题中心的农民工,“它唯一的资本就是其本身的遭遇带来的话题,它对议题的影响和积极的塑造能力却相当薄弱。他们总是在被看、被讨论、被塑造……一个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却与其本身的积极主动的参与无关,这就是农民工在新闻场中的尴尬地位”<sup>①</sup>。

总体而言,三农问题报道的边缘化体现在:表现主体的边缘化、所属资源的边缘化、受众群体的边缘化、传播效果的边缘化、行为主体的边缘化。<sup>②</sup>即乡村受众在大众媒介报道中是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是被动型的受众,媒介资源掌握在城市主流群体手中,乡村社会在拥有媒介资源的领域中是处于边缘地位的,这两种边缘化的状态必然会弱化或降低大众媒介相关报道在乡村社会中的传播效果,从而弱化了大众媒介报道内容与村民之间的联系和纽带。而“乡村居民对作为现代性及其产物的大众传播媒介或漠视、或抛弃、或迎合或意见分歧,表现出种种出人意料的独特性”,<sup>③</sup>这种报道视野和想象中的城乡关系,势必会减弱大众媒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也会削弱大众媒介报道内容在村民心中的信任度。这一点,理应成为乡村传播学关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命题之一。

## 二、改变乡村大众媒介生态状况的建议

### (一) 以点带面促进乡村媒体发展

1996年由农业部和中央电视台合办、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承办的央视七套农业节目正式播出,对全国农业节目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最新调研显示,截至2008年3月CCTV-7乡村地区覆盖人口近5.2亿,覆盖率高达63.2%,在中央电视台15个卫视频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有84.4%的CCTV-7乡村地区覆盖人口通过省、市、区/县级有线电视公共网收看CCTV-7;CCTV-7在乡村地区月到达人数为4.2亿,月到达率达50.9%,高出

<sup>①</sup> 乔同舟、李红涛:《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体投影》,《新闻大学》2005(4)。

<sup>②</sup> 李仕权:《表面繁荣下的边缘化实质——对三农问题报道热的冷思考》,《声屏世界》2005(10)。

<sup>③</sup> 连水兴:《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下: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媒介形态与观念研究》,2007年“媒介新生态与电视发展”两岸三地学术高峰论坛提交论文。

中央电视台 15 个卫视频道乡村地区平均月到达人数近 5 000 万,高出平均月到达率 6 个百分点;CCTV-7 在乡村地区稳定观众人数达 6 600 多万,忠诚度约 15.8%;CCTV-7 在乡村地区喜爱人数超过 3 500 万,喜爱率达 6.8%。CCTV-7 主要栏目在乡村地区的收视人口均超过 1 亿,收视比例均达 25% 以上;稳定观众人数均超过 1 400 万,忠诚度均高于 10%;喜爱人数均超过 2 500 万,喜爱率均在 20% 以上;《致富经》与《乡村大世界》栏目的收视比例、忠诚度与喜爱率在 12 个乡村农业类栏目中均位居前列(见表 5-3)。<sup>①</sup>

表 5-3 CCTV-7 主要栏目在全国农村地区的收视状况

| 栏目名称   | 观众数(万人)  | 比例(%) |
|--------|----------|-------|
| 致富经    | 19 829.0 | 47.4  |
| 乡村大世界  | 16 636.8 | 39.8  |
| 乡土     | 15 041.4 | 36.0  |
| 科技苑    | 14 790.4 | 35.4  |
| 每日农经   | 14 381.5 | 34.4  |
| 聚焦三农   | 13 934.1 | 33.3  |
| 阳光大道   | 13 037.1 | 31.2  |
| 法制编辑部  | 12 356.0 | 29.5  |
| 天天饮食   | 11 870.9 | 28.4  |
| 农广天地   | 11 564.9 | 27.6  |
| 生活 567 | 11 179.2 | 26.7  |
| 乡约     | 10 738.0 | 25.7  |

数据来源:北京美兰德媒体传播策略咨询有限公司。

因此,借助中央电视台七套农业节目的优势地位,以点带面带动其他乡村媒体的发展,是改变乡村媒介生态环境的路径之一。

## (二) 技术创新与乡村媒介生态环境的改变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还有 77.6 万个广播电视“盲村”,5 000 多万人收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就有线电视而言,乡村入户率才 17% 左右。数字电视在城市已进入推广阶段,而在乡村,有线电视网络建设才起步。就电影来说,全国乡村基本上没有固定影院,相当多的乡村还是电影放映空白点。从这些情况来看,乡村广电公共服务还处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普及阶段。此外,广播影视基础设施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许多地方无线广播电视设备陈旧、短缺、功率低、传输效果不好、传输节目套数少。小片网传输质量差,有线网络覆盖水平低。乡村电影的放映设备陈旧,16 mm 放映机声光效果差、拷贝少、影片陈旧,缺乏吸引力,许多地

<sup>①</sup> 《2008 年中国农村居民媒介接触习惯与广告传播价值新探索》,《市场观察》2008(5)。

方没有固定放映的地点,即使有也基本上瘫痪或者废弃。<sup>①</sup>

而国家实施的“村村通”工程和乡村电影放映过程,由于初期采用传统技术,工程推进进展缓慢,效果欠佳,村民热情不高,“村村通”工程出现了“返盲”现象,乡村电影放映面难以扩大,技术创新改变了这一局面。在广播电视方面,统筹无线、有线、卫星等多种技术手段,在乡村因地制宜推行无线覆盖、有线联网和卫星覆盖,三者并用,使得乡村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得以迅速发展,收听收看效果得到显著提高。在电影方面,数字电影流动放映开创了乡村电影发展的新时期。原来的胶片放映变成数字放映;原来的影片逐级发行变成了总发行机构到放映点的直接发行;发行手段由拷贝的传递变成了卫星传输,乡村电影放映技术和效果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为乡村电影放映的普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sup>②</sup>

### (三) 借助新媒体力量,推动乡村社会发展

随着新媒体在乡村的普及,其对乡村社会转向的作用也渐渐凸显出来了。那么,如何借助新媒体的力量,以推动乡村社会发展,从而改变乡村大众媒介的生态环境呢?这其中涉及到一个乡村信息化如何迅疾实现的问题,实践证明,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

#### 1. 乡村信息化的成败还是取决于农民与企业的双向选择。

2009年7月14日,农业部与中国移动在北京签订了“共同推进农业乡村信息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协议中,双方达成了包括农业产业化改造、农业生产经营信息服务、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信息技术应用、农业生产指挥调度系统建设在内的五项合作共识。未来三年,中国移动将投入700亿元,用于乡村基础通信网络和信息化建设。这种“政企联动、着眼长远、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的合作原则与合作方式,代表了今后的乡村信息化发展模式。

首先采用“阵地战”模式:在中国移动与农业部的合作中,将采取一种类似于“阵地推进”的方式,双方将共同选择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农业省作为试点,给予相应的政策、资金等支持,按照“成熟一个、推广一个”的原则推动农业信息化试点工作在全国的推广。农业部将大力支持基于TD-SCDMA移动通信技术在全国各级农业部门的应用,特别是用于提升政务信息化水平,建设办公自动化、视频会议、基层电子政务平台、全国应急指挥调度等系统。同时,中国移动承诺,在乡村基础通信建设方面,计划每年实现一万个以上自然村的网络覆盖,确保全国行政村通信覆盖率达到100%,自然村的通信覆盖率达到98%以上。乡村信

<sup>①</sup> 杨明品:《当代农村影视公共服务建设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参见李景园、陈威主编:《中国文化服务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95页。



息化的成败还是取决于农民与企业的双向选择。<sup>①</sup>

2. 在乡村中大力普及互联网技术,提高村民利用网络获得相关生活和技术信息的能力。

2009年第24次互联网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09年6月,中国城乡网民比例与2008年底保持一致,乡村网民占比略有上升。目前乡村网民规模达到9565万人,其中14.8%在过去半年内访问过乡村、农业类网站。网民中农林牧渔劳动者使用农村、农业类网站的比例为42.7%。在访问过涉农网站的网民中,CNNIC调查了查找农资信息、查找种植养殖信息、查找产品供求信息这三种应用行为,调查结果显示,三种应用的使用比例分别为41.6%、40.4%、39.6%。<sup>②</sup>

就比例而言,乡村网民人数比例在稳步上升,但利用网络访问相关农业网站、查找相关乡村技术信息的比例较低。因此需要综合提高村民的媒介素养能力,从而才能更好地拓展新媒体的影响力。

(四) 提升村民的综合媒介素养是改变乡村大众媒介生态环境的关键

#### 1. 村民媒介接触行为

调查显示,乡村媒介接触行为呈现为电视—广播—报纸的序列模式。这种过渡模式在一些地区正在向电视—报纸—广播这一成熟模式转向。<sup>③</sup>就媒介接触内容而言,电视剧和新闻是两大主题。主要以收看中央台和省级卫视为主。广播接触的内容也与电视大致一致,新闻和天气预报占的比例较大。

#### (1) 获取媒介信息渠道

科技部乡村技术开发中心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乡村基层和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计算机网络、电话、宣传资料和乡村科教VCD、乡村图书馆等大众传媒,以及专业协会和信息中介、政府农技推广部门,还有同批发市场、集市、邻居、朋友、亲戚、农村能人的人际交流与沟通等(见图5-2)。

对于村民来说,电视是典型的“情感娱乐型”媒介,而报纸是典型的“新闻资讯型”媒介,杂志偏向于“情感娱乐型”,广播则偏向于“新闻资讯型”。15.9%的受访者对大众媒介几乎没有依赖,14.3%的受访者依赖很轻微(5—7天),其余69.6%的受访者比较依赖及非常依赖大众媒介。<sup>④</sup>

<sup>①</sup> 《解读移动700亿投入农村信息化》,通信产业网,2009年7月16日,http://www.ccidcom.com/html/yunyingshang/200907/17-70607.html。

<sup>②</sup> 《第2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9年7月16日,第34—35页,http://www.cnnic.net.cn/index.htm。

<sup>③</sup> 张国良、廖圣清:《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调查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00(7)。

<sup>④</sup> 强月新,张明新著:《转型社会的媒介景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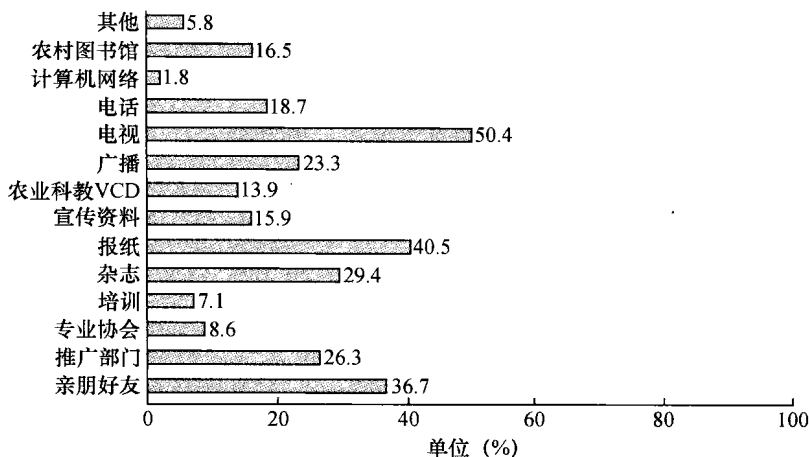


图 5-2 农民信息获取渠道比较

资料来源:王文生等著:《中国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与机制研究》,北京:经济科技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3 页。

电视是乡村消费者主要信息传播媒体:调查表明,超过 1/3 的乡村消费者没有经常收看的电视频道,而有 33.8% 的被访者认为中央一台是他们最常收看的频道,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较强的可看性(电视信号覆盖范围广);其次是省级和县市级电视频道。中央台其他频道和卫星电视频道收视率较低,仅有 2.7%,其原因并不是对所播放内容不感兴趣,而是由于受乡村电视信号接收条件所限制。如中央二台、七台的农业节目很受农民欢迎,就是信号太弱,难以收视。

调查数据显示,46.36% 的乡村家庭比较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另有 43.55% 的乡村家庭喜欢看省级电视台的节目,其中一部分表示既喜欢中央电视台也喜欢省级电视;31.7% 的乡村家庭选择看市级电视台的节目;对于县级电视台则很少有人间津,只有 5.82% 的乡村家庭喜欢看县级电视台。<sup>①</sup>

## (2) 获取媒介信息内容

就电视内容来看,调查显示,选择家庭情感生活片的占 38.4%,选择侦探片和战争片的占 22.9%,选择戏曲的占 29.4%。在这几类片子中,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模式,那就是剧中角色分明、矛盾冲突较为激烈、表现的手法较为简单直接。这类片子一般也是以好人取得最终的胜利为结尾,在观众那里,强化

<sup>①</sup> 吴讯、倪瑜、赵伟清:《中国当代农村电视收视习惯调查报告》,见贾乐蓉主编《新世纪大众传媒的发展:中俄学者的对话》,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70 页。

了一种是非观。<sup>①</sup>表 5-4 显示,农民喜爱的电视节目前三名依次为影视剧 67.36%,新闻 53.73%和文艺晚会 36.27%。就电视台新闻级别来看,村民对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收看热情。调查显示,54.5%的青年农民,64.1%的中年农民,58.4%的老年农民都喜欢看中央新闻联播,并且一致认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最可靠,最真实。农民对中央新闻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国家政策尤其是涉农政策这一块,对国家涉农政策的变动和出台非常敏感,并一致认为当前中央的农村政策很好,“对农民很好”。与这一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对县、市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没有多少收看热情,评价相当低甚至非常反感,农民的说法主要是地方电视台的“新闻不新”,“不真实,很多承诺兑现不了”。农民对中央新闻的高度热情和对地方新闻的冷漠甚至反感,这是当前乡村中的一个现实问题。

表 5-4 农民家庭喜爱收看的电视节目排行

|       |        |      |        |
|-------|--------|------|--------|
| 影视剧   | 67.36% | 谈话类  | 18.65% |
| 新闻    | 53.73% | 戏剧类  | 18.60% |
| 文艺晚会  | 36.27% | 体育类  | 12.60% |
| 法制类   | 32.64% | 科教类  | 9.4%   |
| 监督曝光类 | 32.64% | 其他节目 | 8.29%  |
| 曲艺类   | 27.6%  | 广告   | 2.50%  |
| 娱乐类   | 19%    |      |        |

资料来源:吴信讯、倪瑜、赵伟清:《中国当代农村电视收视习惯调查报告》,见贾乐蓉主编:《新世纪大众传媒的发展:中俄学者的对话》,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71 页。

随着传媒技术的发达,电视频道和电视节目不断增多,农民选择节目的自由度也大为增加。但无论频道有多少,节目多繁杂,农民总是依据其村庄的生活,而非电视节目本身的丰富性选择他们所喜爱的电视节目。农民对电视的选择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依托于其生活的村庄以及村庄的生活伦理。当我们以村庄内部的视角,以农民的眼光来看农民对电视节目的选择时,电视便成为了农民选择中的电视、村庄生活中的电视,而不是新闻学或是传媒意义上的电视。如果没有村庄基础,缺乏农民视角,那将永远无从理解农民与电视的真正关系。<sup>②</sup>

<sup>①</sup> 申瑞锋:《电视下乡:大众媒介与乡村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湖南社会学网 2008 年 10 月 27 日,中国社会学会 2008 年会提交论文, [http://www.hnsh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399&ArticlePage=1](http://www.hnsh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399&ArticlePage=1)。

<sup>②</sup> 欧阳静:《农民如何选择电视节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 2. 村民的媒介素养状况

1992年,美国传媒素养研究中心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人们面对传媒的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性回应能力。简而言之,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服务的能力。媒介素养的内涵应该包括认识大众传媒、参与大众传媒、使用大众传媒三个部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对大众传媒的了解,学会以批判的意识接触媒介的信息;二是掌握与媒介交往的尝试,懂得合理地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媒介素养直接影响媒介的使用能力,而城乡之间知识沟的形成与居民在媒介素养之间的差距有着密切联系。

调查显示,我国乡村一般受众的媒介素养状况具有以下的特点:

(1) 媒介使用的被动性特征。中国乡村一般的受众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在和大众传媒关系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他们被动地接收传媒信息,他们更被动地接受传媒信息,还缺乏对传媒信息的判断和反馈。

(2) 在接受信息方面的从众性行为。一方面,作为同质群体的乡村受众在面对大众媒介信息的时候,因为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的强大作用力,呈现出同一的信息接收行为,例如对某一部电视剧,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口口相传,而使受众在接受这一信息方面呈现出从众的特点。另一方面,共同生活于乡村社会中的群体,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的需要往往也会选择同样的媒介信息来接受。由于中国乡村社会地域性、经济性和文化性等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受众有不同的特点,受众的分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抵挡的乡村现实,换言之,受众接受信息的行为与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文化程度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从众性这一特征在乡村社会受众接受媒介信息方面却表现出一致性的特征。

(3) 接受信息的地域性和文化特征。例如《刘老根》、《胭脂雪》电视剧播放的时候,南方地区和北京地区收视率的显著差异,中国媒介受众的地域性和文化特征,在乡村受众群体上同样表现得较为突出。

(4) 信息接受内容的日常化、通俗化特征。村民从媒介中获取的信息主要是为了满足生活的日常需要,所使用的媒介信息也包含了村民的生活特点,以通俗易懂为主。

就上述状况而言,媒介对乡村的报道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但是大众媒介在村民心目中的认同度较高。在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框架下,农民在体制内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相当匮乏,媒体被理所当然的视为重要的表达渠道。而社会精英对传媒的控制与话语权的把持,又使农民在传媒上谋求利益诉求的通道相当狭窄。社会体制框架的局限和农民过于迫切的表达渴望之间的

拉锯,甚至使媒体和农民之间呈现为一种“畸形”状态,媒体被视为第二个信访部门。<sup>①</sup>作为第二信访部门的媒介,如何更好地以这样的切入点间接促进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或者是目前媒介从业人员可以选择的操作性路径之一。

概括来说,建国初期的乡村传播媒介是国家和基层民众之间互动的桥梁,当时的主要媒介包括人际传播媒介(包括宣传员、传授站、会议、农民俱乐部、剧团、剧场)和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在媒介和基层民众的关系上,媒介自身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着受众的导向。经历了20世纪50至70年代末期的中国大众媒介,在乡村社会中的形态依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尽管广播电视的普及率很高,但为农民设定、农民也愿意观听的节目并不多。报纸杂志延续自身的产业化道路,定位依然与农民无关,内容报道也处在“村外人”的立场上,互联网在乡村开始普及,但利用度不高,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手机媒体,它在未来将会对乡村社会的发展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中国学界开始关注大众传播与乡村、农民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国内进行受众调查研究成果较丰硕的时期。这一时期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1982年杨云胜、程世寿对湖北襄阳地区乡村进行的读者调查;1983年祝建华等人对上海郊区乡村进行的传播网络,即《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1985年张学洪等人在江苏的苏南、苏北、苏中等地乡村进行的受众调查《中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行的全国性乡村听众调查,以及198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开展的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比较调查。这一阶段的调查研究大多只是一般的描述性研究,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理论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学界开始关注大众传播与发展理念下的现代化研究,试图解读或探讨西方相关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适用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探讨则开始转向中国大众传媒系统与乡村、农民关系的研究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教授的调查著作《大众传媒与农村》、徐景华的《由疏离到和谐,媒体与农民关系之现状及解决》、张宇丹的《传播与民族发展》、段京肃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地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仇学英对贵州、云南、广西等贫困山区进行的“大众媒介传播和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谢咏才、李红艳主编的《中国乡村传播学》、李红艳主编的《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谭英的《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

<sup>①</sup> 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新闻界》2005(3)。

究》、李红艳著的《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传播关系之实证研究》、姚君喜的《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2002—2003)》、益西拉姆的《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等等，都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 思考题

1. 简述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发展的主要观点。
2. 简述参与式影像理论的发展历程。
3. 简述大众媒介与现代化的主要观点。
4. 查阅相关资料，举例说明中国乡村媒介的生态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加以论述。
5. 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形式在农村的普及，对促进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有怎样的作用，试举例说明？

### 参考文献

#### 著作

- 陆扬、王毅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 李彬著：《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著、[美]特里·N. 克拉克(Terry N. Clark)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张隆栋主编：《大众传播学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李金铨著：《大众传播理论》(修订六版)，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
- 张咏华著：《大众传播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 Lerner Daniel: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 孙聚成著：《信息力：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美]阿列克斯·英格尔斯、戴维·H. 史密斯等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美]阿列克斯·英格尔斯等著，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美]埃里克·巴尔诺，张德魁、冷铁铮译：《世界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国电

影出版社 1992 年版。

韩鸿著:《民间的书写: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张泉等著:《城乡统筹下的乡村重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

郎劲松著:《韩国传媒体制创新》,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6 年版。

孙君、王佛全编:《专家观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权威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选编:《广播电视史料选编之四:中国的有线广播》,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赵玉明著:《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北京》(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杨元婴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文化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 年版。

舒晓鸣著:《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6 年版。

辛柏青、贾磊磊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

吕新雨著:《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韩鸿著:《民间的书写 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蒋玉生著:《新闻有道》,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年版。

强月新、张明新著:《转型社会的媒介景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论文

贺福中、田文利:《农业电视节目的现状及对策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9)。

吴杰:《电视对农节目现状和发展对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12)。

汪志球:《中国农民工:为何热播》,《人民日报》2009 年 7 月 5 日。

孙铭欣:《中国对农广播联盟 逆势之下,应运而生》,《媒介》2009(4)。

曾岩:《新一轮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广播电视信

息》2008(1)。

江成军:《浅谈农村广播如何应对网络时代》,《声屏世界》2003(3)。

曹立新:《化农民与农民化: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大众媒介功能与策略研究——以〈农民报〉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3)。

张成文:《农民报何去何从——写在报刊征订大战之后》,《新闻采编》1995(2)。

钟玉明、李亚彪:《九亿农民能看哪张报——农村“信息孤岛”现象,成为城乡又一种大差距》,《瞭望》,2006(6)。

张从春、徐一化:《中国农村“报荒”的成因与对策》,《新闻爱好者》2007(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8—2009 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调查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网,2009年1月16日,<http://research.cnnic.cn/html/1245139584d654.html>。

《In-Stat:农村手机市场有待挖掘》,通信产业网,2009年4月1日,<http://www.ccidcom.com/html/chanpinjishu/zhongduan/200904/01-59597.html>。

贾磊磊:《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见郇苏元、胡克、杨远婴主编:《新中国电影50年》,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张恒:《大视野下的新农村电影——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印象》,《电影》2007(11)。

韩鸿:《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新闻大学》2007(4)。

陈文高:《当代农民工媒介镜像批判》,《学术交流》2007(5)。

雷涛:《媒体农民工报告分析》,《中国科技信息》2005(11)。

卫凤瑾:《大众传媒与农民话语权——从农民工“跳楼秀”谈起》,《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2)。

乔同舟、李红涛:《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体投影》,《新闻大学》2005(4)。

李仕权:《表面繁荣下的边缘化实质——对三农问题报道热的冷思考》,《声屏世界》2005(10)。

连水兴:《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下: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媒介形态与观念研究》,2007年“媒介新生态与电视发展”学术高峰论坛提交论文。

《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媒介接触习惯与广告传播价值新探索》,《市场观察》2008(5)。

杨明品:《当代农村影视公共服务建设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参见李景园、陈威主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

《解读移动 700 亿投入农村信息化》，通信产业网，2009 年 7 月 16 日，<http://www.ccidcom.com/html/yunyingshang/200907/17-70607.html>。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24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9 年 7 月 16 日，<http://www.cnnic.net.cn/index.htm>。

张国良、廖圣清：《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调查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00（7）。

吴信讯、倪瑜、赵伟清：《中国当代农村电视收视习惯调查报告》，见贾乐蓉主编《新世纪大众传媒的发展：中俄学者的对话》，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申瑞锋：《电视下乡：大众媒介与乡村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湖南社会学网 2008 年 10 月 27 日，中国社会学会 2008 年会提交论文，[http://www.hnsh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399&ArticlePage=1](http://www.hnsh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399&ArticlePage=1)。

欧阳静：《农民如何选择电视节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6）。

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新闻界》2005（3）。

## 第六章 乡村传播学之受众

### 第一节 乡村传播学之受众概况

这一节首先分别从受众的一般理论、作为受众的农民理论以及乡村外来者的受众理论出发,进而对乡村传播学的受众概况进行总体描述。

#### 一、受众理论

##### (一) 作为受众的基本理论

对受众角色的认知与定位,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靶子论阶段,将受众当作是消极受众,在媒介信息传播过程中,完全是简单地加以接受。第二阶段是影响不一理论阶段,认为受众是有个体差异、隶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并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群体。受众成为了包含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干预变量在内的极为复杂的研究对象。第三个阶段是使用与满足理论阶段,也可以称为是受众本位论阶段,与前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是:受众本体论者将受众看作是研究核心,站在受众的立场探讨信息内容与受众接受之间的关系。第四个阶段是传受双方角色逐渐平衡阶段。这一阶段的发生与新传播技术的大众化、日常化和通俗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新媒体形式和手机媒体等新型媒介使用形态在大众群体中日常化之后,每个人都是传者,同时也是受众。正如鲍尔(Raymond Bauer)在《固执的受众》中所说的,以往的问题是:“信息如何作用于受众”(what can the message do to the audience),而现在的问题是“受众如何使用信息”(what can the audience do with the message)。换言之,其视角分别是信息能对受众做什么和受众能用信息做什么,受众与传者的双重身份也浮出水面了。

##### 1. 作为受众的一般理论

###### (1) 个人差异论:遗传还是学习

“个人差异论”(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ory)主要是从行为主义视角和动物

心理学视角延伸出来的,二者都认为个体是存在差异的,但是对个体差异的来源的认知有所不同。行为主义认为个人差异论的理论基础是“刺激—反应”论,认为人的心理和性格虽然有遗传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后天形成的。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社会经历都不尽相同,他们的性格也就各有差异。在信息面前,个人会因为心理、性格的差异而对信息做出不同的选择和理解,随之而来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也会因人而异。动物心理学则认为个人差异论的理论基础是人的先天遗传,认为遗传决定了人的差异性。

传播学中的个人差异论,首先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卡尔·霍夫兰的陆军实验,他在研究传播媒介的实际效果时发现,传播效果因人而异,而人们对信息的不同反应来源于个人性格和态度的千差万别。继而由美国传播学者梅尔文·德佛勒在其《大众传播学绪论》一书中进行概述,他指出受众在接受信息时的差异现象主要是由于个人在以下态度和性格方面的差异造成的:①心理构成的差异;②先天条件与后天知识的差异;③个人在立场、价值观念、信仰上的差异;④个人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⑤个人成见在理解客观事物时带来的差异。

### (2) 社会分化论

受众可以根据年龄、性别、种族、文化程度、宗教信仰以及经济收入等人口学意义上的相似而组成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些因人口学因素相同或相似而结成的群体,又有着相似的性格和心理结构,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也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因此,同一群体中的成员在传媒的选择、内容的接触、甚至对信息的反应上都会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受众分成不同的群体进行研究。换言之,个人差异论强调的是个体之间的差异,社会分化论则侧重研究群体之间的差异,注重在个人差异前提下的群体特征的一致性,可以说是对个人差异论的一种发展和补充。

### (3) 社会关系论

社会关系论是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和卡茨等人在伊利县调查时提出来的。卡茨指出:“直到最近,大多数传播学者头脑中的社会形象还是由原子化的个人所组成,他们由大众媒介相连,而不是彼此相连。社会‘受众’被看做是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等等的聚合体,很少有人想到比较非正式的关系的含义,问题不在于传播学者没有意识到受众成员都有家庭和朋友,而在于他们不相信这些关系会影响竞选结果;所以,非正式的人际关系被认为与现代社会体制不相干。”①

① [美]梅尔文·德佛勒、鲍尔—洛基奇著,杜力平译:《大众传播学绪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页。

个人差异论和社会分类论都忽视了受众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对受众研究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如家庭、邻里关系、亲戚、朋友等。在受众的媒介接触中,社会关系经常既能加强也能削弱媒介的影响。事实上,媒介的效果经常为受众的社会关系所削减。社会关系主要包括人际网络、群体规范和意见领袖等,具体到受众的社会关系则主要有他们所处的工作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各种非正式的群体等。社会关系论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提供了一个结合点,而结合的媒介就是社会关系。

#### (4) 媒介接近权与社会参与论

美国学者 J. A. 巴隆 (Jerome A. Barron)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接近媒介权——一项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Access to the Press: A New First Amendment Right*)一文,首次提出了媒介接近权(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的概念,<sup>①</sup>他指出当时的大众媒介垄断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公众使用媒介传播所需信息和观点的权利,应当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增加公众对媒介的接近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出版自由”所保护的是作为一般社会成员的受众的权利,而不是大众媒介企业的私有财产权。所谓媒介接近权是指“大众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皆应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自由”。而且,“为确保大众的言论自由,也必须由宪法确认大众接近‘媒’的权利”。也就是说,“一般社会成员可以也应该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同时,这项权利也赋予了传播媒介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sup>②</sup>

1973年,他又出版了《为了谁的出版自由——论媒介接近权》一书,对权利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强调传播媒介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社会公众越被排斥在大众传播媒介之外,因此“必须把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归还给它的真正拥有者——读者、视听众”。由此他提出了社会参与论。他认为,为了维护大众传播媒介中受众的权利,保障他们参与使用信息传播媒介的权利,必须承认公民对传播媒介的参与权。正如《麦克布赖德报告》(即《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所指出的“新闻传送费用,报纸、期刊、书籍和视听资料的运输,是实现自由的、平衡的新闻流通的主要障碍之一。这种局面必须通过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多种努力予以纠正,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电磁频谱和空间频道,均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它们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更平等地被人类所享用”。因此,“不要把读者、听众和观众当作消息情报的被动接受者。大众媒介的负责人应该鼓励他们

<sup>①</sup> 魏永征、张咏华、林琳著:《西方传媒的法制、管理和自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sup>②</sup>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的读者、听众和观众在信息传播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办法是拨出更多的报纸篇幅和更多的广播时间,供公众或有组织的社会集团的个别成员发表意见和看法”。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参与”有不同的含义。20世纪70年代以前,“社会参与”主要是对大众传播媒介而言的,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在政府的保证下有权接触各种新闻来源,以便为受众提供所需要的“客观公正”的信息。70年代后,“社会参与”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其关注点由大众传播媒介转到了受众,受众有权直接参加传播过程,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自由发表意见,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成为受众发表意见的社会讲坛,政府应该保障受众这一权利的实现。

换言之,社会参与论为受众向受众与传者双重角色的转换起到了中介作用。也使得受众理论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将受众与传者的角色设置为平衡状态。

## 2. 作为受众的信息选择心理过程

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选择性注意又称选择性接触,是指受众在接触大量的信息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职业、家庭、性别、年龄及文化背景和个人兴趣等因素,将注意力自然而然地放在那些与自己的总体观念比较一致的信息内容上,而有意无意忽视或回避与自身的观念不一致或无关的信息。换言之,受众在面对海量的信息时,也扮演着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只是这种把关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把关,与社会大众的信息需求无关,是微观意义上的个体信息把关人。但是这种个体信息把关人并非是完全与社会隔绝的,自身信息的局限性会使得他对外来的大量信息很难总是有自己的判断,也不得不在信息获取中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受众的选择性接触行为是与受众个体、信息传播媒介体系和信息容量的大小相关联的,并非是受众独立的信息选择所决定的。

选择性理解(selective apprehension):所谓选择性理解,是指受众依据自身的价值体系而对接触到的信息作出独特的个人解释,由此获得个体在认知上的一致性。

选择性记忆(selective retention):选择性记忆的过程往往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受众记住某种信息并非由于它合乎自己口味因而将它存入记忆,而是不知不觉记住某种信息的事实本身正表明它投己所好,表明它合乎自身的认知结构与思维定势。

选择性行为(selective exposure):也称为选择性暴露。受众在接触了同一个媒介信息后,由于前三类变量的差异,选择性地按照从大众传播媒介接受来的、与自己头脑中“预先存在的态度和信念相符合”的信息所给予的提示采取相应的行动(或将自己暴露在对该信息的行为反应上)等,强调的核心在于可能采取的行动或“暴露”的“选择性”和“差异性”上。

对于受众的信息选择心理过程的研究,其基本理论前提还是将受众仅仅当作是受众、是从传者角度如何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而言的。

### 3. 作为受众的信息选择动机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及其发展

20世纪40年代,由于认识了个人差异和社会分化对于与大众传播相关联的行为的意义,因而出现了一个有关受众与媒介关系的新看法。1974年,卡茨在《大众传播调查和通俗文化研究》中首次提到“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pproach)研究。1974年,卡茨和布拉姆勒(J. G. Blumler)的论文《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总结了当时“使用与满足”领域所做的研究,他们认为“使用与满足”研究指的是:①需求的社会和心理起源。②人们的需要。③需求产生的期望。④期望指向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其他来源。⑤这些来源引向对不同形式媒介的接触(或参与其他活动)。⑥由接触造成需要的满足。⑦与满足同时产生的其他后果,也许大多是无意获得的结果。

这种研究取向隐含了五种基本假设:①受众使用大众传播媒介是有目的的,受众基于心理或社会的需求,借助媒介来满足需求。②传播过程需要依靠受众把媒介的使用及对媒介需求的满足联系起来,受众是媒介的主动使用者,受众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③大众传播媒介所能满足的需求,只是人类需求的一部分,媒介在满足这些需求上,必须与其他来源,比如人际传播或其他传统的需求满足方式相竞争。④研究资料来源于受众的自我报告。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假设受众是理性的,能了解自己的兴趣和动机,并且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研究者根据受众的回答加以推断其使用媒介的目的。⑤不必要对大众传播媒介下任何价值判断。<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使用与满足理论主要集中在对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的研究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以及新型的数字媒体手段的丰富化和多元化,托马斯·鲁杰罗(Thomas Ruggiero)认为,“在每个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初期,使用与满足总能提供一种最前沿的研究方法”,他提出了以计算机为中介的“提供了大量传播行为集合”的大众传播的三个特性,供使用与满足的研究者考察:

交互性(Interactivity)“极大地加强了积极的受众的使用与满足的核心概念”,因为大众传播中的交互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传播过程中参与者能够控制和在相互交流中改变角色的程度”。

去一体化(Demassification)是“媒介使用者从一个丰富的菜单中选择的能力

<sup>①</sup> 翁秀琪著:《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第二版),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版,第13页。

……和传统的大众媒介不同的是,因特网之类的新媒介具有选择性,允许个体根据自己的需要量身定做”。

异步性(Asynchronicity)意味着经由中介传递的信息“可以在时间上错开。电子讯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能够在不同的时间里阅读电子邮件,在各自方便的时间里达成交互。同时也意味着个体能够方便地发送、接收、储存、找回信息。和使用传统媒介相比,个体拥有了更多的控制权”<sup>①</sup>。

研究证明,使用与满足的研究方法对于进行多种新媒体研究都很有效。<sup>②</sup>换言之,受众与传者的角色在新媒体语境下,开始有融合的趋势。

#### 4. 传者与受众角色趋于平衡时期的理论

##### (1) 信息平衡论

信息平衡论反应了信息论和耗散结构论的一些观点:认为社会乃至自然布满了各种信息,信息的流动总是从高密度地区流向低密度地区,从而趋于平衡。信息是一种无序的状态,所以,变革的社会、动乱的国家、活跃的组织和个人拥有较大的信息量,成为传者;而平静的、相对稳定的个人和组织,则往往成为受众。这种变动和稳定的状态由于信息的流动而不断变化,传者与受众的角色也经常互换。

##### (2) 模仿论

法国社会心理学塔尔德于1890年出版《模仿的法则》,提出了模仿规律。塔尔德模仿论的主要假设是模仿可以产生平等。他所说的模仿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新的发明与原有社会中已被模仿和已被制度化的旧的发明越接近,被整个社会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大。并将之称为逻辑模仿律(logical law of imitation)。二是对模仿的超逻辑层面而言,有两个潜在的规律,<sup>①</sup>发明初期所影响的人群往往是最接近发明源头的个体和群体,后来这些发明才逐渐向比较远的地方辐射。<sup>②</sup>模仿是由地位来决定流动的地位:从社会优势的高处流向社会弱势的低处,精英的功能不仅是给发明发酵,还对社会提供引导的模式。换言之,由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提出的思想,哪怕它再好,也不会被人模仿,然而如果领导阶层迫于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支持这样的思想时,即当精英阶层将这一思想合理化之后,整个社会就会去模仿,可以将这一现象成为启动效应(pump priming

<sup>①</sup> T. E Ruggiero: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in the 21st Century",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0, Vol. 3, No. 1, pp. 3—37.

<sup>②</sup> 转引自:[美]斯坦利·巴兰(Stanley J. Baran),[美]丹尼斯·戴维斯(Dennis K. Davis)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 基础、争鸣与未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262页。

effect)。就模仿的宏观发展趋势而言,是从单向模仿走向交互式模仿。<sup>①</sup>

除此之外,塔尔德还在论述到模仿不能由底层向上层传播的时候,专门论及到法国农民,他说:

“走进一家农舍去看看其财产:从农夫的刀又到玻璃杯再到他的衬衣……我们沿着社会阶梯下降到农夫的村舍之前,没有一件衣服、没有一件工具不是从上往下降的:首先是帝王、战将或教士使用奢侈品,其后是贵族开始模仿,然后资产阶级才跟着模仿,最后是与其地位接近的地主跟着模仿。让农夫说话,你就会在他的身上发现:所有的法律、农业、政治或数学的观念,所有的家庭感情或爱国思想,所有的希望或欲望,都是始于社会高层的创新或革新,然后才往下传播,并逐渐深入到农夫身上的”<sup>②</sup>。

传播学者们认为,媒介信息蕴涵的模式或榜样形象对受众产生影响,经常经过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受众个人接触媒介关于行为模式的描述。第二阶段,接触者与榜样模式认同,并有意无意地(或成功或不成功)模仿这种行为。第三阶段,接触者的模仿尝试获得成功,并取得相应报偿或鼓励后,接触者便会积极地继续重复该模式行为来应对相同的情况。于是,媒介模式行为被受众采纳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模式。<sup>③</sup>

## (二) 作为受众的农民理论

对于农民作为乡村社会传播系统中传者,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分别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 1. 农民社会行为理论

#### (1) 农民认知行为理论

农民认知行为的改变分为四个层次:知识改变、态度改变、个人行为改变、群体行为改变。这四种改变的难度和所需时间是不同的。在农业推广中,动力因素促使农民采用创新,而阻力因素又妨碍农民采用创新。当阻力大于动力或两者平衡时,农民采用行为不会改变。当动力大于阻力时,行为发生变化,创新被采用,达到推广目标,出现新的平衡。<sup>④</sup>

#### (2) 农民集体行为理论:搭便车理论

搭便车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森(Mancur Olson)于1965年

① [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美]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4页。

② 同上书,第43页。

③ 张隆栋主编:《大众传播学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④ 参见高启杰主编:《农业推广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3页。



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搭便车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出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这便是搭便车困境。换言之,在一个大群体中,虽然每一个人都想获取一个公共物品,但每个人都不想因此而付出代价。便形成了搭便车困境。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奥尔森从组织角度,以选择性激励的方式,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其一是小组织原理。在一个较小的组织或社会网络中,你是否参加集体活动其他人人都知道。如果不参加,就得不到相应的奖励,甚至还会被组织边缘化;其二是组织结构原理。在一个职权和阶层相对清晰的组织结构中,组织成员的行为处在相互监督的状态;其三不平等原理。组织成员在组织内部的权利、利益、贡献等不能搞平均主义。<sup>①</sup>

## 2. 农民经济行为理论

### (1) 最优化农民理论

所谓最优化农民理论即追求最优化的农民理论,基本假设是农民追是最求一个或多个家庭目标的最大化。这些理论主要有五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追求利润型农民。以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为代表,他假定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农业是“有效率但贫穷”。认为农民是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农民的行为选择,完全符合经济学的理性原则。农民“‘首先是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他购买自己能买得起的东西时非常注意不同市场上的价格,他认真地计算其生产用于销售或家庭消费的谷物时自己劳动的价值,并与受雇工作时的情况加以比较,然后根据计算与比较再行动”<sup>②</sup>。传统农民缺乏的不是经济理性,而是廉价的有效投入。“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激励,农民将会点石成金”<sup>③</sup>。

第二,风险规避型农民。由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农民与不确定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命题。主要命题有:① 不确定导致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难以达到利润最优化;② 不确定性会造成农民的保守主义倾向,使得他们在接受新事物方面非常犹豫;③ 降低不确定性因素的做法可以解释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许多现象;④ 不确定性对乡村社会中弱者影响力大于强者,因此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⑤ 市场的不稳定性也加固了农民的风险,使得他

① 赵鼎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160页。

② [美]西奥多·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34页。

③ 同上书,第5页。

们在难以得到保障的情形下,更倾向于进行风险规避。

第三,劳苦规避型农民,即恰亚诺夫的家庭效用最大化理论。恰亚诺夫(A. V. Chayanov)在1925年出版的《农民经济组织》中提出,农民家庭是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体系,有自己独特的运行逻辑和规则。小农家庭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农民的经济活动量由边际产品带来的满足程度和边际劳动的辛苦程度的均衡决定,而不是由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均衡决定。因此可以说,恰亚诺夫的农民模型是家庭效用最大化理论。对一个农民家庭而言,一方面农田劳动是辛苦和乏味的(即劳动的负效用),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他们又需要收入(即收入的效用)。换言之,农民家庭有两个相对独立的目标:一是收入目标,而收入需要通过田间劳动才能获得;二是与获得收入相对立的逃避劳动的目标,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恰亚诺夫的农民模型称之为劳苦规避型农民理论,其基本假说有如下几条:①没有劳动力市场;②农民可以自由获得土地;③农产品既可到市场出售又可自己消费;④农民有最低消费水平保障。

第四,部分参与市场的农民。主要有巴鲁姆(Barnum 1972)和斯奎尔(Lyn Squire 1971)农户模型和艾伦·罗(Allan Low)农户模型。

巴鲁姆和斯奎模型是将新经济学中的某些概念引入到农户行为模型之中。该模型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为农户对家庭情况变化(农户规模和结构变化)以及市场变化(农产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工资和技术等等的变化)行为反应的分析 and 预测提供了理论框架。这一模型的基本假说是:①有劳动力市场以便农户可以雇用劳动力和被雇用;②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间内是固定不变的;③“家庭”活动和“休闲”被合并为一个约束条件以便反映效用最大化的特性;④农户的一大重要选择是:农户可以自己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也可以将产品在市场出售并换回自己不生产的产品。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决策的均衡条件是:①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工资水平;②其他可变投入的边际产出等于其平均价格;③农户自身消费的时间和购买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应等于工资和购进物价格之比;④农户自产消费品和购买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于自产品价格和购买商品价格之比。

艾伦·罗通过对南非诸国农业生产的研究,1986年建立了一个农户模型。其主要的假设条件是:①存在劳动市场;②原始土地租佃制度;③半生存经济;④大量粮食自给不足的农户与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

尽管罗模型与巴鲁姆—巴奎尔模型使用的前提条件不同,但其基本思想均是通过家庭生产函数来最优地配置时间,共同强调了劳动市场对农民经济运行的意义。恰亚诺夫提出的农户计算经济的独特模式消失了,留下的是部分参与

市场的农民。

第五,分成制农民。包括两个模型,一是以马歇尔模型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佃户模型,其核心是将佃农当作是利润最大化者,他们置身于竞争市场中;二是以张五常模型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地主模型,其核心是将地主当作是利润最大化者,他们可以改变所支配的土地的数量,决定出租规模、出租数量以及地租份额,并采取一些措施激励佃农投入时所需要的劳动。这两种模型都假设了竞争性劳动市场,但在现实中,这两种劳动市场都是不完全的。

## (2) 农民的生存伦理与经济行为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James Sterling)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者的武器:农民的日常抵抗》和《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等政治人类学论著陆续被译为中文,越来越为中国学界所认知。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他强调农民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认为这不仅仅涉及到的“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是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sup>①</sup>认为农民生存经济是安全第一原则、规避风险原则、自救原则。这三个原则构成了农民的生存伦理,以此来反驳“理性小农”的相关理论。

## (三) 作为受众的乡村社会外来者的理论

### 1. 霸权理论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中,结合意大利革命斗争的现实情况,检讨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受挫和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深刻地探讨了哲学、政治、文化、历史、知识分子、政党、国家等问题。同时,葛兰西在此书中提出了全新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以“霸权”(hegemony)的观念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

他认为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社会的特征在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利用霸权为手段,劝诱被统治阶级接受它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价值。霸权也由此成为社会统治集团可以使用的各种社会控制模式。其产生的背景是社会冲突。霸权概念的核心不在于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知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压迫,而是让个人“心甘情愿”,积极参与,被同化到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中来。<sup>②</sup>换言之,霸权是一种认同和同化的力量,其潜在地

<sup>①</sup>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北京: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

<sup>②</sup> 陆杨、王毅著:《文化研究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发生作用,影响着社会大众价值观的形成和社会心理体系的构造过程。

以霸权概念来理解以城市为主体的文化和以乡村为主体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剥离掉其中的资产阶级文化理论的要素,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切入点。从这一视角出发,对了解农民的文化受众特征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2. 核心—边缘理论

核心与边缘理论是1966年由弗里德曼(J. R. Fridemna)在他的学术著作《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正式提出的。他认为,发展是通过创新的一种不连续但逐步累积的过程而实现的,它总是起源于“通信域”(communication field)内具有高频相互作用潜力的少数“变革中心”(centres of change)。创新通常是从这些中心由上而下、由里到外地向创新潜能较低的地域扩散。创新变革的主要中心被称之为“核心区”(core regions),特定空间系统内的其他地区则被称之为“边缘区”(peripheral regions)。也就是说,核心区是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地域社会组织子系统,边缘区则是根据与核心区所处的依附关系而由核心区机构决定的地域社会子系统,核心区与边缘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创新就是从核心区向边缘区扩散,边缘区的发展依赖于核心区,并在很大程度上由核心区的体制所决定,核心区的增长会促进整个区域系统的发展。但是,随着信息从核心区向边缘区的流动,边缘区内处于依赖地位的现代化精英会逐渐觉醒,他们会在边缘区被允许的自主权范围内与核心区的政府产生冲突,其结果不是导致离心力就是向心力进一步增强。因此,必须有积极的国家干预手段以减少不平等现象,引导社会向预期目标发展。

他指出,在空间系统中,核心区与边缘区处于权威—依附关系中:(1)核心区在组织上强加于这种权威—依附关系的机制。这种依附关系是通过核心区权威控制机构对边缘区渗透来维持的;(2)核心区强化自身对边缘区支配地位的过程有自我强化之势;(3)核心区创新活动向边缘区的渗透,扩大核心区输往边缘区的信息流;(4)核心区对边缘区扩散效应的加速会导致新形成的核心区与原有的老核心区真正分享决策权。<sup>①</sup>

## 二、受众概况

如同乡村传播学之传者一样,乡村传播学之受众也分为三个大的类型。第一个类型是乡村社会内容的受众,以乡村社会居住的农民为主要群体;第二个类型是隶属于乡村社会但主要居住在乡村之外的社会群体,如乡村商人、乡村知识

<sup>①</sup> 参见金元欢、王建宇著:《区域经济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3页。

分子、乡村绅士乡村贵族等等；第三个类型是乡村社会外部的受众，以与乡村社会进行信息传播的群体为主，这些群体包括乡村旅游者、政府官员等。

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定居于乡村社会的群体、与乡村社会之间进行信息传播的群体以及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信息传播群体，作为信息的受众，其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有着显著的变化。作为乡村社会中的受众的发展，与受众理论的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而这种变迁过程与不同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价值观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由于不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所差异，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对农民作为受众的信息传播形态和特征也有所差异。换言之，各国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态度，恰恰表明了他们对乡村社会农民受众群体的传播动机，也从另一方面演化出农民群体在不同制度下，作为受众地位的变迁过程。这一变迁过程首先是与农民政策联系在一起；其次与社会发展的特定情形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以英国为例，中世纪的英国农民主要由自由人和农户组成。中世纪英国农民一身兼有三重身份。在村镇里，他（她）是一个村民；在庄园里，他（她）是领主的庄民；在教区，他（她）又是一个教民。因此，他们是这三重管理和监督机构的受众，同时由于这三者之间权力的空隙，任何一方也不可能完全控制他们，宗教活动是中世纪英国同农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在英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8世纪。15世纪末开始的圈地运动，到17世纪上半期仍在进行。圈地运动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不仅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预备了大量的产业工人，还分化了作为受众的农民群体，使得他们逐渐摆脱了乡村的管理机制，进入了城市社会的管理机制中。

而美国的情形则不相同。建国之前的美国，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15世纪末期开始，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格兰人，它们先后闯入了北美大陆建立了各自的殖民点。18世纪中期，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先后建立了13个殖民地，从1607年的弗吉尼亚的詹姆斯城到1733年的佐治亚前后持续了126年时间。在这前后法国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拥有巨大的殖民地，西班牙人则控制了佛罗里达和墨西哥地区，荷兰人控制了纽约地区。1756年至1763年七年战争后英国人控制了加拿大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地区，成为北美大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地区的霸主，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20世纪则是美国社会高速发展和进入现代化时期。

鉴于美国国家历史的独特性，美国政府对农民教育问题格外重视。佛蒙特

州国会议员莫里尔(Justin Smith Morrill)于1848年提出建议,要求取消美国学院中几个世纪以前建立的以欧洲学术为特点的学习教育体制,以较新的更有实用价值学习来填补空白。莫里尔坚信对普通民众的实用训练。他希望高等教育民主化,以便任何希望获得实用训练的人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1857年,莫里尔再次向国会提交“赠地法案”(Land-Grant Act),建议联邦政府向各州捐赠公地,以支持建立一些学院,发展农业和机械工艺教育。该法案于1862年5月获得立法通过。根据这个法案,各州可以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一些公用土地,以出售土地所得创办至少一所农业与机械学院。这便是美国著名的“赠地学院”。为了有针对性地进行科学研究,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哈奇法案,仍以出售公用土地的方式支持实验研究,农业试验站在各州得以建立。<sup>①</sup>换言之,作为受众的美国农民,除了是教民、村民之外,还是政府系统化农业教育的受众。

## 第二节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受众

### 一、1949年以前的乡村受众

#### (一) 古代农民受众

中国古代农民,在社会阶层的划分中,可以分为九类:(1)自耕农。自身拥有耕地,通常可以自种自食,身份上属于平民范畴,是良人,国家的主要纳税人,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半自耕农。与自耕农有基本相同之处,唯自有田地少,不够耕种,需要租佃一些耕地,或者家内有人要出卖劳力,才能维持家庭生活;(3)平民佃农无地的农民为求生存,赁地耕种是一条最可行的道路,于是成为佃农。佃农的社会身份有属于良人和非良人的不同,大体上说,秦汉时期和宋代以后的佃农中有一部分具有平民社会地位,是法律上的良人(指非奴婢的平民百姓),可以向上流社会流动。中古时代佃农身份下降,而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庶民化,佃户身份逐渐提高。例如在法律上,宋元时代主佃冲突中,在量刑上主佃不平等,而清代已基本改变,严惩官绅地主对佃户的凌虐。法律虽然没有明言佃户是良人,但是实际上是平民,他们可以读书科举,可以出仕,这就是良人的权利;(4)佃仆。与平民佃户并存的是佃仆,她们与主家有人身依附关系,大多实行劳役地租制,或者交纳实物地租,然而附加地租很重,要在交租之外到主家无偿服役,依然受地主较强的人身控制;(5)国家佃户。屯田户、占田户、营田户等耕种国有土地的农民,历代皆有;(6)农业佣工。没有或丧失土地而受雇于农

<sup>①</sup> 参见周建华、尤玉平:《美国农民教育的经验与启示》,《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业经营者的人,是农村中的赤贫人家,即农业佣工。这类人数量不多,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有限,远远不是农民的主流;(7) 农业奴隶。将奴隶使用于农业,是在封建社会里保存的奴隶制度的残余形态,在秦汉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都存在;(8) 富裕农民。指自家生产,还有余田,雇工经营,或者将余田出租,向政府承担赋役,是平民身份,财力上比自耕农富裕一些,比地主又不如,经济收入主要靠自家劳动,属于劳动者行列的农民群体;(9) 平民地主。平民地主向佃户收取地租的同时,向政府交纳赋役。他们人数不多,却与自耕农同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他们与自耕农同是国家的主要关注对象。他们属于平民身份,无法定特权,只是和佃户关系中属少长关系中的长者,在社会生活的实际中,他们一定程度上控制佃农。<sup>①</sup>

## (二) 近代农民受众

近代以来的中国农民,经历了辛亥革命时期、军阀混战时期、民国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三年内战时期,其组成成分和作为受众的传播机构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期间,中国农民扮演的受众角色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 1. 乡村教育中的农民受众

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是科举时代的私塾和书院承担着教育农民的工作。私塾的主要作用是对农民的下一代进行启蒙教育,以便为将来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因此其教材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启蒙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日用杂学》、《千家诗》等;一类是为科举考试准备的课程,如《四书》、《五经》、《古文观止》、《资治通鉴》、《楚辞》、《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策论新萃》等。《三字经》、《百家姓》等所谓小书,原为帮助儿童识字之用。与农村生活相关的教材比较受农民欢迎,如《日用杂学》,多用韵语,结合农村生活用品,较通俗易懂。这类结合乡村生活的教材比较受农民欢迎。实际上,多数农民子弟,读书不是为了科举,目的只在认识几个字,稍长即参加生产。而书院则源于民间的精舍、学堂。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科举考试做准备,客观上也培养了农村的教育人才。1901年,清政府下令将书院改为学堂。

晚清至民国时期,政府在小学教育上规定实行义务教育,在乡村也如此。但是由于师资缺乏,成效甚微。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在1929年至1933年间的调查,7岁以上的人口共计87048人,其中男子46358人,女子40690人。平均不识字者达83.1%,男子占69.3%,而女子占98.7%。其中华南不识字者为

<sup>①</sup> 参见冯尔康:《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在冯尔康、常建华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版,第9页。

80.7%，华北不识字者为85.2%。<sup>①</sup> 这些不识字的文盲几乎全在乡村。政府自兴办学校以来，多偏重城市教育，忽视乡村教育，农民并未因此在教育方面真正受惠。

南京政府对乡村扫盲工作也很重视，在义务教育方面，于1932年根据国家情况，暂定义务教育年限为一年，而以四年为长期目标。到1935年度全国学龄儿童为49 414 387人，已受义务教育的儿童为15 041 542人，约占总数的30%，1936年达到35%。抗日战争爆发后，除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农村外，学校教育和扫除文盲工作深受影响，基本上停滞不前。<sup>②</sup>

换言之，“旧日的农民教育，可以说不是农民教育，而是农村贵族教育。因为真正的农民，为着生活所迫，很少有场合利用各种教育的机关（家庭教育除外）。尤其是私塾教育，要想加入，定要致送相当的束脩，<sup>③</sup>所以有钱的子弟才能请先生、进学堂；没有钱的孩子只好去放牛、拾柴。结果一个农村里面，只有少数的儿童，不问可知是地主或乡绅的子弟。一般农民的子弟，他们求学上进的机会，完全为经济所剥夺了”。<sup>④</sup> 因此陶行知先生立志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实现教育的平民化，“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综上所述，近代乡村教育中，农民受众一开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儿童启蒙教育，第二类是扫盲教育，也就是农民的识字教育。

## 2. 政府管理过程中的农民受众

近代中国的乡村管理，由于政权体系的剧烈变动，处在动荡不安中，乡村的管理机构也处在变动之中。近代以来的中国农村政权，主要是县以下的各级政权。但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县以下的政权又直接受制于省及地区政治机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县以上的地方政权也具有乡村政权的性质。

民国初定之时，南京临时政府集中忙于国体改制。各省虽脱离清朝服从南京临时政府，但在很大程度上尚各自为政，更无暇顾及地方政制的转换。各地官制虽有某些变动，但大多沿用清末之旧制。民国初年，省的行政制度曾采取军政、民政合一的制度。各省设都督府，统一管理本省一切事务。1913年后改为军民分治的办法，在都督府之外另设行政公署，作为专门管理行政的机关。1925年7月1日改组为国民政府的革命政权，在所辖区域内，对各项制度进行了许多

① 乔启明著：《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91页。

② 参见朱玉湘著：《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1页。

③ 束脩，是指致送给教师的酬金，相当于现在的工资。塾师的收入虽然不限于束脩一项，但无论何时何地，束脩都是塾师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④ 杨开道：《农民教育》，《农业周报》第十六到十七期。



改革。其政权组织形式,在中央,采取国民党指导监督下的议行合一、民主集中的委员制;在地方,实施省、县两级制。直至南京政府时期,一直未有改变。为“改善县政,推进县治”,蒋介石还提出在江苏省设江宁实验县。1933年2月,江宁自治实验县成立,直属江苏省政府,其实验期限为四年。除此之外,尚有几个由民间组织同政府相结合进行的实验县。最具代表性的是定县和邹平县。

定县实验所推进的平民教育实验,力图以教育救国的理念完成社会改革,1933年与政府合作之后,又试图借助政治力量,来推进社会改革。定县实验县成立后,许多实验工作如计生、卫生等,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这种改良的办法却无法改变中国社会。邹平实验县建立后,主要进行县以下地方行政改革、推行县以下地方自治和开展县境内的社会改进。梁漱溟在开展乡村建设地区还曾在各乡设乡农学校,于每区设一中心乡农学校。自1933年7月始,改组为乡学、村学。这种乡学、村学并非单纯的教育机构,实际上它是与研究院、县政府一脉相承的下级政治机构,是政教合一的产物。乡学以全乡民众为学生,村学以全村民众为学生,故乡民村民统称为学众。<sup>①</sup>

综上所述,可以说,县一级组织是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权中极具特性的制度。在县一级政府管理中,对待农民受众的态度是以政府管理者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认知为前提的,因此政府的管理机制的改革主要围绕的是组织机构的改革。教育救国的理念与政治力量的社会改良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农民受众而言,成效虽也有,却也遭遇了极大的社会阻力。

### 3. 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农民受众

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表明,鸦片战争后,除了少数行业的传统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打击下逐步衰弱并销声匿迹外,大多数行业均能维持下来,其中,若干乡村地区的若干手工业行业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还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形成了“半工业化”现象。<sup>②</sup>在这种半工业化的现象影响下,一方面农民在乡村经受着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对传统农民意识和价值观的冲击,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的崛起为农民选择自己的生存道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频率逐渐提高。到了20世纪30年代,农民离村的人数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更是急剧增加。有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离村现象的描述,日本学者田中忠夫的研究数据在当时极有影响。田中忠夫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和《上海周报》记者,当时在上海专门设立了以中

<sup>①</sup> 参见朱玉湘著:《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403页。

<sup>②</sup> 彭南生:《近代中国“半工业化”农村中的经济社会变迁》,《中国近代史》2005(5)。

国农民为研究对象的“田中农村研究所”。他根据自己的研究结合其他人的调查估计,当时江苏、安徽、山东、直隶、浙江等五省十个地区的农民平均离村率为4.61%,中部地区为3.85%,北部地区则为5.49%。<sup>①</sup>另外,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曾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和云南等六省的农民离村情况进行了调查。江浙两省的盐城、启东、常熟、龙游、东阳、崇德、永嘉七县,每县抽查了六至九个村,结果发现:在1928年至1933年间,江浙两省农民的离村率总的说来上升了,在调查的七个县中有四个离村率上升了,两个县持平。<sup>②</sup>

发生在近代的这第一次农民大批的脱离土地、流向城市的现象,尽管造成了城市人口集聚增加、农村土地荒芜、农民生活贫困状况加剧等现象,但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转化的开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江浙农村众多受安土重迁传统束缚的人口,开始走出土地,虽然有的是不自觉或被逼无奈的选择,但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还是折射出农村习俗变革以及农民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变化”<sup>③</sup>。

对农民受众而言,其所受到的影响力主要在于:第一,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和洗礼,并在乡村社会开风气之先。不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意识到,他们进城“讨生活”、参与城市的建设过程,城市或者说城市生活方式也在改造着他们,促使他们与传统告别并迈向现代的行列;第二,传统“重农抑商”风气式微,重商思潮漫卷乡村社会。除了经商以外,其他各种新型的职业也开始吸引着离开土地的农民,这使农民的职业选择也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第三,人际交往中的“利益观”逐渐取代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宗法意识。<sup>④</sup>

## 二、1949年至今的农民受众

就中国当代乡村发展史而言,1949年至今的农民受众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1949年至1978年,第二个时期是1978—2009年。在这两个时期中,农民受众的特征和类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信息传播的受众而言,农民依次成为被改造的对象、需要改造他者群体的对象、作为改革开放推动者的对象。这种总体形象的变化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需求紧密相关。

① 转引自王仲鸣编译:《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上海: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版,第185—187页。

② 参见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农村调查》,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农村调查》,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转引自周晓虹著:《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页。

③ 周晓虹著:《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页。

④ 仲富兰著:《民俗传播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352页。

在1949—1978年这一阶段中,在乡村的主要政策及运动包括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乡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和1958年发端、直至1978年才在制度上完全终结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制度化、政策化和社会运动形式中对农村社会的改变,也同样发生在对农民群体的改造上。在1978—2009年期间,在农村的主要政策有1978年开始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2000年以后开始的乡村税费改革、村民自治等。

### (一) 当代乡村教育中的农民受众

早在1950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中便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因此,如何改造农民成为建国初期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命题。因此,政府应从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入手,对农民受众进行改造。这次整治改造主要的特点之一是乡村教育体制的改革,其目的是为了乡村发展服务,主要是以学历教育为形式展开的。

1951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目的是把补习学校列入正规学制,在乡村设立高小,促进乡村教育发展。但由于未经过充分论证,带有一定的盲目性。1953年是教育发展处于整顿中。由于建国后入学率迅速上升,成人教育、半成人教育(即超龄儿童)迅猛发展。1953年12月政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提倡民办小学。乡村公立小学以整顿为主,不再扩大规模。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设想,即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机关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1958年3月17日,江苏省委在南京召开民办农业中学座谈会,推广江苏省海安县等创办农业中学的经验,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恶化,农业中学迅速萎缩,绝大多数农业中学都未能坚持下去。

仅仅从乡村教育说,“文革”是乡村教育发展比较快的十年。教育重心面向乡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恢复高考制度之后,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主要有三条路:招工、参军后的转干和考学由国家分配工作<sup>①</sup>。因此通过上学、考试进入城市成

<sup>①</sup> 参见杨东平著:《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第一章第三节“文化大革命”与教育乌托邦部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为许多农村青年唯一公开、公平、合理合法的方式。

特点之二是从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全体农民进行教育,主要是以非学历教育的形式展开。

1949年12月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冬学运动。该指示提出,冬学教育包括政治的和文化的两个方面,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向农民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意义,解释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解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和劳动人民的任务,讨论恢复和发展本地农业生产和克服生产中各种困难的办法。文化教育的内容以识字为主,还可以加入适当的卫生常识教育和春节文艺娱乐活动内容。要有计划地建立识字组、读报组与其他经常组织,并选择条件较好的冬学有准备地在冬学结束后转为经常的农民半日学校、农民夜校或小学。1950年12月,教育部根据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精神,发出《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农民业余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1952年11月15日,教育部设立工农业余教育司,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设立农村扫盲工作司。至此,1953年至1956年农村成人非学历教育逐步走上正轨。1956年前,冬学的重点是扫盲及向农民群众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宣传宪法,教育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粮食产量,并把余粮卖给国家,以支援国家建设事业。<sup>①</sup>人民公社时期基本延续了建国初期乡村教育的基本模式,在乡村开办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教育活动,以非学历化的形式对全体村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政治现状信息的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教育的学历化和职业化教育在农村政策方面均有所创新。

1978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在农村重建学区、中心小学。1980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指出:县以下的教育事业应当主要面向乡村,为乡村的各项建设事业服务。要提倡城乡各行各业广泛举办职业(技术)学校。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要建立与健全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体系和培养农村建设人才的教育体系”,“必须抓紧改革农村教育。要积极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有步骤地增加农村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的比重。面向农村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要有一套新的招生和分配办法,打开人才通向农村的路子”。198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指

<sup>①</sup> 参见李冰山主编:《农村教育史》,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5—406页。

出提高劳动者政治、文化素质,造就农村需要的各种人才,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教育的任务主要是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sup>①</sup>

进入 21 世纪,国务院连续发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文件,对完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推进农村基础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以及大力发展乡村职业教育做了着重强调。2003 年,国务院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并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2005 年,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其创新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村教育政策的变化是国家教育政策创新的标志;第二,对农村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确认;第三,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是农村教育政策创新的另一表现;第四,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是农村教育政策创新的重要反映;第五,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新战略是农村教育政策创新的又一反映;第六,有力地实施教育补偿政策是农村教育政策创新的更深刻的体现。<sup>②</sup>

## (二) 当代政府管理过程中的农民受众

建国六十年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乡政并立、人民公社制和村民自治。<sup>③</sup> 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的建构,与推行的土地改革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土地改革的过程也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sup>④</sup>

对农民受众的主要改造则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主要是伴随着在乡村基层政权建设而展开的。

第一,“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为了动员农民行动起来,组成农民协会,并通过农民协会向农民进行阶级教育;

第二,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为了保证农业合作化的顺利进行,必须在“农民内部、社的内部以及党组织内部进行艰苦的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农村党员及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任何资产阶级思想和富农思想的影响”<sup>⑤</sup>。

<sup>①</sup> 参见边慧敏主编:《新农村建设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基于“三农”问题的视角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7—133 页。

<sup>②</sup> 张乐天:《论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政策变革与创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sup>③</sup> 陈益元著:《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sup>④</sup> 郑有贵:《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5)。

<sup>⑤</sup> 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9 页。

因此,围绕这一主题,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教育、劳动光荣和剥削可耻的教育、工农联盟的教育、合作社优越性的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

第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社教运动的主要内容:①组织和训练工作队。工作队要力求精干,其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审查。凡是在“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有严重问题而没有认真交代和认真检查的人,都不能参加;②召开人民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和公社干部会议,反复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宣读若干别的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典型材料,结合着对本地阶级斗争情况的揭露,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这些会议可以吸收贫、下中农的代表参加;③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④召开党的基层组织会议,包括公社党委会议、支部会议和小组会议,在党员中进行阶级教育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犯有错误的党员认识和改正错误;⑤发动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召开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各种会议,在做好思想工作、启发干部觉悟的基础上,进行“四清”工作;⑥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关系,积极完成生产计划和农副产品的交售任务;⑦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敌人进行说理斗争。正确处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分子;⑧成立贫、下中农组织;⑨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妇联会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和农村其他组织;⑩改选或者调整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⑪建立和健全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⑫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集体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

第四,改革开放之后的乡村政策宣传教育。最突出的有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在改革初始的六年间,中央农村政策的制定均围绕恢复发展农村经济这一主要精神展开,进而衍生出该时期农村政策的基本目标,即变革现有农村经济体制,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sup>①</sup>而从1985年到1991年,农村政策则围绕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等中心而展开,1992—2002年的农村政策则是围绕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展开的,政策调整已经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展到乡村社会生活领域,乡村教育、乡村社会保障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2002年开始则以统筹城乡经济

① 吴家庆著:《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中国政治》,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

社会全面发展为主要精神,实现从以农补工向以工哺农,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转变。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政策的核心转变体现在:① 1978—1984年以农村土地政策为核心;② 1985—1992年以商品流通和乡镇企业为核心;③ 1992—2002年,以调整、稳定政策为核心。具体内容为土地政策、所有制政策、乡镇企业发展政策、科技和教育政策方面;④ 2002年至今为政策转型时期,以税费政策为核心。

### 三、受众特点

就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而言,中国乡村传播学之受众尽管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信息传播过程中有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性别的特点,但也体现出一些共性来。

#### (一) 他者属性与自我属性的双重身份

作为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的群体——农民群体,他们始终处在社会发展的最底层中,也同样是社会信息传播的最底层。就乡村社会信息传播过程而言,他们具有自我属性。他们隶属于乡村社会,因此天然地拥有获取乡村社会信息的诸种途径,对信息的理解度、容纳度也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也即自我属性。外界的信息对他们而言,具有“入侵者的性质”,也因此具有了他者属性。他们作为信息传播的受众,也因此一方面具有自我属性,一定程度上具有自主性;另一方面具有他者属性,即一定程度上具有被排斥的特点。

#### (二) 多元性与单一性的双重特点

自城市化和工业化以来,农民的职业性特点便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口流动、农村的市场化、社会制度的变迁等方面的因素,都使得农民这一职业的特点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也因为文化教育程度的差异、地域的差异、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别的差异等等,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例如同样是观看一个电视节目,农民受众的接受度和理解度有很大的不同,这便是农民受众多元性特征的体现。随着农民受众群体自身的分化,他们之间的内部差异甚至超过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这也使得农民群体内部的信息需求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趋势。

除此之外,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地域及其群体,乡村及其农民群体相对于城市及其城市市民而言,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角色而言,又具有单一性的特点。

#### (三) 他者话语的主导型与自我话语的消解性

鉴于农民群体在整个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的弱势地位,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的话语主导权是掌握在信息强势群体手中,如大众媒介组织传播者、政府机关

相关组织传播者、企业传播者等,他们以他者话语的主导身份,以传播者所希望达到的传播效果为目的,对乡村社会的农民群体进行信息传播。在这种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农民群体的自我话语体系逐渐消解或者是被歪曲了,这一点在乡村影视剧中有很显著的体现。

换言之,作为受众的农民群体一方面被社会主流话语群体所包围着,他们在他者话语的引导下,被迫建构着自身的特色;另一方面,农民群体的自我话语在他者话语群的围困中,坚守着自身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农民群体自身的信息传播实践中,与主导话语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主导话语不仅重新塑造了作为农民受众的话语模式,并试图建构着作为受众的农民群体的思维模式和日常信息接受习惯。

### 思考题

1. 简述农民社会行为理论的主要观点。
2. 简述农民经济行为理论的主要观点。
3. 简述霸权理论的观点,并谈谈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体现。
4. 简述核心—边缘理论的主要观点。
5. 论述作为受众的中国农民在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发展特征。
6. 简述建国后农民群体的受众特点。

### 参考文献

#### 著作

[美]梅尔文·德佛勒、鲍尔—洛基奇著,杜力平译:《大众传播学绪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

魏永征、张咏华、林琳著:《西方传媒的法制、管理和自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翁秀琪著:《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第二版),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版。

[美]斯坦利·巴兰,[美]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 基础、争鸣与未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美]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张隆栋主编:《大众传播学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赵鼎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美]西奥多·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北京: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陆杨、王毅著:《文化研究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金元欢、王建宇著:《区域经济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乔启明著:《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朱玉湘著:《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王仲鸣编译:《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上海: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版。

周晓虹著:《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仲富兰著:《民俗传播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杨东平著:《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李冰山主编:《农村教育史》,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陈益元著:《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吴家庆著:《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中国政治》,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 论文

周建华、尤玉平:《美国农民教育的经验与启示》,《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冯尔康:《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载冯尔康、常建华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版。

杨开道:《农民教育》,《农业周报》第十六到十七期。

彭南生:《近代中国“半工业化”农村中的经济社会变迁》,《中国近代史》2005(5)。

张乐天:《论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政策变革与创新》,《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郑有贵:《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5)。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1963年9月。

## 第七章 乡村传播学之传播制度

就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而言,任何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新的产品等等都有一个在社会大众中传播开来的过程。这种传播过程的发生大多是在政府或相关组织的有意识的引导下或者参与下而逐渐散布开来的,政府或相关组织的传播机制可以称之为传播制度。换言之,传播制度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对传播活动的规范和制约的体系。就乡村传播学而言,传播制度是指乡村社会内部以及与乡村社会外部进行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传播活动的制约和控制体系。这种制约和控制体系的形成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中有很大的差异性,不仅与国与国之间政治制度的差异性相关联,而且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所积淀的人文社会传统相关联。

学术界一般从大众传播的视角出发,将世界上现存的传播制度分为四个大的类别。这种划分主要源于威尔伯·施拉姆与弗雷德里克·赛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合著的《媒介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中的观点,该书指出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制度与其社会政治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即威权主义传播制度、自由主义传播制度、社会责任传播制度和前苏联的集权主义传播制度。可以说,这四种传播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痕迹,该书最早出版于1956年,因此带有冷战时期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北美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产物,不仅忽视了西欧公共广播体制的特征,而且这四种理论的划分也有些牵强,并不能与社会现实的发展完全吻合。

我们这里所说的乡村传播学的传播制度,与上述的传播制度有根本上的差异。因为上述的四种传播制度是从大众媒介的管理和控制视角出发,乡村传播学的传播制度不仅仅要从大众媒介的传播制度出发,更主要是从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的立场出发、从乡村社会内部信息管理机构的特点出发来论述传播制度。乡村传播学之传播制度试图描述乡村社会内部及其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传播机制和特征。在这里,我们将乡村传播学之传播制度分为乡村农业传播制度、城乡关系传播机制两种类型。

## 第一节 乡村农业传播制度

乡村农业传播制度主要从农业知识及信息传播系统和农业推广的历史发展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还涉及到知识传播的一般理论。

### 一、农业知识及信息传播系统

#### (一) 知识传播的相关理论

##### 1.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理论

英国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是率先系统研究隐性知识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末,他出版了《个人的知识》(*Personal Knowledge*, 1958)和《人的研究》(*A Study of Man*, 1959),公开系统地论述了关于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理论。波兰尼指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又译为意会知识)。所谓“显性知识”是指用“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表述了的知识。”就知识的可接触性而言,用文字和其他形式表述了的知识是“显性”的,同时也是“明确的”。就这些知识外显的方式而言,显性知识通常是通过言语、图表等人为方式来表述的,所以显性知识又称为“言明的知识”(articulate knowledge,又称“明确知识”);隐性知识是指尚未被言语或者其他形式表述的知识,就这类知识的内隐形态而言,隐性知识是“尚未言明的”、“难以言传的”、尚处于“缄默”状态的知识,因此又称为“缄默知识”、“默会知识”、“默然知识”等。波兰尼证明隐性知识的经典比喻是:“我们能在成千上万张脸中认出某个人的脸。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却说不出我们是怎样认出这张脸的。”这类知识的绝大部分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简而言之,“我们知晓的比我们能够说出的多。”<sup>①</sup>人类任何通过语言和其他表述形式呈现的显性知识,都依赖隐性知识的存在。隐性知识具有不稳定性,对情境、个体或群体的特性等有一定的依赖性,因此在传递过程中有不断递减的特征(见图7-1)。显性知识可以存贮于文档或计算机中,稳定性较高。

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和竹内弘高(Hiroataka Takeuchi)认为,新知识产生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换过程中,他们将知识的转换过程分成了四种不同的类型: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换过程;显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换过程;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换过程;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换过程。他们认为,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换是四种方式中产生知识的最有效途径。个人拥有的

<sup>①</sup> 参见黄荣怀,郑兰琴著:《隐性知识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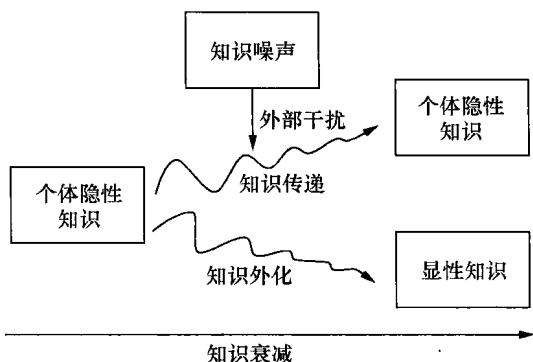


图 7-1 隐性知识传递衰减的信息论模型

资料来源:奉继承著:《知识管理:理论、技术与运营》,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4 页。

隐性知识是新知识产生过程的核心,新知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四种方式的动态作用。因此,如果这四种方式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增多,也就是说如果有更多的人参与,小组或组织中的知识就会出现“知识放大”。知识也就从个人水平上升到小组水平或组织水平,甚至是不同组织间的水平。有效的知识转换过程需要不同层面间高频次的相互作用和四种方式的共同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有价值的隐性知识快速地转换为显性知识,需要寻找到更好的相互交流和表达我们自身知识的途径。<sup>①</sup>

调查显示,在乡村传播学研究中,显性认知不是影响农民行为的主要原因。现有传播活动主要通过传播显性知识和提供一定资源诱惑的方式促进农民产生其所希望的生产行为。这种传播活动或许能在一定时期内促使农民采用某种行为,但由于其内容与方式不符合农民的认知与行为变化规律,不能满足农民培训需求,不能促进农民认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不能解决农民认知能力与个体素质这个农民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农民行为更多的是受隐性认知影响而不是显性认知影响。<sup>②</sup>

## 2. 知识传播模型:SMCR

贝罗(David K. Berlo)在香农—韦弗模式基础上,将其发展到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提出了 SMCR 模式,即知识传播的模型(A Model of the Ingredients in Communication)。这一模式含有四个基本要素:来源、信息、通道和受众。来源

<sup>①</sup> Nonaka, Ikujiro & Hirotaka Takeuchi: *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参见郭强著:《现代知识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14 页。

<sup>②</sup> 旷宗仁:《发展传播视角的农民认知与行为改变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8)。

即制码者,要考虑到传播技术、态度、知识程度、社会地位及文化背景。信息包括符号、内容及处理方式。通道是指传播信息的各种工具,如各种感官、媒体、载体等。选择合适的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受众,对其所要考虑的因素与传者相同。这一模式比较适用于知识传播活动(见图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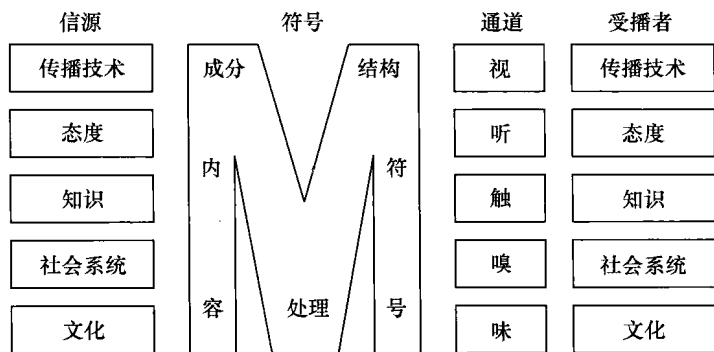


图 7-2 贝罗模式(S-M-C-R 模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钟文、余明阳著:《大众传播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9 页。

## (二) 农业知识信息传播系统

1988 年荷兰罗林(Niels Roling)在分析知识和信息区别之后,提出农业信息系统理论,将从事农业知识和信息的产生、转化、传递、存储、回收、综合、扩散和应用过程的相关组织者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视为农业信息系统,并指出完整的农业信息系统由农业研究子系统、推广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三部分构成。在农业信息系统中,农业研究子系统、推广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必须协同合作,农业技术子系统研究出的新成果、新技术,通过技术推广部门扩散到农户,农户则将技术需求及时反馈到推广和研究部门,形成双向交流。包括农业新技术、新知识在内的信息流在各子系统之间的顺利传导,是各子系统顺利衔接的保障,任何一个环节脱节,都会影响整个信息系统的运转。为保障农业信息系统的顺利运转,必须建立起包含信息反馈、信息传导、信息甄别及利益约束与激励机制在内的完整的信息系统运行机制。<sup>①</sup>

农业知识信息系统(AKIS)分为农业知识系统(AKS)和农业信息系统(AIS)。AKS 是指各种信念、认识、模式、理论、概念和其他个人或群体所积累的农业生产方面(可替代的)的经验所组成的精神产物的一个系统。AIS 是指农业

<sup>①</sup> 冯中朝、李强、郑炎成著:《中国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 页。

信息产生、传递、整理、接收和反馈的一个系统。此系统中的诸过程协力合作,共同促进农民对知识的应用。农业知识系统的构成因素包括研究系统、传播系统和用户系统,其交叉点在于生产的信息是在怎样的需求状况下得到传播和应用的(见图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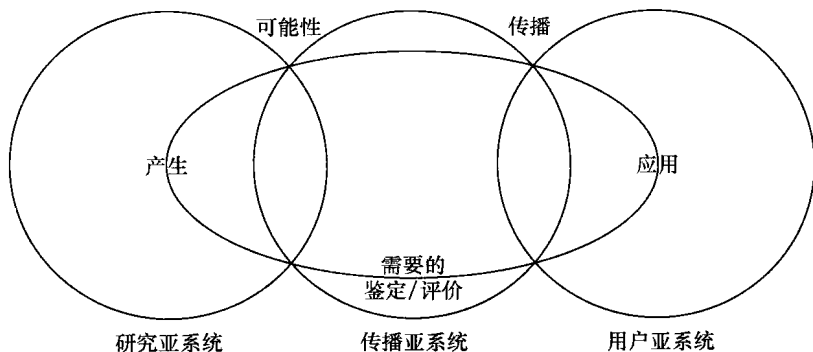


图 7-3 农业知识信息系统的构成要素

资料来源:许无惧主编:《农业推广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2 页。

从理论上说农业知识和信息系统起源于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传统的创新和创新的扩散研究以及沟通网络理论。这一部分将在第八章进行详细论述。

## 二、农业推广的历史及发展

农业推广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教育运动,该运动的目的是将科学理论运用于人类生活需要的实践中去。17—18 世纪关于农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同时在欧洲和美洲等地开始出现农业团体,19 世纪在美国便有了利用教师进行农业知识和推广的巡回活动。19 世纪中叶的马铃薯大饥荒时期,爱尔兰于 1847 年秋成立了一个农业咨询和指导性的服务机构。初成立时,它只有 10 名巡回指导者和讲师,在爱尔兰南部和西部那些饥荒最严重地区的农民中间开展工作,高峰期时增加到 30 人,是近代农业推广史中的一次重大农业推广活动。

“推广”一词首先应于 1866 年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所写的大学推广系统中,后被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教育机构所接受。“推广教育”一词则是剑桥大学在 1873 年描述这种专门的教育改革时第一次使用的,指出大学推广的目标是使大

学教育普及到普通群众。<sup>①</sup>“推广是不断地将有用的信息传递给人们的一种进行着的动态过程(沟通过程)。然后帮助这些人们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和观念来有效地利用这种信息或技术(教育过程)。一般说来,推广过程的目的是使得人们能够运用这些技能、知识和信息改善他们的生活”<sup>②</sup>。农业推广则是通过教育过程,在改进耕作方法和技术、增加产品效益和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和提高农村社会教育水平方面来帮助他们的服务和体系。

农业推广的类型有:第一,信息性推广。重点是帮助单个对象为达到期望的目标而做出最佳决策。推广服务是免费的;第二,解放性推广。推广可作为一种工具被用来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或使他们获得解放。在这种情况下,推广是通过强调结构性问题以获得社区目标的工具;第三,开发性推广(人类资源的开发)。推广也可以通过培训教育或帮助人们决策、学习、管理、交流、分析问题、成为领导者、应付压力和自我组织等;第四,劝告性推广。当政府或某一机构希望引起对某一事件如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公害等的预防性行为时,推广将作为劝说的工具,使目标团体相信这些行为对其同样有害。<sup>③</sup>

宏观而言,农业知识及信息系统(AKIS)和农业技术管理系统(ATMS)与农业推广制度的运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农业知识及信息系统是参与知识和信息的创造、转化、传送、储存、恢复、管理、巩固、传播和应用的农业机构、组织和(或)个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其目的是在特定的部门、分部门、领域或其他范围内一起合作。以支持观念的形成、决策、问题解决和创新。”<sup>④</sup>推广组织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干预,几乎所有的推广定义都强调推广是经预先考虑的、有计划的、循序渐进的、系统设计的、有目标指导和有目的性的活动。干预包括两方面:一是推广机构、组织、推广人员作用于一个目标团体或个人;二是实现干预的过程是运用沟通的手段。因为干预沟通的目的在于改革人,而不是物。根据上述原理,罗鲁(Royen,1972年)提出沟通干预的要素,即磨坊提法,并强调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见图7-4)。

农业推广体系在不同国家中均具有自身的特色,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美国在19世纪前期的农业传播,主要是由农业团体进行组织活动。1855年在密执安州通过法案成立州学院,是美国最早的农业科学教育学院,也是美国赠地学院

① [美]伯顿·E.斯旺森等著,许无惧等译:《世界农业推广》,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② 同上书,第2页。

③ 转引自[丹麦]约恩·德尔曼著,聂闯、吴俊译:《中国农业推广—农业革新及变革中的行政干预之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④ 同上书,第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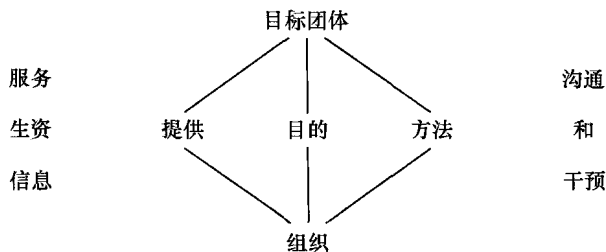


图 7-4 沟通干预的要素

资料来源:参见[丹麦]约恩·德尔曼(Jorgen Delman)著,聂闯、吴俊译:《中国农业推广—农业革新及变革中的行政干预之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的先驱。1862年2月林肯总统签署了《莫里哀法》(Morrill Act of 1862)亦称赠地学院法。该法案规定:拨给各州一定面积的联邦公有土地拍卖,以筹集资金,每州至少成立一所开设农业和机械课程的州立学院。这个法案促进了农业教育的普及。18世纪中后期,美国赠地学院从成立以后,为适应农民的要求参加了农业推广活动。到1907年,39个州内的42所学院都参加了农业推广活动。1914年5月8日,威尔逊总统签署了《史密斯—利弗法》(Smith-Lever Act),即合作推广法。该法规定,由联邦政府拨经费,州、县拨款,资助各州、县建立合作推广服务体系,推广服务工作由农业部和农学院合作领导,以农学院为主。这一法案的执行,形成了美国赠地学院教学、科学试验和农业推广三结合的体制。<sup>①</sup>

美国目前的合作农业推广制度是政府领导的以州立大学农学院为主体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结合一体化的农业推广制度,其组织机构由三方面组成:联邦政府农业部推广局、州立大学农学院、县推广站。这个联邦政府一州一地方三级合作农业推广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全国协作网。联邦农业部推广局是全国农业推广工作的管理机构,也是农业部的宣传教育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和领导农业推广工作,而不是直接从事推广工作。它指导州推广部门制定和执行推广计划,有效地协调各州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州赠地学院或州立大学农学院是美国合作推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州立大学农学院的农业推广中心是美国推广工作的中级管理机构,由大学的董事会或教务委员会选出该机构的领导人,并经农业部批准任命。在州农业推广中心主任的领导下,设有若干办公室,分别领导农业推广示范、4-H<sup>②</sup>俱乐部及运销工作等;县推广站(县推广办公室)是合作推广体系的基础,是联邦农业部推广局和州农业推广中心在地方上的代理机构,与农学

① 参见任晋阳主编:《农业推广学》,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4页。

② 4-H即head(头脑)、heart(心智)、health(健康)、hand(实践),是由政府向教育推广机构推动的一个教育计划。



院共同负责全县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美国的农业推广内容包括农业科技推广、家政和 4-H 俱乐部三个部分。农业科技推广的对象是农村中的成年男子,学习最新的农业技术知识,推广最新的良种、采用最新的耕作方法和其他先进技术。家政则以农村中的成年妇女为对象,学习编织、料理家务、美化环境等知识。4-H 俱乐部是农村青少年组织,它们同农村学校配合,把 10—18 岁的农村青少年组织起来,学习和试验有关农业的科学知识,从小培养他们对农业科技和生产劳动的兴趣。

农业推广体系的工作基本上是以引导启发为主,采取了自下而上的咨询推广方法。推广宗旨是“帮助你把知识用于实践”。推广形式有宣传培训、示范表演、印发资料、访问农民等多种形式。国家在各级推广机构都配备有较先进的仪器和宣教设备,随着高技术农业上的应用,推广方法不仅采用电视网、录像等先进手段,电子计算机也开始在农业推广工作中应用。<sup>①</sup>

日本则自明治维新年代起,就开始学习欧美农业改良运动,通过政府开展农业改良试验和普及应用的工作。明治内阁中开始设立管农业的劝业寮,1877 年改为劝农寮。从 1870 年起,先后设立劝农场、育种场、垦殖学校,组织农谈会,逐步发展农业改良与教育。1881 年设农事教场、农事讲习所。1885 年,由农商务省和日本农会设“农事巡回教师”,对农民进行通俗教育。1877 年日本政府颁发《农事改良必行事项》以后,各府县相继设立农事试验场,并由试验场职员兼任巡回指导,进行农作物改良试验和巡回讲授。1899 年制定《农会法》,成立了农会。农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农事改良活动,选派经过农事试验场培训的技术员巡回指导,推广试验场的研究成果。<sup>②</sup>

日本现有的农业推广制度筹建于 1948 年,是仿效美国的。其与日本原有农业推广制度不同之处在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政府为配合军事需要,增加农业生产,于 1943 年将全国所有各种农民组织合并起来,改组为农会,透过农会执行种种临时管制与取缔工作,以配合国家的需要。二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成立军政府。鉴于原有农会制度不合民主精神,遂由其所属之国家资源部重新设计,于 1948 年 7 月颁布“农业改进法”,将全国原有农会一律撤销,将此项综合性的组织,拆散改组为各种性质之合作社。<sup>③</sup>

1955 年日本修订《农业改良助长法》,由国家和地方共同负责发展农业改良普及。在中央农村省的农业改进局分设推广、研究处。推广处下设三科;推广

① 参见罗伟雄、赵鲲鹏著:《发达国家农业管理制度》,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5—411 页。

② 任晋阳主编:《农业推广学》,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 页。

③ 参见钱理群编著:《钱天鹤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68 页。

科,以成人为对象;教育科,以青年为对象;家庭改进科,以妇女为对象。在县府的农政科内设农业普及组,与县农事试验场的专家共同领导,分区派驻农业改良普及员和生活改进普及员。

在多次修改后的《农业改良助长法》的影响下,形成了日本现有的农业推广体系。主体是县政府所属的地域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在县范围内按区域设若干个农业改良普及中心,1994年以前称改良普及所);中央级不设农业推广(改良普及)专事机构,市、町、村也不设同类机构。<sup>①</sup>

## 第二节 城乡关系传播机制

城乡关系传播机制与一个国家、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路径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城市化发展路径又与国家的农业政策、城市化管理模式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密切相关,不同国家人口迁移的层次与时间,一方面可以折射出该国城乡信息传播的发生机制,另一方面则显现出该国城市化、工业化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

城乡之间关系的发展,学术界有两种解释模式:一是推拉因模式。二是系统分析模式。推拉因理论是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动力的一种模式,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把乡村人口拉了进来,“拉因”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乡村破产使乡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造成城市人口膨胀,“推因”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所以,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形成的动力机制主要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经济收入与生活方式和质量上存在着一定的梯度,不断地吸引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而使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1970年马卜贡杰(Mabogunje)提出了城乡人口迁移的系统分析模式。该模式认为,城乡人口迁移的原因不仅在于移民本身,更为重要的在于农村和城市的控制性次系统及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调节机能,这种机能具有控制移民数量的功能。农村控制性次系统主要通过农村各种组织机构、家庭和家族等来实现(见图7-5)。

从其他国家城乡人口迁移机制可以看出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诸国城市化道路的差异,及其由此而客观形成的城乡关系传播机制。

英国的城乡人口的变迁:英国乡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最早开始于11—12世

<sup>①</sup> 参见韩清瑞主编:《国外农业推广经验及启示》,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任晋阳主编:《农业推广学》,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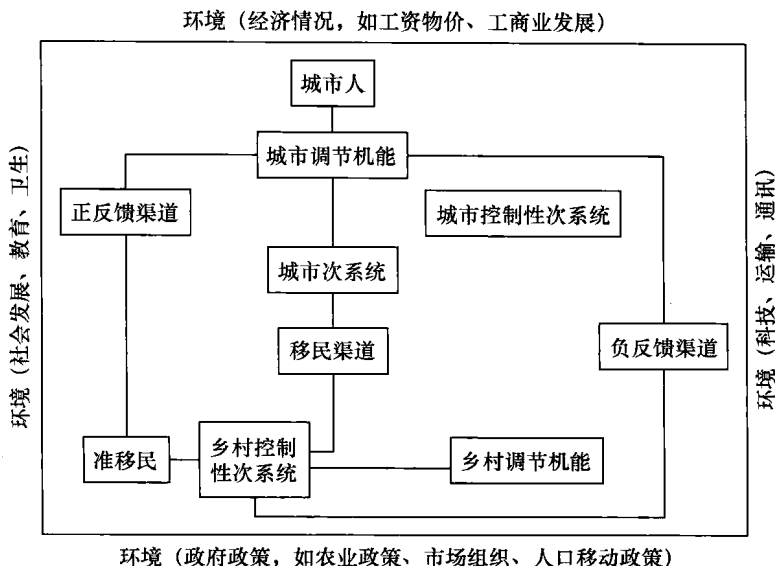


图 7-5 马卜贡杰模式

资料来源：转引自孔祥智：“英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是怎样处理工农关系的？”，《前线》1999（4）。

纪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这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次乡村人口向城市持续转移的浪潮。这一时期迁移的对象主要是穷人，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存，距离也比较长。在 15—17 世纪，英国又出现了第二次劳动力快速向城市转移的浪潮。这一时期迁移的对象主要是商人、工匠和青年女性，迁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前途和获得丰富的生活资料，迁移的距离较短。从转移的模式来看，英国乡村人口非农化主要是选择了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以暴力为核心内容的强制性转移模式。英国城镇非农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也是通过暴力的方式从本国农村强制性转移出去的。<sup>①</sup>

英国的城乡人口迁移的动因主要在于：第一，乡村人口的持续增长。近代以来，英国的乡村人口一直不断增加。适度的人口增长在开始时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又加速了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得不少无地可种的农民陆续迁移到一些矿区或者是附近的城市；第二，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的促进。始于 15 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使许多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失去了收入来源，同时，乡村也在进行着农业经济的变革，这双重的因素使得在乡村失去生存基础的农民不得不加入自由流动的人流，成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主要劳动

<sup>①</sup> 孔祥智：《英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是怎样处理工农关系的？》，《前线》1999（4）。

力;第三,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产业结构的变化,造成了城市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第四,人口流动制度障碍的消除。工业革命以后,为了满足工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政府颁布和修改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消除了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其中,1846年颁布的《贫民迁移法(修正案)》使一些贫民不再被遣返原籍;1865年议会通过的《联盟负担法》扩大了救济贫民的区域范围和贫民居住地范围,使限制定居地不再可能。这些约束性制度因素消除之后,大大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和英国的城市化进程。<sup>①</sup>

换言之,资源、市场与产业结构是英国城市化的前提,工业革命的进程也就是城市化的历程,而城市化的进程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完成。“大跃进”与“自由放任”是英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英国早期城市化的“激进式推进”过程,类似于休克疗法的“大跃进”方式。这种“激进式推进”与“自由放任”的管理模式是相互作用的。英国早期城市化以“自由放任”为基本特征,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从宏观来看,英国城镇化进程发展过大过快,出现严重的“城市病”,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只有到20世纪初,英国才出现了将城市问题与乡村问题合并解决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理论——田园城市构想。到二战前,英国全国上下达成了在全国范围进行城乡规划的共识,从而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城乡规划体系,促进了城市问题与乡村问题的解决。<sup>②</sup>

美国的城乡人口的变迁机制:1870年之前,美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3/4的人口生活在乡村,乡村社会是美国社会的主要特征。1870年以后,英国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成果随着移民浪潮大量转移到美国,使美国开始了以电力、钢铁等先导产业为主的工业革命,把工业建立在很高的起点上,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工业化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城市劳动力的稀缺,进一步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从而形成了“棘轮效应”,<sup>③</sup>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

① 聂洪辉:《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2005年中国劳务经济发展论坛提交论文。

② 孔凡真:《城市化关键在于农民命运的改变》,《农民日报》,2008年7月23日。

③ 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也可译为“制轮效应”,指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的稳定性对短期消费减少的抑制作用。美国经济学家J.杜森贝利(J. Duesenberry)在相对收入假说中提出了这一概念。根据相对收入假说,人们的消费行为是不可逆的,即消费易于增加,而难于减少。因此,人们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现期收入,而且还取决于他在过去最高收入水平时所形成的消费习惯,或者说取决于过去的高峰收入。这样,即使在短期人们的收入暂时减少了,他们仍要维持过去所形成的消费习惯,用过去的储蓄甚至借债来进行消费,从而使消费的减少小于收入的减少。因此,在经济衰退期,尽管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但消费并不会同比例减少。这样就减轻了经济衰退的程度,使上一次繁荣时期由于收入增加而引起的消费增加不会完全减少。棘轮效应在经济衰退、萧条和复苏时期一直发生作用,直至经济达到繁荣,经济活动超过前一次繁荣时,它的作用才消失。棘轮效应抑制了消费的减少,减轻了经济的衰退程度,起到了自动稳定经济的作用。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实际上棘轮效应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快。工业化还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城镇化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而且使大批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城镇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美国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仅用了 50 年的时间。

美国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实现美国乡村的社会转型,主要因为:首先在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时期,英国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转型过程,英国对美利坚民族的殖民统治,不可避免地带着资本主义的印记;其次:由于美国社会的发展机遇工业革命的基础,在乡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没有遇到强大的传统力量的反抗;第三,美国的独立战争、西进运动、南北战争对于美国民族意识起到了培育的作用,美国独立战争的理念——“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成为美国民族精神的灵魂。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的现代化奇迹时,就特别推崇美国的民族情感。<sup>①</sup>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美国进行考察后认为,世俗化的清教主义或新教伦理是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支柱。“历史事实证明,那种精神状态最适合资本主义企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的最合适的心理动力来自这种资本主义精神。”<sup>②</sup>

日本城乡人口的变迁机制:日本乡村劳动力能够顺利转移出去,首先得益于其就业容量较大的非农产业和人口条件。以工业地区主导产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扩大是其根本原因。同时,1945 年以后的近 10 年间,日本异乎寻常地迅速降低了出生率,这使其有效避开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减轻了乡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其次,迅速发展的工业大量吸收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再次,日本政府在乡村人口非农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1 年,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和《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规定在 10 年内要将农村中农户总数的 60% 转移到非农业领域。<sup>③</sup>

法国城乡人口迁移制度的变迁机制:在 19 世纪中叶之前,法国乡村大部分人口还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乡村公社中。1830—1850 年,阿尔萨斯、皮卡尔迪和诺曼底等地的乡村小工业甚至因人口增长而有所增加。在这些小工业中劳作的是农村中的业余劳动力或季节性劳动力。至 1852 年,还有 100 万农民在乡村小工厂里做工,平均每年做工 150 天。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法国工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冲击着这种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使农业与小工业及

① 申延平著:《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论》,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 页。

② [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慧美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8 页。

③ 朱信凯:《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中国软科学》2005(1)。

小手工业发生分离,乡村工业衰落。<sup>①</sup> 第一阶段(1836—1851)。这一段时期法国人口出生率高于死亡率,仅少数几个地区除外。绝大部分省向外迁移的人口比向内迁移的多,但各自迁出的数量都不大,迁出者的目的地相对集中;第二阶段(1851—1914)。这一时期法国人口的出生率逐年下降。乡村人口仍然占多数;第三阶段(1919—1954)。这一时期的人口问题必然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不可分。大战中死亡的主要是年轻人,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十万年轻人阵亡以后,留下了几乎同等数量的年轻寡妇,这使本来自然增长率就低的法国人口资源受到严重威胁,就是在这种人口形势极端严峻的情况下,法国乡村人口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地区缓缓流动;第四阶段(1954年以后)。法国绝大部分省的出生率继续上升,并超出了死亡率,已恢复到19世纪初的水平,这一时期的乡村人口转移,一方面保持了上几个阶段的共有流向,即人们大量地涌入巴黎地区。另一方面,中小城市有所发展,吸引了部分乡村人口,这就延缓了以往的省际流动,促进了省内的城市化;城市人口外移的现象开始出现,也可称城市人口倒流。<sup>②</sup>

### 第三节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传播制度

中国乡村传播制度主要从农业传播制度、城乡传播制度和大学生村官制度三个层次进行论述。

#### 一、中国农业传播制度

##### (一) 农业推广制度

##### 1. 1949年以前的农业推广传播制度

据记载,中国古代在尧、舜以后就开始建立劝农制度,设劝农官来指导农民种地。将“推广”一词用于农业始于宋代,宋代开始设有“农师”,也即农业技术推广员或者叫农民技术员,这些人不是“官”,朝廷不给薪俸,他们是直接从指导的农民增产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报酬,明、清两朝的农业推广体系已逐渐形成。尤其是清代,在作物良种推广上创造了一套比较科学的试验、示范、推广的程序。

近代农业技术推广机构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农科创办,学习美国赠地学院的模式,结合教学、科研开展推广工作。进入20世纪30年代,政府办的推广

<sup>①</sup> 许平著:《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 19世纪—20世纪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sup>②</sup> 参见王章辉、黄柯可著:《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7页。

机构兴起,并逐渐形成体系,成为推广工作的主体。1930年,国民政府制订《实施全国农业推广计划》,其目标是:在全国各地设置农业推广委员会,教育农民。其原则是:(1)指导及扶助,养成农民自动自助的能力;(2)教授农民新的科学知识;(3)以最少人力财力获取最大效果;(4)除办成人农民教育外,还兼办农村妇女及青少年教育;(5)与当地机关团体保持密切联系。公布全国农林矿品展览会章程及办法、农产竞进会规则、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章程等。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通过省农业推广处组织纲要,农业专科以上学校农业推广处组织纲要。农矿部与中央大学农学院先后在江宁县第四区及汤山镇合办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推广改良稻、麦、棉及蚕种、猪种,并倡导组织合作社及农户储押仓库。

1932年,成立中央农业试验所,目的在于(1)研究及改进中国农业技术及方法;(2)就中外已知之良法,加以研究及试验,并推广其成果;(3)调查农业情况,并引进有益之动植物;(4)调查及研究农村经济。1933年,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在南昌设立农业服务中心区。1937年国民政府迁四川后成立农产促进委员会,又公布《县农业推广所组织大纲》、《全国农业推广实施计划纲要》及《实施办法大纲》。1940年,农产促进委员会增设农业推广巡回辅导团,对地方进行推广。1942年,在各省成立推广繁殖站。1943年,公布农业推广委员会组织条例,设粮食增产、棉花及工艺作物、推广机构、推广材料、宣传及辅导6个组。1945年公布《县农业推广组织规程》。1946年,中美农业合作技术团实地考察全国农业推广机构后,提出农业推广是一种教育工作,旨在服务及指导农民及其家庭如何经营农业,并协助解决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之一切问题。推广工作的任务,一是了解农民的意见和要求,以供研究者参考;二是以最好的服务提供农民知识,以供选择采用。到1948年底,全国有农业推广人员2446人(中央级396人,省级550人,县级1500人),还有在公私农业机构从事推广工作的专职兼职人员700人。在15个省派有代表,在16个省的农林厅或农业改进所附设农业推广机构,在11个省按相当于专区的范围设立19个农业推广辅导区。<sup>①</sup>

## 2.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农业技术推广制度

1949年初期在接收国民党农业试验场、所的基础上,经过扩展充实,形成大区设农业科学研究所,省、地设农事试验场,县设示范繁殖农场的农业科技体系。要求以示范繁殖农场为中心,互助组为基础,劳模、技术员为骨干组成技术推广网络。以后国家兴办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迅速发展,形成体系,成为推广工作的主体。

<sup>①</sup> 杨士谋编著:《农业推广教育概论》,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1951年,在黑龙江省满洲里建立了第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由此揭开了在东北、华北地区开展试办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序幕。1952年10月,农业部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建立技术指导站的意见。《意见》要求以县为单位,根据经济区划的要求,平均每15万亩(一个区)设一个包括农、林、水利的综合技术指导站,每站配备干部5人左右。同时规定,农业技术指导站在行政、技术上受农科所直接领导;在业务上受上级农业技术部门的指导,并提出以国营农场为中心,互助组为基础,劳模和技术员为骨干的技术推广网的建设思路。1953年,农业部颁布了《农业技术推广方案(草案)》。《草案》要求各级政府设立专业机构,配备专职人员,逐步建立起以农场为中心,互助组为基础,劳模和技术员为骨干的技术推广网。到1953年底,全国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3622个,有干部28327人。<sup>①</sup>

人民公社时期,推广机构和人员均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在全国兴起了由于生产需要、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即县办农科所、公社办农科站、大队办农科队、生产队办农科小组)机制,承担了农业推广机构的工作,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解体。

从1976年起,中央政府开始每年拨出专款资助四级农科网中的机构购买各种各样的实验室设备和田间的观测仪器。<sup>②</sup>1979年农业推广体制开始全面改革。从县一级开始,把原来分散独立的县农科所、农技推广、植保、土肥等专业站和农业技术学校结合起来,成为试验示范、培训、推广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乡一级重建与县“中心”业务相一致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在县以上设立了从中央、省到地区(市)的农业技术推广管理机构,组成了现今的由政府领导、农业行政部门主管的从中央到县、乡的农业技术推广新体系。<sup>③</sup>

政府事业单位性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主要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农业机械化、林业技术推广和水利技术推广、农业经营管理等七个体系。长期以来,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都是按照“条条管理”的模式设置的,按照所属的专业分成了农业、畜牧、农机、水产、林业等不同部门。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农业对科技的需求趋向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尤其是对于兼业农户来说,需要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和不同环节的生产技术。因此,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户的综合性技术服务的要求不相适应(见图7-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地、县、乡

① 陈荫山主编:《前进中的中国农技推广事业》,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② 杨士谋编著:《农业推广教育概论》,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③ 邹品卿:《农业推广组织与管理》,参见聂闻、吴俊主编:《农业推广的重要趋势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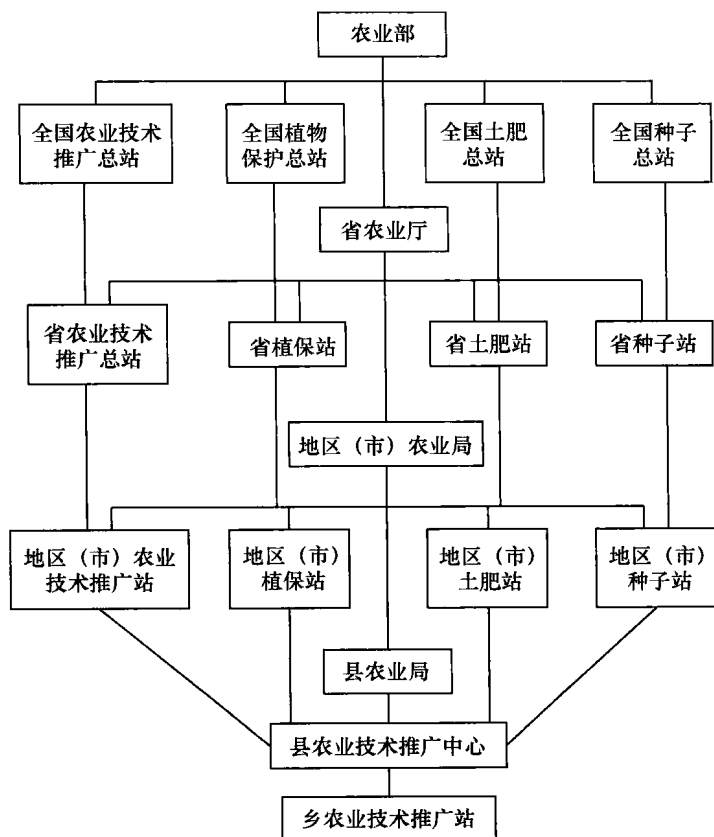


图 7-6 国家、省、地、县、乡各级农业推广机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邹品卿，《农业推广组织与管理》，参见聂闯、吴俊主编：《农业推广的重要趋势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4 页。

多层次、多功能体系，在传递服务这一传统模式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农业推广的优化模式：

(1) 项目辐射型。这种农技推广模式是以地方政府出面组织协调，利用实施各类项目（如“丰收计划”、“星火计划”等）的过程，集中应用各项高新技术与适用增产技术，建成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试验区、示范区、技术园，通过项目自身所体现的科技进步威力与经济效益，调动农民学习新技术的积极性，从而加速农技推广的步伐，扩大推广应用面。

(2) 技术承包型。技术承包是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推广农业技术的做法，通过同农民或生产单位签订技术承包合同，运用经济手段和合同形式推广农业技术。具体形式有联产提成技术承包、定产定酬技术承包、联产联质技术承

包、集团技术承包等。

(3) 技物结合型。庄稼医院、开方卖药等形式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农技推广部门利用本身的技术优势,加上物资配套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创办“庄稼医院”,把物化形态与知识形态的农业科技成果商品结合起来,一起出售给农民。

(4) 技术转让型。指农民具有自行开发、应用新技术的素质和购买新技术的意愿,在推广人员的中介和协助下,向技术发明人购买新技术。

(5) 实体服务型。这种模式是指围绕推广服务,兴办经济实体。很多地方以优质农产品基地为依托,发展种养加、农工贸、产供销一体化的经济实体,进入流通领域。

(6) 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型。技术咨询是指推广人员向农民提供各种技术咨询,实现推广技术的目的。在实践中采用了个体咨询、团体咨询和大众传播等形式。

(7) 公司加农户型。这通常是指涉农的公司企业直接与广大农户建立联系,为其提供公司所生产的新品种、新化肥、新农药、新农机具,并派技术人员指导使用。在实践中,这类公司通常围绕当地的支柱产业或重点产品,以利益机制为纽带,通过契约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

(8) 民间组织加农户型。这种模式是由各种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和农村兴起的各种专业性服务组织进行产前、产中、产后的自我服务。<sup>①</sup>

### 3. 传播学视角的中国农业推广制度研究

20世纪70年代左右,国外传播学者对中国农业技术传播发生了兴趣。在施拉姆与勒纳1976年主编的《传播学与变革》一书中,涉及到有关于中国乡村信息传播经验的评述,并用一个章节专门对此进行讨论。罗杰斯1983年出版的《创新的扩散》一书,对当时中国的典型大寨和赤脚医生,作了传播学意义上的诠释。

1980年,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小组对中国农村的培训系统作了专门调查,并形成专著《中国农业培训系统》。此书实际上对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推广系统的一般做法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并辅以传播学角度的理解,从多方面加以肯定。实际上,在此之前以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自己还没有出现过这类著作。此后,随着中国的开放,国外传播学、农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对中国农业进行考察、研究,并写出很多论文,代表了他们对中国农业推广工作的研究和传播学角度的思考。

<sup>①</sup> 参见杜鹰主编:《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180页。

20世纪90年代,丹麦学者约恩·德尔曼对中国农业技术推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实证研究。他指出“农业推广是专业人员用来导致为获得个人、集体和国家目标的自愿变化的一种政策工具。为达到其目标,农业推广需要人员、经费和其他资源。这些资源由机构(组织)支配,这个机构可以是国家的、集体的或私有的。”为此,他利用了传播学和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的农业推广机构在农业推广领域中逐渐退出了国际主流,而且其推广方式与实践很少为外界所知”<sup>①</sup>。

## (二) 科技特派员制度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传统的农业推广制度与农户的信息需求不相适应的现实背景下诞生的。这一制度首先由福建省南平市于1999年试点,以期可以在技术供给和信息需求方面嫁接农户与技术供给部门之间的及时而有效的联系。经过6年的试点和摸索,南平市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由40%提高到50%,农产品销售率从50%提高到75%。有科技特派员的地方,农民收入年均增幅达到了11.5%,有的高达20%(从2001年开始,南平市农民收入平均增幅为5%左右)。

南平经验的主要内容是:(1)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将南平市相关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派下去”,并签订相应的科技特派员服务合约;(2)通过鼓励各种有偿服务模式,利用“利益共同体”的方式让科技特派员在乡村“扎下根”;(3)利用矩阵结构,结合科技特派员个人专业特长和团体优势;(4)利用“典型示范”的方式逐步引导农户采纳先进生产技术;(5)构造“宝塔型”新型科技传导网络,利用科技特派员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实现“科教携手”的良性循环。<sup>②</sup>

自南平经验以来,按照“因地制宜、自愿选择、分类指导、梯度推进”的原则,2002年,全国首先在西北地区五省区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2003年在全国许多个省份陆续开展。2006年,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了对试点工作的宏观指导和宣传推广的力度,推动试点工作向纵深发展,科技特派员制度试点地区由西北迅速扩展到西南、中部、东部,呈现出了良好发展态势。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机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单位具有一技之长的科技人员,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通过政策鼓励、市场导向和机制创新,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实现科技“高位嫁接、重心下移”,形成科技人员基层创业活

<sup>①</sup> 参见〔丹麦〕约恩·德尔曼著,聂闯、吴俊译:《中国农业推广—农业革新及变革中的行政干预之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

<sup>②</sup> 孔祥智、方松海、李圣军等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福建省的经验及意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120页。

动的长效机制。

## 二、城乡关系传播机制

### (一) 1949年以前城乡关系传播机制

城乡关系是指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流动和空间格局等因素相互影响状态的综合体现。农业时代由于没有城市的存在,也就没有城乡关系问题,那时的城市和乡村是无差别的统一状态。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城乡关系是分裂的,也是二元结构的状态。就中国城市发展史而言,从春秋战国时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的兴起,至清朝前期(鸦片战争前)的三千多年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城市始终是处于皇权控制之下的,是统治集团进行有效统治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各级城市就是各级政府的治所所在地,由城市辐射状地统治着乡村。据统计,1843年中国共有大小城镇1653个。<sup>①</sup>

农业时代中国城市和乡村的个性特征,表现在城市与乡村结构关系上,便是城市统治和剥削农村,城乡经济关系的物质流向便自然而然地呈现“单向流动”——乡村向城市流动的状态。从政治上讲,乡村依附于城市,城市对乡村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与控制权。从经济上讲,城市则依赖于乡村而存在和发展,城乡关系因而呈现出一种天然的联系性。

与欧美社会相比,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其所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用“城乡统一体”(urban-rural continuum)一词来形容19世纪之前的中国城市与周围乡村的和谐关系。他们认为在传统中国,城乡差别(特别是社会文化方面)不明显,因此欧洲城市人的优越感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并不显著,这是因为,首先中国的上流社会人物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士绅文人阶级,其社会经济基础偏重于乡村而非中心城市。住在城市中的士绅阶层人物,以及许多离乡背井在外从事各种职业的人物,总是与他们的原籍保持关系。他们的“根”和自我意识基本上仍属于乡村;其次,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没有割裂成城市和乡村两大块。与欧洲不同,中国城市不一定是保存文化与宗教的中心;再者,中国城市没有欧洲社会那种集合性的自我认同感,没有都市标志或“都市公民”。城乡之间各种性质的交流和移民,使欧洲人那种都市优越性在传统中国没有基础。<sup>②</sup>

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在独立发展了数千年之后被强大冲力所中断,加之

<sup>①</sup> 参见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

<sup>②</sup> 卢汉超:《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见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400页。

中国社会完整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完成,也不存在充分而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客观社会前提。外在的冲击诱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它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缓慢地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城市社会在内外力量的双重作用下,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变迁,继而重新塑造了近代中国独具特色的城乡关系。在城市工业与乡村持续败落共同发生的状况下,城乡之间的分化和差异急剧加速,“城乡一体化”逐渐为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所取代。

概括而言,20世纪城乡关系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城市的支配作用与辐射功能有限,城市拉力弱化。一方面由于城市经济结构与社会分工使部分农民获得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结构的畸形化和工业化的低度发展,又使城市对大量涌入的乡村人口严重排斥。同时,近代中国城市数量相对不多,规模不大,城市经济发展畸形,很难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第二,乡村的推力作用异化。中国乡村的自然经济结构经过千年的发展,其根基在乡村,从没受到过任何剧烈触动,近代以来,乡村的封建剥削没有改变反而日益加重。正因为乡村没有发生过经济意义上的革命,所以不能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更不可能走上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乡村市场的萎缩对城市化的阻力。在中国近代的城乡关系链中,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作用,城市拉力不足,乡村推力弱化,这两个关键作用力发生了松弛、扭曲,甚至变形;城市没有带动乡村共同发展,非但不能充分吸收农村剩余人口,反而以乡村的极度贫困为代价促进自己的畸形繁荣;乡村没有推动城市的发展,反而与城市不断拉大差距,使城市发展失去了后劲。<sup>①</sup>

## (二) 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关系传播机制

1949年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是二元社会结构的基础。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二元”特征:一元是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元是生产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就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之初非熟练劳动者是充裕的。<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437页。

<sup>②</sup> [美]阿瑟·刘易斯著,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149页。

我国城乡之间的差异,自1949年之后并未减弱,就深层次而言反映出中国建国60年来的城乡关系不仅仅是二元经济,而且是二元社会。一元是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另一元是具有城镇户籍的城市居民即“城里人”。户籍制度是将二者截然分开的标志,并成为城乡二元社会在相互割离情况下运转的最基本的体制保障。主要差异表现在:粮食、副食品和生活燃料供给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等方面。

### (三) 改革开放后的城乡关系传播机制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概念的普及,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形成,城乡关系形成了新的特点。首先,农民工群体成为新型城乡传播关系的促进力。起初,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状态下只能产生并停留在乡村内部,但却已从农业分离和农民中分化出来,在乡村产生了非农产业,这就首先打破了“城市—工业、乡村—农业”二元经济结构,推动了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换言之,农民工进城是改革开放后城乡关系发生转变的重要一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之一。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存在并松动的条件下产生,反过来又反作用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断地改变着城乡二元社会的现实格局。同时,农民工又是中国社会利益机制重新调整的产物,是中国的城乡关系重新调整的产物;

其次,总体而言,城乡关系由封闭走向交流和开放。城乡之间的经济联合体、文化联合体等日益增加,城乡居民之间的人际交流领域也在逐渐扩大,从乡村旅游到文化下乡,从干部下乡、大学生村官到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的大幅度提高,城乡之间的关系尽管依然在户籍制度框架中缓慢推进,但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力度在未来将会越来越大。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在逐步推行。1989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城市规划法》和1993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村民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中所涉及到“一法一条例”的二元结构也被2008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城乡规划法》所取代。

### 三、大学生村官传播制度

大学生村官制度在中国的推行历经了自发性探索到制度性全面展开的过程。1995年,为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乡村基层干部。1999年,海南省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定安、临高、东方等市县先后组织招聘大学生“村官”。同年,浙江省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地区。2000年3月,广州市天河区公开招聘52名大学生“村官”,全国各地3000多名大学生前往求职。2002年河南省鹤壁市招聘205名大学生“村官”,拉开了河南省大学生“村官”工程序幕。2004年,河北省邢台市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决定每年选派1000名大学生到农村工作,5

年内实现全市 5 200 个行政村都有大学生“村官”的目标。到 2004 年底,全国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省市区发展到 10 个,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大学生“村官”工作逐步进入到多省联动、以地区为单位的整体推进与探索阶段。

2005 年 7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要求从 2006 年开始,每年选拔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争取用 3 到 5 年时间基本实现全国每村至少有一名高校毕业生的目标。在此政策指导下,中国很多城市开始有组织地输送大中专毕业生投身广大农村;2006 年 2 月,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此后,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大范围试验阶段。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可选拔大中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到乡村任职,改善乡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截至 2008 年 2 月底,全国共有 28 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 17 个省市区启动了村村有大学生“村官”计划。<sup>①</sup>

2007 年 4 月 17 日创建的大学生村官网(www.54cunguan.cn),其主要宗旨是关注大学生村官、关心大学生村官、关爱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村官网(www.54cunguan.cn)的着眼点在于关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措施和成就,是大学生村官助理交流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综合性平台。从 2008 年开始,中组部等相关部门决定用五年时间选聘 10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全国各个省市大规模开展,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调查显示,95% 大学生“村官”经常做整理文件和档案工作;84% 的人为村里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协助发展特色农业、有机农业,创办企业及科教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等;44% 的人经常做治安联防;30% 的人常陪同上级领导进行工作检查;28% 的人经常反映民情。47% “村官”表示经常与村民接触,21% 的“村官”表示熟悉村民的家庭情况。有 77% 的大学生“村官”认为自己受到了当地村民欢迎,有 79% 的大学生“村官”表示受到了当地各级领导的欢迎。有 95% “村官”认为自己合格。<sup>②</sup>

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实行过程中,是逐步推进的,并带有强烈的行政化和地域

### 思考题

1. 名词解释: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农业知识信息传播系统,农业推广。
2. 简述日本和美国农业推广的特点。
3. 简述马卜贡杰城乡人口关系系统模式的主要内容。
4. 从世界各国城乡人口迁移机制的特点,论述中国城乡人口迁移机制的优缺点。
5. 简述中国1949年以来的农业推广制度的特点。
6. 简述科技特派员制度模式的形成过程。
7. 简述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发展历程,并谈谈自己对大学生村官制度的看法。

### 参考文献

#### 著作

[美]威尔伯·施拉姆等著,戴鑫、展江译:《报刊的四种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黄荣怀、郑兰琴著:《隐性知识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奉继承著:《知识管理:理论与技术与运营》,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Nonaka, Ikujiro & Hirotaka Takeuchi: *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郭强著:《现代知识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钟文、余明阳著:《大众传播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冯中朝、李强、郑炎成著:《中国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

[美]伯顿·E.斯旺森等著,许无惧等译:《世界农业推广》,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丹麦]约恩·德尔曼著,聂闯、吴俊译:《中国农业推广—农业革新及变革中的行政干预之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

罗伟雄、赵鲲编著:《发达国家农业管理制度》,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钱理群编著:《钱天鹤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年版。

韩清瑞主编:《国外农业推广经验及启示》,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申延平著:《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论》,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德] 马克斯·韦伯著, 康乐、简慧美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许平著:《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 19 世纪—20 世纪初》,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王章辉、黄柯可著:《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杨士谋编著:《农业推广教育概论》, 北京: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陈萌山主编:《前进中的中国农技推广事业》,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 年版。

杜鹰主编:《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 年版。

孔祥智、方松海、李圣军等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福建省的经验及意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1840—1949 年》,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美] 阿瑟·刘易斯著, 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

王延中著:《经济组织与城乡发展》,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8 年版。

### 论文

旷宗仁:《发展传播视角的农民认知与行为改变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8)。

孔祥智:《英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是怎样处理工农关系的?》,《前线》1999(4)。

聂洪辉:《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2005 年中国劳务经济发展论坛提交论文。

朱信凯:《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中国软科学》2005(1)。

卢汉超:《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载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王艳艳:《试论“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演化路径》,《科技新报》2008 年 8 月 22 日。

北京大学生村官成长课题组:《95% 村官认为自己合格, 7 成表示不后悔》,《北京日报》, 2009 年 5 月 6 日。

## 第八章 乡村传播学之效果研究

乡村传播学之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微观效果的分析,二是宏观效果的分析。宏观效果的分析主要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简要描述乡村传播综合行为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力,探讨在特定的时期内,某些具体传播行为的合力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其中包括隐性的和显性的影响力。微观效果则着眼于某一具体传播行为的效果。

### 第一节 乡村传播学之微观效果理论

微观效果理论主要从平衡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态度改变理论三种视角进行论述。

#### 一、海德的平衡模式理论与纽卡姆的对称模式理论

海德(Frize Heider)假定,个人在不平衡状态会产生紧张感,同时也会产生恢复平衡的力量,并将平衡状态定义为:被感知的个体与个体所感觉到的情绪相互和谐地共同存在。同时,平衡的状态是稳定的,不受外界的影响,而不平衡的状态则是不稳定的。这种假设所隐含的前提是:如何改变以及如何抗拒态度改变的模式。海德模式的示意图如下(见图 8-1):P 代表个体;O 代表他人;X 是第三者(人或物)。其中,实线代表正面关系,虚线代表负面关系。

从海德的平衡模式出发,可以研究乡村社会中以人际传播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某些特定社会行为的传播机制及影响力。

西奥多·纽科姆(Theodore Mead Newcomb)1953 年在海德的平衡模式基础上提出对称模式。他认为人们企图影响别人,借以维持这种对称关系。这一模式假设:力图影响另一个人,是某人对其他人所具有的吸引功能。如果我们不能经过传播达成对称关系,则我们可能要么改变对对方的态度,要么改变对客体的态度,以便建立起这种对称关系,其核心倾向是强调两人之间的传播行为(见图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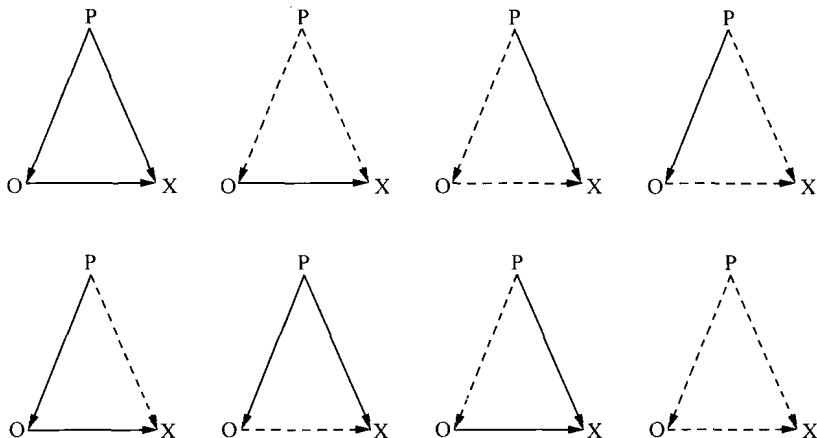


图 8-1 海德模式

资料来源:转引自〔美〕沃纳·赛佛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等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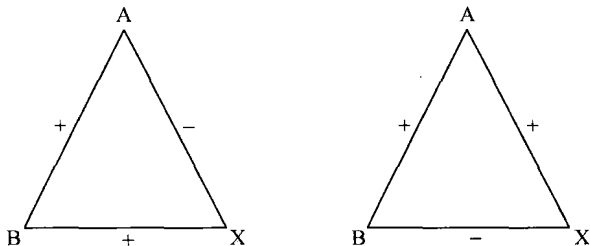


图 8-2 纽卡姆的对称模式

他假设人类对和谐有基本的需求,如果 A 与 B 对 X 的意见不同,这种倾向便取决于 A 对 X 的态度强烈程度和 A 对 B 的吸引力的强弱,如果二者都增强的话,可能会导致的结果是:A 努力达到与 B 和 X 之间的态度的对称;很有可能实现对称;A 有可能加强对 B 有关 X 的传播。

A 与 B 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A 与 B 的亲密度;X 对 A 或 B 的重要程度;A、B 因 X 发生的相关关系;A、B 对 X 的分歧程度;A 或 B 对自己态度的自信程度。<sup>①</sup> 由此而言,人际传播过程是双方关系逐步协调的过程,伴随而来的是和谐现实的人际关系建立。

对称模式可以解读不同类型的传者在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

<sup>①</sup> 转引自〔美〕沃纳·赛佛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等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7—158 页。

分离乡村社会中信息系统中的层级,剥离出意见领袖的特征,从而为实现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提供有益的启示。例如,一项农村政策借助乡村社会中哪个群体的力量,会更迅速地得以传播并获得良好的效果?一项新的技术如何通过不同乡村社会中差异的层级群体进行传播,效果才更为强大?

## 二、社会认同模式

特勒(John C. Turner)和塔吉费(Henri Tajfel)于1979年提出了社会认同模式,其目的是研究个体在群体内部的心理基础。该理论认为,首先,对群体成员的划分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根据认知的反应,而不是情感的反应来进行确定的;其次,人对社会类别的自我定位并不仅仅是一种微弱联系,在社会成员心目中,是将这种微弱联系看作社会维系群体成员身份的一种重要感觉的;再次,这种认知对社会类别的认同过程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因为它与个体对自身的认知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个体获得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感的关键依据。产生这种社会认同感的原因源自于个体对自己在社会中自我身份确定的困扰,所以个体需要认知,需要不同的群体和社会环境的支撑来获得这种个体的自身需求。<sup>①</sup>

社会认同模式有利于我们了解乡村社会中的传统习俗和价值观念,理解乡村社会中的主流意见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左右着其他相关乡村成员的意见,从而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

## 三、态度改变理论

态度改变理论首先发端于卡尔·霍夫兰的陆军实验。研究结论认为:第一,就传播来源而言,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出自不同的传播者,人们的接受程度不一样,获得的传播效果也不同。一般来说,信源的权威性、知名度越大其可信度就越高,传播效果就越好。换言之,信源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但是信源的可信度与传播效果之间的一种变动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低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由于信源可信度的负面影响,其内容本身的说服力不能得以马上发挥,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可信度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弱或消失以后,其说服效果才能充分表现出来;第二,就传播方式而言,“只说一面”的方式对于原来就赞同此观点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有较强的说服效果。“两面都说”对于原来反对此观点,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有

<sup>①</sup> 转引自[美]沃纳·赛佛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等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较强的说服效果。此外,感情的诉求方式较之逻辑理性的诉求方式更可能导致态度的改变。第三,就传播对象而言,听从性强的人容易被劝服,决定听从性强弱的是对自己的主观评价,自我评价高的人听从性弱,自我评价低的人听从性强。<sup>①</sup>

美国传播学家奥士·勒平格(Otto. Lerbinger)在《劝服性传播的设计》一书中将刺激—反应理论运用到说服理论中,提出了态度改变的五种有效模式,即刺激—反应设计、引发动机设计、认知性设计、社会性设计和性格性设计。刺激—反应设计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信息(S,即刺激);接受者(O,即有机体);效果(R,即反应),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通常以下列方式表述:S-O-R。此项设计认为,通过重复和联想,可以使受众对特定目标产生预期的印象。

学习理论倡导者则认为,态度是在刺激作用下逐渐形成和不断改变的,人们获得态度就像获得事实、概念、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习惯一样,是在刺激作用下,通过反应而不断学习所获得的。因此态度的获得经历了联系、强化、模仿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几种有关刺激经常同时出现时,就发生联想作用,就其机制而言是形成暂时神经联系。这种暂时神经联系逐渐地固定化,形成新的定势,从而使人形成新的态度,改变旧的态度。强化也是态度形成与改变中不可缺少的,它在建立暂时神经联系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强化有正负之分,奖励、赞赏、社会认可等能形成正强化,促进心理倾向的持续,产生肯定的态度;而惩罚、批判则起负强化作用,引起对某种对象的否定态度。

近年来,说服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较新进展,体现在创造了一些新的说服模式,这些模式强调说服是一个过程。主要的过程模式有三个:麦奎尔(Denis McQuail)的信息处理理论(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安德森(Norman Anderson)的信息整合理论(information-integration)和佩蒂、卡西欧皮(Petty&Cacioppi)的详尽细节可能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麦奎尔的信息处理理论提出,态度的改变包含六个阶段或步骤,每一阶段都成为下一阶段的必要前提。这六个阶段是:说服性信息必须得到传播;接收者将注意这个信息;接收者将理解这个信息;接收者接受和信服所陈述的观点;新接受的立场得到维持;期望的行为发生。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麦奎尔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补充,提出了信息处理理论的8段论和12段论。

安德森的信息—整合理论的研究取向聚焦于人们是如何积累和组织有关某个人、某个事物、情境或者思想的信息,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态度。态度是一种

<sup>①</sup> 参见[美]斯坦利·巴兰、[美]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 基础、争鸣与未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性格趋向,这种趋向表现为人们对某个事物是以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式采取行动。信息一整合取向是有关态度本质和态度变化的最常见的模式之一。

安德森认为,态度的改变过程包含了一种认知代数,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他将态度改变描述为新信息与旧信息的整合过程。旧信息由当前的态度组成,而新信息则由说服力消息组成。每一条信息都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等级值(scale value),一个是重量值(weight value)。等级指接收者对那条信息的喜好程度,重量则指那条信息对接收者的重要性或相关性。对各条信息的评价(等级值与重量值)可以由个人在处理信息时以几种方式予以结合。在实践中,这些不同的程序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sup>①</sup>

详尽细节可能模式描述的是受众接受和选择信息时的精心与否和用心程度。在信息量充盈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处在各种信息轰炸中,一个普通的接受者是不可能处理所有信息的。通常的情形是:接受者选择一些信息仔细检查,以更简略的方式对待其他信息。详尽细节可能模式将通过这两种处理信息方法进行说服的途径称为中心途径(the central route)和边缘途径(the peripheral route)。

该信息模式提出,说服既可能发生在受众高度精心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在低度精心的情况下,或发生在两者之间的任意精心程度的情况下。但在不同的精心程度下,态度改变的过程可能大相径庭。当说服发生于接收者采取中心途径时,通常是高质量的观点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被提出,当接收者被引导赞赏占主导地位的主张时,说服的效果可能最好。在边缘路径起作用时,说服不依赖于对消息周密的考虑,此时,接收者使用简单的决定规则。较之旧的说服模式,详尽细节可能模式给态度改变研究中的接受者赋予了更主动的角色作用,接受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决定是采取中心途径还是采取边缘途径,如果是中心途径,那么接受者在分析消息时就可以成为更积极的角色。<sup>②</sup>

利用相关的态度改变理论,可以在乡村传播中针对特定或具体的政策执行、乡村治理等方面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尤其是针对有差异的村落社会,需要使用不同的信息传播策略,促使村民在态度方面发生改变,以期引起其行为的最终转变。

<sup>①</sup> 参见[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sup>②</sup> 胡正荣、段鹏、张磊著:《传播学总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258页。

## 第二节 乡村传播学之宏观效果理论

### 一、创新与扩散理论

#### (一) 理论发端

创新与扩散理论首先发端于欧洲,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在1903年指出,学术研究目的是要“弄明白在一个社会中,假如同时有一百项创新以语言、虚构的想法或工业过程等形式出现,为什么只有10项可以传播而其他90项却被遗忘?”塔尔德把接受或拒绝创新看作扩散研究中关键的结果变量。他观察到一个新思想被采用的速度通常遵循以时间为横轴的S形曲线。认识到如果社会体系中观念的领导者采用一个新思想后,S形曲线会出现飞快上升。虽然塔尔德没有使用一些现代的概念,如关系网,相异性或相同性等,他对S形曲线的解释已涉及到扩散关系的思想。他指出创新的扩散是解释人们行为变化的最基本因素。“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发明和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行为”。<sup>①</sup>

与此同时,创新与扩散理论的另一个源头人类学也在逐渐露出头角。这些人类学家都被称为“英国派扩散学家”和“德—奥派扩散学家”。他们的观点相似。扩散学说是人类学的核心观点。他们认为创新只有一个传播源,更倾向于通过参与观察直接从研究对象身上获得扩散数据。通过完全沉浸在研究对象的世界中,人类学家能够对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世界观,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获得一个整体的认识。人类学家所具有的研究个体文化的能力,再加上他们长期进行的数据采集工作,使他们掌握了理解创新的结果独一无二的方法。他们更关注技术创新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传递(与一个新方法在社会或系统内进行的扩散相比)<sup>②</sup>。

1943年以瑞安(Brycc Ryan)和格罗斯(Near Gross)(1943)为代表的对杂交玉米的扩散研究,从理论框架及方法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他们对技术的接受率、影响因素、传播网的作用等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由此建立了典型的扩散研究设计方案(见图8-3)。从20世纪50到60年代间,有关乡村社会学家进行的扩散研究在美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地开展起来。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的支持以及研究者之间的广泛合作使得扩散研究形成了相互高度联结的研究网络,不断交流更新信息,培养人才,并把类似研究扩散到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扩散研究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涉及的领域除了以往的

<sup>①</sup> [美]埃弗雷特·M. 罗杰斯著,辛欣译:《创新的扩散》,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2—43页。

乡村社会学、人类学外,还包括教育学、医学社会学、传播学、市场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工业工程等领域,可以说几乎所有与行为科学有关的学科都对扩散研究进行了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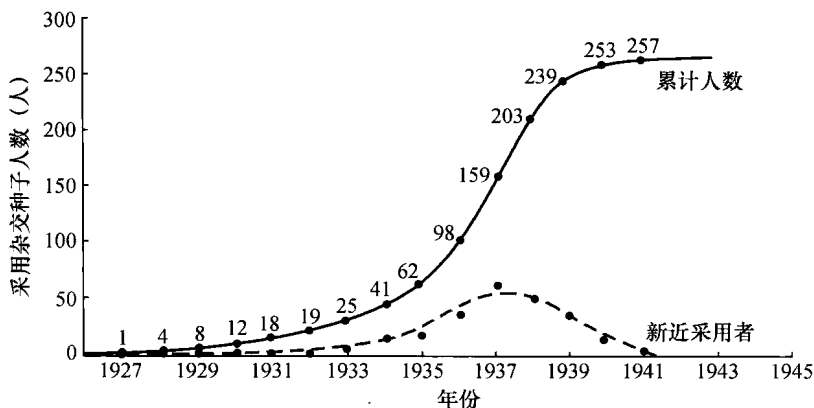


图 8-3 两个社区采用杂交玉米种子创新人数和累计人数为例

资料来源:参见罗杰斯著,辛欣等译:《创新的扩散》,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1 页。

## (二) 核心观点

1962 年,罗杰斯等通过深入调查乡村中的新事物(新品种、新农药、新机械)的采用和普及过程,出版了《创新的扩散》一书,提出了创新扩散理论,20 世纪 70—80 年代进行了修正。其主要观点认为:(1) 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的结合是新观念传播和说服人们利用创新的最有效途径,大众传播可以较为有效地提供新信息,而人际传播对改变人的态度与行为则更为有效;(2) 创新扩散过程包括五个环节:了解阶段:接触新技术新事物,但知之甚少;兴趣阶段:发生兴趣,并寻求更多的信息;评估阶段:联系自身需求,考虑是否采纳;试验阶段:观察是否适合自己的情况;采纳阶段:决定在大范围内实施;(3) 创新的过程呈钟形正态曲线,创新的累积采纳者人数呈 S 曲线分布;(4) 根据个体第一次采用新思想的时间,将具有同等创新采纳程度的个体分成一类,将其分为 5 类:① 具有创新精神的创新者;② 受人尊敬的早期采纳者;③ 深思熟虑的早期大多数;④ 持怀疑态度的后期大多数;⑤ 墨守成规的落后者。

创新与扩散理论中的几个核心概念:S 形曲线(S-shaped Curve):这是扩散理论对创新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扩散过程的形象描述,即创新的扩散,总是一开始相同时间间隔只有极少数人采纳创新,曲线上升比较慢,然后当采用者达到一定数量(“临界数量”)后,扩散过程突然加快,这个过程一直延续,直到系统中有可能采纳创新的人大部分都已采纳创新,最后扩散速度又逐渐放慢,从而系统中累



积采纳创新者的数量随时间而表现出 S 形的变化轨迹。不同曲线的斜率和渐近线不同,开始斜率大,表示扩散速度快,斜率平缓,表示扩散相对较慢;临界大多数(Critical Mass):这个概念借用自物理学中的原子链式反应,即能够使链式反应持续下去的核反应物质的数量,这是链式反应能够发生必须要跨越的门槛。在创新扩散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门槛,即创新在一个社会系统中要能继续扩散下去,首先必须使系统中一定数量的人采纳这种创新。通常,这个数量是系统人口的 10%—20%,扩散比例一旦达到临界数量,扩散过程就起飞,进入快速扩散阶段;饱和点(Saturated Point):创新在社会系统中并不总能 100% 扩散。很多创新在系统中扩散最终只能达到某一百分比。当系统中的创新采纳者再也没有增加时,系统中的创新采纳者数量(绝对数量)或创新采纳者比例(相对数量)就是该创新扩散的饱和点;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创新扩散总是借助一定的社会网络进行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每一个个体都有一定数量的社会联系,一个人的社会联系可以分为强联系(strong ties)和弱联系(weak ties),前者指与一个人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生活圈子里的人,如家人、亲朋好友等;后者指认识但交往稀少的人;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指那些社会系统中信息来源丰富、对其他人的认知和态度具有较大影响的人。

罗杰斯—休梅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创新—扩散理论的不足之处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聚合型的决策过程模式(见图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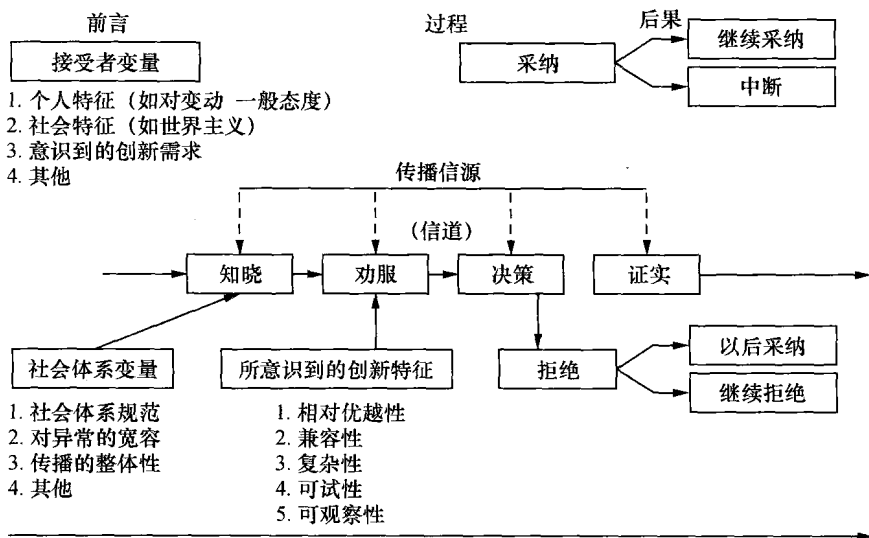


图 8-4 罗杰斯—休梅克决策过程模式

资料来源:[英]丹尼斯·麦奈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4 页。

对创新与扩散理论模式的评价:①超越现实的理想化倾向。尽管创新扩散理论来自于实践,但它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规定性的模式。它包含了过多的关于理想行动方式的假设,对创新扩散的原动力分析同样存在缺陷。麦奎尔在论述这个模式的缺点时也说过,“该模式是从外部或上级的变革力量这个角度设计出来的,这些外部或上级的变革力量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来决定什么是有利的,并通过大量的资源来促进变革”<sup>①</sup>。②传播过程过于简化。在模式中,创新采用的假设是以人的理性化选择为前提的,而且将说服和态度转变的环节放置在认知与决策中间,与实际情况不符。③有直线性传播倾向,对反馈重视不足。

### (三) 创新与扩散模式

#### 1. 传染病模式

传染病的流行是通过感染者与健康人的接触而传递的。随着疾病的传播,带菌者的数目不断增加,扩散的速度也不断加快,直到健康个体的数目所剩甚少时,蔓延的速度迅速下降。创新扩散的情况被认为与传染病传播相类似。研究者先后使用传染模型对创新扩散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这个模型方法简单并且与经验数据有着相当好的拟合度,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扩散曲线的速度上升点,和曲线上升斜率的取值各有不同(见图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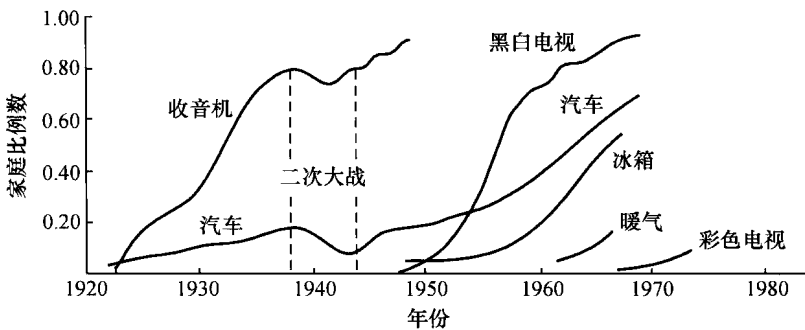


图 8-5 英国家庭采用各种用品的情况

资料来源:刘满强著:《技术进步系统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6—158 页。

对传染模型的质疑:第一,“传染模型”的分析方法是静态的,假定潜在的采用者人数和扩散的创新在扩散周期的开始和结尾都相同。然而,理论与经验两方面的证据均表明,许多创新在扩散的过程中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

①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6 页。

可以增加潜在的采用者数目,也会引起创新本身不断的完善和发展;第二,“传染模型”只考虑了扩散过程中的采用者或需求方面,但是,如果要想扩散得以完全进行下去,就必须使采用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有利可图。

## 2. 戴维斯模式

鉴于传染病模式的不足,戴维斯(Lance Davis)1979年提出了双轨迹的创新与扩散模型。第一种创新叫做A组,由技术简单而不需要场地的廉价过程组成。对于这种创新,学习效果在初期阶段显著但很快就急剧下降,使得技术在扩散过程的早期阶段就趋于稳定。第二种创新叫做B组,由技术上复杂昂贵的创新组成,通常建构在专用的基础上,并且要求在采用者的场地上有较长的装配期。这些创新生产的“块度”和小数量意味着学习效果在开始要比A组慢。然而,B组改进的范围将比较大,因而在较后的阶段,扩散的速度和扩散的上限将超过A组。A组创新的例子可以是消费品(电视机、洗衣机等),而B组的例子就是化工厂或钢铁厂。因此,不同类型的创新会导致不同的创新曲线(见图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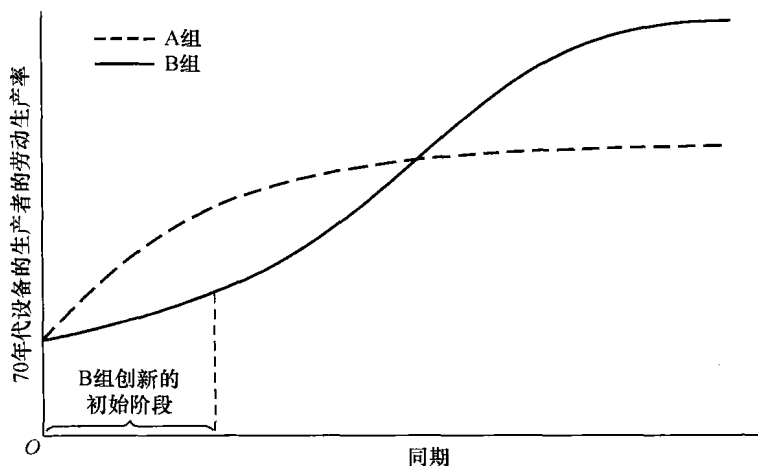


图 8-6 戴维斯模式

资料来源:刘满强著:《技术进步系统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 (三) 创新与扩散理论的实证研究

#### 1. 创新与扩散网络研究

麦克唐纳(Jim MacDonald)和威尔逊(James Wilson)使用创新扩散曲线描绘出使用网络技术的图示(见图8-7)。他们把消费者在家里使用网络和在办公室使用网络区分开。同时,他们也把使用网络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类别:尝试、信息收集、作为一个附加的渠道使用和作为一个主要的或者基本的渠道使用,并且表明这些利用是在不同的应用水平之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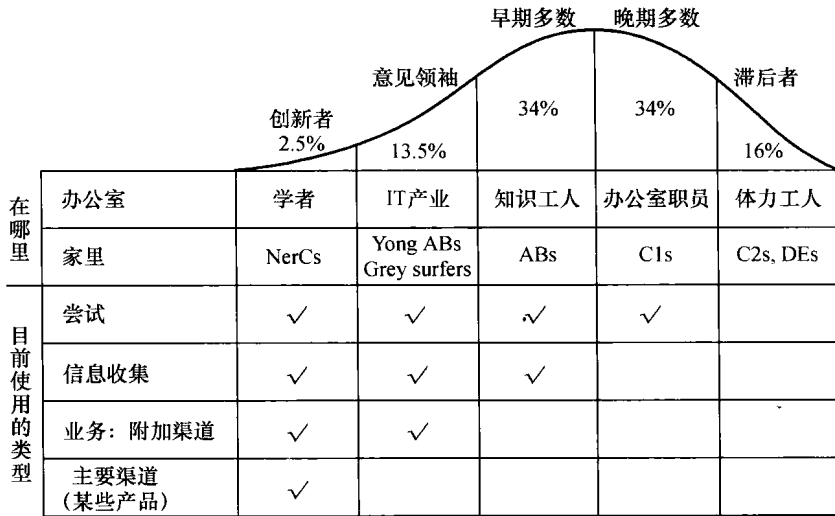


图 8-7 创新网络扩散

资料来源:麦克唐纳和威尔逊 1999a。(转引自:[英]伊丽莎白·丹尼尔(Elizabeth Daniel)等著,黄金星译:《数字时代的营销战略 在你的业务领域拓展电子商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1 页。

2. 农业创新扩散过程的实证研究

创新与扩散的逻辑曲线也即标准曲线 S 曲线,在农业技术、产品等创新扩散的实际检验中,呈现出多种形态。大致来说,具体的扩散曲线有以下几种:低效型曲线、短效型曲线、曲折型曲线、高效型曲线、速效型曲线。

低效型曲线:创新扩散速度(S)始终很慢,远没有达到一定高峰。维持时间(T)虽然较长但始终没有大面积推广应用,所以效益很低。这可能由于该创新技术难度较大或需要过高投资、推广方法不当等原因所致(见图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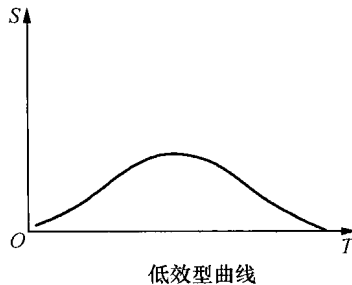


图 8-8 低效型曲线

资料来源:任晋阳主编:《农业推广学》,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2 页。

**短效型曲线:**创新扩散前期发展较正常,上升较快,但到达顶峰后很快就急速下降,即成熟期维持很短时间就衰落下来。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创新本身不过硬,被新的成果过早取代。

**曲折型曲线:**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和经济政策调控引起的创新扩散过程的变化,则成为曲折型曲线(见图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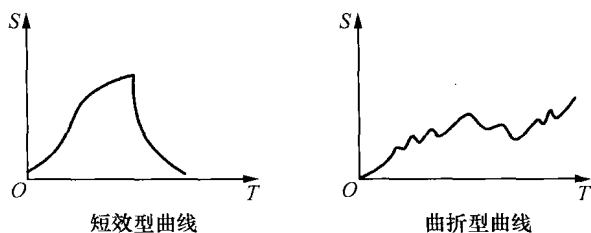


图 8-9 短效型曲线与曲折型曲线

资料来源:任晋阳主编:《农业推广学》,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3 页。

**高效型曲线:**由于某种条件优越使创新扩散阶段中省去了试验阶段,从而加速了扩散,这样形成的曲线叫高效型曲线。其条件为:创新成熟度高,适应性强,推广人员素质高、应用熟练。

**速效型曲线:**试验示范整个阶段都省去,直接进入发展期或成熟期的创新扩散过程,以速效型曲线表示。大面积应用一步到位,速度快,风险高,要注意的条件有:创新适应性极强,市场价格吸引力大,周期短,生产规模一般不大,推广人员和农民都对此创新比较了解(见图 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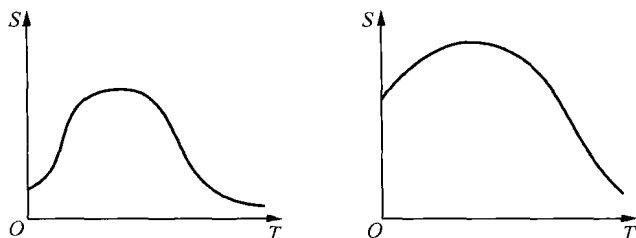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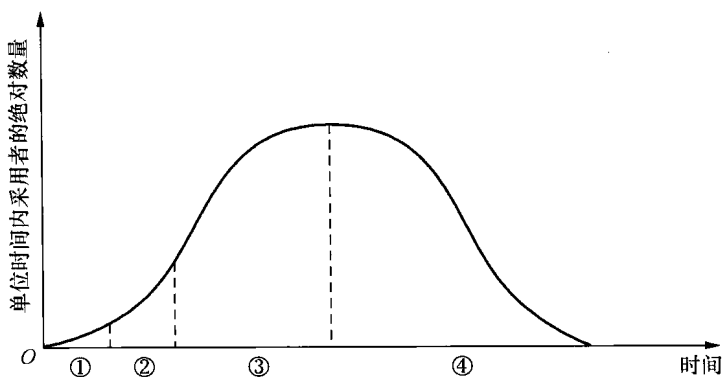


图 8-10 高效型曲线与速效型曲线

资料来源:任晋阳主编:《农业推广学》,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3 页。

如果我们把扩散规模看成是采用者的非累计数量或百分率,而不是一个累计数量,那么,通常可以画出一条铃型或波浪型的曲线,反映采用者分布频率的状况,这说明扩散曲线描述了某项创新扩散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借助扩散曲线

可以分析某项创新的扩散速度与扩散范围。前者是指一项创新逐步扩散到采用者的时间快慢,后者是指一定时期采用者的数量比率(见图 8-11)。<sup>①</sup>



铃型扩散曲线及扩散过程的不同阶段

1. 突破阶段; 2. 关键阶段(转折点); 3. 自我推动阶段; 4. 浪峰减退阶段

图 8-11 铃型扩散曲线及扩散过程的不同阶段示意图

资料来源:高启杰著:《现代农业推广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5 页。

## 二、涵化理论

### (一) 涵化(acculturation)的界定及基本类型

1910 年末到 1920 年,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 Znaniecki)出版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作者在开创了“自下而上”书写历史的新方法,即“生活研究法”的同时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也浮出水面,这就是“涵化”。20 世纪 30—60 年代成为美国人类学家探讨的重要命题,其着眼点在于居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对居从属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关注的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交往和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而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涵化问题,尤其是发生于城市多民族之间的涵化现象备受关注。在各种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中,涵化理论是与迁移者城市文化适应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理论。

所谓“涵化”,是指由个体所组成的、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直接接触,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形态发生变迁的现象。涵化有如下三大特点:第一,涵化属于文化变迁的一种,是在两个各自独立的文化相遇时发生的变迁;第二,

<sup>①</sup> 高启杰著:《现代农业推广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4 页。

涵化是一种区别于发明、发现的变迁过程;第三,涵化不是文化借用,也不是文化传播,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变迁。

涵化的类型包括结合、适应与融合、同化三种形态。(1) 结合。结合是指本文化系统中的特质与外来的特质相结合,或者说新的文化特质加入原有的体系中。涵化是在没有压力时一个文化接受的过程。一个文化系统可能自愿放弃一些原有的特质,补充一些新传入的特质,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产生许多变化之外,还有创造的过程。由于这种结合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自愿的,从而接受可以分为“逆涵化”(negative acculturation)和“顺涵化”(positive acculturation)两种。前者指在统治者或征服者强制下形成的接受,而后者则指在接触中自愿或自发产生的接受;(2) 适应与融合。适应是指把接受过来的各种文化成分同自己传统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或全部协调起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旧文化特质或外来的文化特质与原有的互相调适,或重新解释后混合形成新的系统。由于调适的方向不同,结果就可能出现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和文化融合(cultural fusion)两种情况:同化是文化接触后一个群体的原有文化完全被另一种文化所替代,往往发生在两个文化发展水平不一致的情形中,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同化。融合是指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特质融合在一个模式中,成为不同于原来的两个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系统。原先的两个系统不复存在;(3) 同化。同化是文化接触后一个群体的原有文化完全被另一种文化所取代。一般表现为,两个文化系统接触时,比较落后的文化自然地吸收先进文化的文化特质,以至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而这一群体既已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征,结果也就变成了另一个民族。而当在一个民族侵略、统治另一个民族的情况下,前者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强加于后者,当压力还未达到压倒之势时,反涵化的抗拒活动就会产生。这种反应通常称为复兴运动(revitalization movement),它指的就是在此情况下那些被统治者试图恢复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某些传统文化和仪式的运动。

## (二) 涵化与文化传播

涵化的前提条件是文化接触和文化传播。涵化和文化传播是有区别的。首先涵化强调双方长期的持续互动,双方文化的接触是全面的。而文化传播则不强调长期性,双方即使有接触也往往是局部的、规模较有限。另外,涵化过程无法区分涵化的主动方和被动方。而文化传播能明显地区分出传播方和接受方。最后,涵化的结果是双方在长期互动中通过双向传播或单向传播,使得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体系发生大规模变迁。而传播的结果是传播方的文化因素被接受方拒绝或者采借、整合,甚至还会出现一个群体的原有文化体系被另一种文化体系取代,发生质的变化。两种或多种文化一段时间的交流之后,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通常变迁先发生在文化边缘地带,然后才向文化中心推进。这种横向的文化

变迁过程在文化区的纵深发展即是涵化的过程。<sup>①</sup>

涵化理论对研究城乡社会变迁过程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对于研究乡村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转型和乡村文化的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培养理论

#### (一) 基本假设

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理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关于文化指标项目中暴力行为的成因与防治研究中。格伯纳(George Gerbner)及其同事1967年在美国暴力原因及防止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的资助下,在美国宾州大学的安南堡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开始了一系列有关电视暴力内容的研究。其研究旨在证实电视具有潜移默化的“培养”功能,即电视节目中的暴力内容标志着什么样的社会真实并且怎样影响着受众观念现实的建构。培养这个术语,则出自格伯纳在1969年发表的《转向文化指标:大众媒介信息体系的分析》一文中。

培养理论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7—1978年的发展期,第二阶段是1978—1987年的挑战期,第三阶段是1987年至今的理论拓展期。

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1)电视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2)媒介是美国社会的“重要文化武器”;(3)电视观众有关社会真实的观念更接近于电视所表述的符号现实,而非客观现实;(4)电视的主要功能是社会结构保持平衡;(5)电视对某些文化现象影响较小。<sup>②</sup>

基于上述假设,格伯纳及其同事在文化指标项目中多次实施节目内容分析和受众调查,前者即“信息系统分析”(同媒介产品相关的节目内容分析),后者就是培养分析(媒介对受众影响之分析)。

#### (二) 核心观点

格伯纳等人对美国电视节目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研究,重点探讨了电视暴力内容所建构的社会真实和对受众有关社会现实观念的影响,进而完成“暴力素描”。1976年,格伯纳等人提交的资料数据显示,在客观世界与“电视世界”二选一的向度上,重度收视者比轻度收视者提供的有关社会现实的答案更倾向于“电视世界”。重度收视者中选择电视世界答案的人数比例,减去轻度收视者中

<sup>①</sup> 麻国庆著:《走进他者的世界——文化人类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304页。

<sup>②</sup> [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319页。



选择电视世界答案的比例,所得出的百分点被解释为“培养差异”。研究者们认为,这个差异肇因于收视电视时间长短的不同,由此推论出电视具有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效果。<sup>①</sup>

为检验培养理论的适用性,格伯纳增加了主流化(mainstreaming)和共鸣(resonance)两个概念来解释不同群体间的差异。主流化指的是来自不同背景 and 不同社会群体的重度收视者,其主观现实均倾向于媒介提供的符号现实。也就是说,只要是看电视时间较多的人都对现实的认知趋同,那么培养效果就能够跨越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团体,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共鸣指的是当电视中所展现的内容和观点与个人经验一致,或当电视中的角色和自己的社会角色相当时,培养效果就会显著扩大,这一过程的形成无关收视时长的多少。可以说,主流化所强调的是由电视所建构的社会现实观念会影响到受众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而共鸣则说明个人的亲身经验在理解电视所呈现的世界时是重要的参考坐标。<sup>②</sup>

20世纪80年代,格伯纳等人又对培养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在原来的基础上将可能的培养理论分为两种类型的变量:第一级信念和第二级信念。它们表明培养效果之间存在着差异。第一级信念是指人们通过收看电视所形成的对社会现实的表面认识。它主要度量受众对真实世界中事件或事实发生的频率或概率的估计,如暴力犯罪的发生率,由此分辨受到电视扭曲的部分和反映了真实情况的部分。第二级信念则是指人们对社会现实态度层面的认识,也就是评估受众对于社会现实的一般信念,是受众根据电视内容作出的推断。<sup>③</sup>

从培养理论的视角,既可以研究三农政策在乡村社会传播中所积淀的政治价值观和国家形象观念,也可以从媒介中的价值观念对乡村社会原有价值观念的冲击进行研究,还可以对了解外来信息对乡村社会长期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估和预测,进而对乡村社会村民群体的价值观念的变迁趋势进行干预和研究。

#### 四、知识沟理论

知识沟理论的基本假设认为:信息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布状况是不平衡的。因此随着大众传播媒介体系的日益成熟,人们对其社会

<sup>①</sup> [美] 麦克·摩根、詹姆斯·尚翰著,龙耘译:“涵化研究的两个十年——一个总体评估和元分析”,《现代传播》2002(5),笔者认为培养与涵化的含义不太相同,因此这里一律改为培养。

<sup>②</sup> [美]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学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294页。

功能、尤其是信息传播功能的认知效果抱有一定的期望,认为大众传播媒介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会上的信息不均衡状况,消除信息富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的差距。借着不断发展的大众传播技术,信息可以跨越地区、国家的界限、社会阶层的界限,给信息匮乏者提供更为充分的获取信息的机会,从而逐渐消除信息流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这一充满了乌托邦色彩的期望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假设基础上:社会上每个受众都有获得均等信息的机会。

知识沟理论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大众传播媒介体系的构建,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促进信息流在社会大众的平衡作用可以实现吗?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在全国推出一部名为《芝麻街》的学前儿童启蒙教育电视系列片。学前启蒙项目的目的是利用普及率很高的电视媒介的传播,以帮助贫困家庭里的学龄前儿童接受教育,从而缩小当时富、贫家庭中的儿童所受教育的差距。这一节目播出后,实际效果如何呢?1970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纳蒂奇诺(P. Tichenor)、多诺霍(G. Donohue)、奥里恩(C. Olien)等人就该节目的传播效果进行了研究,并在《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距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说:

“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换言之,大众传播媒介对消除贫富群体之间的信息差距方面并没有积极的作用,反而是拉大了这些阶层之间的知识差距,原因在于:受众个体或群体在传播技能上的差异、知识储备上的差异、人际交往和社会网络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选择、理解和接受方面的差异以及不同媒介性质的差异等几方面的因素。

1974年,N.卡茨从新传播技术发展的角度着眼,提出了“信息沟”理论。其主要观点包括:①新传播技术的应用必然会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量和信息接触量都有所增大,但并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均等地获得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利益;②现有的信息富裕阶层通过及早采用和熟练使用这些先进的信息处理机器,能够拥有相对于其他人的信息优势;③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新的媒介技术会不断出现并加速更新,因而“信息沟”的发展趋势可能是在逐渐加大。<sup>①</sup>

罗杰斯在1976年指出,信息不仅导致知识沟的扩大,而且还导致受众在行为和态度上产生沟壑。因此,他提出将这一术语改为“传播效果沟”(Communication effect gap)。这些沟壑不一定仅仅是由不同的教育水平引起的,其他因素也可能促使这种沟壑的产生。

<sup>①</sup> 参见〔美〕沃纳·赛佛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学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

另两位研究者 J. 艾蒂玛和 F. 克莱因则提出了与“知沟”相反的观点。他们于 1977 年提出了“上限效果”假说。其核心观点是: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饱和点)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止下来。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其“上限”来得也就早;而那些经济地位低者,虽然知识增加的速度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前者在获得知识上的减速和停滞,就有可能赶上前者。大众传播活动并非扩大“知识沟”,而是缩小了它。

潘和麦克劳(Pan & J. M. McLeod, 1991)认为,现有的知识沟研究是在两种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一种是微观层次或个体层次,研究的是个人怎样获取知识;另一种是宏观层次或社会层次,研究的是信息控制及其与社会结构、权利等级的关系。他们主张系统地建立个人层次和社会层次上各变量之间的联系,以拓展知识沟理论。<sup>①</sup>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传统的大众媒介体系与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对消除城乡社会之间的差异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二者合力所构建的信息环境对乡村村民信息素养的培养、对城乡居民对同一信息接受上的差异性的消除、对信息泛滥中有效信息的选择将会发生怎样的作用?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媒介从业人员和研究者应该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 五、冲击—反应理论

冲击—反应论是美国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他认为,西方对中国产生冲击,导致中国内部的变化,从而引发中国对西方冲击的一系列反应。这种冲击导致的是一种对抗的关系,这便是也曾经支配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对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认知的一个普遍观点。在《晚清中国史》中,他描述了这种冲击—反应的具体过程。具体而言,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冲击一开始发生在商业贸易领域,接着是军事和外交领域,再接着是技术及技术人才的培养领域,最深刻的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基督教思想和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应的,中国社会则被迫接受条约制度,从军事领域开始进行主动改革,同时应对国内的各种叛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和社会阶级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进而产生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最终开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革命而不是改良的方式建立近代化的民族国家。

<sup>①</sup> 参见[美]沃纳·赛佛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学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4 页。

这一理论尽管是就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而言的,但是与心理学家在微观层面对人们行为解读的刺激—反应模式颇有相似之处。所谓刺激—反应模式原本来自19世纪末期俄国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进行的一系列生物学实验。他认为以往一些生理学家做实验时所采用的手段,或是杀死动物,或是使用强烈的麻醉剂,或是进行局部的外科手术。在动物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很难对动物的功能进行长时间的试验。因此,他开始进行从狗分泌唾液的现象入手进行研究,先给狗以灯光刺激,然后喂食物,于是在狗的大脑中就形成了灯光和食物这两个刺激物的偶然联系。对这一过程多次重复之后,便在狗的大脑中形成了条件反射,并将之称为无条件反射,这是动物和人都具备的本能性条件反射。条件反射则是人与动物在后天的社会环境中在无条件的发射基础上形成的。多拉德(John Dollard)和米勒(Neal Elgar Miller)在学习和模仿理论研究方面仿效巴甫洛夫,认为刺激泛化(stimulus generalization)是指一个习得的反应不仅可以由实际学习过程中的线索引起,也可以由其他类似的刺激引起。并用“强化理论”说明人类模仿行为的产生。认为人类的行为表现是为了满足非习得的动机如饥饿或性等原始驱力(primary drives)或为了满足学得的动机如情感、赞许、权力和成就需求。

“冲击—反应”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冲击—反应”理论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

那么,乡村社会的发展是否是在城市社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下而作出的被动式反应呢?对这一问题的认知,需要从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寻找线索。继而探索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城乡社会发展中的适应性问题,描绘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特征。

### 第三节 中国乡村传播学之效果研究

#### 一、乡村传播学总体效果研究

##### (一) 大众媒介对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力研究

##### 1. 新闻传播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 (1) 新闻传播在乡村治理中的反作用。

研究表明,由于现阶段中国的农村政策信息传播还是“直达”式的政治传播模式,即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

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科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sup>①</sup>但是这种直达式的政策信息传播模式,在大众传媒产业化并不断延伸到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调查显示农户获取农业政策的渠道按重要程度依次为:电视(65.5%),乡政府(38.7%),村喇叭(35.0%),集市(34.3%),邻居/能人(32.6%),报纸(27.8%),农技站(23.4%),宣传册(18.3%),电台(9.3%)。<sup>②</sup>显然,电视在村民获取农村政策信息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 (2) 媒介经济信息对农村受众的影响力显著。

对媒介经济信息的影响力调查显示,33.4%的受众表示,在企事业工作中,曾经从媒介中得到过帮助,26.4%的受众表示自己在种植业活动中得到过媒介的帮助,21.8%的养殖业者则表示在养殖方面获得过媒介的帮助。那么这些帮助主要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呢?22.2%的受众认为媒介帮助自己理解了国家政策,18.5%的受众表示“从媒介中了解了社会需求或从某个节目中受到启发”,分别有16.9%的受众表示“从媒介中学习了科学的生产技术”,“从媒介中知道了产品进销渠道”<sup>③</sup>。

调查结论显示,大众媒介中的经济信息对乡村受众的影响力显著。

## 2. 乡村广告传播效果

### (1) 广告对乡村消费者行为的总体影响力。

调查显示,广告对于乡村受众购买其不甚了解的商品时,所产生的影响在“一般”到“较大”之间。影响尽管不是很大却明显存在,有关乡村生产中所必需的商品,广告对其影响力甚微。农民属于经常接触媒介广告的群体。调查显示,从职业类别来看,农民群体“经常接触”国内电视广告的人数比例较高,在66.7%以上。<sup>④</sup>

### (2) 家电广告信息获取渠道及效果分析。

根据由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信息产业部有关部门

① 车英、袁松、张月盈:《试论新闻传播在乡村治理中的反作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1)。

② 常兴华主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卷二),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864页。

③ 方晓红著:《大众媒介与农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9页。

④ 李曲波著:《消费者广告回应学》,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以及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北京中企市场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乡村家电市场联合调查研究课题组,对全国 14 个省市 2 万个农村居民家庭所做的专项调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广大乡村消费者最主要的家电产品信息来源渠道是广告宣传,其中又以电视最为重要。统计表明,61% 的乡村消费者认为,电视是他们最重要的家电信息来源渠道;而有 24% 的乡村消费者的家电信息来自亲戚朋友介绍,即口碑传播。调查发现,乡村消费者具有强烈的消费趋同性,从众心理和攀比心理突出,往往是一定区域先富起来的农民购买了某种品牌的家电后,便会很快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同一区域的乡村消费者购买同样品牌的家电产品。针对乡村消费者广告诉求,要适应他们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对产品的推荐应着力强调其实用性,少做诸如“现代时尚、提高生活品质”之类空泛的宣传,要让他们看得懂,看得明白,简洁好记。调查表明,乡村消费者对以字母如“TCL”、“LG”、“JVC”等品牌的认知度非常低,说明乡村消费者与城市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存在一定差距。反观“长虹”在乡村消费者中的品牌认知度非常高,“长虹——红太阳”朗朗上口,家喻户晓。<sup>①</sup>

### (3) 农业电视广告在乡村的传播效果。

电视广告成为商品全面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改变着农民的消费习惯并成为农民选择商品的第一影响因素。12.1% 的乡村居民完全收看电视广告,是电视广告的既有受众;26.8% 的乡村观众持选择性收看态度,属于电视广告的潜在受众(见表 8-1)。此外,电视广告在乡村居民中的信任度高于其他媒介广告,中央电视台广告信任度高居榜首。<sup>②</sup>

表 8-1 乡村观众对电视广告的收看比例(%)

|                 | 收看比例  |
|-----------------|-------|
| 不换频道,观看广告       | 12.1  |
| 不换频道,感兴趣的广告内容就看 | 18.4  |
| 不换频道,去做其他事情     | 8.4   |
| 换频道             | 59.7  |
| 其他              | 1.4   |
| 合计              | 100.0 |

数据来源:北京美兰德媒体传播策略咨询有限公司(CMMR)。

### (4) 乡村户外广告的有效性研究。

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农民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和独特的认知条件,使

<sup>①</sup> 陆刃波、赵学敏:《怎样让农民看见你的广告产品》,《家用电器科技》2000(12)。

<sup>②</sup> 崔燕振:《2008 年中国农村居民媒介接触习惯与广告传播价值新探索》,《市场观察》2008(5)。

户外广告成为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其中,又以墙体广告、太阳伞广告和村务公开栏广告为代表。乡村的墙体广告跟城市的大型户外广告类似,相比而言,墙体广告设计更为简单,成本也低,但视觉冲击力更强。乡村比较空旷,色彩单一,同时农民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因此墙体广告很容易对农民的认知形成刺激;乡村商店是人员聚集区域和重要的信息交流场所,同时这些商店往往也经营服务提供商的相关业务。如果为店主赠送载有相关广告的太阳伞,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是回馈渠道商,另一方面为业务做宣传;目前基本上所有的行政村都有自己的村务公开栏,它们一般设置在村委会,人流量大。但利用率并不高,多数处于闲置荒废状态。作为政府性质的公告栏,如果能与之合作开发,其公信力和影响力将是巨大的;除了户外广告,口碑传播也是乡村宣传的一种重要方式。同一个村或邻村的村民一般彼此熟识,或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人们之间的交往多,信息传播快,能够很快地形成“滚雪球效应”。但同时口头传播也具有无序性和难于控制的特点,信息容易失真。鉴于此,可以选取村干部、乡村医生、乡村教师和保险代理员等在农村有一定影响力和交际圈较大的人作为意见领袖,由专门的客户经理跟踪,对其培训,进行节日关怀或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让其成为推动农村业务发展的重要力量。<sup>①</sup>

## (二) 城乡之间信息传播效果

城市与乡村作为社会的两个组成部分是不可能完全隔离,或者完全断裂,从绝对意义上说,城乡互动在一个社会中是绝对的,只是在互动的频率上存在多和少之分,互动的强度上有强和弱之分。<sup>②</sup> 换言之,城乡之间的信息传播始终是存在于这种互动过程中,互动频率和强弱直接决定了城乡之间信息传播的效果。

### 1. 建国初期城乡之间信息传播的畅通性

这一时期信息传播的特点表现在:① 沿袭近代以来形成的城乡商品流通的网络和结构,促进城乡物资信息交流;② 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上,也基本延续了近代以来的自发性方式。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全国市镇人口从5765万增加到7163万,增加了1398万,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从10.6%上升到12.5%,三年时间增加近2个百分点。然而,这时农民自发进城和城市就业难的矛盾已经出现。但此时对城乡人口流动仍没有严格限制,1954年9月一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仍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

<sup>①</sup> 闫德利:《户外广告和口碑传播是在农村最有效的宣传方式》,中国广告人网,2008年8月5日, <http://www.chinaadren.com/html/news/2008-8-25/2008825154111.html>。

<sup>②</sup> 程启军:《嬗变与断裂:城乡关系的动态性和结构性分析》,见徐勇主编:《中国农村研究2003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的自由。”其他户口管理的规定对人口迁移只要求办理手续,未加限制条件。1949—1958年,是建国以后户口迁移最频繁时期。仅1954年到1956年的3年间,迁移人数就达7700万。这其中包括城镇向城镇的迁移和乡村向乡村的迁移(沿海向内地和边疆移民拓荒);③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将城乡之间的物资信息交流关系转化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比价,也称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建国后,在对待工农业产品比价上,是否应尽快缩小“剪刀差”,是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保持工业生产的一定利润,在短期内不可能大幅降低工业品价格,而农民如果换不到适当的工业品,也会影响生产积极性。由于国家通过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控制了主要工农产品的比价,因此‘剪刀差’问题也就成为政府与农民关系的问题”。<sup>①</sup>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尽管“剪刀差”依然存在,但是二者比价相对还是降低了,“工农业产品比价平均指数1950年为100,1952年为90.3。其中沿海地区缩小得少,内地及边远地区缩小得多”<sup>②</sup>。

## 2.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期城乡信息交流的阻隔性

1956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盲流”问题。这些流动的农民开始对城市造成巨大冲击。1956年12月,《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政策出台,但盲流问题并没有得到制止。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于1957年3月、9月和12月连续下发通知和指示,要求各地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农民外流,开展生产自救战胜灾荒,同时禁止城市粮食部门供应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粮食,禁止工矿企业私自招用农村劳动力。1958年1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到1960年代初,严格的城市户口管理和粮食供应相结合,城市逐渐走向封闭,农民不能自由流入城市,这就在城乡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户口管理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成为阻隔城乡信息传播的制度性因素,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在这两种制度的辅佐下,使得城乡关系呈现出城乡通过隔离乡村,而达到剥削乡村资源、完成资本积累的城乡发展模式。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生产责任制在乡村的推行,乡村的信息传播市场开始活跃起来,1985年1号文件正式废除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城乡关系的制度性因素开始部分瓦解,城乡之间信息交换的不平等关系开始逐渐消除。

① 张鼎如著:《城乡和谐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 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信息传播的断裂性与延续性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崛起之后,大批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原有城乡之间的信息传播体系开始发生断裂。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市场主导断裂性结构。主要表现在:在城市,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来看,在以市场为核心的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城市并没有形成调节收入差距的机制,致使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分层的日益加剧使城市社会阶层结构最终形成了以暴富阶层和特权阶层为核心的上层社会,以白领阶层为核心的中层社会,以城市下岗工人和部分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为核心的下层社会。在这种阶层结构中,不同类型社会阶层之间逐渐形成某种“壁垒”,市民之间融合程度也越来越弱,市民之间的互动出现严重的阻滞;而在乡村,随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的功利化和疏松化,乡村社会逐渐原子化,农民之间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互助合作的关系开始消解,新型的良性互动的乡村社会关系又没有最终形成,同时农民之间的贫富悬殊也引起了农民阶层内部的分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社会的断裂。而从城市地域与乡村地域来看,由于国家行政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差别,导致直辖市、大城市、中小城市之间的不同程度的断裂,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国家政策、市场化改革实施进程的不同,导致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与中西部乡村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某种断裂。这些断裂既是由人为制度造成的,又与市场因素密切相关,但在诸多因素之中,市场因素是产生不同程度、不同类型断裂的主导因素,故把这种深刻的断裂称为“市场主导型断裂结构”。<sup>①</sup>

在这种“市场主导型断裂结构”中,城乡之间的断裂不仅仅是市场性的,还是制度性的。但是乡镇企业的力量和农民工群体的自发性改变,冲击着制度阻隔中的城乡信息传播机制,大众媒介系统,尤其是新媒体在乡村社会中的普及,也带动了城乡新型信息传播关系的建立。

概括而言,建国初期的城乡信息传播的效果主要是以制度性的约束为前提的,因此始终是一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流过程。随着乡村经济的改革、农民的行动、市场的作用、乡镇企业的发展、大众媒介系统的普及以及政府对乡村发展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新型的城乡信息传播机制正在建立。

#### (三) 乡村社会内部信息传播系统的传播效果

##### 1. 乡村交往格局的变化

从总体上看,我国乡村交往格局日益由刚性人际交往结构转向弹性人际交

<sup>①</sup> 程启军:《嬗变与断裂:城乡关系的动态性和结构性分析》,见徐勇主编:《中国农村研究2003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往结构,交往形式日趋多样化,日益突破乡土意识和宗亲观念的束缚。调查显示,对于影响观念的渠道,受家人行为影响和受大众媒介影响分别是 17.3% 和 14%。受后者的影响已经逼近前者。认为可相互托管照顾家事的人减少了,为 31.8%。村民之间以及家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如从前那般亲密了。<sup>①</sup> 电子交往没有提供时间和空间框架,在提供选择范围很大的联系方式的同时,选择又是个人的和有个人特征的,从而致使在生活中通过电子交往而产生的许多关系是短期而松散的。虽然村民之间的生活空间距离不大,但相互之间的心理距离却拉大了。电子媒介促进人际交往外延不断扩大的同时,人际交往的内涵却在不断减少,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呈现平面化趋势。

## 2. 人际网络与市场网络:农民人际交往方式的改变

人际网络与市场网络是连接农民与社会的两种不同方式,或者说,是农民社会交往方式的两种不同媒介。从中国古代农民的社会交往方式到当代农民的社会交往,这两种媒介都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人民公社组织是人际网络行政化的延伸,“从传统的人际网络走向人民公社的行政化网络,究其本质依然是人际网络平面型的扩展。国家借助行政权力组织的农民合作依然是在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平面无差异状态下的‘熟人社会’人际社会交往,……传统乡村中国的社会‘差序格局’虽然被人民公社有组织的科层结构所取代,但个人对村落(生产队)的依附性不仅未削弱,反而更加强了。尤其是在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下,农民个人自主活动的地域空间不仅没有扩展,反而变得更加狭窄了,农民更加不‘自由’了”<sup>②</sup>。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农民在市场机制下,逐渐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农民逐渐从“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进入到“陌生人社会”中。

## 二、乡村传播学本土化的传播效果实证研究

### (一) 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乡村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议程设置的基本思想来自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评论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 年,李普曼在其经典著作《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 也译为《舆论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即:“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四十余年之后,美国传播学者麦考姆斯(Maxwell Mocombs)和肖(Donald Shaw)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将新闻媒介对大众的影响设定为两个层面,第一个方面,是议题(或者说对象的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过程,这是一个外

<sup>①</sup> 朱娇娇、顾玮程:《电子媒介对我国农村交往格局的影响研究——以青浦农村调查为例》,张志安、晁小卉主编:《转型社会与中国传媒》,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8 页。

<sup>②</sup> 曹阳、潘海峰:《人际网络、市场网络:农户社会交往方式的比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1)。

显的过程;第二个方面,是公众在头脑中构成这些议题和对象时,新闻媒介所起的作用,这是一个内在或内隐过程。

这一理论说明了媒介研究领域的一些突出的现象:第一,媒介是连续不断的社会信息流传播的主要载体,大量受众以媒介为其主要的信息来源;第二,媒介以把关人的角色对社会信息进行选择,并根据其重要性进行排列,使某些事件显得更为重要。研究者们以大量的定量分析证实了媒介可以通过一定的议程设置给受众以重要的影响,同时参与了对一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建构和重组过程。

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而言,乡村传播系统中的议程设置与什么因素有关?是大众媒介设定议程吗?还是乡村社会内部自身的传播系统在起着更大的作用,还是与乡村社会外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发生某些变化?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其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信息差距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城乡之间信息传播之不对称状况,也体现在媒介议程设置的议题中了。媒介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不平等状况体现在地区间及城乡间传媒普及率的差距上。一方面,成熟的媒介均集聚在城市,乡村缺少成熟媒介。另一方面,面向城市的媒介发达,面向乡村的媒介落后;开放地区较发达,落后地区处于弱势。

在目标受众的寻求与划分上,媒介的目光始终紧盯在城市受众上,对于消费能力较低的乡村受众,则普遍采取放弃的做法。回顾全国的乡村目标受众,基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没有一个真正为自己说话的声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上,农民减负、农产品价格、农民进城打工、撤乡建镇、计划生育等等问题及报道的忽视。大众传媒往往倾向于接受、关注、讨论大众传媒所关注的问题,崇尚都市文化的大众传媒多半关注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一些话题。除了农民减负这项议程屡有出现外,其他的却多被闲置在被遗忘的角落。一些被认为是引领中国正义的栏目、报刊,如《焦点访谈》、《南方周末》在打鱼撒网后也是力不从心。由于大众媒介的较少关注而重视程度较低。由此可见,许多乡村的受众“议程”是由大众传媒代为设置的,而非农民自行设置。<sup>①</sup>

## (二) 知识沟理论在中国乡村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 1. 乡村社会内部知沟形成因素的实证研究

学者通过对健康性议题和政策性议题在乡村社会内部的实证研究指出:第一,健康卫生议题在乡村不存在“知沟”。第二,政策性议题在乡村存在“知沟”。形成知沟的原因在于:(1)大众传播媒介中,报纸有利于低社会阶层农民缩小与其他阶层之间的政策性议题的“知沟”,电视的“均衡器”作用却没有表现出来。

<sup>①</sup> 《论大众传媒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农民进城务工对乡村社会影响的对比研究”课题系列论文选,机械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2004年同济大学学生论文集。

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接触报纸越频繁,农民知道议题的概率就越大。这说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阶层,如果有良好的报纸阅读习惯,也能跨越知识的鸿沟。有线电视的拥有和接触对议题知晓率的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电视越来越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工具,其作为知识的“均衡器”的功能并没有发挥;(2) 组织传播媒介中,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低社会阶层农民缩小与其他阶层之间的政策性议题的“知沟”。农民参加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越多,其所获得各方面的信息越丰富,越能缩小与其他高社会经济地位阶层的“知沟”;(3) 人际传播中,同村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并不能有效缩小政策性议题的“知沟”,农民经常去城市中心反而扩大了政策性议题的“知沟”。因为在乡村这一社区中,聊天更多地是在同阶层群体中,而相同阶层的群体在信息获取或丰裕程度上并无多大差异。因此,虽然同质的发布者和接收者之间,信息沟通比较有效率,但是同质性也是信息扩散的障碍,因为同质扩散模式只是导致新观念在系统内水平扩散,而不是垂直扩散;(4) 受教育程度和环境因素对“知沟”影响并不显著;(5) 农民个人特征中只有年龄对“知沟”有显著影响,个人能力、动机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sup>①</sup>

## 2. 传播技术在乡村社会中消除知识沟可能性的实证研究

研究者对网络扶贫的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指出:第一,社会的变迁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各种因素的互动过程,仅凭某一因素的变化是无法实现全社会的整体变化的。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极为落后的地方,对它的改变必须从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人的现有素质出发考虑问题,而不能盲目地超越现实;第二,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不仅要建设示范性的网点和机构,更重要的是解决互联网所代表的全新的生产形态同所在地原有生产形态的“对接”,解决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服务同普通农民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对接”;第三,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互联网要有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和一定数量的“中介机构”。在目前阶段经济落后地区的普通群众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掌握互联网技术并配备计算机设备。学者由此提出信息断裂的概念。所谓信息断裂是社会断裂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指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因占有信息资源的不平均、拥有信息传播权利的不对等和信息传播的机会不公平而造成的事实上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处于弱势的群体缺乏甚至没有对外沟通的手段与机会。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地位低的一方可能完全失去了应有的传播权利,失去了在社会性大众传播媒介中发言的基本的话语权,失去了在“公共领域”中应有的位置。因

<sup>①</sup> 徐雪高:《农村各阶层“知沟”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永安市的农户调查数据》,载程昆、熊启泉、易法敏主编:《新农村建设与三农问题 2006 年全国中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论文集(下)》,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92—1000 页。

此可以说,信息断裂是影响网络媒介在乡村社会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sup>①</sup>

### (三) 创新与扩散理论在中国乡村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 1. 农业技术扩散研究

##### (1) 杂交水稻技术扩散与集体农作制的影响力研究:

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是在袁隆平教授的首创和领导下进行的,这项研究于1964年在湖南省开始。学者林毅夫经过研究指出,影响杂交水稻扩散的因素有:第一,杂交水稻对地方病的适应性问题;第二,杂交水稻的种子获取渠道和质量问题;第三,采用者的资金问题;第四,制度压力。其中,制度变迁对杂交水稻技术扩散起到了主要的促进作用。改革之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业生产结果没有市场评价,与生产者的利益也不挂钩。所以,尽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农业技术进步很快,农民采用技术的积极性并不大,农业绩效不佳。而当家庭联产承包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后,市场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作用使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高涨。以杂交水稻的推广为例,1976年杂交水稻对常规水稻的增产优势为51.6%,采用率仅为1.8%;改革十余年后的1987年,杂交水稻的产量优势降低到20.4%,采用率却提高到46.5%。从湖南省和全国杂交水稻扩散的曲线可以看出,制度化因素在其中的显著作用(参见图8-12)。<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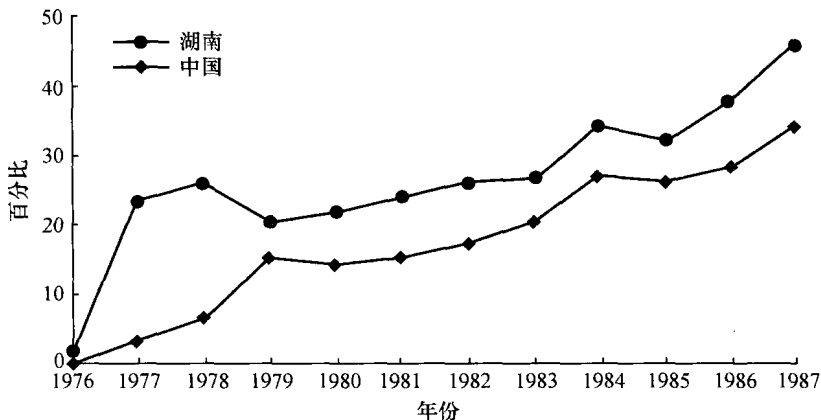


图 8-12 杂交水稻扩散示意图

资料来源:林毅夫著:《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sup>①</sup> 段京肃、李惠民、王锡苓:《信息断裂与社会断裂——一个网络扶贫个案的研究》,参见《全球化华文媒体的发展和机遇: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102页。

<sup>②</sup> 林毅夫:《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改革与杂交水稻的采用》,载林毅夫著:《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 (2) 农业技术扩散框架研究

研究者认为,第一,农业技术扩散的主体是农民。技术扩散过程中涉及了众多的参与主体,有技术的研究发明者,有政府推广机构,有经营销售部门,有技术的使用者——农户,也有基层政府及干部。以往,以至目前占主导的认识是技术扩散的主体主要在外部的努力,包括政策、投入、推广体系等,而不是技术的用户。技术扩散的主体应该是技术的受体——农民;第二,他们提出了技术的相容性理论。技术的相容性指一项技术与现存农作系统或用户系统间的吻合程度,这种相容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技术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吻合;技术应与农户需要及已有想法相吻合;技术还应与社会价值及信仰相吻合;第三,技术扩散中的媒体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技术的流动几乎全部通过行政动员与组织,只要小试成功,即大面积推广实施,农民基本没有选择的自由。进入市场经济后,除了政府发布及传播的技术外,还有很大部分来自大众媒体及其他商业团体,技术的流动由此迅速加快。以往研究对大众媒介较为重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际网络的作用。扩散的重点在规范加强对大众传播技术信息管理的同时,研究乡村人际交往网的结构及特征,并加强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以扩大村民的交际面及对技术的认同;第四,技术转化率的辨析问题。以往普遍认为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在35%左右,农业增产因素中科技成果的贡献率也在30%—40%,这中间实际存在一些误区:首先,已有的技术转化率仅是一静态,没有确切定义的概念,也没有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测算。转化只包括那些已经被农民试用了的,还是只有采纳了的才算?其次,在以往的研究模式下,许多研究成果的产生并非为了解决生产问题,而只是某些“知识、经验”的堆积。获得国家奖励的成果也并非都是可以直接应用的,其中有些可能是为了完成考核指标的。这种体制下产生的成果如何能经得起用户的检验?这样的成果再多也无助于技术转化率的提高。因此,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低是我国农业研究推广体制下诸多复杂因素影响的结果,包括科技体制的转轨、科技成果的管理与评价、技术的试验与示范、信息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农民教育与培训等。政府的功能应重在为技术的产生、交流和使用提供有效的环境支持与保障;第五,技术转化模式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启动农民需求者的动力,铺平其与技术持有者之间的沟通渠道;深入考虑技术转化在空间上的扩散过程,特别是当技术在不同社会或社区系统内扩散时,考虑实际农民之间、村与村之间交流技术时受到来自信息渠道、社会组织、供销金融等制度约束因子的影响,而这些因子恰恰正是农民接受技术时可能遇到的难以克服的因素。<sup>①</sup>

<sup>①</sup> 李季、马永良、陈阜著:《小规模农户系统下的农业技术扩散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4页。

### (3) 乡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内在机制研究

通过对湖北省三地乡村的问卷调查发现,创新传播科技在我国乡村社会的扩散情形不容乐观,在总分为10的情形下,乡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得分均值为3.91。在人口因素、媒介使用因素和人际交往因素三者之中,人口因素对乡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力最大。其中,乡村居民的大众媒介内容偏好、受访者的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响其创新传播科技采纳最主要的变量;同时,尽管乡村居民的行为因素对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有一定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其核心指标即为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乡村居民之间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差异;不言而喻,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差异将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从而对今后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产生更大影响。<sup>①</sup>

### 2. 新媒体扩散的实证研究

随着移动电话、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电脑以及互联网等在内的各种创新传播科技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因此而不断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及行为。借鉴创新与扩散的理论对新媒体技术在中国社会中的扩散研究,已有一些有益的尝试。如:金兼斌:《我国城市家庭的上网意向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金兼斌:《互联网在中国内地的扩散》,中华传播学会年会,2001年7月,香港浸会大学;祝建华、何舟:《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现状与前景:2000年京、穗、港比较研究》,《新闻大学》,2002年夏季号;周裕琼:《手机短信的采纳与使用——深、港两地大学生之比较研究》,《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夏季号等等,对新媒体技术在中国乡村的扩散状况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张明新、韦路:《移动电话在我国农村地区的扩散与使用》,《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1期;张明新、韦路:《我国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研究:人口与行为因素的影响》,《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等研究成果。这些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移动电话与互联网在乡村的扩散研究上。

研究表明:互联网在乡村的扩散有的是借助电子媒介向平面媒体的转化作用,有的是借鉴学校培育模式。前者如甘肃金塔的“网络连乡村,信息进万家”活动,当地农民中成功得到散播的是以报纸为载体的市场和农业信息,而并非互联网技术。在向农户散播的过程中,网络信息首先由数字媒体转为印刷媒体,最后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传递到农民手中,这种靠编辑和发放《经济信息导报》向农民传递信息的做法自2001年在金塔乡红光村和营泉村两个试点村试行成功后,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就迅速普及到全县75个村,导报覆盖率达到全县农户

<sup>①</sup> 张月新、张明新著:《转型社会的媒介景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的90%；后者如古浪县黄羊川的“以校领乡”模式，在古浪的黄羊川镇，互联网技术的扩散主要是在镇职业中学师生和附近部分村民两个不同群体中展开的。职业中学的师生能够直接应用互联网技术来帮助教学。网络技术在附近村民中的散播则主要依靠职业中学的校园网吧。网吧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为村民提供信息技术培训，电子商务及其他互联网服务。<sup>①</sup>

通过对互联网在西部地区扩散的这两种模式，即黄羊川模式和金塔模式的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乡村信息化的过程中，国家的资金支持、政策扶持和地方政府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二，西部地区的乡村传播系统主要由电视传播和人际传播组成，不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扩散；第三，互联网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第四，“金塔模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双向传播的渠道，即：网络信息服务中心→村级信息点→《经济信息导报》→农民以及农民需求→村级信息点→网络信息服务中心。这种互联网传播模式和低成本运营的互联网应用和推广模式，是符合西部乡村特殊的发展情况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sup>②</sup>此外，还需要在农民的知识教育和信息传播的内容定位上有所改进。这样才会有力地促进互联网等新媒体在乡村中的扩散，并与其他相关因素一起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

不论对于互联网，还是作为家庭上网最必需设备的计算机，几乎所有的乡村居民对计算机和互联网持较正面或中间态度，但其自我报告关于新技术的知识却较少或太少，而正是这两个因素影响了乡村居民的计算机和互联网采纳速度。“态度”仅受到“知识”和年龄的影响，而“知识”受到诸多行为及人口因素的影响。正面的“态度”对于乡村居民的家庭电脑和互联网采用有着积极意义，贫乏的“知识”则显著制约了新技术的采纳。因此，如何通过大众媒介、人际交往、学校教育等多种渠道增进乡村居民关于新技术的“知识”显得尤为重要。<sup>③</sup>

### 3. 苏南模式的扩散研究

在研究南京、镇江和扬州三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时，费孝通教授区分了“近距延扩”和“超距辐射”两类情况。从江苏地区大部分农村来看，它们是在主要争取远距离城市影响力的情况下努力发展乡镇工业的。他认为，这三个城市，尤其是南京和镇江，是本区域经济中心。如果把把这些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叫做“近距延扩”的话，那么远距离经济中心（如上海）的作用就可称为“超距辐射”。无论是“近距延扩”还是“超距辐射”，指的都是作为增长极大中城市对周边欠

① 赵新秋、郝晓鸣：《中国农村互联网技术的扩散》，《中国传媒报告》2006（3）。

② 王锡苓著：《互联网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研究：互联网在西部农村两种应用模式的探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170页。

③ 张月新、张明新著：《转型社会的媒介景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104页。



发达地区的积极的扩散作用。对苏南农村区域发展模式来说,来自上海的“超距辐射”与来自无锡、苏州、常州等中等城市的“近距延扩”都是不可或缺的。

对苏南模式发展而言,(1)无论是苏南的城市工业,还是农村乡镇企业,都与上海的企业有着密切的交往与合作关系;(2)上海的技术以很快的速度向苏南城、乡工业扩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南乡镇企业的许多技术骨干直接来自上海,或由上海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兼职;(3)苏、锡、常三市的城市工业迅速向附近各县的农村扩散,使城乡工业既有分工合作,又有利于对城乡经济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由此,苏南地区向着城乡一体化的方向不断发展。<sup>①</sup>

#### 4. 乡村人口流动的扩散研究

有学者通过对一个民族山区进行田野调查,从传播学、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流动”这一创新性的观念和实践在原本封闭的民族地区的扩散过程、传播渠道及其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并且从传播的角度阐释了人口流动的某些行为特点。

研究指出,外出观念的发端或来源往往不清晰,主要是因为该信息的传播渠道是人际传播。这种经商观念完全是以“一传十、十传百”的人际传播方式扩散出去的,而信息的失真与扭曲则是人际传播的一个特点。离信息源愈远,信息变异的可能越大;其次信息源对信息的控制较为有力。早期开始从事这种经商活动的人是在一种不事先声张的状况下悄悄地进行的。尽管信息传递的范围和速度被人为地控制,但同时又在不可遏止地慢慢地扩散。乡村社会的关系结构特点决定了信息传播的社区性。在经过了若干年的地下“潜流”之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信息的积累终于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信息的散播从隐秘转为公开,外出经商终于成为一种地区性的经济活动。

导致外出经商这一观念扩散的因素有:(1)新的经济活动所具有的经济效益优势。不同产业之间的利润差别很容易在实践中感受出来。“做生意,左手拿货进来,右手出去,钱就来了;种粮食周期要长,不可能很快见到效果”。商业活动比农业活动来钱快,而且有望望;(2)乡村人际传播的巨大影响力。乡民社会是熟人社会,生于斯、长于斯,人们彼此熟知,亦彼此信任。乡村的人际传播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社会土壤,也是最受信任的、传授效果最显著的传播方式。大部分家庭在听到这个挣钱的生意时,能从“知晓层次”进入“行动层次”,与乡村人际传播的高度可信性分不开;(3)村民实践过程中的“学以致用”。村民的外出是一种“亲戚带队、群体适应”的方式,一个带一个,先行者带后来人,而且通常十个八个成群地结伴而行,这个小圈子是一个互助网络。他们

<sup>①</sup> 参见张敦福著:《区域发展模式的社会学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200页。

互相学习、沟通信息、吸取他人经验,每一个初出茅庐者从前人那里学习“生意经”,认识和了解都市的生存环境,通过示范和经验传递开始了在都市里“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以群体传播的方式进行流动经验的生成与积累,这使得新的实践具有了某种可操作性。

因此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乡村人际传播的作用突出。建立在乡土可靠的人际关系基础上的传播,即使新消息是在被人为地控制的情况下,其扩散仍然显示了不可遏制的态势。通过人际传播与模仿跟随,新的生活实践在原本封闭保守的乡土社会逐渐流传开来。这一人际传播的链条使得当地人在外几乎从事着相对单一的职业。这种从事职业与地域流向的相对集中,既与流出地信息的人际传播模式有关,也与在流入地时经验与知识的群体内传播模式有关。这些新的经验与知识进而引发了流入地一系列社会结构特征再生与社会变迁。<sup>①</sup>

### 思考题

1. 名词解释:海德模式,对称模式,社会认同模式,态度改变模式,涵化。
2. 简述创新与扩散理论的主要模式。
3. 简述涵化的基本类型。
4. 简述冲击与反应理论的核心观点,并谈谈自己的理解。
5. 论述1949年以来城乡信息传播的特征,并举例说明。
6. 根据你的媒介实践经验,谈谈新闻传播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
7. 选择一份报纸,阅读有关农民受众的报道,分析在媒介议程设置中农民受众的地位和角色。
8. 互联网技术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如何?试举例说明。

### 参考文献

#### 著作

[美]沃纳·赛佛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等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美]斯坦利·巴兰,[美]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

<sup>①</sup> 王琛:《创新观念的扩散:乡村人口流动的传播学研究——一个民族地区的个案》,载刘洪一主编:《高等教育创新与探索》,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343页。

版社 2004 年版。

胡正荣、段鹏、张磊著：《传播学总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美]埃弗雷特·M. 罗杰斯著，辛欣译：《创新的扩散》，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2002 年版。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刘满强著：《技术进步系统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法]马特拉著，陈卫星译：《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2001 年版。

麻国庆著：《走进他者的世界——文化人类学》，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1 年版。

龙耘著：《电视与暴力：中国媒介涵化效果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 年版。

方晓红著：《大众媒介与农村》，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李曲波著：《消费者广告回应学》，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0 年版。

张鼎如著：《城乡和谐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7 年版。

李季、马永良、陈阜著：《小规模农户系统下的农业技术扩散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8 年版。

张月新、张明新著：《转型社会的媒介景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王锡苓著：《互联网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研究：互联网在西部农村两种应用模式的探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张敦福著：《区域发展模式的社会学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论文

[美]麦克·摩根、詹姆斯·尚翰著，龙耘译，《涵化研究的两个十年——一个总体评估和元分析》，《现代传播》2002(5)。

汤允一、陈敏琪：《台湾地区青少年电视使用个人经验与世界观——一个涵化分析研究与讨论》，参见中华传播学会网，[http://commdb.nccu.edu.tw/ccs/history\\_paper\\_list.php? P\\_YEAR = 2003](http://commdb.nccu.edu.tw/ccs/history_paper_list.php?P_YEAR=2003)。

车英、袁松、张月盈：《试论新闻传播在乡村治理中的反作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1)。

方晓红：《经济信息在苏南农村的传播现状调查研究》，参见张国良、黄芝晓主编《信息化进程中的传媒教育与研究 第二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崔燕振:《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媒介接触习惯与广告传播价值新探索》,《市场观察》2008(5)。

程启军:《嬗变与断裂:城乡关系的动态性和结构性分析》,见徐勇主编:《中国农村研究2003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朱娇娇、顾玮程:《电子媒介对我国农村交往格局的影响研究——以青浦农村调查为例》,张志安、晁小卉主编:《转型社会与中国传媒》,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

曹阳、潘海峰:《人际网络、市场网络:农户社会交往方式的比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1)。

杨育才:《党报关于农民报道的问题及对策——对7家省级党报农民报道标题的议程设置分析》,《新闻大学》2003(3)。

徐雪高:《农村各阶层“知沟”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永安市的农户调查数据》,程昆、熊启泉、易法敏主编:《新农村建设与三农问题2006年全国中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论文集》(下),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版。

段京肃、李惠民、王锡苓:《信息断裂与社会断裂——一个网络扶贫个案的研究》,参见《全球化华文媒体的发展和机遇: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林毅夫:《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改革与杂交水稻的采用》,载林毅夫著:《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8年版。

赵新秋、郝晓鸣:《中国农村互联网技术的扩散》,《中国传媒报告》2006(3)。

王琛:《创新观念的扩散:乡村人口流动的传播学研究——一个民族地区的个案》,载刘洪一主编《高等教育创新与探索》,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 第九章 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状况;二是乡村传播学在中国当代乡村社会转型中向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

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主要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传播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市场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上。研究内容则主要集中在:(1)大众媒介与三农问题关系的研究,如大众媒介在农村的综合传播效果、村民的媒介素养、村民的媒介接触行为、村民的社会传播网络等;(2)乡村信息化状况研究;(3)村民交往关系变迁研究;(4)乡村治理与大众媒介关系研究;(5)乡村媒介形态研究等几个方面。这些内容在前面的章节中都有所论述,因此,这一章节主要是就乡村传播学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发展趋势进行描述。

作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势必会造成乡村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的断裂、重组、承继、变迁等状况。在这种社会现实背景下,研究者的视野也随之发生转换。概括而言,乡村传播学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方向:一是现有研究方向的深入与细化,包括:对乡村信息网络系统研究的持续、大众媒介与乡村发展关系研究的逐渐深入、科技传播研究的多元化发展等等;二是乡村社会中的传播系统研究的专业化、深度化现象开始出现,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乡村传播制度、传播机制和组织制度、城乡传播的差异性研究、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传播性质的理性思考等;三是由乡村传播研究所引发的对传播学研究方向的影响力,体现在对传播学研究的主位思考、构建城乡传播系统议题的提出等方面。

### 第一节 大众媒介与乡村发展研究的拓展

大众媒介与乡村发展的研究,对于认识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原因在于:首先,就整个历史环境而言,自19世纪以来,

媒介的受众从一个很狭窄的群体,逐渐完成了面向广阔大众的转向。随着与逐渐兴起的大众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影响,媒介本身也完成了向大众媒介的转型。在这种转型中,媒介的大众化成为主流,媒介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在传播学兴起之后便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其次,在大众媒介转型中,大众身份的厘定成为了另外一个话题,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层次而言这个话题则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日常话语里所说的大众是哪一个群体?在何种意义上我们使用了这个概念?

在日常话语的世界里,大众是没有面目的群体,不论在何种意义上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似乎都是正确的。但这一概念本身的历史含义却揭示了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就宏观意义上而言,大众是指所有的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和观念上没有绝对的差异;同时,这一群体对拥有话语权的大众精英而言,只是中国社会大众群体的一部分;最后,就整体意义而言,大众是跨越人文地理界别、是没有地域和文化限制、但却有着类别和背景差异性的。对中国当代大众的话语世界而言,大众所隐含的前提是生活在城市的大众。随着社会的变迁,逐渐地会有一些关于乡村地区的消费者信息进入公众的视野。但经济地位的弱势和大众媒介系统的刻意忽视使得乡村群体在日常关注的话题中有意无意地被排除在大众之外了。换言之,大众媒介是在以城市为主位的前提下,使用了大众这个概念;在关注城市受众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模式的基础上,界定了中国意义上的大众在日常生活视野里的含义。这种界定的大众含义如此深刻地影响着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进行的种种社会改革的思维模式,并最终使得对大众这一概念愈加稳固地和城市生活模式连接在了一起。而在学术视野中,关于大众这一概念的界定最终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尽管,学术界关于大众文化和大众社会的研究日益增加,关于中国是否已进入大众社会的讨论却一直在继续。总而言之,对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话语而言,大众一词本身并没有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讨论大众文化可以很容易地从文化的消费角度和接受以及流行的程度来厘定其特性,而大众文化的危机性也可以从中得到很日常化的解释。遗憾的是,整个社会系统形态与大众社会及其大众这一群体的问题便被很轻易地从中被剥离掉了。

因此,日常视野和学术视野里的大众,有意和无意间遗忘了中国社会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中国农民群体,或者说,不是遗忘了,而是在不同的前提下被分解了。这种遗忘和分解很普遍化地弥漫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样也弥漫在大众媒介机制和系统中。

二战之后,逐渐兴起的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将大众触角延伸到了社

会学、管理学和经济学,乃至文化研究中,并将发展置于诸多学科的核心。假定大众媒介会对社会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传播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兴起之后,发展传播学的基本观点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同。

换言之,大众媒介与乡村发展的研究既体现在社会系统的转换中,也体现在对媒介本身的认识过程中,这两个方面共同造就了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议题。而对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则首先体现在对于大众概念的理解上;其次体现在对大众媒介体制及组织系统的运作模式中;最后,关于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思考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进而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乡村社会的变迁又将这种研究的视野引导到大众媒介与乡村发展的关系上。换言之,关于大众媒介与乡村发展的研究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走向深入和细化:

### 一、大众媒介在乡村传播系统中使用权的研究

对作为独立个体的受众而言,大众媒介的使用权和控制权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城市视野下的媒介组织机制和运作模式上,媒介的改革、经营运作也仅仅在这种视野下才是有现实意义的。目前的大众媒介研究,一方面是从宏观角度将媒介体制和组织形式进行剖析,总结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这种研究的缺陷在于容易忽视对媒介发展历程和社会背景的考察;另一方面是从微观角度运用相关的传播学、新闻学、文化研究的理论进行横断面的、有选择性的层面分析,并通过媒介种类的特性研究,进行学理上的剖析。社会变迁逐渐将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拓展到了乡村,乡村作为整体的组织形态会逐渐进入研究领域,媒介在乡村的使用权的理论研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应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大众媒介进入乡村的途径如何?对于大众媒介自身的发展而言,如何拓展自己的经营思路、如何在中国媒介市场和组织机制转换中始终保有自己的优势,并且在日益国际化的媒介竞争中优化自己的产品机构和经营模式?中国乡村社会机制和组织形态也正在逐渐变换中,如何使得这两种需求相互在实践性的、可操作性的层面上结合?这些既是媒介管理者关注的,也是从学理上研究者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无论从现实的还是从学术的角度,大众媒介在乡村的进入途径这个问题必然会首先被提出来。关于这种途径的研究必然会对媒介本身的组织模式和运作机制产生观念上的影响,对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提升无疑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推动器。关键的问题很可能是,这种途径的探索在理论上的研究大大超过在实践层面上的论证,因为其中还涉及到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化问题、性质问题、文化背景问题、社会结构形态问题以及民族心理的集体无意识问题等等。因此,这种研究趋势应该和乡村社会学、乡村文化学、乡村发展模式等

研究相结合,互相借鉴,才可能寻觅出大众媒介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乡村的途径。这些路径包括:从内容的设置到信息的传播、从机构的设置到传播模式的变换、从组织形态的考量到对乡村区域化的审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村民被动的信息接受以及对这种接受程度的实证研究上。

进入乡村的大众媒介使用权问题的考察,主要考量的是乡村社会的结构、传播系统、城乡之间传播的互动问题。特定的乡村社会结构中,大众媒介的使用权的分配是不均匀的,同样的媒介形式对不同的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和传播系统而言,权利符号和信息符号的运作是截然不同的,所达到的效果也大相径庭。从这个角度的研究将会加深对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和组织制度变迁的研究。

伴随着关于大众媒介在乡村使用权的问题,需要关注到乡村传播系统中大众媒介的作用。这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切入的研究思路,多采用实证和调查的手段,从量化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但是,仅仅从量化上的考察是远远不够的。从批判的视野和定性的角度结合量化的分析数据,才可以比较准确地从不同角度描述中国乡村传播系统中的大众媒介的使用权问题。传播学者的定性研究必然会借鉴到乡村社会学研究和乡村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并注重和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结合,才可以既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又不脱离传播学学科的独立性。

## 二、村民作为大众媒介的受众和传者的话语权问题

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特殊的群体正在逐渐分化,这种分化体现在区域化的,也体现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对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关注的是村民作为受众和作为传者的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发生在乡村传播系统中,也发生在城乡信息传播互动的过程中。村民这一特殊的群体已经开始进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了,关于这一研究群体在未来的方向将体现在:

作为传者的村民对于所要传递的信息的理解程度如何?也就是说,在理想的乡村传播系统中,作为传者的村民,他拥有怎样的传播话语权,这里的传播话语权包括:传递信息的动机和心理模式如何?对于自己作为传者的感觉如何?在传播过程中的社会角色如何?这种社会角色在传播中的作用如何?这种作用在乡村传播系统中发生着怎样的作用?对于城乡互动而言,乡村传播系统的,作为传者的村民是如何应对的?城市的信息传播对他作为个体的冲击和影响模式是如何产生的?他又是如何将这种影响在自己作为传者的角色上进行传播的?等等。

作为受众的村民,在接受中处于传播中什么位置?他的心态是怎样的?被迫的还是积极的?对于所给予的信息,他的反应是怎样的?他的解释和理解又如何呢?在接受中他的社会角色如何?社会地位如何?这种社会地位和角色对



他作为受众的影响有多大?是如何发生的?在城乡互动中的信息传播中,他作为受众的反应如何?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对于城乡信息交流互动的看法如何?等等。

对于第三个层面而言,无论村民作为传者还是受众,他拥有怎样的话语权?他接受或者传达信息的结构和组织是怎样的?在这种机构和组织中他的角色如何?这种角色可否建构他的话语使用权?话语的解释权对于他来说是自由的还是非自由的?给予了他这种话语解释和建构的权利,他是否有能力去拥有这种权利?他是否知晓这种话语权?等等。

作为乡村传播系统中的村民,其地位对于乡村传播学而言是核心的。关注乡村传播系统中的村民,关注他们的生活形态、文化积淀、政治态度等,也正是关注大众媒介如何进入乡村的途径问题。不同的是,这里关注的不是媒介的使用权问题,而是村民的话语权问题。“乡村传播系统中的农民作为群体是有个性的群体,作为个体是有血性的个体,他们站在属于自己的历史位置上,和研究他们的学者一样,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发生的区域和系统仅仅属于他们所建立的无形系统。这种无形的系统在政治制度的干预中,不断改变自身,却不会消失。在这系统中生长的村民,有着自身的自豪感和说不清、道不明的对于自身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感情”<sup>①</sup>。

对村民的话语权的研究,也是传播学中关注弱势阶层的一种需求。在传播学研究中,所谓的弱势阶层是指那些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主要是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的人群和那些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群体。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正在被大众传播事业边缘化的趋势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乡村受众是传播领域中的弱势群体,在媒介资源的享受和利用、信息接收工具的拥有量、享受媒介消费的时间、接受信息和自我表达声音的能力等方面,均不如城市受众”<sup>②</sup>。村民话语权的表达缺乏体制上的保证,也就是说,在组织机构传播体制中没有设定村民的位置。因此,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为农民说话,争取自身权益的诉诸对象。

---

<sup>①</sup> 李红艳:《乡村传播意义下的“农民问题”》,传媒学术网 2005 年 7 月 16 日, [www.academic.mediachina.net](http://www.academic.mediachina.net)。

<sup>②</sup> 陈崇山:《谁为农民说话:农村受众地位分析》,中国农村研究网 2003 年 8 月 26 日, [www.ccrs.org.cn](http://www.ccrs.org.cn)。

### 三、大众媒介与村民的观念改变问题

“在我们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我们的社会里。从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再到农民的地方性的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而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混杂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每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的”。<sup>①</sup> 这样的时代人的观念的改变更是一个应该得到关注的话题,如何改变人的观念对于乡村传播学而言,主要涉及的是大众媒介的使用在村民各种观念现代化过程中影响力的研究。这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直接关联。大众媒介在乡村的使用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力的研究趋势,将会主要依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主要从实证角度来进行研究。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以及转型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此类研究将会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 (一) 研究方法以实证性为主

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在研究大众媒介在乡村的使用状况时,研究者将基本采用调查的手段,以量化的数据来得出结论,为了避免可能造成的误差,应该使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定性资料研究相结合的手段。

#### (二) 研究内容的区域性、地域性和人文性

这是由中国的地理人文构成决定的,尤其是中国乡村的地理人文结构。地域性则是说以某一地区为研究对象,比如:江浙、西南、华中、华南等,以人文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历史变迁的溯源性,加之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开放性,还有个体的心理构成来进行划分。此类研究将会提供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区域性参考依据。地理性和地域性的研究,大至一个省,小至一个村落,都可以作为选定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对当地的大众媒介在当地的乡村社会中的作用加以界定,并就对村民的观念的改变加以实证分析。

#### (三) 研究成果上的社会性和策略性

综合以上两个研究内容,所呈现的研究成果就不仅仅是学术性的,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和策略性的。社会性的是指:此类研究成果对于媒介在推动现代化发展方面的作用进行科学化的描述,对城市大众对媒介的社会功能的认知,对乡

<sup>①</sup> 孙立平:《关注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的新变化》,《社会科学论坛》2004(1)。

村社会现代化的紧迫感的认识会因为研究成果在大众媒介上的宣传报道而更加明晰。策略性的是说:这些研究策划可以为各级政府进行媒介体制改革以及乡村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 (四) 研究视野的逐渐拓展性

从大众媒介对村民观念的改变延伸开来,其他的研究视野会逐渐呈现出来,比如:关于村民的现代化观念、大众媒介在乡村的话语权问题,乡村现代化和大众媒介的使用问题,以及大众传媒与科技传播的关系、大众媒介对于农业政策执行的作用等等。

## 第二节 乡村信息化网络建设和农业科技传播与推广研究的持续

### 一、乡村信息化网络的建设

乡村信息化主要指的是农民生活消费的信息化的,更多的是从信息科学的角度在乡村社会的传播系统中进行的。乡村信息化是农业信息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农业信息化指的是在农业领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方法手段和最新成果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在农业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农村经济、社会、技术等各个环节全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工具,实现农业生产经营、农产品营销、农产品消费的科学化、智能化过程。<sup>①</sup>农民是农业信息最广泛、最直接的利用者。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民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农民需要从微观角度了解各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供求信息,从宏观角度掌握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变化情况。他们需要依靠获取的信息来进行各种生产和市场决策,需要在网上寻求“订单农业”的合作伙伴,并随时通过网上市场买卖各种生产资料及农产品,需要直接访问农业专家网站,咨询农技知识。所有这一切,通过信息网络能够获得最快速、最直接的反映。在未来的研究趋势中,从乡村传播学的角度将会有以下的趋势:

从信息学的角度对于乡村社会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和组织之间的信息流动和协调的研究,包括:农民的信息化需求与信息网络之间的差距、媒介在农业信息化过程中的作用、农民对于信息的需求渠道和农村信息流通的问题等。

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乡村传播过程中的经济信息行为和经济传播组织行为进行研究,包括:信息的特性和信息的供给是如何在乡村传播的系统中进行

<sup>①</sup> 潘盛洲:《关于我国农业信息化问题的几点认识》,《农民日报》2005年5月19日。

的、构建农村信息化网络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信息化网络对于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乡村经济信息传播网络问题研究等。

从乡村社会发展的角度,就建立不同区域、地域的乡村传播系统中的信息系统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构建,包括:乡村信息化网络的流通模式和渠道、不同地区信息化程度的差异性研究、乡村传播系统中信息传播的特点、城乡信息化传播网络的建设问题研究等。

## 二、农业科技传播和农业技术推广研究的拓宽

农业科技传播和农业技术推广在乡村传播学未来的发展中,对于经济的促进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关于农业科技传播和农业技术推广的研究在现有的研究基础和方向上,会逐渐拓展和深入。

从乡村传播学的角度,关注的是农业技术传播行为的特殊性及其表现途径,以及如何把握它的规律和特性,从而制定有效的推广方法及策略。传播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路径及成果在二战之后开始进行,我国在农业技术推广系统中的传播学研究至今仍然处于薄弱环节。关于乡村传播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领域在未来的研究趋势表现在:

### (一) 农业科技传播研究在乡村的传播行为、传播渠道及有效性研究

关于农业科技传播的研究在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是零散的研究,无论就研究议题和研究团队而言,都没有形成规模和体系。在未来的研究中,会有这样几种趋势出现:主位的研究团队出现、一批研究力量逐渐形成;系列性的研究议题开始出现,研究成果逐渐走向深入,关于农业科技传播的理论逐渐形成;对于科技传播本身的研究视野在以乡村传播为核心的前提下,不仅注重对于科技本身的研究,而且深入到对于科技传播对象即村民的研究,人文主义的色彩和技术理念的研究将会有不同程度的融合。

### (二)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系统的实证研究的加强

就目前的实践发展而言,全国各地在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机制方面有很多的研究与实践,如南平的“科技特派员”模式,宝鸡的“农业科技专家大院”模式等,都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未来的科技推广服务系统的研究也同样会在地域化、区域化的层面上进行,侧重的是科技传播的后续服务,即乡村传播学中关于传播模式及渠道和有效性的研究。换言之,科技传播将会从乡村传播系统的研究视角去审视乡村的科技传播模式、传播渠道问题,并着手开始研究不同区域的技术传播与当地的文化经济及其政治制度变迁的关系,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的研究将会由此更紧密地和乡村传播学和乡村社会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就乡村传播学的议题而言,涉及的是如何在一定的乡村区域内使得技术传播达到最大的效果;就

乡村社会学的议题而言,涉及的是乡村社会性质和结构和技术传播构成及有效性的关系。

### (三) 构建乡村科技传播体系的理论研究

包括:农业科技传播运行机制研究、发展战略研究、公益化和产业化研究。

## 三、大众媒介与农业科技传播的关系

大众媒介与农业科技传播的关系如何?在何种意义上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何种行为下是没有相关性的?如何认识这种关系和从哪个角度认识这种关系构成乡村传播视野下一个独特的研究视点;另一个研究视点则是大众媒介对于农业政策执行和技术推广的影响研究。

### (一) 大众媒介与农业科技传播的关系研究

对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大众媒介和农业科技传播的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关于大众媒介在农业科技传播过程中的使用研究、关于大众媒介与农业科技传播手段相结合的传播学研究、关于大众媒介的科技信息传播内容与农业科技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比较研究、关于大众媒介在乡村传播系统与农业科技传播的关系研究等等。

### (二) 大众媒介对农业政策执行的影响研究

大众媒介对农业政策的影响研究,对促进政府缩小城乡差别,促进乡村现代化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决策依据的意义。农业政策在乡村的广大地区的执行和推广,在传统的意义下是制度体系的操作和运作问题,至于农业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影响的调查研究,一直是一个很模糊的地带,其原因很多,主要是基于政府的主导行为能力的结果。政策的执行程度原本也只是一种很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行为,没有可检测的量化的数据,只有一种上传下达的传播模式。在大众媒介时代,大众化的媒介受众决定了大众媒介在承担整个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载体作用。那么,与政府行为和制度安排相比较,大众媒介对于农业政策在乡村社会的传播系统中有怎样的作用?这种作用的程度如何?村民对于大众媒介所宣传的农业政策的信任度有多大?和传统的乡村政策传播系统相比,大众媒介发生的作用层面在哪里?作用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都是乡村传播学在未来的关注点。

### (三) 大众媒介对农业技术推广的作用

农业技术推广在我国有着自己的历史,与乡村传播学的结合则仅仅处在认识阶段,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于大众媒介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就更是一个新的视角了。这一研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体现在:对于大众媒介中关于农业技术推广信息的宣传和发布的内容及数量的研究、农业技术推广模式中大众媒介的

角色研究、农业技术推广的乡村传播学的意义及其对于大众媒介在其中的角色研究等等。

与农业科技传播的研究不同的是,农业技术推广更多的是针对乡村的广大村民,村民是这里的“大众”,“大众”在这里需要的是可以付诸于实践的技术手段和操作过程,大众媒介在这其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现实操作领域,乡村传播中的大众媒介是否显得无能为力呢?对这种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将会是大众媒介与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在乡村传播视野下的发展趋势,对这种趋势的关注本身也构成了乡村传播学的一个研究内容。那就是:农业技术推广与乡村传播在什么层面交叉?不交叉的部分发生作用吗?

### 第三节 乡村传播组织制度研究

中国乡村社会的传播组织制度的研究,密切关注乡村传播系统的有效运行,在机构和组织行为方面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研究思路。

#### 一、乡村作为传播组织:传者和受众的话语权问题研究

作为一个与城市相对应的概念—乡村,其内部的体系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形态在中国人文地理的演变中早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形态。在“乡村”这一大概念的视野下,将乡村作为大众社会中一个独立的组织形态对其进行乡村传播意义上的研究,切入点是将乡村作为传播组织,关注传者和受众的话语权问题。

作为传播组织的乡村的研究,在最原始的层面上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话语权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传播环境和体制中,乡村的位置如何?乡村这一传播组织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样的?应该如何应对?面对大众媒介的日益泛化,乡村在其中的传播位置如何?作为传播组织的乡村在多大意义上接受着外化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解析了这种信息?

仅仅就乡村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解释作为传播组织形态的乡村,远远不够。还应该就乡村这一概念的传播属性和传播理念进行学理上的阐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乡村,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划分和研究的依据是什么?研究的特征和方法是什么?这一研究趋势将会发生在关于“乡村”概念的探讨过程中,这种探讨过程不只是发生在传播学的领域,还将会涉及到关于围绕乡村研究的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理论论证。

传播学形态上的研究,将主要集中在:作为传播组织的乡村在哪种意义下是

成立的?这个问题的研究前提是“乡村”这一概念不是封闭的系统,在信息的社会化中始终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在开放和动态的社会结构中,乡村作为传播组织处于整体的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传播特性、传播构成、对于信息的处理过程,都将是乡村传播系统研究未来的一个前提。换言之,将乡村作为大众传播社会中的一个传播环节来看,是在大的传播理念下对乡村传播学的定位进行研究,以便为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提供学理上的论证。

作为传者的乡村在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中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而作为受众的乡村的位置和角色则是另外一个研究问题。二者角色的研究背后隐含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乡村作为传播组织的话语权问题。在大众传播的环境下,乡村作为传播组织拥有怎样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给予和传递的形态是怎样的?在乡村传播环境下的乡村作为传者的话语权是如何使用的?这种形态下的话语权的层面是如何厘定的?这种种研究问题的提出将会在未来关于乡村传播的研究中逐步进行,并逐渐走向学科的专业化和深入化。

## 二、村民传播组织形态和构成研究

对农民组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相当不少,这些研究大体上围绕着四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属性,如何对待“两社”等。其中在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上,研究者们达成了一致的共识,而在后三个方面则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论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都有呼声。尽管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呼声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研究者在应极大地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上达成一致,分歧则主要体现在对于农民组织的法律问题的质疑上、关于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属性、关于如何对待“两社”问题上。目前对于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农民经济组织上,研究者对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探讨比较多,涉及问题的范围比较广,研究也比较深入。而对于农民在政治上的组织化问题研究还比较少,目前呼声也不集中。<sup>①</sup>在乡村传播学的立场上,对于村民组织的研究则主要是从传播的结构出发,对于不同类型的村民组织的组织结构、组织行为、运作模式等等运用传播学的视角进行分析,解剖村民组织的外围和内部的传播环境、传播形态、传播类型和传播渠道,并从传播学的研究立场,将村民组织研究的性质进行分类。

<sup>①</sup> 程同顺、黄晓燕:《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共识与分歧》,农民维权网,2005年6月15日,http://www.nmwqw.com/。

很显然,这种研究的视角将会给村民组织研究带来新的研究思路,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思路所关涉的村民组织不仅仅是政治形态的和经济形态上的,还包括文化组织、宗族组织以及一些非正式的以人际传播的性质来界定的组织。对于学科建设,尤其是对于关于乡村组织研究的经济学、政治学的意义而言,从传播视角的研究提供的是对组织机构有效性的研究途径,这种研究途径在以后的研究中,必将会形成一种趋势,其意义在于可以给研究村民组织的学者提供思路上的启迪,丰富乡村传播学研究的内容。

### 三、乡村传播组织制度史研究

从乡村组织传播的研究视角延伸开来,学者的目光必将关涉到乡村传播组织制度史的研究上。村民传播组织的运作历史如何?是如何演变为今天的形态?这种组织形态的特征和历史背景有多大程度上的关联。那么,关于乡村传播组织制度史的研究会在哪种层面展开呢?

(一) 关注乡村传播组织制度史的研究,是学科建设和社会现实相结合所导致的必然性

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构建,基本立场和研究模式主要还是以传播学的古典研究模式为基点的,这一基点的研究诚然对于乡村传播学的建构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其缺陷在于:没有对中国乡村社会传播史进行解读,而关于中国乡村传播史的研究,对乡村传播系统最具现实意义的,是从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形态上进行研究,因而,未来十年的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将会在关于乡村传播组织制度史的层面上,以历史发展背景为依托,逐渐展开。

(二) 关注乡村传播组织制度史的研究,是乡村传播学研究系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如前所述,乡村传播学的构建借助的主要是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和研究范式,这种经典理论和研究范式包含的一个研究方向即是对传播组织的研究,包括组织的历史演变、运作模式等。历史的演变对于乡村中国的传播机制的作用是什么?中国乡村传播组织制度的渊源如何?和现实是如何发生连接的?等等。

(三) 关于乡村组织制度史的研究,是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已经成为、也将继续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历程,不仅仅是单一学科的使命,不同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相互补充才有可能形成关于中国当代社会以及当代乡村社会的总体风貌。因而,从传播学的视角深入到乡村社会组织制度研究中,并由此形成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乡村传播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于乡村传播组织制度的研究,除了对对象自身的理论研究和历史探源之外,对传播机制的研究也将成为一个发展趋势。所谓传播机制是指乡村传播组织中,传播的发生模式是怎样的?这种发生模式在传播组织中的作用频率如何?如何认识这种频率?政治组织体制的变化对这种传播机制的影响是什么?主要发生在哪些层面?传播机制和政治制度的变迁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去分析和界定这种关系?等等。

综上所述,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社会现实的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宏观背景而言,研究乡村传播组织制度都将会成为乡村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 第四节 乡村社会性质与乡村传播特性的理性思考

经济变革引发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废除之后,农村开始逐步建立村民自治制度,农村的行政管理体制开始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制度转变,农村基层政治民主不断扩大。农民的社会意识随之变化,自由、平等和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念逐步增强。中国农村开始逐渐走上了由家庭承包经营、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的农村现代化道路。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特点是经济改革先行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社会结构对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作用日趋明显。对农村社会结构加以研究,研究社会结构对村落发展的作用,探讨有利于农村内部发展的社会结构模式,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

##### 一、如何认识中国当代的乡村社会性质以及与中国乡村传播特性之间的关系,从理性的思考上构成了乡村传播学未来的研究趋势之一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研究,乡村社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比如:半个世纪前,费孝通先生曾给人们生动地描绘过一幅以乡土为底色的中国乡村社会图景——以家族为单位构筑的差序格局,维系着和谐的礼治秩序。费先生说:“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sup>①</sup>

对乡村传播学而言,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话题便带有了传播学的特色。因为传播学所关心的首先是一种知晓权,在同样的媒介环境、媒介制度和媒介系统中,乡村传播的受众得到的是和其他社会形态中的受众相同的信息质

<sup>①</sup>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和信息量;其次,传播学关注的是,如果具有同样的媒介条件和媒介政策,乡村传播受众的构成形态、传播效果是如何发生的,这种传播现象和乡村社会的关系如何;再次,传播学还要关注这些共享的信息内容是否在含量上对城市和乡村的群体是平等的。所谓含量包括:内容的构成、内容的轻重、话语的组成形式、话语的使用惯例等等。在信息共享的角度下,乡村因而是一个平等的和城市共存的研究地带。在这个角度中衍生出来的乡村社会性质和特征、乃至乡村社会系统、运作模式对如何认识变迁中的中国可以提供一个可借鉴的参照系。<sup>①</sup>

在乡村传播意义下对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思考将会向几个方面延伸:乡村人际网络传播的性质和特征、乡村政治文化经济组织的性质和特征研究、乡村流动人口的传播形态研究、城乡传播互动中乡村传播性质的界定等。

## 二、乡村传播的性质问题:如何界定乡村传播的性质是认识中国乡村性质和乡村传播关系的前提

因此,关于乡村传播的性质的讨论会在学界逐渐展开,其研究的层面包括:由对中国乡村传播的形态来界定其性质,形态指传播的形式、人群、模式、渠道和有效性等;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来界定中国乡村传播的性质,也就是说,从中国乡村社会已经成型的关于其性质的研究理论,界定乡村传播发生的可能性过程和传播原理;由地域性出发,从人文地理的结构划分人群,从而确定乡村传播在不同地区的性质等。

## 三、乡村传播学角度关于乡村人文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的广义研究

以传播概念为核心,乡村社会为依托,在传播的理念下,进行关于乡村人文、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发展历程的梳理,也将是乡村传播学关注的视点之一。

### 第五节 城乡传播的差异性研究

对乡村传播系统的研究,并不仅仅是以乡村社会为主体研究对象,还要以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和研究乡村传播系统与外围环境的差异性以及互动性,在对这种差异性和互动性的研究中充分反映出乡村传播的特征和本质。

自工业化以来,城市从乡村逐渐独立出来并不断扩大,城乡差别因而成为社会各界开始关注的话题。对中国而言,中国乡村首先面临着农村改革以及与城

<sup>①</sup> 李红艳:《乡村传播意义下的“农民问题”》,传媒学术网 2005 年 7 月 6 日, [www.academic.mediachina.net](http://www.academic.mediachina.net)。

市关系的问题。一方面要加速城市发展,加强城市功能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乡村发展;另一方面,乡村人口向城市地区无秩序的流入将导致城市人口的膨胀从而引发城市问题,同时会出现许多发达国家曾经历的农村地区人口过疏化、人口结构老龄化引发的村落社会解体问题;其次,中国乡村面临的是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城乡一体化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城市与乡村实现结合,以城带乡,以乡补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在这样的研究前提下,从乡村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城市传播和乡村传播的差异性,可以更好地认识目前中国的城乡差异问题,并在信息传播的结构中平衡和化解城乡差异的某些因素,将会成为乡村传播学的一个研究趋势。

### 一、乡村传播如何与城市发生关联

乡村传播的系统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模式是隶属于乡村社会内部的,如前所述,农村改革与城乡一体化是认识城乡差别的两个视角,关于乡村传播外围环境的研究包含在这两个视角之内。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所要破解的除了对乡村社会独立形态的研究外,要解决的便是乡村传播的系统本身如何在实践的、可能性的层面上与城市发生关联。

就宏观而言,城乡差异主要表现在:社会性质差异、社会化程度差异、组织化程度差异和融合化程度差异。从社会性质而言,城市是异质性社会,乡村是同质性社会;从社会化程度而言,城市社会化程度高,分工复杂,收入状况差异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意识较强,需要彼此互相帮,乡村社会化程度低,工作单一,收入状况差异小,独立性强;从组织化程度而言,城市组织化程度高,乡村组织化程度低;从融合力而言,城市融合力强,乡村融合力弱。而关于乡村传播与城市的关联研究很有可能在这几个宏观方面开始。这种宏观研究发生的可能性在于:第一,乡村在传统的观念里是一个被动地接受信息的单元,乡村的信息同时被认为是落后的、保守的,城市不需要这些信息;第二,城市的主位研究视角和研究者的城市立场共同决定了乡村传播与城市的关联,其研究必然以城市的运作机制和发生模式为参照进行;第三,对乡村社会性质的模糊性和习惯性的认识导致了这种研究视角的出现。从宏观的社会性质区分上来研究乡村传播与城市的关联,至少可以对于传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另类阐释,也可以对乡村传播的需求进行分析,进而从城市的主位立场来判定乡村现代化的需求状况。

从微观而言,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不仅仅是普遍性的一种定性化的结论。从乡村传播的角度主要体现在:城市传递的信息在乡村传播中的运作和反馈,乡村信息传播对城市信息流的影响,城乡信息传播的交互影响,这

种影响体现在信息种类的变化、信息内容的分化、信息传递模式的演化等方面。

## 二、城市传播在乡村的发生过程

乡村传播与城市的关联研究必然引起对于城市传播在乡村发生过程的研究。这里的城市传播的含义包括:首先,在中国,大众传播的主位研究集中在城市,大众传播理论的阐释通常是以城市为主要发生地的;其次,大众媒介的立场也始终是与城市的发展连在一起的,这与大众媒介的发展历程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媒介的产生与新崛起的城市对信息的需求相关,大众文化的勃发引导了媒介与大众的联系,大众又主要从消费的意义隐含的主要是城市的大众,这是当代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一。因而,城市传播从某种程度上是日常视野里的传播,这种日常视野尽管不是很清晰地以严密的方式陈述出来。那么,这里的城市传播在乡村的发生过程的研究主题,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将仍会是在以城市为主位的视角进行,研究内容将包括:

(一)城市传播到乡村的传播理念:也就是说,在怎样的传播理念下,来界定传播的内容、方式及模式;

(二)城市传播到乡村的信息类别分析:城市传播到乡村的信息内容是什么?有哪些类别?这些类别是如何确定的?确定这些类别的意义是什么?

(三)城市传播到乡村的信息渠道分析:采取什么样的渠道城市传播的信息抵达乡村?信息抵达乡村的时间间隔与城市内部传播的时间段有怎样的区别?在这些传播渠道中,哪些是最有效的?有效的传播渠道发生的可能性和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思考。

(四)城市传播到乡村的信息效果分析:哪些信息符合乡村的现实需要?这种现实需要该如何界定?

(五)城市传播到乡村的信息反馈性分析:在乡村的内部力量作用下,城市传播的信息的反馈机制如何?这种反馈如何达到城市的传播和运作机制中?对反馈的信息的分析研究?反馈的信息如何重新转换为城市传播在乡村的作用?

以上关于城市传播在乡村的发生过程的研究议题,已有一定的实证研究基础,但并没有从传播系统的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也没有形成专业的研究团队和研究领域,在未来的研究中,相信会在对这些研究议题的逐渐拓展和研究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系列和成熟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理念。

## 三、城乡传播一体化的可能性研究

城乡一体化的命题在城市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视野里已经屡见不鲜,乡村传播学也必然要触及城乡一体化的话题,只是这种触及是如何发生的?可

能性如何?

传播学学科的出现和传播概念的广泛深入,重要的影响在于:传播是一种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力量,传播的延伸和辐射关涉到的是社会形态的变迁和人的观念的转化,对于建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传播一体化的可能性可以从这里生发出来。

就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趋势而言,如何消灭城乡差别,如何使乡村的发展能够在现代化的意义上设想和构建,如何重新认识城乡差别,如何更好地完成对乡村和城市之间发展模式的探讨,并使乡村发展在具有各自特色的发展中,走向现代化之路,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对中国城乡之间差异进行全方位的认识和分析,城乡传播一体化要回答的便是如何使得城市更好地认识乡村、乡村更好地理解城市,从而构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传播学框架。

## 第六节 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主位思考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提升将引导中国的传播学向着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这种独立自主的研究将会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传播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定位;传播学者的使命;传播学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传播学的研究潮流正在蔓延,并从各个方面体现出来,用时下流行的一个词语叫做“与时俱进”来形容,很恰当。无论怎样,从外围的基础和内部的资源来看,传播学可以说俨然成为一种研究潮流,<sup>①</sup>教育的普及和学术的资源蔚然可观。在这种传播学研究环境中,如何冷静下来,抛开浮华的概念化描述,对学科本身的基本建设和理论进行审思,是必然的。乡村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体现在:传播学在中国研究的主位立场应该是怎样的?关注社会发展还是关注理论阐释?关注外围建设还是关注学科本身?应该如何看待传播学的研究历程?乡村传播学的研究与传播学的主位研究有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会把传播学研究延展到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趋势中。

自传播学进入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以来,传播学本土化问题很快就成为学者讨论的命题之一。对本土化问题的理解本身就存在差异性,差异性学科发展的趋势,各种定义和研究思路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首先,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于本土化而言,是一种在国家制度安排、民族地域和国家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下进行的研究,既涵盖了民族性也是以国家性为前提的,同时也兼顾了中国的

<sup>①</sup> 参见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绪论部分。

地理人文和历史政治的社会情境的影响因素;其次,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于本土化而言,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的出现,这种研究思路的着眼点不是仅仅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更多的是从乡村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其隐含的研究前提是:传播学应该在学科建设角度,以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为着眼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应该是传播学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方向,中国化应该是本土化的一个构成部分;传播学的研究可以在交叉学科的发展中找到本土化的研究趋势和研究方法;最后,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的意义还在于:可以在乡村传播的领域构建中国乡村社会的传播特点和性质,在传播学的经典研究理论和模式中,总结出传播学在乡村的传播规律。

就学术的建设立场而言,乡村传播学对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意义表明,传播学应该有独立的学术研究问题,而不是仅仅就传播学的原有理论加以阐释,或者只就大众媒介的发展和中國媒体的机制改革进行预测和评估。更重要的是,力图使传播学的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家庭中确立属于自己的学术规则和学术问题。

作为一门有着独立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念的学科,传播学者必然要重新思考他们的研究使命。对这种研究使命的认定,是乡村传播学关注乡村社会发展的研究领域所引发的。

由于传播学在中国的介绍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在非独立化的环境中进行的。所谓非独立化的环境是指:第一,介绍传播学的学科的基本理论的学者大都是研究新闻学和文学的,他们的研究思路和对于学科的理解有意无意中会影响到对于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独立自主性;第二,传播学引进之后,对新闻学研究的思维模式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冲击。基于这种发展状况和研究环境,传播学的研究者构成成分也具有非独立性特征,这种非独立性对研究者的直接影响是:传播学研究者缺乏明确的学者使命,只是在就学科研究而进行学科研究,在概念和理性的范畴内,进行着职业化和非职业化的研究。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思路和学科构建,将会引起传播学者对职业化的研究使命的思考,从而对传播学在中国的独立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话题在前面已经进行了论述,关于此类研究在大众媒介研究领域开始兴起。就传播学学科的建构而言,因为传播学学科在西方社会环境中诞生和发展,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虽然已经界定,但是很多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却还处于开始的阶段。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目前大都只是对这些理论进行阐释并由此进行相关的案例分析。乡村传播学通过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将会探索出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一条新思路,即将传播学的研究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总结出属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规律和研究范式。通过这种

研究将传播学在国际化的研究视域中加以拓展,将本土化的和国际化的研究结合起来。

### 思考题

1. 你如何看待传播学与乡村传播学之间的关系?结合你的理解进行论述。
2. 你认为城乡信息传播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结合你在大众媒体上所看到或亲身体验的信息传播事件进行分析。
3. 你愿意从事与乡村传播学相关的研究工作吗?为什么?

### 参考文献

#### 著作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贺雪峰著:《新乡土中国》,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 论文

孙立平:《关注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的新变化》,《社会科学论坛》2004(1)。

段京肃:《社会发展中的阶层分化和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问题》,人民网2006年4月12日,<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00/62010/62011/4292850.html>。

程同顺、黄晓燕:《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共识与分歧》,农民维权网,2005年6月15日,<http://www.nmwqw.com/>。

李红艳:《乡村传播意义下的“农民问题”》,传媒学术网2005年7月6日,[www.academic.mediachina.net](http://www.academic.mediachina.net)。

## 后 记

几经周折,总算可以交稿了。

似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旅程,在诸多烦乱的事务和纷飞的人事缠绕中,坚信思考与阅读的快乐,坚信文字的力量与理论的积淀,或者是现代生活中守候自己灵魂的一种办法。但即使如此,依然需要在现代生活的沉沦中一次次地唤醒自己,一次次地在艰难的选择中前行。

这一路上,有无数个熟知或不熟知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给予我无数次的帮助和鼓励,因此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与我相遇的人们。我的亲人们,朋友们,师长们,同事们,学生们,以及与我偶然相遇又相忘于江湖的人们。感谢你们给我的理解和支持,感谢你们对我的启迪和帮助,感谢你们的批评和指正。

感谢我的学生马喆、王刚、曹文露、邱密、马琳和王硕,他们对书稿进行了初步校对。我的同事王朋进老师不仅阅读了书稿,还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特地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还需要特别感谢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诸葛蔚东先生,没有他温和而儒雅的催促,我想这些文字或者几年之后也不一定会面世,所有不足之处,敬请诸位见谅!自然,其中的观点对错,均由作者承担全部责任,欢迎诸位同人指正批评,不胜感激!

作者

2009年10月31日于北京